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6-2006

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 年文学翻译研究

Xiaoyuan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tran_etd

Part of the [Applied Linguistics Commons](#), an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王晓元 (2006)。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 年文学翻译研究 (博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tran_etd.6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
——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

王晓元

哲学博士

岭南大学

二零零六年六月

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
——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

王晓元

论文呈交以符合哲学博士课程之部分要求

岭南大学

二零零六年

论文撮要

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

——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

王晓元

哲学博士

1895—1911年这一时期，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现有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由于受到各自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局限，均未能对这一断代史进行充分的研究。

本文采取文化研究的视角，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式——翻译社会学模式，即考察翻译场域中，翻译这一话语生产活动，如何在受到意识形态制约的同时，通过不同途径（其中特别是通过主体性）获得各种资本，尤其是符号象征资本，对现有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作用。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特别是小说的翻译，加以研究。

本文认为：翻译这一社会行为，不仅是语言之间而是处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的转换活动，因而势必会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翻译作为一种话语生产活动，亦会因此生产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由此，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本文采取纵横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纵的即历史的跨度，考察这一时期翻译行为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从文化史与思想史的高度，概述这一时期的翻译史特征，史论结合，以史为辅，以论为主。其次，截取其中某个时间横断面，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者与译者，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包括梁启超、林纾、苏曼殊、周氏兄弟），希冀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微观（文本分析）与宏观（文化研究）相结合，以微见著，从微观中看出宏观来，同时又能高屋建瓴，从宏观解释微观，总结该时期的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

本人谨声明，本论文为本人之原创性研究成果，所有引用已发表或未发表之研究作品，均已适当注明出处。

王晓元

二零零六年六月

毕业论文核准证

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
——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

王晓元

哲学博士课程

论文审查委员会：

_____（主席）
陈德鸿教授

_____（校外考试委员）
张佩瑶教授

_____（校内考试委员）
张南峰教授

_____（校内考试委员）
孙艺风博士

导师：
黄国彬教授

副导师：
张南峰教授

代教务会核准：

饶美蛟教授
研究及高级学位课程委员会主席

日期

目 录

导论.....	1
引子.....	1
研究现状.....	2
研究对象与目标.....	11
本文的论述结构.....	13
第一章 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式.....	23
1.1 翻译史研究方法现状.....	23
1.2 翻译社会学模式.....	29
第二章 社会文化语境.....	42
2.1 近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西学”话语策略.....	42
2.2 近代中国翻译的文本类型与翻译主体.....	49
第三章 文学（翻译）话语：从边缘到中心.....	56
3.1 小说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	57
3.2 翻译小说的作用.....	59
3.3 启蒙规划中的小说与小说翻译.....	61
3.4 （翻译）小说：从边缘到中心.....	66
3.5 晚清小说翻译综论.....	72
第四章 归化的颠覆：林纾的翻译.....	80
4.1 林纾的合译.....	81
4.2 个案研究.....	85
4.3 归化的颠覆.....	115
第五章 伪译：革命话语——《悲惨世界》的翻译.....	123
5.1 副文本描述.....	124
5.2 翻译分析.....	138
5.3 伪译分析：革命话语.....	157
第六章 异化的萌芽：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	174
6.1 周氏兄弟的初期翻译.....	175
6.2 周氏兄弟翻译方法上的转向.....	177
6.3 《域外小说集》.....	179
6.4 《域外小说集》的失败：多视角的解释尝试.....	193
结语.....	201
动机与目的.....	202
文本类型.....	205
意识形态.....	208
译本读者与翻译语言.....	214
翻译策略与方法.....	217
话语功能与译后行为.....	218
翻译中的主体性.....	224
对晚清文学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解释.....	226
拓展本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231
参考文献.....	233

致 谢

感谢导师黄国彬教授、张南峰教授！承蒙他们的悉心指导，我才得以顺利完成本论文的写作。四年多来，我在学业和生活上，一直得到他们的深切关怀。为学的严谨，为人的宽容，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感谢陈德鸿教授、张佩瑶教授、孙艺风博士。他们对我的研究给予了鼓励，并就本论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感谢毛思慧教授、李东辉博士的关心和鼓励。

感谢蒋嘉慧女士、陈彩云女士、赵玉婵女士、苏佩珊女士的热情帮助。

感谢刘重德教授、许钧教授、单德兴教授、王宏志教授、Theo Hermans 教授、彭镜禧教授、赵光育教授、杨自俭教授、杨晓荣教授、李运兴教授、朱志瑜教授、王继权教授。我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他们的鼓励和帮助。

感谢家人四年多来对我的支持和关心。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岭南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热情和友善，使我在研究中体会到真正的博雅教育氛围，亦将成为我对母校岭南大学的美好记忆的重要部分。

导 论

引子

由于翻译这一概念的外延过于宽泛，因而翻译史实际上可以说包括两个本身内涵相当丰富的领域：（1）翻译实践史；（2）翻译理论史。当然，构成这二者的基础的，乃是在包括历时的与情景的语境中发生的翻译现象，或可称之为翻译史的原始状态。这一点，与从事元翻译史研究的Anthony Pym对翻译史的界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Pym, 1998: 5）¹：

翻译史……是一套话语，陈述翻译场域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或被积极阻止〔因而没有发生〕的变化。翻译史的场域包括导致译文（或非译文）产生的行动与行动者，译文（或非译文）的效果，有关翻译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存在因果关系的现象。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翻译史均可发挥一个历史的作用，即启发后来者，“以史为鉴”；正如法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Antoine Berman所言：“翻译史的构成是翻译现代理论的头等任务。对自身的反思，就是自身的确立，只有这种反思运动才有着现代性，而不是一种厚古的目光。”（Berman, 1984: 12；转引自许钧，1999: 1）²

自然，无论是翻译实践史，还是翻译理论史，其背后均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理论支撑系统，这种理论可以是史学理论，也可以是翻译理论，甚至还可以是两者之外的其他理论；但无论是哪一种理论，均可统称之为翻译史理论，即元翻译史。

就本文所要研究的翻译实践史而言，实际上与翻译史同样存在三个层次：（1）翻译实践史的原始状态，即客观存在的翻译事实，包括翻译主体、文本、时间、地点、受众，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潮或运动等，以自然状态呈现，甚至因

¹ 除有说明者外，本论文中直接引用英语文本的译文均为笔者翻译。

² 笔者未能找到法文版的Berman（1984），在其英译本（1992: 20）中查到如下句子，或许可资参考，但与上引中文似乎不同：“Translation, if it wants to be capable of participating in such a movement, must reflect on itself and on its powers. Inevitably, such a reflection is a self-affirmation. And this, we must repeat, is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loaded”。

为历史的原因而有待于人们去发现；（2）翻译史实践，乃是研究者根据现有的文献与考证，试图恢复或还原翻译语境，对翻译现象所作的梳理、历史描述与解释，即研究与撰述工作；（3）翻译史学，简言之，就是对翻译史实践的归纳总结与理论建构，其研究对象是已有的翻译史实践，即各种翻译史著作与研究，总结其特征与规律，研究其态势与走向，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翻译史理论，以此指导将来的翻译史实践。可以看出，翻译史实践与翻译史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

研究现状

翻译，正如 I. A. Richard 所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曾经并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地位。

翻译史的研究，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翻译学中的一个有机构成元素。

然而，到目前为止，就本文作者所知，尚未有一种关于人类自有翻译实践活动以来的“世界翻译通史”出版。或许，这种“通史”也会像一个无法完成的“通天塔”？

纵观横览之下，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翻译史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类型：（1）地域：包括国家或者某一地区，涉及的语言对（language pair）则会超出一对以上；（2）时期：通史或者断代史；（3）文类：如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等；（4）语言：这可能牵涉到操某种语言的民族或族群问题，但同时也可能超越地域的限制，如英汉翻译史则至少包括从英国、美国、加拿大等主要英语国家与汉语之间的翻译，而其中的汉语则又涉及大陆、港、澳、台等不同地域；（5）翻译思想：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译者、不同文类等方面所体现的翻译观点、主张、思想，以至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根据上述分类来区分翻译史著作，而实际上，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则是上述几种基本类型的组合。

本文作为翻译史的一种——断代史研究，而且是文学翻译史的研究，在考察所谓的研究现状时，自然就包含了以下几个层面：（1）翻译史的研究现状；（2）

断代史的研究现状；(3) 文学翻译史的研究现状；(4) 文学翻译的断代史研究现状。虽然可以有这种层次上的划分，但下面的论述与评论，并不打算依此作出严格的区分；而是基本上先国外、后国内，再依照出版时间的先后展开³。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内（甚至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可观的气候。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翻译史研究的起步都不算早。在西方，特别是在英语共同体中，较早而且较具影响，同时又为中国学术界所知的研究，可能是 L. G. Kelly 的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1979)。或许受当时学术视野的局限，该书的考察角度或方面今天看来较为传统。而国内对西方翻译史的介绍，至今也只有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⁴。

然后是法国 Antoine Berman 的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1984)。这是一部具有相当大影响的著作，可惜因为用法语写成，其应有的影响力没有得以发挥，而其英语译本的出版则已经是八年后的事了 (Berman, 1992)。在中国，此书的内容有部分的介绍，如许钧 (1999) 等，但似乎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这里还是有必要作一简要的介绍。

近 30 年来，随着译界对翻译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有一批翻译史研究成果问世。

据许钧 (1999: 1) 介绍，法国在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成果⁵有：(1) 爱德蒙·加里的《伟大的法国翻译家》(1963)。此书以主要篇幅集中研究、介绍了法国一批具有创造意识的译家，如多莱、阿米欧、达西埃夫人等。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家，爱德蒙·加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法国翻译历史中有“自由翻译”倾向的翻译家。在他看来，他所选择介绍的那些翻译家同时也是作家，具有创造的才能。他们的翻译活动有强烈的创造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加里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本身是一个译家，崇尚“艺术性”的翻译，只从翻译结果这一层面进行评述，忽视了各种风格的翻译在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缺乏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审视目光，所以对历史上一些采用直译法的译家的评价有失偏颇。(2) 日纳维埃芙·康塔米娜主编的国际翻译研

³ 因此，表面看来，内容虽不够紧密，但实则有时间这一因素贯穿其中。

⁴ 据悉，作者正在进行修订。

⁵ 在涉及到国外有关文献时，较为理想的做法是列出相关文献的原名（包括作者与文献）等，本文中由于一些文献不是第一手的，属于转引二手性质的文献，因而无法提供原名等信息，这里特别予以说明。本文后面如有类似情形，不再说明。

讨会论文集《中世纪的译事与译家》(1989)。(3) 利埃温·杜勒斯特的《法国翻译理论研究一百年——从巴特到利特雷(1748-1847)》(1990)。如题目所示,此书着重于18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这一个世纪翻译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代表性观点的梳理,其中对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探讨,并根据译者对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态度及采取的翻译方法,对翻译的吸收与传播功能进行了分析。(4) 马利亚姆·萨洛姆-卡尔的《阿拔斯时代的翻译》(1990)。(5) 罗歇·佐贝的《佩罗·德·阿布朗古尔及其“不忠的美人”——从巴尔查克至布瓦洛的翻译与批评》(1968)。书中,罗歇·佐贝对法国翻译历史中被称为“不忠的美人”的翻译现象,特别是对1625年到1665年间法国翻译的普遍状况和主要倾向进行了研究,资料丰富,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但是,法国译论研究专家乔治·加尔尼埃认为,这是一部文学史博士论文,旨在为法国翻译史中“不忠的美人”这一翻译类型平反。该书实际上并不关注翻译本身的问题,也未就翻译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只是将翻译置放在一个具体的文学类型的关系中进行考察。(6) 米歇尔·巴拉尔的《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与思考》(1995)。

在加拿大,有Jean Delisle的*Translation in Canada, 1534—1984* (Delisle, 1987), 和Jean Delisle & Judith Woodsworth主编的*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1996)。后者主要考察译者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同类著作中最具影响力。

在美国,André Lefevere编辑出版了*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1992),此书收录的文献历史地展现了西方不同时期与地域的翻译思想;在此之前,Lefevere还出版了*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 (1977)。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几种有关翻译史的著作(包括文集),如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主编的*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0); Tejaswini Niranjana的*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1992); Willis Barnstone的*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1993); Lawrence Venuti的*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4); Maria Tymoczko的*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1999); 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这几部著作论述的对象是具体的国家或地域，具体的时段或文类，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几乎完全跳出了以前局限在翻译本体范围的圈子，从不同的视角，从文化的高度，展开了论述。而值得指出的是，美国 Edwin Gentzler 的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1993; 修订版, 2001) 则是一部梳理当代翻译理论流派史的著作。此外，国际译联 (FIT) 也成立了专门的翻译史委员会，并且以不同的形式 (如光盘)，展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翻译史研究的努力与成果。

国外研究中尤为引人注目者，当为在西班牙执教的 Anthony Pym 所著的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1998)。严格地说，Pym (1998) 并非一部研究翻译史的著作，而是一部元翻译史著作，即研究如何进行翻译史研究的著作。要言之，Pym (1998) 在翻译史的研究中，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在中国 (包括港、澳、台等)，第一部史论性质的著作⁶是韩迪厚的硕士学位论文，1969 年以《近代翻译史话》为名在香港出版 (韩迪厚, 1969); 1975 年台湾出版了陈鹏翔编著的《翻译史·翻译论》(1975)。第一部翻译史著作，则是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该书在吸取了前人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历时地叙述了中国翻译史的大致情况；但或许正因为是“第一部”，此书不可避免地具有几乎所有“第一部”可能具有的不足。该书作者此后作了增订，出版了《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98)。尤可注意者，作者还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翻译史》(上卷)(1999)；该卷著述的对象则是周代—清代这一历史时期。显然，作者的立意是撰写第一部中国翻译通史⁷。但或许因为作者所采取的视角与立场的关系，这几部著作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或类似的问题：没有理论框架，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罗列；但作为第一部，其历史贡献则不容抹煞。

从马祖毅 (1999) 的目录⁸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历史阶段之内，将论述范围分为：(1) 外事翻译；(2) 宗教翻译；(3) 国家内民族间的翻译；(4) 科学翻译；(5) 西学翻译；(6) 文学翻译。但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这种分类存在着

⁶ 关于翻译文学史的编写，谢天振 (1999: 256) 指出，“开此先河者是阿英的《翻译史话》”，尽管这部史话没有写完，只有四回，而且是“套用我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形式” (257)，但作者阿英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字字有根据，事事有出典，考证与叙述之严谨与严肃的学术著作并无二致” (259)，不过毕竟是“一部通俗性的大众读物” (同上)。此外，1959 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 57 级全体同学编著了《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但未正式出版 (参见谢天振, 1999: 261—270)。本文对此二者因而一律不加论及。

⁷ 据悉，马祖毅目前正致力于下卷的写作，整部“通史”将分三卷于 2008 年前后出版。

⁸ 马祖毅 (1999) 除“概说”外，共分为六章，各章标题如下：第一章 从周到清各朝外事机构之沿革与口笔译活动；第二章 宗教文献的翻译；第三章 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互译；第四章 明代以前及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第五章 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西学翻译；第六章 从东汉到清代的文学翻译。

分类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如果说该书从总体上说建基于翻译类型之上，然后在每一类型中再按历时的角度进行叙述，那么其中第三章“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互译”作为其中的一类，明显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原因是这种国家内部民族之间的“互译”完全有可能涵盖诸如“宗教”、“科学”、“文学”翻译等类型。我们且不说实际情况如何，单就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就已经显出其分类的理论不足之处。

1989年，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出版；作为国内第一部较为详细而又相对全面的文学翻译史论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⁹。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大多是从事比较文学的学人；或许正因为如此，与此前的马祖毅（1984）相比，除了考察的对象不同之外，其考察的角度与范围亦有所不同。从该书的章节目录可以看出，编者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¹⁰，涉及的时间跨度达一百多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66年“文革”前夕，论及的对象有译者、机构与社团、思潮，以及国别等。作者在“编后记”中说：“我们撰写中国翻译文学史时，以文学翻译活动的事实为基础，以脉络为主，阐明翻译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规律，并力图对翻译文学家的翻译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的继承和相互影响，翻译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和它同其他形式的文学基本的不同点等问题进行探讨。”

（陈玉刚，1989：405）

1991年，臧仲伦的《中国翻译史话》（1991）出版¹¹。

1993年，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1993）出版，后来又有李亚舒、黎难秋的《中国科学翻译史》（2000）出版。这两部著作均属于科学翻译史¹²。

1996年，孙致礼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6）出版。该书作为（英美文学翻译）断代史的第一部著作，其主要意图之一乃在于为此一时期的翻译家作传；其主要特色，正如有论者所说的，是“不仅介绍了翻译

⁹ 谢天振（1999：274）指出，陈玉刚（主编）（1989）“这样一部著作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文学翻译史’，而不是‘翻译文学史’”；但《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一书的副主编之一刘献彪告诉谢天振说，他在撰写《史稿》时，“是尽力想把它写成翻译文学史”（1998：152）。

¹⁰ 谢天振（1999：271）通过对照后发现，陈玉刚（主编）（1989）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同学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1959）“两者在全书的编写方式上竟如出一辙”。但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一书的副主编之一刘献彪在写给谢天振的信中说，“我本人在参与撰稿、审稿、定稿过程中，都未见到《[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并通过仔细对比，不但目次“不一样”，而且“内容则更大不相同”（1998：152）。

¹¹ 笔者虽未见到该书，但从书名中的“话”来看，似乎并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专著，更为合适的归类可能是通俗性质的读物。

¹² 这两部书因为既不属于翻译通史，又不属于文学翻译史或翻译文学史，故此不予评述。

家的总体翻译活动，而且对翻译家的具体翻译成就得失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注意”（谢天振，1999：286—287）。但作者在这部书中尚未体现出一定的理论深度。所以如此，或许因为作者在当时主要是一个翻译实践者。在资料收集方面，则由于受作者用意的限制，也显得不够丰富与完整。

1992年，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修订本，2000）出版。此书作为国内第一部有关中国翻译理论的史学著作，不但纵向检阅了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历程，而且也涉及不少翻译实践史的方面；其优势体现在作者本身不但接受过专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训练，而且也是该领域的研究专家；美中不足之处乃是：由于作者本身未曾受过翻译研究的学术训练，无法对所挖掘出来的史实进行理论分析；尽管如此，作者仍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并可能引导研究者由此进一步接触第一手材料。

1995年，Lydia Liu的*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1995）出版，该书的中译本《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刘禾，2002）也于2002年出版。此书虽然不是专门的翻译史，但对翻译研究——包括翻译史研究——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尽管这一价值尚需时日方可体现出来，因为此书出版至今，英文版将近十年，而中文版也近两年，但在翻译研究界，其参考引用率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接近于零。¹³

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1996）虽然带有史的性质，但严格说来，乃是一个个案研究。而王克非（编著）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虽然编著者本人的著作部分并不多，编著者却能根据自己的理念，从不同时期（以中国为主，但也有国外的）有关翻译的论述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论说，串成了一条主线：翻译与文化。¹⁴

1999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小说史论》（赵光育，1999），可谓从具体文类——小说——的角度探讨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部著作。作者将中国小说翻译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1）近代；（2）现代；（3）当代；并针对不同时期的特点展开论述：“近代编”主要以译者为主；“现代编”则涉及文学社团、文学思潮及其翻译，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译者；“当代编”则突出不同地域或国家的小说在中国

¹³ 刘禾现在在美国大学执教，但因为其所讨论的对象属于中国的，故在此加以论及。

¹⁴ 另参见本文第一章中有关论述。

的译介及译者群体的介绍。此书主要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当代编”在整体上的把握不够，或许是因为论者与所考察的对象之间的时空距离太近。

1996年出版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邹振环，1996），虽然不是有关翻译史的著作，却也是对中国翻译史上不同时期——主要是明清之际到1949年这一“近代”——具体个案所作的描述及分析；作者“以明清之际至新中国诞生前的三百余年西学翻译为考察对象，采用翻译作品为主线，以这三百余年影响较大的一百种译作的出版先后为经，以这一时期的文化人与文化运动为纬，来展示一部西书中译的历史以及这三百年来西书中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邹振环，1996：vi）。作者选择译作的标准是“译本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回返影响，也有超越影响”——具体说来，标准有：（1）“产生共时性与历时性重大影响的名著”；（2）“译作虽非名著，但在当时流传甚广并深刻地影响过国人的思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强烈的反响”；（3）“影响深度也许有限，但在当时却是轰动一时或风靡文坛的译作”；（4）“影响较深的文学名著或是其他学科输入史的‘第一部’”（邹振环，1996：vi-vii）。然而，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由于本书结构的限定，它不可能是一本面面俱到的中国近代翻译史，也不可能提供三百余年来最有影响的西书中译本完整无缺的历史记录”（邹振环，1996：vii）；同时，“这种入选标准是受到作者个人视界的限制，也与作者手头掌握的材料有关”（同上）；作者在“前言”结尾指出：“本书大致以这些原著某个较有影响的译本的出版先后为序，努力在独立成篇的札记间寻找相互的联系，以建立一定的连贯性”（邹振环，1996：ix）。1998年出版的《江苏翻译出版史略》（邹振环，1998）则是一部地域翻译史。

199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1998），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其优点或者说优势是作者本人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出版过文学史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在事实上占有一般从事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史研究的学人所无的优势；不足之处则是，作者并未接受过翻译研究的专业训练，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具有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史研究的视野，因而在面对较为丰富的翻译史事实时，无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阐述。

从郭延礼(1998)目录¹⁵可以看出,该书的主体包括两篇:上篇在概述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点”之后,分门别类地论述中国近代的“翻译诗歌”、“翻译小说”、“翻译政治小说”、“翻译侦探小说”、“翻译科学小说”、“翻译戏剧”、“伊索寓言”等,但将“翻译文学理论”归类于上篇,似乎亦存在不类的感觉,当然它更不是评论者所说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高旭东,2000:145),而是文学翻译理论。此外,在章节结构的安排上,此书似乎也有可商榷之处:上篇中的第一章“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点”、第三章“中国近代翻译小说概论”,从某种意义上言均属于综论性质;前者可谓对全篇甚至全书的总括,后者至少可以说是对其后的“翻译政治小说”、“翻译侦探小说”、“翻译科学小说”的总括;两类不同的概括,该书却加以并列安排。从下篇的目录可知,探讨的对象均为译者这一翻译中的主体之一,但在标题上却有时“有意”标出诸如“诗歌翻译”、“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等。作者这样做,或许是为了醒目,甚至是为了照顾不同语言或国别与文类,但这种突显损害了作者原本的翻译“主体”意识。

1999年出版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王宏志,1999)虽然主要是个案研究,但却能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而且较为偏重翻译理论的探讨。

2000年出版的《翻译史话》(王晓丹,2000)并未开展深入的研究,而是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性质上而言基本上是一种通俗读物。

2000年出版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邹振环,2000)则是针对上海这一地域在20世纪这一时段,考察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该著作主体框架包括九个章节,纵向以编年史的形式对上海翻译出版史料进行了梳理,并对各个时期横向地以出版活动为核心,对译家、译作、翻译机构和文化社团、文化论争与翻译出版的关系加以分析,从而论证上海翻译出版与上海文化变迁的关系。”(柯亚,2002:145)正如作者所言:“一部上海城市史,就是一部上海开埠并接受欧风美雨、走向近代化的历史:一部上海翻译出版史,

¹⁵ 郭延礼(1998)目录为:绪论;上编:一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点;二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理论;三 中国近代翻译诗歌鸟瞰;四 中国近代翻译小说概论;五 中国近代翻译政治小说;六 中国近代翻译侦探小说;七 中国近代翻译科学小说;八 中国近代翻译戏剧述略;九 中国近代伊索寓言的翻译;下编:一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二 严复的“信、达、雅”及其翻译;三 林纾的翻译及其历史地位;四 苏曼殊、马君武及其他诗歌翻译家;五 周桂笙、奚若及其他;六 吴栻、戢翼翬、陈霞与俄罗斯文学翻译;七 伍光建、曾朴与法国文学翻译;八 陈景韩、包天笑与周瘦鹃;九 “五四”前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活动;十 “五四”前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的文学翻译活动;结束语;附录。

也是上海开埠后上海的翻译家和出版家用一种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通过翻译出版寻求文化会通而最终期望超越的一部文化奋斗史。”（邹振环，2000：30）

2000年，王宏志（编）的《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2000）与David Pollard 编的*Creation and Transl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1998）则均为同一研究项目的结题成果。这两部论文集展示的是课题组对“中国近代”“翻译小说”不同侧面的考察。Pollard（1998）将所收集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1）背景（Background）；（2）译本（Translated Works）；（3）思潮（Making Waves）。王宏志（2000）在内容上与Pollard（1998）有部分重叠（实际上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也没有分类，但也有类似的思路。二者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其专业并非从事翻译研究，而是从事文学、历史研究的学者，但因为项目主持者为翻译研究学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带有跨学科的性质；除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给翻译研究领域带来有益的启示外，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2003年，王建开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2003）集中讨论1919—1949年间英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并“为突出重点，确定了六个方面”（vii），主要包括：（1）积习与转折：五四时期关于译介方向的论辩；（2）域外来风：译介态势与成因；（3）现代文艺期刊对译介的推进；（4）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5）对英美文学的不同评说与选取；（6）英美文学译介实用倾向的语境因素。作者亦认为，“研究翻译文学，有两个方面可写”：“一是从史料的角度，对不同阶段的译介状况作描述，并从中引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一是运用理论系统，从某几个视角切入作观察”（vii），作者在该书中则“尽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史中有论，论中有史”（同上），但总体看来，还是以历史描述为主。

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2003）虽然不是一部系统的翻译史著作，但能够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展开论述，以“理论旅行”为切入点，从翻译的角度进行思想史的研究（250），考察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思潮”¹⁶，或者说“经由翻译体现出的新时期跨文化话语实践”（“前言”，1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考察并非完全拘泥于语言本身，而着眼于由此显示出的接受者的理解及其意

¹⁶ 这里录出该书的主要章节目录，以便大家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印象：第一章 人道主义；第二章 现代主义；第三章 萨特热；第四章 弗洛伊德热；第五章 形式主义；第六章 博尔赫斯热；第七章 女性主义；第八章 米兰·昆德拉热；第九章 新历史主义；第十章 后殖民主义；第十一章 俄苏文学。

义，因而涉及与翻译的历史条件相关的广泛材料。”（“前言”，18）论者所采取的这种研究路径与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的大多做法形成了对照，因而也更具启发意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事翻译史——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的学人，其专业分类基本上不外乎两种类型，一为外语专业人员；一为非外语专业人员。就中国这一语境而言，后者主要是从事文学研究（如郭延礼）或历史研究（如邹振环）。既涉足文学或历史，又从事翻译的作者，一个也没有；也看不到学科之间的合作。或许，这就给我们一个危机——危险+机会——的信号。

研究对象与目标

从前述的分类看，本论文研究的范围——中国在 1895—1911 年间的文学翻译实践——属于具体国别、具体文类的翻译断代史研究。或许这是一个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为什么选取 1895—1911 年这一时段作为研究的对象？其原因有二：第一，在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过程中，这一时段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从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还是思想的内容上，均发生了突破性的变迁（参见张灏，2002：109；205；281）。换言之，这是一个转型时代。第二，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这一时期是第三个高潮阶段——第一与第二高潮阶段分别为历时长达千余年的佛经翻译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而这第三次高潮则是对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翻译¹⁷；如果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考察，可以说这是第一个文学翻译高潮。其历史意义与学术意义就自不待言了。

其次，这一历史时段，从翻译的角度加以研究的成果不多¹⁸，特别是那种采取宏观的文化或文化研究视角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以史为鉴”，都有必要对这一历史时期作出较为客观公正而又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研究，这也算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第三，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翻译实践史¹⁹，讨论时就牵涉到一个根本的问

¹⁷ 施蛰存在“翻译文学的输入——《翻译文学集·导言》”中则认为，“从 1890 年到 1919 年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施蛰存，1999：289）。

¹⁸ 至少在深度与理论高度方面，还大有可以挖掘的空间；此外，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虽然也是以中国近代——如晚清——甚或现代为研究对象，但其成果尚未发表或出版。

¹⁹ 但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相关的翻译观点或理论。

题：何谓翻译？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哪些文本属于“翻译”或“译本”²⁰（translations）的范围？Gideon Toury提出“假定译本”（assumed translations）与“伪译本”（pseudotranslations）两个概念（1995），将那种在译语语境中被视为译本但实际上不存在原文文本的现象纳入研究的视野，无疑拓宽了“翻译”的外延。但本文作者认为，还有一种现象应该而且可以纳入研究对象之中，那就是在译语语境中被视为创作但实际上却有所本的现象。如果将前者称之为“伪译”，那么后者则可称为“伪作”。

在将上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确定为研究对象后，本文的研究目标是：（1）探讨清末文学翻译的基本特点；（2）阐述翻译主体在翻译中的作用；（3）分析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4）探索翻译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

虽然本文研究的范围不是很广，但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却很多，本文无法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展开穷尽性的研究，只能择取自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同时段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在个案的选取上，也颇具有代表性：在翻译方法上，既有以林纾为代表的“译述”或“意译”，苏曼殊、陈独秀为代表的“伪译”，也有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直译”；在翻译方式上，有合译与独立翻译，既有直接从原文的翻译，也有转译；在翻译主体上，既有一点不懂外语的林纾，也有通外语的周氏兄弟；在翻译目的上，林纾从无意为之到具有明确意识形态追求的译述，苏曼殊、陈独秀假借翻译——即“伪译”——鼓吹“无政府主义”，周氏兄弟开始追求“文学性”；在文本类型上，长篇与短篇兼有；在译本的语言上，既有林纾与周氏兄弟的文言，也有苏曼殊、陈独秀的白话。这些个案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翻译主体都试图通过翻译的途径，实现各自的意识形态目的。

本文的研究，如果放在晚清时期这一宏大的历史语境之中，依然属于微观的研究，但如果就所考察的个案而言，则又做到了宏观的分析，因而可以说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具体到操作层面上，则注重对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对所分析的个案，也不采取预设理论框架而后演绎理论的思路，即采取“法从例出”的策略，而是力图在个案剖析的过程中，不断反省与修正原有的构想，希冀形

²⁰ 本文一般不对“译著”与“译文”加以区分，一律称之为“译文文本”，或简称“译本”。

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眼光与研究立场。同时，因为研究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断代史，考察的是这一时段的文学翻译，注重的因而也就是从总体着眼，侧重的是文学翻译的演进路向，而不是对具体个案的价值判断，因而也就不再局限于对具体的译者的译本的高下优劣之评价。换言之，本文的研究，虽从个案入手，着眼点却是宏观把握，即采取“以小见大”的论述策略。

本文的论述结构

本文在考察中国近代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经，以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为纬，史论结合，以论为主，分析翻译如何通过话语的形式，（1）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2）生产出新的意识形态；即翻译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研究方法^①与理论模式”在梳理中外有关翻译史研究的方法或范式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的研究，借鉴并整合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化社会学家的一些关键概念，试图提出一个普适的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的理论模式。

本文作者首先提出了翻译的宏观语境构成因素：（1）社会-文化语境；（2）翻译主体；（3）文本；（4）读者。

其次，本文将翻译行为视为一种社会行为，是一种话语的生产行为；这种行为是意识形态的。

第三，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翻译行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另一方面，翻译行为生产新的意识形态。这种互动关系是通过话语实现的。

最后，将翻译行为视为一种宏观的言语行为，每一翻译行为的产生因而同时实施了三个不同的行为：（1）译内行为；（2）译外行为；（3）译后行为。相应地，我们从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层次研究“翻译”：（1）文本（text）维度；（2）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xis）维度；（3）社会学（sociology）或意识形态（ideology）维度。

第二章“社会文化语境”从以下两个方面简要考察中国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

（1）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西学”话语策略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

无论是出于自愿抑或迫于现实形势，由于受到当时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均可能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就本文所论及的范围而言，近代中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过程中，面对“西学”话语，在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采取了不同的话语策略，作为各自合法性的依据；这些策略包括：师夷制夷；西学中源；中体西用。

（2）翻译实践中的文本类型与翻译主体 翻译是对当时的社会语境所作出的一种几乎是直接的反应，体现在文本的选择上，则与其实用性有直接关系：首先是自然科学（包括应用类科学），然后开始关注社会科学，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兼而有之，到了甲午之后，甚至有社会科学成为主流的趋势。翻译主体的构成趋势是，开始以外国人为主，然后外国人与中国人合作，最后逐渐以中国人为主。

第三章“文学话语：从边缘到中心”在考察文学以及小说在历史上内涵与外延的发展与变化后指出，小说在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开始意识到并重视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出于“新民”的政治需要，以小说作为工具，开展启蒙运动。小说因此从文化系统与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但是，由于“新民”的内涵与当时中国传统文学所载之“道”不一致，梁启超等人因此提倡翻译域外小说，特别是翻译政治小说。由此引发了晚清的文学翻译高潮。

同时，本章还对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实践，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一简要的综述：

（1）翻译主体 译者的构成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1860年代前，基本上是以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等）为主；到甲午战争，则是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合作翻译为主；甲午之后，则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合作翻译为主。此外，出版机构也增加了。

（2）文本类型 与翻译主体直接相关的就是文本类型了，原因是在某种程度上，文本类型乃是由翻译主体决定的；换言之，翻译主体基本上决定了翻译的选材。文本类型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体现。就小说翻译而言，从不同的视角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在晚清时期，最为突出的小说翻译文本类型，可能要算中国文学系统中原本没有的三种——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以及具有

域外异质性的言情小说²¹。

(3) **译本语言** 毫无疑问，译本的语言取决于多种因素：1) 历史语境：翻译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决定了当时社会不同群体使用何种语言形式：口头语还是书面语；白话还是文言；2) 翻译主体：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译本的语言最终还是由主体确定并成形；因此不但与翻译主体的教育背景有关，而且与翻译目的相联；3) 译本读者：翻译主体在进行具体的翻译操作之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会预设其译本的隐含读者 (implied readership)，从而确定译本采用的语言形式；此外，实际的译本读者群体与隐含读者群体未必重合或重叠，阅读实践反过来又会对翻译主体后来的翻译语言决策发挥一定的反作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4) 经济因素：这里的经济有两种涵义，一是指翻译主体考虑到金钱的因素，如稿酬是按照译本的篇幅长短来计算的；一是指翻译主体——特别是译者——实际翻译过程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当然，还会有其它的因素在起作用。总而言之，必须综合考察才能对译本语言问题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合理的解释，否则就可能会产生误判从而误导的后果。

(4) **翻译方法** 这里的方法，还包括翻译方式。在晚清时期，从译本发表时署名的方式看，翻译方式主要有三种：(1) 合译，即其中一人（甚或多人）口述，一人（甚或多人）笔录。这种方式虽然与甲午前的合作翻译模式是一样的，但如前述，主体发生了变化，基本上已经是以中国人为主，甚或全部都是中国人，其典型代表是林纾与其合作者的翻译实践；(2) 独立翻译；(3) 机构翻译。翻译方式中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译者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本”问题：一般说来，原本自然应该是作者写作语言的文本。但在晚清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本身也是译本，即译者采取的是“转译”的方式。这存在多种可能的原因，如译者接触到的“原本”资源有限；但主要的原因则可能是译者的语言能力不足。

至于本体意义上的翻译方法，在晚清时期，从性质上言，自然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套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术语，可称之为“直译”与“意译”；而如果采用 Lawrence Venuti 的术语，则就是“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

²¹ 中国文学系统或小说系统中自然有言情小说，但域外言情小说以其异质性在晚清颇受青睐。

(foreignization)。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术语系统，都体现了翻译主体对原文文本忠实与否的态度。

但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方法，就其主流方法而言，既不是我们今天的“直译”，也不完全是“意译”。译者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译述”。如果从翻译的语言、诗学等方面考虑，也可称之为“归化”。这种译述方法的主要特点，从字面上亦可见到：包括“译”与“述”两个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则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1) 增改；2) 删节。实际操作中，则可能有其它形式，如“增删”。而其原因，则有多个方面：语言；诗学；伦理思想观念等。

第四章“归化的颠覆：林纾的翻译”首先探讨了林纾的合译问题，认为林纾的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两种：第一，原本的选择：林纾本人完全不懂外文，原本的选择几乎完全依赖合译者。就合译者而言，在原本的选择过程中，也存在几方面的决定因素：(1) 合译者的外语水平；(2) 合译者的(外语与中文)文学或文化修养(甚至包括诗学观念)；(3) 合译者的意识形态；(4) 合译者所能接触到的原语文本资源；以及(5) 其它偶然因素。因此，在原本的选择问题上，我们需要采取历史的态度，考虑当时的语境。第二，具体的口述。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二：(1) 合译者的外语水平；(2) 合译者的中文水平。合译者的外语水平基本上决定了对原本的理解能否正确，并最终决定译本会否出现错误以及错误的多寡。合译者的中文水平也会对笔录者产生影响，特别是林纾“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林纾，1907；1997：293)，而“助手们事后显然也没有校核过林纾的写稿”(钱钟书，1963；1984：708)这种笔录方式。

本章分别以林纾与合译者翻译的三个文本——《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黑奴吁天录》(1901)、《迦茵小传》(1905)——为考察对象，从翻译的动机与目的、语言与诗学、删改、读者反应、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个案分析。

第五章“伪译：革命话语——《悲惨世界》的翻译”以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 *Les Misérables* 为个案，采取微观与宏观视角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文本分析与社会文化语境的考察，论述翻译是如何受到当时语境的制约，以及翻译主体的意图与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翻译(包括“伪译”)得以表述与实现的。

本章首先从译本的副文本描述入手，内容主要包括：（1）译本的版本考证；（2）翻译所依据的“原本”分析；（3）译者或作者的考辨；（4）苏、陈的分工。

继而对《惨世界》这一文本中的“翻译”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翻译中的删节：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了译本的删节情况，并指出了目前相关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2）删节所引发的误读：就此所作的个案分析纠正了有关论者具有相当影响的结论；（3）诗学干预：译者自身的诗学主张或所认同的译语诗学对译者的翻译行为产生制约作用；（4）添加：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以文本中叙述者的身份进行添加，一是受译者诗学影响，套用译语小说传统模式；（5）误译：主要分析了译者由于理解等能力引起的误解与误译；（6）人物与地方命名的用意。

本章最后对“伪译”部分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1）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考察“伪译”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内涵；（2）分析了文本的语言与诗学，并作了微观的文体学个案分析；（3）从较为宏观的视角考察与分析译者为什么选择“伪译”的方式；（4）分析了作者与译者的意识形态上所存在的差异。

国内外现有的理论研究均未涉及本章所讨论的个案，其特殊之处在于该文本既不是完整与完全的译本，也不是纯粹的“伪译”，而是一个混合的文本。译者的意识形态意图体现在“伪译”之中，但由于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的制约，却只能将“伪译”“隐藏”在译有所本的“翻译”中。

第六章“异化的萌芽：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与分析：

（1）在考察周氏兄弟初期翻译的基础上，首次明确周氏兄弟从“译述”到“直译”这一翻译方法转向发生的时间是在1906—1907年间，而非学界通行的1909年；

（2）围绕周氏兄弟编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1909）这一个案，从翻译的动机与目的、翻译范式、异化、直译、翻译语言、翻译的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首先，在对《域外小说集》（1909）进行作者分布与选材分析的基础上，纠正了国内学界流传与流行的说法，并从多方面对周氏兄弟的选材作了解释；其次，从文本细读入手，解析译者的翻译动机与目的：“对抗”当时的主流译风，引介异域文术新宗；第三，指出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1909）开创了新的翻译范式，并对“直译”方法作了分析；第四，讨论翻译语言与异

化的辩证关系；第五，从历史语境的角度考察该文本的效果与影响。

(3) 对《域外小说集》在清末的失败遭遇进行了多视角的解释：在考察论者对《域外小说集》(1909)失败的原因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种多元因素决定论。这些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 文言在晚清是(翻译的)主流语言，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1909)中所使用的语言为古奥的文言，因而并没有超出当时的翻译规范所规定的语言范围。虽然译者使用的是文言，但由于采用了“直译”的方法，结果导致译本的语言“句子生硬，‘诘讁聱牙’”，从这个意义上言，周氏兄弟的翻译语言是“异化”的——“异”于当时的翻译语言规范，即严复与林纾那种通顺的文言。

体裁 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收录的短篇小说，是那种“异”于中国短篇小说的文本；造成这种结果，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一，是译者在选择原文文本的时候，“有意”选择那些不同于中国的文本；其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因为采取了“求真”的“直译”，没有像当时主流的译者那样，对域外短篇小说进行“归化”处理，即按照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学规范的要求对所译文本进行删改。一言以蔽之，存在着体裁与诗学两方面的原因。

译者地位 译者如果具有足够的文化资本或影响力，所翻译的文本在译语语境中获读者接受的程度(或者说销售)自然会受影响。周氏兄弟1909年及此后一段时间内，尚未积累足够的文化资本，当时在中国尚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无法像林纾或严复的译作那样畅销。此外，原文作者在译语语境中是否已经具有影响力或知名度，在译本的接受过程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域外小说集》(1909)中的绝大多数作者，当时在中国尚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读者期待与隐含读者 译者的隐含读者是属于受过良好(传统)教育而又愿意阅读域外小说的“精英”阶层。然而，这些“精英”分子的小说观(或者说“诗学”)显然尚未达到译者的“隐含读者”的层次，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均存在阅读“障碍”。从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视角看，则是晚清时期读者尚无法接受“直译”带来的完全“陌生化”效果。

诗学观念 周氏兄弟的诗学在于，他们在选择原文文本时更为强调其文学性；同时代的其他译者认同的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学。这些译者各自的诗学观念在具体的内容上可能也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是“中国的”，或者说

是“本土的”。而周氏兄弟当时的诗学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中读者——自然也包括其他主流译者——的主流诗学之间的不同，在于周氏兄弟注重的是原文中异质性的诗学，或者说是“域外的”。译语读者的文学诗学因与译者不同，自然难以认同译者选择与翻译的文本。

翻译方法 在晚清末年这一中国语境中，由于周氏兄弟文学诗学不同的缘故，他们所采用的“直译”却显得特别突出，成为当时的一种“另类”与“异数”。

最后，本章试图从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论的视角，解释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1909）在出版后的遭遇。

“结语”部分首先从以下方面对清末的文学翻译进行了宏观的总结：

动机与目的 从整体上言，通过小说翻译实现“意识形态启蒙”，已成为清末小说翻译实践的“翻译意识形态”，或者说是译者等主体翻译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但在具体的翻译语境中，不同个体的翻译动机与目的则自然会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或者说有着各自的翻译动机与目的，具体体现为翻译主体的意识形态话语、诗学观念、译者的文化资本（如地位）与经济等因素。因而，在具体的翻译个案中，则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分析各个因素，最终确定翻译行为的动机与目的。就清末翻译而言，梁启超等人提倡翻译的目的是意识形态启蒙，而在他们看来，实现这一目的最佳手段是小说；但由于中国传统小说无法承载这一功能，因而只能选择域外小说这一文类（genre）。

文本类型 就翻译而言，有两种类型需要选择：原本的类型与译本的类型。在清末文学翻译中，虽然已经选择了小说这一文类，但具体选择哪些类型的小说，当时则尚未有一个所谓的“选目”。从原则上言，只要能够达到严复在“原强”（1895）中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目的，都可成为翻译的对象。换言之，小说类型的选择必须符合“新民”这一意识形态启蒙的原则。确定了小说的类型，进入翻译程序后，译者还需要做出一个抉择：译本的类型。文本类型对翻译过程，特别是对确定翻译的策略与方法，具有一定的影响。就本文研究的小说翻译而言，我们不但需要考察原文文本的类型，如长篇、短篇，而且需要考虑译语文化语境中的文本类型，这实际上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文本分类，细分起来非常复杂。清末小说翻译中，实际出现的译本类型有：1 长篇文言小说；长篇白话小说；短篇文言小说；短篇白话小说；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文白夹杂的文本，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长篇小说译本。

意识形态 在翻译语境中，存在多种意识形态类型。从宏观上言，可以分为原语意识形态与译语意识形态两大类。原语意识形态又可分为原语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与原文文本的意识形态。译语意识形态则包括：（1）译语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可归为主流意识形态与边缘意识形态；（2）翻译主体的意识形态，需要注意的是主体的意识形态在译语社会意识形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彼此的关系：主体认同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边缘意识形态？或者说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的立场是“维护”还是“颠覆”？（3）译本的意识形态，需要考虑的是译本的意识形态与原语社会、原本的意识形态以及译语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说，翻译处于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网络之中。

原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原本（甚或作者）的意识形态，它们的主要作用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1）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在文本选择过程中的宏观作用；（2）原本（或作者）的意识形态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的“微观”作用：这涉及原本（或作者）的意识形态在具体文本的选择与翻译中的作用；这也可以从翻译主体（以及译语社会文化）的视角来分析。

因此，译语意识形态是研究中的重点。从分析的操作层面上言，可以翻译主体作为切入点，考察翻译主体（的意识形态）与原语意识形态及译语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1）如果翻译主体的意识形态与译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或基本一致，至少没有冲突，原本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对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构成冲击或危险，翻译行为就会得以顺利进行。此时，译本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译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所起的是“维护”作用。我们需要考察的就是译本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在译语语境中产生了何种具体的作用。（2）如果原本的意识形态与翻译主体或译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会采取何种策略与措施。一般而言，翻译主体可能采取的基本措施类型有：删节；淡化；保留；增改。至于具体采用哪一种或几种做法，则需视当时的语境而定，同时也要看当时译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容忍度。

译本读者与翻译语言 与作者在创作文本时一样，译者在翻译之前或过程中，也会有意或无意地预设读者类型，针对特定的读者类型进行翻译，即翻译的目标读者。与此同时，译本一旦生产出来，文本本身则会有其“隐含读者”，

即文本的最佳解读者，或者说理想读者。此外，文本还有现实读者，即阅读文本的实际读者。因此，同一文本就可能存在三种类型的读者；最为理想的情形是三种类型的读者产生重合，即都是同一类型的读者，最“坏”的情形则是三种类型的读者群体互不相干，一般的情形是介于这二者之间，存在部分的交叉。

在清末小说翻译的语境中，译本的三种读者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这种复杂的读者群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语言等文本特征表现出来的。

翻译策略与方法 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有时甚至到了无法区分的地步。如果说翻译策略主要和翻译的动机与目的相关，策略决定方法；那么，翻译方法同时还与译者对原本或原作者的态度——如尊重——有关。就清末的小说翻译实践而言，“主流”的翻译方法则是侧重“可接受性”的“归化”翻译，即以“译述”为主。清末的译者选择“译述”的归化翻译方法，是由翻译的动机与目的、文本类型、意识形态、读者市场以及译者的语言与诗学观念等多元因素决定的。

话语功能与译后行为 每一个翻译行为可说是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即译内行为、译外行为与译后行为。如果将译内行为理解为文本内的语言层面上的操作活动，将译外行为视为文本在翻译语境中的话语层面的运作；那么，译后行为则是译本这一翻译产品进入“市场”后读者的“消费”行为。

对译后行为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1）分析译本在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了哪些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2）分析翻译主体的翻译动机与目的，验证译本是否实现了当初的翻译意图，达到了相应的目的；（3）在前两个层面的基础上，还可以比较与对照译本实际发挥的作用与翻译的预设功能，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异，由此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不难看出，第二个层面的操作是以第一个层面的操作为基础的，因而，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展开分析与研究，均需要进行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的对象文本可以包括：译本；与译本同类型的文本，即译本生产后生产的原创文本与译本；可能受译本影响的研究文本、评论文本与描述性文本；有关的社会思潮、运动与译语语言等宏观文本。通过对这些可能有关的文本进行话语分析，确定译本在译语社会文化中实际产生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言，这种历时分析实际上是一种话语考古学。

由于清末的小说译本与原创文本大部分现已不易找到，这里自然只能根据

时人受到翻译影响的文本加以概略的分析。这种影响，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意识形态；文学；语言。

翻译中的主体性 在清末小说翻译这一潮流中，其最为基本而又突出的特征就是主体性，具体表征则是翻译主体的“在场”(presence)或“显形”(visibility)。这种“显形”在翻译行为中，从翻译动机与目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到对意识形态的操纵，可谓无处不在。但这种“显形”最终体现在文本的层面上，表现为翻译过程中，语言、诗学与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上的增与删；既表现在译本的序跋等副文本中翻译主体的“自我表白”及对译本读者的“导向”之中，更表现在评论家等“专业人士”将“评语”一类的“价值判断”或对时政的评论直接“插入”译本的正文之中这样最具“暴力”性质的干预之中；“伪译与伪作”可谓“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清末小说翻译，表面看来是一种“归化”，其实却是最大程度上的“异化”：手段（即策略与方法）是“归化”的，效果却是“异化”的。

此外，结论部分指出中国大陆翻译研究界运用多元系统论解释晚清文学翻译所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对本文的研究做出概述。

最后，本文作者在反思本研究的局限的同时，就进一步拓展本研究范围，提出了一些设想与可能的研究方向。

第一章 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模式

1.1 翻译史研究方法现状

从某种意义上言，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模式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同构关系，可以说二者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互为预设的关系：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者所采用或建立的理论模式；反之亦然。因此，探讨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模式也就显得非常必要；而鉴于中国翻译史研究领域尚未对此有明确的意识，这种探讨就越发迫切了。

翻译史的研究方法，可以有多种，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做法有：

陈玉刚的做法是（1989：405）：

我们撰写中国翻译文学史时，以文学翻译活动的事实为基础，以脉络为主，阐明翻译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规律，并力图对翻译文学家的翻译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的继承和相互影响，翻译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和它同其他形式的文学基本的不同点等问题进行探讨。

陈福康（1992：5—6）论及“具体的写法”时，在“参考各种文学理论史等”的基础上，认为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挑选一些重要的译论者，分别作介绍和评述；另一种是不拘泥于时间先后，而照自己的见解和‘理论设计’，将有关材料重新组合，分成某种类型、流派等，予以综述。

这两种方法各有长短（同上）：

前一种写法的缺点是容易写得平，“只见树不见林”，成为关于一个个译论者的单篇评论的汇编；优点是可以对这些重要译论者论述得较为详尽，并为研究者提供较多的资料信息。后一种写法的缺点是容易写得浮，“只见林不见树”，在未发掘和占有详尽资料时容易“以论带史”，即把前人的观点剪裁了以后往自己的模式框架内填塞，而且，这种写法在突出主要线索后就只好放弃枝节，读者对每位译论者的了解便很不全面了；优点则是容易显出“理论性”和“体系性”。

论者考虑到“一般在专题研究刚刚起步、有关资料也远未搜罗穷尽的阶段，当以采用前一种写法为宜”，以及论者自身的“个性爱好特长”，“基本采用前一种写法”（同上）。其实，陈福康之所以没有采取后一种写法，还有一种专业背景的考虑：自身并未从事翻译研究，甚或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学术训练。

邹振环（1996：v）指出，“可以翻译家为中心，也可以翻译机构为主线；可以通过翻译思想的变动，也可以通过翻译运动的兴衰来清理线索”；具体到明清之际开始的“西学翻译”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可以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可以从出版的角度，也可以从翻译与文化等视角加以考察”。

王克非（1994）吸取了王佐良“新时期的翻译观”（1987）一文中的有关观点，认为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他将翻译文化史“大致分为三类”：（1）中国翻译文化史；（2）世界翻译文化史；（3）比较翻译文化史；其中前两类的纵向研究以主要的翻译活动来划分时期，后一类横向研究则包括中外——如中日或中印——在不同时期翻译和摄取外域文化中表现的相同或不相同的心态、结果、作用等方面的比较（1994：60）。他还认为在这一新的视角下，“研究课题或需要重新审视的课题很多”，如：（1）对重要的文、史、哲著作的中外不同译本（或不同的中文译本）的翻译处理进行研究，对其不同传播和不同影响加以考察；（2）对译者的翻译过程（如译前的动机、准备，译稿的修改，译作的原始材料等）加以考察；（3）对翻译的语言（包括词汇尤其是译词、句法、语体）加以研究，并考察它对本族语言发生的影响（1994：61）。在此基础上，王克非（1997）根据自己的理念，从国内外（主要是中国）编选了有关论述，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便是翻译与文化。

谢天振（1999）从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角，在区分了“文学翻译史”与“翻译文学史”的基础上，认为翻译文学史所应包括的内容，除了文学翻译史所涉及的文学翻译事件、译作和翻译家之外，还应该包括以下内容（284—292）：（1）“对具体某些重要外国作家的译介和接受的描述”（284），“全面展示某一重要的外国作家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285），即“对外国作家在接受国的译介做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从最初的译介到他的作品在各时期的翻译出版，从该作家作品的主要译者到译入国对该作家作品的接受和反响等”（同上）；（2）“某些文学思潮流派的翻译介绍”（285）；（3）“与原语文学中艺术手法变换有关的

翻译潮流的发展和斗争，对翻译艺术的看法和观点的变迁”等（286）；（4）“翻译在促进文学交流和文学影响之中的作用”：“以往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影响研究往往偏重在影响的结果上，而忽视对翻译和翻译作品本身的研究”，因此理应重视译作的质量、风格、变形等问题（286）；（5）“翻译过程中起媒介作用的中介语”，即“转译本所依据的外语所起的作用，以及因转译而产生的二度变形等问题”（287）。他最后还特别强调了翻译文学史的编排方式问题，认为通常按照时代和翻译家这样一种历时编排法，对于翻译文学史来说存在顾此失彼的问题，为了“使翻译文学史的叙述比较全面和周到”（291），作者提出的设想是（291—292）：

未来的翻译文学史也许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按照传统的编年顺序的历时编排，另一部分则按国别、地区、语种、流派、思潮和代表作家编排。具体而言，第一部分叙述文学翻译的发展史，诸如每一个时代有哪些翻译活动、翻译事件，哪些文学社团和翻译家翻译了哪些作品，取得了哪些翻译成就（包括翻译理论上的进展）等等；第二部分则按照语种分为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等，或是按国别、地区、民族等，或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大作家，叙述这些国家、地区民族、语种的文学和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

通过第一部分的“线”与第二部分的“面”相结合，“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翻译文学史的全貌”（292）。

可以看出，论者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是综合了已有的翻译史——无论是翻译文学史，还是文学翻译史——的做法，但似乎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意识作为支撑。此外，谢天振（1998：17—19）从学理上就编写翻译文学史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初步探讨，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1）对翻译文学的认识问题；（2）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3）翻译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王宏志（2001：101）在“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中构思的《晚清翻译史》“舍弃了编年史的模式，以翻译在译入语文化及社会的操作为重点，”而在章节的安排上则是“以个别专题为纲领”，虽然该“晚清翻译史”尚未出版，我们无从详细了解，但作者也“暂定”了几个专题，或许可藉此略窥全豹（参见王宏志，2001：101—103）：

（1）翻译“场”：“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导致在晚清这历史时段出现大量而

独特的翻译活动？”（101）

（2）译者群：“对于译者，我们可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谁来翻译？他们具备什么资历？他们为什么要从事翻译活动？他们在整个译入语文化（包括社会地位）占什么位置？他们如何进行翻译？”（102）

（3）赞助人：“这是过去的翻译研究所忽略的一个课题。…根据利弗威尔的定义，‘赞助人’是指那些‘足以促进或窒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力量（包括人和机构）’（Lefevere 1992: 13—15）。他（它）们可以是一些人、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朝廷、出版商，以至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等。他们会借助他们所参与确立的建制，诸如教育机制、学院、评审制度、评论性刊物等，来影响译者的地位、收入和取向，从而推动或阻挠某些翻译活动。当然，倒过来看，译者也往往会主动地对赞助人作依赖和提出要求，以求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收入，因此，译者和赞助人之间也有一种互动的关系。由此可见，赞助人确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在课题上，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支援某些翻译活动？为什么？他们提供什么赞助？他们对翻译活动有什么牵制？他们跟建制有什么关系？他们跟译者建立了怎样的关系？”（103）

从上面的简述不难看出，王宏志（2001）深受 Lefevere 的影响；如果从翻译史研究的视角看，他的这一“构思”较之（中国）此前的研究或研究方法，已经有巨大的差异，即研究者已经具有相当强的理论意识，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研究框架；但必须指出，由于论者付之于实践的成果尚未出版，我们还无法就其研究的理论设想与实际结果进行对照，从而加以检验。

王建开（2003: 17—18）具体的行文方式是，“译介描述与背景评析并举，以突出的现象为主线，伴以典型事例作为支撑，同时尽力揭示成因”，但几乎不涉及理论层面。

从总体上言，翻译史的研究与元翻译史的研究（即翻译史的方法论研究），显然落后于翻译研究领域的其它方面。就中国语境而言，特别是翻译史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停留在资料的收集上，甚至连资料的整理还谈不上（如马祖毅 1984），遑论研究方法；而个别研究成果，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虽然在资料的收集甚至整理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研究方法以及论述的深度，则基本上没有向前走出一步。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的翻译史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尽管如此，在如何进行翻译史研究，即翻译史的方法论或元翻译史方面，一些研究成果或研究者几乎没有理论意识，总体上可谓尚未起步。

当然，正如本文在前面所指出的，研究翻译史，可以有多种理论来源。

在元翻译史研究方面独树一帜者，当推 Anthony Pym 的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Pym, 1998)，在此有必要做一个较为详细的评介。

Pym (1998) 分 12 章，正如作者所说 (vii)，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六章基本上属于实践层面，关注诸如如何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制作列表、如何在“地图”上标注译本与译者，以及将各种元素放在一个系统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等实际的问题¹；从第七章开始，则对描述翻译研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 的主要概念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评述：(1) 国际关系；(2) 因果影射 (the allusiveness of causation)；(3) 译者们的身份，以及 (4) 追寻跨文化性²。可以看出，前半部分主要是针对翻译史实践的，而后半部分则是针对那些“对翻译史的理论更感兴趣的人” (vii)；从总体上言，作者的目的乃是“探索这两方面的关系”。

Pym 根据研究过程首先提出了未必处于同一层面的四个原则 (principles)，它们是 (ix—xi)：

1 第一个原则是翻译史应该解释翻译作品**为什么**在特定的社会时间与地点被生产。换言之，翻译史应该解决社会原因的诸种问题。这看似直截了当，但你会意识到，狭窄的经验研究方法——我们在许多系统描述研究途径中看到的那种——从根本上无法提出社会原因模式。

2 第二个原则是历史知识的中心客体不应是翻译文本，也不是语境系统，甚至也不是译文的语言特征。中心客体应该是译者，因为只有人才具有适合于社会原因的责任。只有通过译者及其社会赞助者我们才能试图了解译文为什么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间与地点被生产。要想了解为什么译文会出现，我们必须研究/看所涉及的人。……但是，注意的最终焦点必须是人而不是文本，无论方法上存在什么制约。

3 第三个原则紧接上面的原则。如果翻译史的焦点在译者，那它就必须围绕译者生活与工作的社会语境组织自己的世界³。

¹ Pym (1998) 前六章的标题为：1 History；2 Importance；3 Lists；4 Working definitions；5 Frequencies；6 Networks。

² Pym (1998) 后六章的标题为：7 Norms and systems；8 Regimes；9 Causes；10 Translators；11 Intercultures；12 Interdisciplinarity。

³ 关于这一点，Pym 同时指出，“这些语境如今通常被假定为目标文化 (target cultures)”；但他认为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提出一个普遍的工作假设，即：译者大多是跨文化的 (intercultural)。

4 第四个原则乃是关于要做翻译史的原因。这一原则大致是说，原因……存在于当下。我们做翻译史是为了表达、关注并试图解决影响我们自身处境的诸种问题。这不是说我们将自身投射到过去。相反，过去是一个客体，必须使之回应我们的问题，指出我们以前从未考虑过的范畴与潜在的解决方案。但我们的出发点总是此时此地。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幻觉（illusions）。当下的首要性不但无可避免，而且十分值得肯定；我是赞成在翻译史研究中要有严肃的主体投入的。如果人要处于我们研究的客体的中心位置，那么我们的史学主体也必须人性化。⁴

就具体的翻译史而言，Pym 的四个总体原理是：“关注因果，聚焦于有血有肉的译者，假设译者的归属是跨文化的，以及强调当下”（Pym, 1998: xi）。作者也坦承，“这些观点并不新奇；它们都漂浮于我们时代的知识空气之中”；但它们可能有的新意是，“我力图使它们说话，一起在翻译史的实际实践中说话。”（同上）

Pym 继而对翻译史作出了自己的界定（Pym, 1998: 5）：

翻译史是一套话语，陈述翻译场域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或被积极阻止[因而没有发生]的变化。翻译史的场域包括导致译文（或非译文）产生的行动与行动者，译文（或非译文）的效果，有关翻译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存在因果关系的现象。

Pym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翻译史的构成：考古学、批评、解释。这三个部分具体包括（Pym, 1998: 6）：

翻译考古学是一套话语，回答如下整个或部分复杂问题：“谁翻译了什么，如何翻译，在何地翻译，何时翻译，为谁翻译，有何效果？”翻译考古学包括的内容广泛，可以从目录编辑到译者传记研究。“考古学”一词这里并无贬义，也没有福柯所使用的那种特别含义。它只是表示一个特别有趣的领域，常常包含了复杂的侦探工作、巨大的自我牺牲以及对翻译史的其他领域真正的贡献。（Pym, 1998: 5）

历史批评话语则是对译本促进或阻碍进步的方式作出评价。这是一种并不时髦而且冒险的做法，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说明进步是什么样子。传统中，历史批评可能广义地包括历史学中的语文学部分，如果语文学列举（conjugates）了进步作为道德价值的种种观念的话。然而，由此产生的批评不能将当代的价值观念直接应用于过去的译本。真正的历史批评不是

⁴ 我不太同意Pym（1998）的这一看法，因为研究者在开始真正的研究前，自然可以有个人主体投入，但一旦进入正式的研究，研究的客观性自当成为研究者的追求；当然，研究者由于语境的制约等原因，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但这与作者提倡的主体投入是不同的。

要确定译本相对于我们此时此地而言是否是进步的，而是必须根据过去所达到的效果来确定过去译者的价值。这就是历史批评与非历史批评之间的差异所在。(Pym, 1998: 5)

翻译史中的**解释**试图说明**为什么**某时某地的考古材料发生了，以及它们如何与变迁发生联系。解释必须关注的是这些数据的因果关系，特别是那些通过种种权力关系的因果关系；在这一场域中，可以发现译者们是有效的社会行为者。其它层面的解释，例如对科技变化或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解释，同样值得对整个时期或网络作出大规模的假设。对一个包括翻译史各个组成部分的项目来说，“为什么”或许看似一个非常小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它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也是真正关注变迁过程的唯一一个问题；它是在 Holmes 那张图中严重缺席的唯一一个问题。一部忽略了原因的历史或许能够描述行为与效果，甚至也可以有单维度的进步观念，但它却无法认识到文献与行为中人的维度才是变迁的进步所在。

简言之，Pym 这里提出的翻译史的构成包括：(1) 对翻译现象进行挖掘与考证；(2) 对翻译产品进行历史的评价；(3) 对翻译现象作出解释。Pym 的这一翻译史观，无论是作为我们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价或衡量标尺，还是对将来的研究项目，均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1.2 翻译社会学模式

本文试图在借鉴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模式：翻译社会学模式。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理论模式并非专为研究翻译史而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言，乃是尝试建立一个普适的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⁵。但无疑，这一模式必须在翻译史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应用价值。

翻译社会学模式，顾名思义，其出发点就是将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视为一种社会行为；而这一社会行为因为其特殊性——即为一种言语行为⁶——同时也是一种话语的生产行为；这就势必要求我们在研究翻译（更不用说翻译史）的时候，考察翻译行为发生时（必要时可包括翻译前或后）的社会文化语境。

首先探讨这一模式的构成。

如果我们借鉴语用学中的语境观念或理论来考察翻译的语境，那么其构成

⁵ 无疑，最终是否能够做到“普适”，则需要也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与校正。

⁶ 套用语言哲学中的“speech act”，“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的“言语行为”。

的基本元素⁷包括:

(1) 社会文化情景或语境 (socio-cultural situation): 主要是指翻译行为发生的历史时代与地理背景, 不但包括具体的翻译行动实施时的语境, 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翻译行为发生前的社会文化语境, 并考察翻译行为发生后相关历史时段的语境, 涉及诸如权力场、审查机构 (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等众多因素, 但在具体的个案研究分析中, 各个参数所占的分量不同, 因而需要考察的参数数量也就不同;

(2) 翻译主体: 与大多数讨论翻译主体或主体性的论述不同, 这里的翻译主体不但包括具体翻译行动的实施者译者, 而且包括赞助的个体或机构与出版的个体或机构⁸; 换言之, 我们将翻译的生产者均视为翻译的主体⁹;

(3) 文本 (text): 自然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 但同时也包括“伪译”与“伪作”。

(4) 读者: 从理论上讲, 翻译行为的目的对象是所谓的隐含读者 (implied readership), 即翻译主体在生产文本前或文本生产过程中心目中所针对的特定读者群体, 但在实际的阅读实践中, 译文文本的读者未必就是或全是隐含读者。

在这一宏观的翻译语境中, 我们提出并考察两种行为: 翻译主体行为 (以下有时简称译者行为, translatorial act) 与翻译行为 (translational act)。毫无疑问, 这两种行为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即翻译行为是由翻译主体实施完成的, 但翻译行为的外延则远远超出了翻译主体行为。因此, 如果我们从翻译的目的与效果这一视角考察, 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 译者行为的动机或目的, 并不同于翻译行为在读者身上实际产生的反应或引发的效果。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交叉 (overlapping) 的情形, 也可能没有交叉关系。这一区分在以往的

⁷ Itamar Even-Zohar (1990: 32) 在“文学系统的作用所牵涉的宏观因素”显示图中列出了三个组成部分: (1) 生产者; (2) 建制、形式库, 市场、产品; (3) 消费者; 他后来又将此图改为“任何社会—符号 (文化) 活动所牵涉的组成因素”的显示图” (1997: 19) (参见张南峰, 2001: 172)。如果将Even-Zohar的这一显示图与本文从语用学的语境角度提出的翻译语境因素加以对照, 可以看出: (1) 本文中的“翻译主体”涵盖了“生产者”与/或“建制”; (2) “文本”基本上对应于“产品”; (3) “读者”对应于“消费者”; 但本文中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外延要大于“市场”, 可能包括“形式库”。此外, Even-Zohar的宏观因素分类, 从本文对翻译主体的界定来看, “生产者”与“建制”之间在内涵或外延上存在着相互交叉的关系, 因而无法满足各因素之间应该各自独立于对方的要求; 换言之, 他的分类存在着逻辑矛盾。这里顺便指出, 至少就本研究而言, Even-Zohar (多元系统论) 的最大不足之处, 在于未能考虑意识形态这一无处不在、无时不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⁸ 因此, 本文的“翻译主体”自然就不包括审查机构。

⁹ 因此, 翻译主体可能会包括原文文本的作者 (或相关的个体与机构, 如作者版权的继承人或有关基金组织), 但未必在所有的情形中, 均需包括作者在内; 相反, 在当代翻译研究, 尤其是以译语文化语境与译本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研究 (如DTS) 中, 几乎不涉及原文作者。在有关主体的问题上, 谢天振 (1999: 290) 则认为, “在翻译文学史里, 作品的创作主体有两个, 即翻译家和原作家”。

研究中几乎不为人所重视。

翻译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其主要媒介是语言活动，因而自然也属于言语行为的一种。语言不是纯粹的，相反是意识形态的，或者说意识形态镶嵌在语言之中，特别是在语言的使用即言语之中。所以，作为话语生产的翻译行为是意识形态的。

本论文认为，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即一方面，翻译行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另一方面，翻译行为生产新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关系则是通过话语实现的¹⁰。

下面我们试图在有关研究¹¹的基础上，逐一论析意识形态、话语与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

1.2.1 意识形态

早在法国的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正式提出“意识形态”（Idéologie）这一概念之前，英国的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便已在其《新工具》（1620）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¹²，可视为意识形态概念降生的第一个先兆与推动力。

在培根之后，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重要著作《人类理解论》（1690）成了意识形态概念的真正的催生剂。

特拉西是第一个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主要见诸《意识形态的要素》（1801—1815）。

¹⁰ 笔者在1998年10月南昌大学召开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三届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大会宣读了题为“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的论文，就“互动关系”提出了两点看法：“首先，翻译的生产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或支配；其次，翻译活动本身同时又在生产着意识形态。”参见王晓元（1999：10）。本文的论点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¹¹ 张南峰（2001）在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参照翻译研究的特殊需要”，“提出一个为研究翻译而设的多元系统论精细版”（170）：（1）“恢复整体文化中的多元系统的分类”（174）：“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可视为由多个互相重叠、互相交叉的多元系统组成，例如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翻译等等。这张名单当然可以无限延长，但对翻译研究而言，上述六个看来已大致足够，因为它们支配翻译决定的规范的主要来源”（175）；（2）“延伸多元系统论的规范概念。我们假设，支配一个多元系统里头的活动的规范，不单来自该多元系统内部，而且来自许多其它的多元系统”（175）；（3）“假设翻译多元系统的存在”（177）；（4）“文化大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政治与意识形态多元系统会比其它多元系统处于较为中心的位置（极权国家尤其如此），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规范会共同影响其它类型的规范。但就算在稳定状态下，也可能有一些文化产品，会在某些建制之内或之外的人士支持下，按照某些多元系统（意识形态、文学、语言等等）中的边缘系统的规范制造出来，向中心系统挑战”（177—178）。但与多元系统论以及其它的研究模式一样，基本上是研究各种因素如何制约（或支配）翻译的。

¹² 这四种假相分别是：（1）“种族假相”（Idols of the Tribe）；（2）“洞穴假相”（Idols of the Cave）；（3）“市场假相”（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4）“剧场假相”（Idols of the Theater）。

此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含义经历了种种变化，据Terry Eagleton在其*Ideology: An Introduction*中对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以下十多种（Eagleton, 1991: 1-2; 转引自孟登迎，2002: 78—79）¹³：

- 1 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
- 2 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论体系；
- 3 有助于主流（dominant）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
- 4 有助于主流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虚假思想；
- 5 体系化的歪曲交流；
- 6 为主体提供位置的东西；
- 7 由社会利益引发的思想方式；
- 8 同一性思想（identity thinking）；
- 9 必要的社会幻觉；
- 10 权力与话语的结合；
- 11 具有自觉意识的行动者在其中理解他们周围世界的媒介；
- 12 有行动指向的一套信念；
- 13 语言事实与现象事实的混淆；
- 14 语言符号的圈套；
- 15 主体通过其与社会结构发生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媒介；
- 16 社会生活转化为自然现实的过程。

这些意识形态的定义虽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但基本上与以下两种理论传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是注重讨论认识真假的认识论传统，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卢卡契，以及一些新近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意识形态看作幻觉、歪曲和神秘化；一是关注意识形态社会功用多于关注意识形态真实性（或非真实性）的社会学传统（孟登迎，2002: 79）。

本论文无意对意识形态的含义作一历史变迁或不同流派的综述，而只准备对所采用的一种意识形态学说加以论析：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的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存在着二重关系。其一是人类与自己诸多生存条件的关系，也就是广义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其二是人类对前一种关系的体验关系。意识形态则属于后一种关系。阿尔都塞说：“因为意识形态所

¹³ 而据孙艺风（2003: 110 注 1），“仅在社会学一门学科中Malcolm Hamilton就曾统计出 27 种对意识形态的定义”。

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像的’关系。”（阿尔都塞，1984：203）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体验”关系和“想像”关系，虽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态度（这种意志和态度可以是不同的，它们或者是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者是革命的），甚至是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换言之，它不是一种对象关系。但是，在意识形态中，人类与自身生存条件、生存环境的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像的关系中去。所以他说，“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像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同上）阿尔都塞在这种特定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能动作用的理论，认为“正是在想像对真实和真实对想像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像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阿尔都塞，1984：204）（参见丁立群，2003：39）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lthusser, 1971）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简称为 ISAs）的概念。这一概念显然与马克思所使用的“国家机器”存在某种互文关系。马克思把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机构视为“国家机器”；那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那些内容呢？阿尔都塞列出了一份“清单”：

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系统）；
 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立的、私立的学校的系统）；
 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法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制度，包括不同的政党）；
 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通讯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社、无线电、电视等）；
 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 运动等）。

为了区分马克思的“国家机器”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机器”，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机器”称之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the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¹⁴；并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参见俞吾金，2004：27—28）：

¹⁴ 俞吾金（2004：27）还指出：当然，阿尔都塞也承认，加上“强制性的”这一定语，也并不会使这一区

第一，“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是单数，即只有一个，因为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机构，虽然看上去也是复数，实际上却是受政府的统一指挥的。与此不同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以复数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即使我们假定存在着一个由复数形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组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也不是直接可见的。”（Althusser, 1976: 18; 转引自俞吾金，2004: 27）

第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属于“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它高高在上，每个人都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必须服从的权威性；然而，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言，它们却从属于“私人领域”（private domain），它们以不起眼的、弥散的方式存在着。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中，教会、政党、工会、家庭、一部分学校、大部分报纸、文化事业等等，都具有私人的性质，从属于私人领域。阿尔都塞认为，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属于私人领域这一新见解的形成而言，人们主要得益于葛兰西。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把握了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阿尔都塞所作的结论是：“私人机构完全能够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很好地‘发挥作用’，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充分合理的分析都能证明这一点。”（同上）

第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发生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通过“意识形态”发生作用。人们也许会这样说，任何一种国家机器，不管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还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是既通过暴力，又同时通过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实际上，“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制造的意识形态，单独地起作用；反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旦失去了“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这一背景性的力量，也会丧失自己的主导性，沦为轻飘飘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始终蕴含着“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支援因素。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某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本身在运作中就直接采用了暴力的方式，如教会、学校对学生或信徒的规训、体罚、除名、挑选等等。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机器的配合是很有默契的，在主导价值上也是基本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写道：“据我所知，任何阶级如果不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施行霸权或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施行霸权，它就不可能长时期地掌

别更为明晰，因为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过程中，同样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强制性的”状态，然而，比较起来，这种“强制性的”状态仍然与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机器”运作中的“强制性”状态存在着质和量上的差别。

握国家权力。”（Althusser, 1976: 20; 转引自俞吾金, 2004: 28）

然而，在阿尔都塞看来，不管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机器在发挥作用时如何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从总体上看，这种差异仍然是存在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所以常常会引起人们的迷惑，就是因为它们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而是通过意识形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所以，阿尔都塞总结道：“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既通过强制，又通过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其差异在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大量地、主导性地依靠强制发生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大量地、主导性地依靠意识形态发生作用。”（Althusser, 1976: 23）

需要指出的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说乃是建立在“再生产”（reproduction）观点的基础之上的。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再生产并不单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还包括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至少包括两个必要条件：“（1）劳动力的再生产；（2）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参见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第128页；转引自孟登迎，2004: 66）他尤其重视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因为这涉及意识形态和主体构造这一更复杂的问题。阿尔都塞认为：

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一种劳动技能的再生产，同时还要求一种对于现存秩序规则加以人身屈从的再生产，即工人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归顺心理的再生产，以及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恰如其分地操纵统治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这一切甚至在“话语”上都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支配权。（第131-132页；转引自孟登迎，2004: 66）

从劳动力再生产角度考察意识形态所起的特殊功用，必然涉及主体的自我建构，涉及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的教化功能，而这些问题正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

阿尔都塞指出，“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阿尔都塞，1984: 201；转引自丁立群，2003: 39）这里所说的“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是相对于科学的描述职能而言的，指的是意识形态对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生存的根本意义。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更是提出了一

个著名的论断：“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Althusser, 1971: 45）。

就实质而言，意识形态的真正的载体永远是人。一方面，没有作为主体而行动着的个人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贯彻，就不可能有意识形态存在，即使它存在着也落不到实处；另一方面，个人也不可能以超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生活，实际上，个人也只有隶属于、居留于意识形态中，才可能作为主体来言说和行动，并为他人所理解和认可。因此，阿尔都塞说：“主体的范畴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但同时我立即要补充说，只有当一切意识形态具有把具体的个体‘构成为’（定义为）臣民的功能时，主体范畴才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惟一构成要素。”（Althusser, 1976: 45；转引自俞吾金，2004: 29）¹⁵

一方面，正是意识形态使个人陷入这样的幻觉，即把自己想象为自由自在的主体，仿佛自己的行为完全是由自我决定的，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无法支配自己；另一方面，也正是意识形态把个人作为“臣民”加以“质询”（interpellation）或“招呼”（hailing）。比如，当一个人在街上行走时，突然有人“招呼”他，他听到了，转过了身。正是这一转身表明他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臣民”，他认同于它，归属于它，并在这种认同与归属中与他人相互识别、相互理解。（参见俞吾金，2004: 29）

在拉康的影响下，阿尔都塞把个体在意识形态中呈现出来的“主体”和“臣民”的双重角色称作为“意识形态的双重镜子-结构”（duplicate mirror-structure of ideology）。在这一结构中，展现出以下四种关系：

- 1 把“个体”作为臣民加以质询；
- 2 他们归属于这个主体；
- 3 臣民与主体之间相互识别，不同臣民之间相互识别，以及主体最终自我识别；
- 4 绝对保证一切确实都是这样的，也绝对保证臣民们在识别自己是在谁的条件 下变得循规蹈矩，于是，一切都变得正常了；阿门——“它就是这样的”。

（Althusser, 1976: 55；转引自并参见俞吾金，2004: 29—30）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阿尔都塞深刻地揭示出意识形态和个体之间的深层的、辩证的关系。个人处处把自己视为“主体”并陷入自己是无限自由的

¹⁵ 在英语中，subject一词具有双重的含义：作为哲学范畴，它可以解释为“主体”；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它又可以解释为“臣民”。此外，还可作动词用。

幻觉中，并试图从这样的幻觉出发去理解自己和他人、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然而，实际上，他们始终居留于、归属于某种意识形态，并成为它的忠实的“臣民”。在阿尔都塞看来，哲学家们常常觉得自己居留于任何意识形态之外，能够以完全超脱的方式来谈论哲学问题，事实上，他们的谈论完全是抽象的，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动物，或者换一种说法，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臣民”，他们是不可能以一种超意识形态的、中立的方式来思考、言谈和写作的。阿尔都塞暗示我们，惟有在确定的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来探讨“主体”的性质和作用，并进而谈论其它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才具有现实性。（以上参见俞吾金，2004：29—30）

在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特征的基础上，阿尔都塞还提出了“统治性意识形态”（*ruling ideology*）和“主流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dominant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的概念：所谓“统治性意识形态”也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意识形态的协调，“强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可能出现的各种裂痕乃至冲突才可能被化解；而“主流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就是“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参见俞吾金，2004：28）而如果从意识形态分类的意义上言，在每一个社会中，则存在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与边缘意识形态。而参照 Raymond Williams 对文化的分类，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外，边缘意识形态又可分为两种情形：残留（*residual*）意识形态与新生（*emergent*）意识形态，即根据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位置，存在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主流，残留与新生。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就是区分一般意识形态与具体意识形态。当我们说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乃是一般意识形态（*Ideology*），或者按照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说法，那是作为结构的意识形态：“即使意识形态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形式出现（如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它也是十分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但这些表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意识’毫无关系；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形象，有时是概念。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而作用于人……因此，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是人类世界本身。”（阿尔都塞，1984：

202—203；转引自丁立群，2003：37）而意识形态的具体形态（ideologies）则包括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等话语。

1.2.2 话语

正如意识形态一样，“话语”（discourse）概念也是“现代批评理论中历史相对较短、用法变化最大、使用范围最广、定义繁复多样、意义至关重要的一个术语”（陈永国，2002：28）。

国内学人在讨论“话语”的时候，实际上在其研究对象或范围上可能存在所指不明确的问题，正如陈永国（2002：30）所指出的，“国内语言学界通常把text译成‘语篇’或‘篇章’，把discourse译成‘话语’，然而也有与此相反者。”其所谓相反者，在翻译研究领域，最突出的可能是罗选民（1990）¹⁶，其所赖以立论的基础乃是de Beaugrand & Dressler的*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1981）。本文则按照国内语言学界的常规译法，将“discourse”译为“话语”，将另一个术语“text”译为“文本”。

纵览语言学家对“文本”（或“语篇”）与“话语”在所指上的区分，不外乎三种基本的意见：（1）文本（或语篇）既指书面语，又指口头语；（2）话语既指书面语，又指口头语；（3）文本只指书面语，话语则只指口头语。

本文并不打算从外延上对二者加以区分，认为无论是文本还是话语，均可包括书面语与口头语；正如黄国文（1987：7）对“语篇”（text）所作的界定：

语篇通常指一系列连续的话段或句子构成的语言整体。它可以是独白、对话(dialogue)，也可以是众人交谈（multi-person interchanges）；可以是文字标志（如交通标志），也可以是诗歌、小说。它可以是讲话，也可以是文章；短者一二句可成篇，长者洋洋万言以上。所以，可以说，无论是一句问候（greeting）、一次谈话、一场论文答辩、一次记者招待会的问答，还是一张便条、一封书信、一份科研报告、一本文稿，都可以是语篇。

但文本与话语确实又存在某种区别。陈永国（2002：30）首先引用了Leech & Short（1981）所作的区分：话语是语言性的交流、说话者与听者之间的交流、一种人际间的活动，其形式由其社会目的所决定。语篇也是语言性的交流（无

¹⁶ 相关文献可参看穆雷（1996），况敏（1998），罗选民（2002）等。

论是书面语还是口头语)，但仅仅是以听觉或视觉媒介编码的一个信息；继而指出：“话语”是说话者与听者之间的交流，而“语篇”仅仅是由听觉或视觉传达的一个信息，二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语篇强调交流所用的媒介，而话语则侧重交流的语境。不过，从其质疑——“但问题是：语篇所传达的信息难道就不需要语境了吗？”——来看，似乎对二者的区分尚未明确。

本文认为，文本（即“语篇”）与话语的本质性区别在于：“文本”概念侧重的是客体性，是作为语言的一个实体，主要是作为一种“结构”而存在，因此de Beaugrand & Dressler（1981）给“语篇”提出了七个必备标准：衔接性、连贯性、意图性、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参见陈永国 2002：30）；而“话语”概念侧重的乃是其交流（communication）¹⁷，即其社会实践性。由此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文本”（或“语篇”）是“话语”得以实现其交流的根本手段，没有文本这一手段，话语就不可能是一个语言活动。¹⁸

而“话语”这一概念，即便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人文学科中，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时期，其外延与内涵自然也是不同的。这里虽然无法就此展开讨论，但从总体上言，话语——或者说话语分析——存在两种传统：一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

在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话语通常是指大于句子的语言交流单位，与“text”（语篇或文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话语分析中，侧重的则是如“话轮”（turn-taking）与会话（conversation）等一类的对象；甚或也有讨论衔接与连贯等问题的，而这也就是“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的研究范围了。

在社会学传统中，话语指的则是人类交际活动所产生和使用的一套“符号”——主要是语词、范畴、命题和概念系统。其突出代表是法国的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话语理论。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话语涉及的是用以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不同方式。福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了“话语”¹⁹，如他自己就承认，至少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使用“话语”这个概念的（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1997；陈永国，2002：31）：

¹⁷ 英语中“communication”一词也有译为“交际”或“交往”的。

¹⁸ 而在更为宽泛的语境中，我们还可以考虑不同语境类型中二者的涵义，如在语言学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的语境中，但这里不再作深入的讨论。

¹⁹ 亦可参见张佩瑶（2003：15）。

有时用它指所有陈述的一般领域，有时用作可以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作为一种有序的、包括一定数量的陈述的实践。

福柯认为，“真理”（或“真实”，即 truth）不是被发现的并从而传播开来的，而是话语建构出来的；所有的真实都是话语的真实；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都是话语生产出来的。因此，话语分析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追溯特定的一套话语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即进行话语的系谱学研究，清理话语形成和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参见张宽，1995：133）。

总而言之，一切的语言使用均包含意识形态立场，社会学传统中的“话语”概念，我们主要是用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意识形态制约话语的生产；话语生产意识形态。

1.2.3 翻译、话语与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仿照微观的言语行为理论，将翻译行为视为一种宏观的言语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说，每一翻译行为的产生同时实施了三个不同的行为：（1）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即译内行为；（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译外行为；（3）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即译后行为。换言之，我们可以相应地从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层次研究“翻译”：（1）文本（text）维度；（2）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xis）维度；（3）社会学（sociology）或意识形态（ideology）维度。

文本维度 这一维度可以说是翻译研究中的本体（ontology）维度，因为翻译首先并且最终都与语言相关，一切都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而发生的。文本维度的研究首先自然可以从微观的层面展开，也可以从宏观的层面展开：从词汇、语法、衔接与连贯到文本结构属性等。

话语实践维度 这一维度涉及（翻译）文本的生产与消费等过程。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生产出翻译文本的生产者的构成、文本消费者的组成等因素在文本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文本的作用力（force）等，均属于这一研究层面。

社会学或意识形态维度 如前所述，话语乃是具体意识形态的体现形式，而翻译行为是一种话语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翻译行为作为一种话语生产

活动，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与此同时，翻译行为生产意识形态。

虽然在具体的研究中，可以有两种方向不同的方式：从文本到意识形态，或反之；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将微观与宏观两种视角结合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在面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时，还可以根据需要，采取其中一个层次或几个层次相结合的做法展开研究。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这里只是试图提出一种框架（framework），并且是一种开放性的框架；换言之，并未对研究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采用何种研究途径（approaches）做出规定²⁰，相反，研究者可以采用任何一种合适的研究视角或途径。

²⁰ 譬如说，笔者在本文的某些章节中便采用多元系统论来解释某些翻译现象。

第二章 社会文化语境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几乎完全封闭的中国大门，出现了李鸿章慨叹的“三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1961：42），梁启超的“中国四千年大梦之醒悟”（梁启超，1989：113），或者曾纪泽所谓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转引自王尔敏，2003：329）。中国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近代社会转型；同时这也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冲撞或交往的开端。

本章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特别是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的社会文化语境做一个大致的描述：（1）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西学”话语策略；（2）翻译实践中的文本类型与翻译主体。

2.1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西学”话语策略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无论是出于自愿抑或迫于现实形势，由于受到当时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均可能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就本文所论及的范围而言，近代中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过程中，无论是经世派、洋务派，抑或是维新派，面对“西学”话语，在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均采取了不同的话语策略，作为各自合法性（legitimacy）的依据；具体说，则包括：（1）师夷制夷；（2）西学中源；（3）中体西用。

2.1.1 中心观的破灭

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对华夏文化与外邦文化的交流作了这样的断语：“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我们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夷夏之间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而且从对“夷”的使用亦可看出其轻蔑的态度与立场。

宋朝石介在其《中国论》中曾经这样表述中国与外界的关系（石介，1984：116）：

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中国（或者说“华夏”）中心观在这里可谓得到了彻底的表述与体现。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见到这样一幅地图：大明帝国的十五个省，被画在地图的中央；在其四周所描绘出的大海上，散布着若干小岛；在各个小岛上填着当时中国人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而所有这些岛屿加在一起的总面积，还不如中国一个最小的省份面积大。现在看来，这幅地图的局限与荒谬自然是十分明显的，但它从象征与认知意义上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中国是如何认识与看待自己的，“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参见利玛窦、金尼阁，1983：179）该书中还记载：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自己带来的《山海輿地全图》时，因为图上中国的位置“稍偏”，引起了人们愤怒的抗议；于是利玛窦赶紧抹去一条子午线，并“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与自豪。”（180—181）

清代嘉庆皇帝则说：“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相提并论。”

上述种种有关华夏中心观的表述，至少表达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心；其二，中国文化优于其他一切外国文化。

这一悠久的“华夏中心观”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中破灭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此转型过程中，不断面对外来的各种刺激（包括军事与文化等方面）。

2.1.2 师夷制夷

面对这样一个“变之骤至，圣人所不能防”的社会剧变，面对西方帝国“坚船利炮”及其裹挟而来的西方文化，衰落的清朝帝国及其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体系——显得十分无力与无助。

然而，与此同时，有一些人从“天朝大国”的幻梦（亦即一种意识形态）中清醒，开始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历程。这便是“经世致用”的复兴。

面对西方（英国等）的强大这一现实，如何“制夷”便被“郑重其事地作为紧迫而重大的方略问题提上清朝政府的议事日程”（丁伟志、陈崧，1995：20）。依照经世致用的原则，经世派中部分人士开始将救亡图存的目光投向西方。林则徐，作为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广东禁烟期间，为了解“夷情”，“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转引自龚书铎，1997：87）；亲自主持编译《四洲志》；注意学习西方炮船技术，购置西方炮船，组织摘译有关炮船操作的资料。林则徐可谓开了探求域外新知、学习西方之先风。鸦片战争后，魏源则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大量中外资料，编成《海国图志》（1844）

——一部从世界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探索富国强兵、阐发改良主义思想，在近代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著作（参见邹振环，1996：42）。

该书最为著名者，当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主张。魏源认为，要强国御侮，要“制夷”，首先必须“洞悉夷情”，了解世界，承认西方国家有值得中国学习之“长技”（魏源，1844；1999：22）。

有论者指出，“本是忠心耿耿地为着‘天朝’的利益，为着有效地‘制夷’而提出‘悉夷’，可是‘悉夷’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即成为触动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十分敏感的大问题。一切主张了解外国情形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本营垒里的非难，逼得他们不得不在蔑视外国的暗昧无知的传统观念包围中奋起抗争，去论证‘悉夷’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为新兴的介绍外国情形的事业争取一席生存之地。”（丁伟志、陈崧，1995：23）尽管如此，在当时内忧外患这一现实面前，我们可以看出，“悉夷情”这一举措，虽然突破了“严夷夏大防”的防线，但仍因“制夷”的需要而获得了“合法性”。

林则徐、魏源等人在认识上发生的一个质的变化乃是从“悉夷”发展到“师夷”。我们自然可以看出，“师夷长技”提出的起因，乃是迫于内忧与外患，为挽救帝国而采取的非常现实的措施，因为当时关注的重心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兵器。

事实上，魏源关注的便是如何（在清帝国当时的逻辑中）对西方入侵进行军事抵抗的“海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写的是一本讲“兵机”的书（彭明、程颉，1999：100）。而正是作为抵抗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其船炮技术，并对西方船炮图式作了介绍。这种类似满洲初兴时“师明长技以制明”的提法，在魏源那里最初只具有海防军事上的意义（彭明、程颉，1999：101）。这一点，魏源自己在其《海国图志叙》中也说得很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转引自彭明、程颉，1999：102）。

当然，虽然魏源等人“师夷制夷”的主张的出发点与意图限于“海防”等“科学技术与军事工业”的层面上，但其实际后果则可能已经超出了这一技术层面，而对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它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华夏中心观，迫使时人在比较中正视中国并非一切都比外国强的现实，即承认外国亦有所长，而这所长恰乃中国之所短。其次，有可能在

思想认识的层面上能够超越具体的“长技”，从而达到文化的层次。不过，正如有论者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能使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真正地正视西方带来的冲击的严重性；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遭进一步入侵，朝野上下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彭明、程献，1999：102—103）。

2.1.3 “西学中源”

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也带来了天文、数学、地理等西学。当时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等人已经感触到中西科学发展的差距，积极与西士合作译书，引进西学，并提出了认同西学的思想观点。“西学中源”说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黄宗羲曾著《西洋历法假如》、《授时历法假如》等，认为“购股之术，乃周公、尚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转引自龚书铎，1997：65）。这种说法实开“西学中源”说的先河。其后，经康熙帝的钦定，王锡阐、梅文鼎的发挥，“西学中源”说逐步流行。甚至连外国传教士也把代数学（Algebra）的译名“阿尔热巴达”转译为“东来法”，或“中国法”，以取悦当时的统治者，保住在华传教的一席之地。

雍正帝时，清政府驱逐传教士，中西文化间的沟通遂告中断。多数士大夫沉溺考据，西学弃置不讲，几成绝学。然而，“西学中源”说在一些士大夫的著述中仍不时提及（龚书铎，1997：67）。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间，一批士大夫著书立说，介绍西学，在当时平静的中国思想界引发了冲击。随着对西学的考求，“西学中源”说再次被人提起。林昌彝说：“外夷奇器，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传，而外夷袭之。”温训且作诗云：“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林昌彝，1988：43页；转引自龚书铎，1997：67）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清政府开始考虑如何达到既能“剿平内患”又能“防御外侮”的目的，重拾林则徐与魏源当年的“师夷长技”的思路，并且逐渐形成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而往日的“夷务”也就改称为“洋务”了。有论者指出，“这种概念的改变透露出一个时代消息：中外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丁伟志、陈崧，1995：42）。

标志这一新阶段真正开端的则是曾国藩在1861年1月议复“俄法助战”之

议的奏折中重新提出“师夷”说（丁伟志、陈崧，1995：48—49）。要在中国制造炮舰，就需要按照西方的办法办工厂，就需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科学，就需要面对西学。

这一思潮的最早代表作乃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1861）一书。此书共四十篇，较早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变法思想。尤为重要的是，冯桂芬已经在“师夷长技”的“制洋器”基础上，走向了“采西学”；他不但论述了翻译事业的重要性，而且最早提议创办“翻译公所”，可谓为此后翻译的体制化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问题，本着纯为培养译员而设外语学校的宗旨，1862年7月清廷决定正式成立京师同文馆，聘请西人教习，教授八旗学生外国语言文字。

在同文馆的课程设置问题上，发生了近代第一次中西文化观念的直接交锋。186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在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的新方案。这样一来，同文馆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从专门学习外国语文到提倡学习以科学和技术为内容的西学。

虽然就表面及实际而言，增设的不过是算学，但由于这牵涉到西学解禁，此举将从根本上消解甚至颠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流价值观念，因而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论争中，双方均使用了“西学中源”这一话语策略。

西学反对派屡屡以“西方学理技艺均乃剽中国古学之绪余”为由贬斥西学，而洋务派则反其道而用之：既然西学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传到西方，西学因此也就是中学，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异端。

洋务派领袖奕訢在反驳倭仁反对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馆时，便是采用了“西学中源”说作为依据。他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犹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国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所以，并不是“舍中法而从西人”（《洋务运动》第2册第24页；转引自龚书铎，1997：68）。

对于这场争论，清廷最后下了一道总结性的上谕：“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是以派令徐继畲总管其事，以专责成。

习西法者，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止有碍于人心士习耶？”（《洋务运动》第2册第29—30页；转引自龚书铎，1997：71）“西学中源”说的作用由此可见。

洋务运动时期流行的“西学中源”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一）诸人所说的西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技术，谈论的大都不出声光化电等格致范围，因此，论者是从技艺层面上来阐述“西学出于中国”的，并没有超出明末清初时的认识水平；（二）“西学中源”说的主要作用表现为时人对西学的认同，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明人士用来为传播西学辩护，但守旧者也将其作为扬中抑西的根据。从总体上看，这种观点在当时更多地是充当了为传播西学辩护的理论依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发生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它成为“洋务派”回击“守旧派”反对西学的思想武器。（三）随着对西方的认识加深，有人对“西学中源”说中的一些观点产生了怀疑。（参见龚书铎，1997：71）

2.1.4 中体西用

与“西学中源”说并行于19世纪后期，而且更具社会影响的文化观念，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论。如果说“西学中源”说是昔日观念的延续和盛行，那么，“中体西用”论则是在近代社会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

“西学中源”说虽然证明了中西文化可以交流，为中国输入西学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它并未能够阐明中西文化的地位关系。

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论战中，一种长时期影响中国文化论坛的“中体西用”文化观，逐步定型。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1861）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999：71），人们一般将此视为“中体西用”论的最初表述。继冯桂芬之后，按照这个思路写文章，发表议论者不乏其人，使“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不过，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人们大都以“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来表述（龚书铎，1997：76）。

王韬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的文章中，较多使用“道器”关系来阐述中西

文化关系，指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强。”（王韬《杞忧生易言跋》，《弢园文录外编》卷 11 第 323 页；转引自龚书铎，1997：77）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王韬《弢园尺牋》第 30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转引自龚书铎，1997：77）他所强调的“中道西器”论，把中国的文化传统视为“道”，把西方文化视为“器”，规定二者的关系为以“道”统“器”，以“器”卫“道”（龚书铎，1997：77）。

在洋务运动时期，也有人提出“中本西末”的观点，如左宗棠、王文韶等，而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则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并指出：“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转引自龚书铎，1997：77—78）

就现有的文献看，最早使用“中体西用”一词的是沈毓桂。1895 年 4 月，他在《万国公报》第 75 期上发表的《匡时策》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5 年后，“中体西用”成为流行的说法，成为各阶层的人都能接受的思想原则。

总而言之，从冯桂芬的“本辅”说起，“中体西用”论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其基本特征是：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容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之价值（丁伟志、陈崧，1995：160）。换言之，“中体西用”这一观念的提出，是在确保“伦常名教”等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变或不受威胁的前提下，采用西学以之为富强之术，因而可以满足双方（提倡西学与反对西学者）的主张要求。

一方面，“中体西用”固然反映出洋务派（尤其是前期洋务派）的价值观念及其对西方认识水准所受的制约；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洋务派在策略上的考虑。正如有论者指出，“提倡西学者，之所以要借助‘中体西用’文化观定式来抬高中学之地位，并在形式上适当压低西学之作用，恰恰是为着防卫对手的攻击，减少由于重视西学所招致的重大阻力。”（丁伟志、陈崧，1995：160）

“中体西用”既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同时也是洋务派提倡西学的一种策略，在中国近代引进西方文明，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起了推动作用。

无论是提倡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的而且不愿意看到的是，

他们出于对“朝廷”的忠心而致力于“自强”，因而提倡西学——主要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其结果并不如人意：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

尤其令西学提倡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提倡的西学，尽管尚停留在科学技术的层面，却在一步步消解他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并最终颠覆了这一意识形态。

以上我们初步梳理并分析了中国近代在面对西方话语的时候，主张与反对西学者在论战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其实，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西学在中国的遭遇。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认识的加深，西学包括的内容也在扩展与丰富。而如果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西学传播的方式也很多，包括宗教（传教士）、学校（包括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人创办的，以及中国人出国留学）、翻译（包括外国人翻译、外国人与中国人合作，以及中国人独立翻译），还有旅游（清廷派出官员游历外国等活动也包括在内）等。

2.2 近代中国翻译的文本类型与翻译主体

自鸦片战争以降，近代中国的翻译活动始终具有明显的、直接的功利性。

无论是林则徐的“悉夷”，还是其后魏源等人的“师夷”，乃至“制夷”，都是对当时的社会语境所做出的一种几乎是直接的反应；体现在文本的选择上，则与其实用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译者的构成则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马祖毅，1999：514）。

《南京条约》（1842）签订后，西方教会随即在中国“办教堂，办学校，办医院，办报刊，印书籍，”，在扩大宗教宣传的同时，甚或是为了宗教的宣传，而翻译介绍了“一些科学、史地、政治、商务、历算等方面的知识”；在1843年至1860年之间，“外国教会的出版机构独揽了西书的出版”（马祖毅，1999：518）。1843年至1860年，教会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出版的书刊共361种，其中属于西学的有83种。教会出版机构则有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¹与上海的墨海书馆²。

¹ 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1844年创办于澳门，次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上海，改名美华书馆。

² 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创立于1843年12月，是上海开埠以后建立最早的新式出版机构，创始人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墨海书馆自1860年以后便不再出版新书。

华花圣经书房为基督教新教差会美国长老会在华设立的第一批印刷出版机构之一，到1860年，出版书刊105种，其中有关西学的有20种左右（马祖毅，1999：518—519）。

墨海书馆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文书籍。当时来沪的麦都思等传教士，虽已粗通中文，但难以用流畅的文言表达出来，不得不找一些中国文人当助手。因此，墨海书馆的职员实际由两部分人组成，外国传教士³和中国文人⁴。翻译的方式则是外国人（传教士）口述，中国人笔记。

墨海书馆的工作，大体可分两个阶段，以1852年为分界。此前，传教士的精力几乎全集中在《圣经》翻译方面，没有出版过什么科学书籍。1852年，《圣经》基本译好，《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先后于1852年、1855年出版，传教士这才着手翻译些科学书籍⁵。

从1860年后至19世纪末，清朝官办的出版西书机构才与教会的出版机构形成“平分秋色”的局面。

1860年后，西方教会出版西学的主要机构有博济医局⁶、土山湾印书馆⁷、益智书会⁸和广学会（马祖毅，1999：536）。

从1844年到1860年，墨海书馆共出版各种书刊171种，属于基督教义、教史、教诗、教礼等宗教内容的138种；属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学知识方面的33种。本节有关教会等机构的翻译与出版的史实等内容，除注明出处者外，参考了熊月之（1994）。

³ 参加墨海书馆工作的传教士，除了麦都思以外，还有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艾约瑟（Edkins Joseph，1823-1905）、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1815-1863）、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1810-1888）、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和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都属于伦敦会。

⁴ 墨海书馆的中国职员有王韬（1828-1897）、李善兰（1811-1882）、蒋敦复（1808-1867）、管嗣复（?-1860）、张福僊（?-1862）等。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与西人合译、合编西书，西人讲出大意，他们笔录、润色。

⁵ 现举其要者如次：数学：《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四部书都是伟烈亚力主译的；物理学：《重学浅说》与《重学》。《重学浅说》，伟烈亚力与王韬合译；天文学：最著名的是《谈天》，1859年出版，凡18卷，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地理、历史：有两部著作，《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都是慕维廉所撰述。前者上卷主要为政治地理，资料取自澳门出版的《地理备览》、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下卷主要为地貌地理和历史地理，取材于孙默维女士的《地文学》、雷达的《地质天文学大纲》等书。后者《大英国志》由慕维廉翻译，蒋敦复润色，1856年出版；植物学：《植物学》，1859年出版，共8卷，由韦廉臣、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医学：有三本新作，两本重印书，都是合信所著。三本新作是《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与《内科新说》，均由合信撰稿，管嗣复润色。重印的两部书是《全体新论》与《博物新编》，先后于1851年、1855年在广州初版。1855年，墨海书馆加以重印；综合性科学：有《中西通书》、《科学手册》和《六合丛谈》（参见熊月之，1994）。

⁶ 博济医局是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G. Keir，1824—1901）于1859年在广州创办。除了治病，该医局还翻译、编写了一批医学与化学等方面的书籍。

⁷ 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由徐家汇天主堂于1860年代开办，主要出版宗教书籍以及《益闻报》、《格致益闻汇报》等刊物，并出版了一批西学书籍。

⁸ 益智书会，又名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1877年成立于上海，主要任务是为各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所涵盖的学科有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博物、天文、地理、化学、地质、植物、动物、心理、历史、哲学、语言等，并将宗教与科学结合起来。编纂委员会大部分为英美传教士，如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Calvin Wilson

1861年1月，清王朝遭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总理衙门，为办理洋务与外交的总机构，其后权力不断扩大，总揽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关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物、交通等各方面的大权。1901年，更名外务部，并增置翻译官15人。

1862年，京师同文馆建立。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一所学校，起初只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外国语学校，培养一些外语翻译人员，进而发展为结合培养专业外交人员、翻译人员，并专司翻译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欧美一些国家有关历史、地理、政经等书籍的译书机构，更进而建成出版印刷机构，形成在一个学院下设有译书和出版印刷机构的教育出版组织。同文馆虽是清政府所办，但它的主要负责人、教授、办学思想、翻译选题的决定和组织，以及出版社的规划等等，都依靠外国传教士；财政的供给、某些政策的决定，实际上受当时的税务司负责人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所控制，即便是上述这种在学院中设印刷机构的做法，也是仿效了当时英美等国经常采用的模式（叶再生，2002：卷一 265）。

京师同文馆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同时⁹，还出版了该馆师生所译的西书25种（马祖毅，1999：550）。

由政府创办，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译书机构，当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¹⁰。

据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的分类（参见马祖毅，1999：553），所译书籍的门类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工艺；水陆兵法；年代表、新闻纸；造船；国史；交涉公法；零件。大多与制造局的“制造”有关，魏允恭在《江南制造局记》中说：“该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

Mateer）、林乐知（Young J. Allen）、傅兰雅（John Fryer）、黎力基（Rudolph Lechler）等。1890年，由该会审定合乎学校使用的书籍有98种；其中最有影响者，当推傅兰雅所译编的《格致须知》与《格物图说》两套丛书。

⁹ 据《京师同文馆馆规》，同文馆的学制为八年（参见陈玉刚，1989：31注1）：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第三年：讲各国地图、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¹⁰ 1865年，江南制造局成立，1867年该局设立翻译馆，1868年在上海正式开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等人从事翻译（陈福康，1992：90）；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与翻译馆同在一处。1871年，翻译馆开始出书。

皆有图可寻。……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专择有裨益制造之书，详细译出。”（转引自马祖毅，1999：553—554）。至于翻译馆的译书方法，傅兰雅在上述文献中有所说明（同上，554）：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而文法甚精。

参加译书的“华士”有35人左右（马祖毅，1999：558），主要有徐寿（1818—1884）、华蘅芳（1833—1902）等。

翻译馆对原本的选择，取决于当时的需要：制造局既从事军事工业，自然以译工艺学书籍为主（马祖毅，1999：569）：“先后翻译刊印图书资料二百余种”¹¹（陈玉刚，1989：32），所译书籍涉及算学、测量、汽机制造、水陆兵法包、天文学、重学（即力学）、化学、光学、医学等等；“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类”，“占80%以上”（郭延礼，1998：7）。

贺麟在其“严复的翻译”（1925）中的“作者小序”中说明他尚未脱稿的《翻译西籍小史》时指出：

原书共分五章。除第一章绪论，论研究翻译史之旨趣及我国翻译外籍之起源外，其余四章分论翻译西籍史上的四个时期：一，翻译西籍发轫时期——明末清初之翻译；二，翻译西籍复兴时期——江南制造局及同文馆之翻译；三，林纾严复时期之翻译；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之翻译。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1887年11月“同文书会”在上海成立，1892年¹²改称“广学会”¹³，创办

¹¹ 关于江南制造局译书的数量，还有163种、178种、180余种等不同说法（参见郭延礼，1998：7注4）。

¹² 这一日期是江文汉（1988）的观点，此前，一般认为是1894年改名的，参见叶再生（2002：406）。

¹³ 最初的英文名称是“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905年英文名称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这一英文名称的改动，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其关注重心的变化。

人是韦廉臣¹⁴。广学会以推广西学为宗旨，并以中国的士大夫为主要的宣传对象。韦廉臣在创办广学会的计划书中说：“我们对于中国的开放永远不会感到满意，直到我们能将中国人的头脑也开放起来。他们反对西方的观点、计划以及商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动，几乎完全是由于无知。……因此，消除这种无知，在人民各阶层中推广学识，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他认为士大夫阶层是“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这些人入手，用书报来启迪他们、指导他们，这样“就可以完全渗透这个帝国并且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同文书会章程、职员名单、发起书和司库报告》，1887；转引自陈玉申，2003：21）

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91年接任广学会的督办后，更注重新对中国“上等人”的影响。其宗旨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新学广中国旧学”；而其主要工作则是出版报刊书籍，出版书籍近三百部左右（转引自马祖毅，1999：546）。广学会在清末出版的报刊有《成童画报》（1889—1891）、《万国公报》（1889—1907）、《中西教会报》（1891—1917）、《大同报》（1904—1917）、《女铎》（1911—1951）等，其中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对中国的学术和政治运动发生过重要影响。

有论者对江南制造局与广学会做了一个比较：“如果说，活动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西书，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话；那么活动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广学会的译书则百分之八十为社会科学著作”（郭延礼，1998：10）。

在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期间，翻译对原本的取向首先是自然科学（包括应用类科学），然后开始关注社会科学，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兼而有之，到了甲午之后，甚至有社会科学成为主流的趋势。

这一点，从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1896）中对当时的翻译情况

¹⁴ 1877年，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举行会议，韦廉臣获推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干事，为各地教会学校提供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化学、植物学等新式课本。后来，韦廉臣认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太狭窄，应该面向中国全社会开展更大规模的西学传播活动，乃于1887年11月在上海创办“同文书会”。该会于1888年成立董事会，推举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为会长，德国驻沪总领事佛克（J. H. Focke）为副会长，韦廉臣为督办，主持日常事务。董事会成员除各差会主要传教士外，还有英、法、美、德等国驻华使节、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员和汇丰、怡和、花旗、谦信等洋行的老板，所以，广学会不单纯是个宗教性团体，还代表了外人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所作的一个概括中也可以看出一二（1999：83）：

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类为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1898）中又说（1999：194）：

自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

其中所谓的“学术”，乃是指历史、法律、政治、教育、哲学等社会科学。但是，有一点也是值得强调指出的，那就是，在梁启超表达上述看法的1896年或1898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的译本出版了¹⁵，而从梁启超的概括与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种种原因，其影响应该说仍然不大。高凤谦在其“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1897）也指出（1995：732—733）¹⁶：

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讲求，制造局历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则鲜有留心，译者亦少。盖中国之人，震于格致之感，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为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学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况格致之学，各有附隶，非专于制造之人不能学，即学之亦无所用。且需仪器以资考验，非徒据纸上之空谈。若夫政事之书，剖析事理，议论时政，苟通汉文者，无不能学。果能悉力考求各国政事之得失，兵力之强弱，邦交之合离，俗尚之同异，何国当疏，何国当亲，何事足以法，何事足以戒，无不了了于胸中，遇有交涉之事，办理较有把握。即欲兴一新治，亦不至事事仰鼻息于人，或反为所愚弄。此翻译政事之书所以较之格致尤为切也。

或者，从另一个视角看，我们可以说，梁启超所说的“我国士大夫”到了此时，

¹⁵ 到了1870年代后，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随着与西方的交往增多，中国的使外人员也在增加。他们通过学习与亲身的体验，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盛并不全在于其坚船利炮与自然科学，更为主要的还是由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因而开始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感兴趣，并着手翻译（郭延礼，1998：8）。有论者统计，1860—1900年四十年间，共出各种西书555种，其中自然科学162种，占总数的29%，应用科学225种，占总数的41%，两者合计387种，占总数的70%，而社会科学只有123种，占总数的22%，其他45种，占总数的8%（熊月之，1994：11—12；转引自郑大华，2002：118）。

¹⁶ 引文标点有改动。

才开始有了一种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紧迫需要感，这大概也是此后严复的（社会科学）翻译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思潮的主要原因罢。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而几乎没有文学这样一种翻译的取向？

郭延礼（1998：11—14）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2）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自我优越感的作祟；（3）文学翻译较一般翻译为难。而我们以为，其中第一点，即翻译是否“有用”于国家或者朝廷，或者推而广之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当时几乎是一切翻译活动的主导思想，“救亡图存”也就成为当时翻译主体从事翻译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第二点，可以说是在译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潜在可能的）翻译主体诗学观念在起作用，如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到英国不久就指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1984：119；转引自郭延礼，1998：12）第三点则属于语言的问题，但郭延礼的解释未必是一个理由：因为在当时，（自然科学的）专业书籍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可能更难翻译。因此，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第一点。

由于文学并非“有用书籍”，其间虽然有零星的译介，但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这种对国外文学冷淡的局面，差不多到在戊戌变法前后才开始有了转折。这一转折的契机，依然是因为文学的“有用”：只不过这一次是文学对政治的“有用”。

第三章 文学（翻译）话语：从边缘到中心

自近代中国¹开始到甲午战争这一段时间内，外国文学的翻译几乎可谓屈指可数²。正如有论者所说，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整体的起步比较晚。甲午战争之前，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仍然很少”（郭延礼，1998：10）；零星的文学翻译实践自然也就无法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一局面的成因，除了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外，还与小说在文学系统甚至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分不开。本章考察（翻译）小说在清末如何从文学（乃至文化）系统中的边缘地位走向中心位置，并就晚清小说翻译作一综述。

¹ 中国近代的分期，此处的起点依照历史分期，为1840年。

² 大约在1840年，《广东报》刊载过《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陈玉刚，1989：26），为英文、中文、拼音对照本，译者为罗伯特·汤姆（王继权，2000：43）。

最早译成中文并出版的长篇小说是在1853年（据刘树森（1997：37）介绍，“英国作家约翰·班杨的小说《天路历程》早在1865年便译为中文。这一发现将中国译介外国小说的历史向前延伸了30余年。”），英国作家John Bunyan（1628—1688）小说*The Pilgrim's Progress*（1678）的译本《天路历程》由教会在厦门印刷，译者则是“一位会说汉语但文字水平不高的外国人”（郭延礼，1998：104—05），有论者考证，为英国传教士William Chalmer Burns（1815—1868）（刘树森，1999：123注1）。

1864年，美国诗人H.W. Longfellow（？—？）的诗歌译作“人生颂”面世（钱钟书，1982/1984）。

1869年，张德彝从“英文或法文报纸上译过‘安南著名大夫诗’一首，译文为杂言体古诗，但此译诗载于张氏日记体的《欧美环游记》稿本”，直到1985年才出版面世（郭延礼，2000：58）。

1871年，王韬与张芝轩合译《普法战纪》，内有法国国歌（即“马赛曲”）与德国的“祖国歌”（郭延礼，2000：57—58）。

1872年，《申报》连载根据英国Jonathan Swift小说*Gulliver's Travels*第一部分翻译的《谈瀛小录》（颜廷亮，1996：4），约五千字（王继权，2000：43）（需要指出的是，陈平原（1997：257）与王继权（2000：43）均未对公历与农历的时间进行转换，认为是“4月15日—18日”）。

1872年，《申报》刊载译自美国Washington Irving“Rip van Winkle”的“一睡七十年”，约一千字（王继权，2000：43）。

近代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郭延礼，1998：106）小说则在1873年初（据陈平原、夏晓虹（1997：570—571）收录的“《听夕闲谈》小序”，文末时间标为“《瀛寰琐记》第三期（1872年），有误；原因是月刊《瀛寰琐记》1872年11月创办，可能又是没有进行时间转换。），蠡勺居士（即蒋子让，但据哈佛大学教授韩南考证，有可能是蒋其章，详见韩南，2001：2004）所译的《听夕闲谈》（据韩南（2004：102—103）考证，译本是英国作家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长篇小说*Night and Morning*（1841）的上半部。），在近代第一份文艺月刊《瀛寰琐记》上连载，自第3至28期，全书用文言文翻译（郭长海，1992；转引自郭延礼，1998：106—108）。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以往翻译（甚或包括文学）研究领域的论者，在论述或论及文学（特别是小说）翻译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只追溯到1897年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²，甚至是1898年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基本上无视蠡勺居士的“《听夕闲谈》小序”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1882年，画图新报馆译印《安乐家》（王继权，2000：43），署名“威尔通女士”，但据郭延礼（2000：60）说，“未注明是作者还是译者”（但郭延礼在同一段落的结尾处却又说“但此书和《安乐家》又都是由外国人翻译的”（2000：60））。

1888年，天津时报馆印《海国妙喻》（即《伊索寓言》），共七十则（王继权，2000：43—44）。

1890年，回族马安礼翻译了阿拉伯诗人蒲绥里的“斗篷颂”，以诗经体翻译，题为“天方诗经”，与阿拉伯原文一同刊出（郭延礼，2000：61—62）。

1891年，月刊《万国公报》自12月起，开始连载译自美国Edward Bellamy小说*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的《回头看记略》，每期刊登数章，至1892年4月号刊载完毕（刘树森，1999）；译者李提摩太将《回头看记略》易名为《百年一觉》，1894年以单行册的形式再版，印刷了2000册，其中绝大部分赠送官吏和翰林（刘树森，1999）；但需要指出的是，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乃是匿名发表的（韩南，2004：96），后来根据1894年上海广学会版译本对照连载版本，推断出连载本为译本，译者为李提摩太。

3.1 小说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

“文学”并不是一个透明的概念；相反，它经历了历时的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不同的。有论者指出（袁进，1999：14）：

文学范围是文学概念的外延，它是由文学的内涵决定的。一个时代的文学概念决定了它对文学范围的理解。中国古代对文学范围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分作广义狭义二种，在汉代它们表现为“文学”与“文章”的对立，狭义的文学称作“文章”，广义的则包括“文学”与“文章”。六朝时期则发生了“文笔之辨”。六朝之后，这种争论反倒沉寂下来。但即使是广义的“文学”，将今天许多不能算作文学范围之内的历史著作与应用文也算作“文学”，却往往将戏曲、白话小说拒之“文学”门外。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文学是士大夫的专利，戏曲与白话小说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并非由士大夫创造，它们的问世又在“文学”范围划定之后。因此，它们更难于进入“文学”的殿堂。

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发生变化，也并非中国所特有的，几乎所有的文学都曾有过这一经历，甚至可以说一直处在或大或小的变化之中。

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也是到了19世纪后才形成的。卡勒指出（1998：22）：

如今我们称之为 literature 的是 25 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 literature 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 200 年。1800 年之前，literature 这个词和它在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而如今，在普通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或拉丁语课程中，被作为文学研读的作品过去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类型，而是被作为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学习的。……比如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如今我们把它作为文学来研究。而在 1850 年之前的学校里，对它的处理则截然不同。

袁进（1999：15）指出：“一直到 19 世纪，鄙视小说，不把小说当文学，同时却又把哲学、历史等学术研究当作文学，几乎是世界性的文学观念。”这也正如卡勒所说的：“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1998：23）

在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转引自谢昭新，2003：1）而早期有关小说最为著名的论断，则

出自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中，列出儒道等十家，其中小说家名列第十，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视小说家为等闲一类（转引自谢昭新，2003：2）：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班固虽然没有对小说或小说家作出界定，但他的这一价值判断却影响深远，“小说”在中国文学甚至文化中的地位几乎就此成了定论。

此后，“小说”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直至晚清如1897年，其低下的地位基本没有改变，严复、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中写道（严复、夏曾佑，1897；1997：25）：

书之为国教所出者，谓之经；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曲，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此三者，皆言理之书，而事实涉及焉。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而难言之理则隐寓焉。此书之大凡也。

在这里，严、夏将小说置于“书”这一可谓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加以考察：首先将史、说（稗史）与经、子、集类作了区分，指出前者注重“纪事”而后者侧重“言理”；然后又对史、说加以区别，点明性质不同（史贵实，说贵虚）。

经、史、子、集在中国，不但是目录学上的文体分类，更是排次尊卑等级的文化秩序。即便是在文学系统中，小说的地位依然低下。如从文体而言，《诗》应与集部的词曲类为伍，可它却赫然同《易》、《书》之类比邻，属于经部。小说在这个“整体”中，地位卑微属子部。而小说地位低下，有论者也做了解释（袁进，1999：15）：“中国古代士大夫鄙视戏曲小说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它们与‘载道言志’的文学传统有距离，一是它们的文学形式不‘雅’。两条标准之中似乎前者更为重要，因为不少戏曲剧本在遣词造句用典上已经穿上‘雅’的华袂，而小说也有用骈文和古文来做的，然而它们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仍无

地位。”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学近三千年的历史中，文学潮流几经变更，从先秦散文到汉赋，再到魏晋小品、唐诗宋词，以至元代散曲、明清小说，直到近代文学开始之前，在文化系统中，其主导思想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文以载道”之“道”：也就是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³。而在文学系统中，占居主导地位的是诗文。

3.2 （翻译）小说的作用

在西方，文学（包括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卡勒（1998：39）说：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呈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一种被赋予若干功能的、特殊的书面语言。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文学被作为一种说教课程，负有教育殖民地人民敬仰英国之强大的使命，并且要使他们心怀感激地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迪文明的事业的参与者。在国内，文学反对由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滋生出来的自私和物欲主义，为中产阶级和贵族提供替代的价值观，并且使工人在他们实际已经降到从属地位的文化中也得到一点利益。文学对教育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懂得感激，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一种伙伴兄弟的感觉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还起到了一种替代宗教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只承认“半部《论语》”可以治理天下，只有“载道”的文章，才能有“治国平天下”的职能；小说不在“文学”之列，自然也就不具有这一功能了。到了咸丰、同治年间，与清代一贯奉行的“禁毁小说”做法相反，苏州、广州等地的地方当局，由官方出资大量印行《荡寇志》，以帮助镇压农民起义。尽管《荡寇志》的遭遇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但它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出于政治功利的需要，士大夫这时已经愿意承认小说的力量，并且按照他们自己对文学功能的理解，赋小说以“救世”的功能，使它与“以文治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衔接起来（参见袁进，1999：15—16）。

1873年，蠡勺居士在“《听夕闲谈》小序”（1873）中就已经对小说的功能

³ 如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汉代儒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学主张，乃至唐宋时代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无不体现出这一点。

与作用⁴以及翻译的目的发表了看法，并将小说与其他文本类型（如诸子百家）作了对比（蠡勺居士，1873；1997：570—571）：

余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魄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又令人闻之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婉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斯则又古人启发良心惩创逸志之微旨，且又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

且夫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之书，国史古鉴之纪载，其为训于后世，固深切著明矣，而中材则闻之而辄思卧，或不欲闻。无他，其文笔简当，无繁缚之观也；其词意严重，无谈谑之趣也。

若夫小说，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心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

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像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犀者也。因逐节翻译之，成为华字小说，书名《昕夕闲谈》，陆续附刊，其所以广中士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诸君子之阅是书者，尚勿等诸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也可。

如果与康有为等后来的论述加以对照，便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然而，虽然在这里蠡勺居士在近代首次提出“谁谓小说为小道哉”的观点，可以说对中国传统的文学系统不同文类的秩序表达了不满，甚至试图“颠覆”——至少是“重新排列”——文学系统的秩序，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当时关注的重点并非文学，而是更为直接“有用”的自然科学翻译⁵。

1895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傅兰雅先后在《申报》与《万国公报》上刊登题为“求著时新小说启”（1895）的小说竞赛广告，开头便指出（傅兰雅，1895；转引自韩南，2004：158）：“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广告希望那些“愿本国富强”的“中华人士”，针对“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鸦片，时文，缠足——“撰著新趣小说”。傅兰雅不但将“三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行为”放置在一起，意欲加

⁴ 韩南（2004：127注90）通过对照小说作者利顿的序言后指出，蠡勺居士的“小序”中有关小说功能的表述似乎来自利顿的序言，至少“译者读过了利顿的序言”。

⁵ 如直到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译书公会，其《译书公会章程》也只是选择“近时切要之书”来翻译，其中依然没有包括文学（或小说）：“本公会之设，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考各国书籍浩如烟海，中国从前所译各书，仅等九牛一毛。兹已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气诸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饷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经较易，本会犹于此兢兢焉。”（章太炎，1981：37注12）。

以批判，而且将小说的功用上升到“爱国主义”与“中国富强”的高度（韩南，2004：162），从某种意义上言，显然比蠡勺居士（1873）又进了一步。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傅兰雅似乎是“失败”了，因为他在这次小说竞赛后（即小说尚未发表之前）就立即离开中国，前往加州（史景迁，1969；参见韩南，2004：151—152）。至少，我们可以说，傅兰雅的观点与做法在当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产生相应的影响⁶。

小说长久以来所处边缘位置的这一局面，终于在以梁启超为首与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手中打破了。文学翻译真正的兴起，则在甲午战争，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文学翻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潮流”，其“功臣”中当首推梁启超，尽管梁启超并非提倡文学翻译的第一人。

3.3 启蒙规划中的小说与小说翻译

关于启蒙，人们即便在论述中，一般也采取“开门见山”的方式，很少对其加以界定。康德在其“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对“启蒙”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康德，1990：22）：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张申府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1937；1999：168）中说：

就字面说，启蒙就是开明的意思。再分别说，启蒙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因此，在字典上，所谓启蒙就是脱离迷信，破除成见，等等的意思。凡是启蒙运动都必要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

钱永祥（2002：358—359）则对启蒙原则做了如下的归纳：

⁶ 虽然韩南（2004：168）指出，“可以说，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

（1）启蒙肯定理性。是因为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至于理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当地表达了人的自主与反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是否发展出一套后形上时代的理性概念。

（2）启蒙肯定个人，是因为认定个人不仅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单位；至于这种个人是否一定沦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个人，从而忽略了社会脉络与集体身份的主张，也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关于个人之构成的理论是否层次丰富。

（3）启蒙肯定平等，是因为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至于这种道德地位的平等，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对于“待人为平等的主体”发展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理论和资源分配原则。

（4）最后，启蒙肯定多元，因为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蕴含着不同的选择与修正结果；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蕴含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又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什么样的道德限制。

在上述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补充很重要的一点：启蒙，究其实质，乃是向启蒙的受众（即对象）提供一套意识形态话语。

如果我们像哈贝马斯那样，将“科学技术”也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自鸦片战争以降，近代中国可以说经历了三种形式的启蒙，此即曾廉于戊戌变法前在其“上在先生书”中所说的：“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转引自武润婷，2003：43）其中的“技”、“政”、“教”分别指科学技术、政治理论（社会科学）、新思想与道德观念。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科学技术层面上的启蒙，甚或甲午之前的社会科学所引发的思想启蒙，基本上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或效应，这一点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1920；2003：85）中曾经指出：

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隆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

到了甲午战争失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同上）：“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

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思想启蒙遂成为主流⁷；其最为典型的代表则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⁸）等社会科学著作。

与此同时，一直到戊戌变法，也开始了文学启蒙话语。

如果说此一时期的思想启蒙对象，乃属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与官僚等精英阶层；那么，文学启蒙的对象则是与之相对的普通大众，包括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幼学），甚或“愚民”，当然也不排除精英阶层，但当以大众为主。这一点，从启蒙者有关语言与启蒙方式等方面的论述就可以见出。

1887年，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学术志》（1887）中说，应当创立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即“言文合一”的文体，因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转引自颜廷亮，1996：4）；其中提到“日本小说家充溢于世”（陈平原，1997：611）；并就口语（言）与书面语（文）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如下论述：“文字者，语言之所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黄遵宪参照欧洲文学发展历程，从文学的兴盛与文化的普及的角度，首次⁹提出言文合一乃势之所趋：“余闻罗马时，……。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转引自吴立昌，2004：36—37）。

1897年，康有为受他所收集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编行的小学课本启示，在其《日本书目志》（1897）的“识语”中，专门讲到了幼学教育的重要性，并在“幼学小说”项下说（转引自夏晓虹，1991：16）：

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若小说也。

他又在“卷十四”中对小说的作用以及启蒙对象作了论述（康有为，1897；同上）：

⁷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及其它社会科学著作，因不属于本文考察的范围，这里不拟详述。

⁸ 有论者甚至指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早木刻本是1894年或1895年陕西味经售书处刻本，这是未经修改的初稿印本，与以后版本文字不同（参见李泽厚，1979：285；2003：261）。

⁹ 当然，人们不会忘记，黄遵宪1868年在其“杂感”中所写：“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胡适的评价是“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张用俗语作诗了。”（参见范伯群、朱栋霖，1993：7）

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

同在 1897 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1897）中就主张把“说部书”列为儿童教育的教学内容之一；他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又说（梁启超，1897；1999：131）：

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伙。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

梁启超在“论幼学”中也提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的问题，从而出现“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他进而倡导（梁启超，1897；1999：39）¹⁰：

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

就启蒙语言与启蒙方式做了相当精当分析的，则当推严复与夏曾佑了：二人以几道、别士署名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¹¹（严复、夏曾佑，1897；1997：17—27），文章提出“纪人事”的“史”与“稗史”均为“纪事之书”，并且“难言之理则隐寓焉”，继而区分了“同一纪事之书”“传之易与不易”的原因（1997：25-27）：

书中所用之语言文字，必为此种人所行用，则其书易传。其语言文字为此族人所不行者，则其书不传。此一也。

即此语言文字为本种族所同行矣，而今世之俗，出于口之语言，与载之纸之语言，其语言大不同。若其书之所陈，与口说之语言相近者，则其

¹⁰ 标点有改动。

¹¹ 有论者指出，严复、夏曾佑（1897）是“中国小说的近代化发端的标志”，因为“它对小说的功能，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念。”（范伯群、朱栋霖，1993：5）；而从本文前述的分析看，此说不成立。

书易传；若其书与口说之语言相远者，则其书不传。故书传之界之大小，即以其与口说之语言相去之远近为比例。此二也。

即其书载之文字之语言，与宣之口舌之语言弥相近矣，而语言之例，又大不同：有用简法之语言，有用繁法之语言。简法之语言，以一语而括数事，故读其书者，先见其语，而此中之层累曲折，必用心力以体会之，而后能得其故。繁法之语言，则衍一事为数十事，或至百语千语，微细纤末，罗列秩然，读其书者，一望之顷，即恍然若亲见其事者然。故读简法之语言，则目力逸而心力劳；读繁法之语言，则目力劳而心力逸。而人之畏劳其心力也，甚于畏劳其目力。……若然，则繁法之语言易传，简法之语言难传。此三也。

即用繁语观之，不劳心也，而所言之事，有相习不相习。……若其所言，其界极远，其理极深，其科条又极繁，加以其中所用之器物，所习之礼仪，所言之义理，所成之风俗，所争之得失，举为平时耳目所未及而心力所未到，则必厌而去之，必其所言服物器用，威仪进止，人心风俗，成败荣辱，俱为其身所曾历，即未历而尚有可以仰测之阶者，则欣然乐矣。故言日习之事者易传，而言不习之事者不易传。此其四也。

……故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此其五也。

据此观之，其具五不易传之故者，国史是也，…；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

他们因此认为（1997：27），

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夫古人之为小说，或各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

最后，他们从启蒙的高度，将（翻译）小说提到了启蒙方案的议事日程上来（1997：27）

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禅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

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

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其一，严复与夏曾佑认定小说具有“开化”即启蒙的功能，并借用域外资源作为其理论支撑，无论这种域外资源

是否属实；其二，严复与夏曾佑的观点除了与前引卡勒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外，实际上还指出了小说的意识形态实践功能：即小说这一“人心之营构”以话语的方式，向读者直接或间接地传达意识形态内涵，最终体现为读者或社会的行为，即表现为“人身之所作”，创造出新的历史。

总而言之，严复与夏曾佑的理论¹²，与此前已经展开的文学翻译实践之涓流，在此会合一处，由此迎来了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潮流的开端。

3.4 （翻译）小说：从边缘到中心

梁启超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翻译小说，以之作为启蒙话语的人，但由于他在维新变法中与其师康有为充当了“精神领袖”的角色，在知识话语场中积累了相当的资本，特别是文化资本，因而成为文学启蒙思潮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其实，1892年，梁启超在其“最初应读之书·西学书”（1892）中所列的七种西学书籍——《万国史记》、《瀛环志略》、《列国岁计政要》、《格致须知》、《西国近事汇编》、《谈天》、《地学浅识》——并没有包括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在“学要十五则”（1892）中论及读西书时指出（1999：4）：

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次读《瀛环志略》以审其形势，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读《西国近事汇编》以知其近事之局，至于格致各艺，自有专门，此为初学说法，不琐及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样两点：第一，梁启超对于西学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与当时以及此前其他人的主张或看法，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第二，从上引文看来，梁启超在看待西方方面虽然具有某种宏观的视野，但并不认为文学在其中具有一席之地。

到了1896年，梁启超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论及报刊体例，首推“广译五洲近事”，认为如此“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于夜郎自大，坐智井以议天地”；并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

¹² 1897年10月2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一日），严复、夏曾佑等创办的《国闻报》在天津创刊。严复与夏曾佑在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后，《国闻报》并未“附印说部”。

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999：67）

梁启超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1897）的开首，甚至于提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1999：128）这里都只是表明梁启超对（非文学）翻译的重视。

梁启超认识到文学的功用，则是在其《变法通议·论幼学》（1896）中：“论幼学”一篇，就把“说部书”与“识字书”、“文法书”等并列，作为蒙学教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看到了“今人文字与语言离”，“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的弊病，鉴于通俗小说读者“反多于六经”的事实，于是提倡：“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其为补益，岂有量耶！”（梁启超，1999：39）在这里，梁启超明确地表明他已经看到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1897年，梁启超在其“论译书”（1897）中提出应译九类书，但其中并不包括外国文学（陈平原，1997：613—614）；文学翻译此时依然尚未进入正忙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的视野之中。

梁启超真正认识到小说翻译的启蒙功能，是在百日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当时，他亡命日本，并在轮船上开始阅读与翻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¹³。这年冬旬刊《清议报》创刊，梁启超主编。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册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1997：37—38），首次提出作为文类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

梁启超继而在文章¹⁴中指出，人们面对“庄严”与“谐谑”时的态度差异乃是人之常情，即便是“圣人”也无可奈何。不过（1997：37），

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谏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

但是，梁启超指出中国文化（或文学）系统中的小说所存在的问题（1997：37）：

¹³ 关于论者对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不同观点，可参看王宏志（1999：120—121）。

¹⁴ 梁启超（1898）这篇文章在近代，尤其是晚清，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而这里有必要对这篇短文（不到八百字）做一个文本细读。

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将中国传统小说划归在“诲淫诲盗两端”，并非梁启超的首创，但梁启超却是在为其后的主张寻找逻辑上的理据；因此便再次引用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对小说的看法（1997：37）：

……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焦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

既然小说具有如此功用，而中国的小说合适者又不多，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也就出来了：唯有借助于域外的小说。为此，梁启超指出（1997：37—38）：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在这里，梁启超可谓建构了一个有关西方小说的“神话”，有论者甚至仿照Edward Said的“Orientalism”（东方学¹⁵）提出了“Occidentalism”（西方学）的观点（Cheung, 1998）。而此处最为引人注目者，乃是梁启超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需要，不惜向中文读者建构出域外小说在启蒙中的巨大作用这样一个“有违事实”（夏晓虹，1991：18）的“话语事实”，从而为其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主张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从中国“时局”与爱国的角度提出了翻译外国（政治）小说的必要性，而这本身也是在建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清末文学（小说）翻译的意识形态¹⁶话语的地位由此也得以确立。

1901年2月，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民丛报》第一号上发表“新民说：论

¹⁵ 也有译为“东方主义”的。

¹⁶ 即英文“the Ideology of translating”。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901），从“内治”与“外交”两个方面展开其立论，“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念”。

首先是“内治”（1999：655）：

所谓关于内治者，何也？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届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虐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亦。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梁启超在“以一家譬一国”后，认为“即有贤君相，亦爱我而莫能助也”，因而得出的结论是要“新民”。何谓新民？梁启超指出（1999：656）：

“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

其次是“外交”，梁启超首先指出（1999：656）：

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以指挥调护之是也。

这里梁启超深刻地意识到民族帝国主义为扩张所采取的多种手段或方式。

当时的中国，在梁启超的眼里，则是如下一幅图像（1999：656）：

而今也，于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彼族一旦窥破内情，于是移其所谓民族帝国主义者，如群蚁之附羶，如万矢之向的；杂然而集注于此一隅。

但问题似乎不仅仅在于中国一时被“占领”，中国“不幸而适当此盘涡之中心点”（1999：657）：“此之进取，则在久远；日扩而日大，日人而日深。”这样以来，“彼以久远之政策渐进者，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也。”面对如此危机的局面，梁启超认为（1999：657）：“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

如前所述，中国需要接受启蒙的民众——“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童孺”——正如康有为所说的，“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在这种语境下，梁启超在理论上，从启蒙的亦即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将小说的地位提升到了可谓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理论，就是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

文章一开头便提出了“新民”与新“小说”的关系（1902；1997：50）：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继而阐述了小说之所以受人青睐，并非因为：（1）小说的语言“浅而易解”；（2）小说的故事“乐而多趣”，而是因为下面两个原因（1997：50—51）：

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

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小说在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由此从边缘走向中心。对于启蒙，理想的小说类型，根据上引的两个原因，就是“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则是因为小说有四种力：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梁启超指出（1997：52）：

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亨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既然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但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社会几乎一切的弊病，均“惟小说之故”，因此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忧虑（1997：53）：

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

也因此，梁启超再次重申（1997：53—54）：“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既然中国无论是“理想派小说”还是“写实派小说”上都没有足以用于启蒙的小说，那就自然只能借助于域外的小说了。而梁启超首先选择的，乃是“理想派小说”，也就是“政治小说”¹⁷了。

梁启超不但在实践上（包括翻译与创作），而且在理论上，从启蒙这一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度，将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或小说翻译），推向了社会思潮的

¹⁷ 梁启超在其“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1902；1997：58—63）（《新民丛报》第14号）中明白宣称政治小说与旧小说不能相容，旨在抒发政治见解，指出：“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理想也”（1997：61）；“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1997：59）因此，其作品多议论，让人物滔滔不绝地演论政治主张，不厌其烦地发表议论，即使小说成为“似说部非说部”（1997：55）也在所不惜。梁启超在其《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1902；1997：55）中毫不掩饰这是“政谈”，而非寻常小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饕读者之望矣。”（1997：55）

顶峰，晚清的小说翻译高潮也就此诞生了。

3.5 晚清小说翻译综论

晚清时期的翻译实践，大致包括了这样几种文本类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其中的文学翻译，则又包括小说、诗歌、戏剧¹⁸等类型。

关于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情况，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论者一直将阿英的概括视为权威的判断（阿英，1996：210）：

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

阿英这一判断的“权威”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学界的质疑；相反，再三为论者所引用；直到日本学者樽本照雄¹⁹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如樽本照雄，2000）²⁰，这一判断的权威才宣告结束²¹。

这里，本文准备对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的综述：（1）翻译主体；（2）文本类型；（3）译本语言；（4）翻译方法；（5）副文本。

3.5.1 翻译主体

自鸦片战争以降（甚或此前一个时期）到晚清，翻译主体（这里指译者）的构成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1860年代前，基本上是以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等）为主；到甲午战争，则是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合作翻译为主；甲午之后，则基本上是中国人的。

¹⁸ 在晚清时期，存在小说与戏剧不分的情况。

¹⁹ 樽本照雄（1988）为《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1997）为1988年版的增订补正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则“翻印”了1997年版的“目录”和“著译编者索引”，即樽本照雄（2002）；本文实际引用的是樽本照雄（2002），但标为樽本照雄（1997）。

²⁰ 樽本照雄（2000：157）指出，“若抽取从1840年到1920年发表的作品来看，辛亥革命以前（1840—1911），创作有1288种，翻译有1016种”，“1911年以前创作比翻译多1.27倍，翻译只占44%而已。……实际的情况是：‘创作多于翻译’。”（2000：158）他还指出，“从具体数字看，阿英说的‘翻译多于创作’这样情况，只出现在1902年到1907年间的6年。”（2000：163）

²¹ 虽然本文研究的是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但由于采取社会学模式的关系，因而并不打算根据樽本照雄（1997）的模式，进行统计学的探讨。

造成晚清时期翻译主体的这一变化,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到国外学习的留学生人数增加。清朝第一次派遣留学生是在1872年,虽然其间屡遭挫折,但留学生的绝对人数则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896年的13人,到1906年已有万名左右(陈平原,1997:612)。清朝政府派遣留学生,自然是要求他们专攻“农工格致各项专科”(转引自陈平原,1997:612);虽然自费留学生不受此约束,可自由选择专业,但也未见有选择文学专业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留学生日后就不可以从事文学翻译,甚或成为翻译家,如留英学船政的伍光建、留日学政治的张肇桐等,便积极从事翻译与创作小说(参见陈平原,1997:612—613)。第二,随着对外开放进程加快²²,与国外的交往增多,这表现为两种形式: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多了,如使节等;来中国的外国人多了。这都可能为文学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翻译主体的另一个变化,则是出版机构的增加。在甲午前,出版书籍或报刊的基本上不外乎传教士主持的机构与清朝官方的机构,前者如墨海书馆、广学会等,后者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等,但基本上不翻译——自然也不出版——文学文本。虽然在1872年与1873年先后有《申报》(日报)与《瀛寰琐记》(月刊)刊载翻译小说,但文学翻译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甲午之后,报刊与出版社(还有印刷业)的发展出现了蓬勃的势头²³。

3.5.2 文本类型

与翻译主体直接相关的就是文本类型了,原因是在某程度上,文本类型乃是由翻译主体决定的;换言之,翻译主体基本上决定了翻译的选材。

文本类型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体现,就小说翻译而言,从不同的视角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

从篇幅上看,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但我们还可以继续细分:这里评判“篇幅”的依据,究竟是原本还是译本的篇幅?自然,一般而言,原

²² 包括主动的与被动的两种形式。

²³ 如《万国公报》(双日刊)(后改称《中外纪闻》)(1895)、《苏报》(1896)、《时务报》(1896)、《国闻报》(1897)、商务印书馆(1897)、《实学报》(1897)、《清议报》(1898)、《女报》(1899)、《译书汇编》(1900)、《译林》(月刊)(1900)、《新民丛报》(半月刊)(1901)、《励学译编》(月刊)(1901)、《翻译世界》(1902)、《大陆报》(1902)、文明书局(1902)、《绣像小说》(半月刊)(1903)、《国民日报》(1903)、《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等等。

本为长篇的,译本也是长篇,但在晚清,由于译者的删削,也有可能变成短篇的,如周树人[鲁迅]在其“《月界旅行》辨言”(1903)中便指出:“《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1997: 68)但还有一种可能,原本为短篇,但因为译者的“增添”,却成了长篇,这后一种情形虽不常见,但也并非没有,如我佛山人[吴趼人]在其“《电术奇谈》附记”(1905)中有这样的说明:“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²⁴(1997: 163-164)由此看来,篇幅在当时无法作为判断文本类型的标准:我们甚或可以说,当时尚未有“篇幅”意义上的文本类型划分²⁵;更不用说从小说的叙述结构等方面来界定长篇与短篇了。

相比之下,另一种文本分类或许较为可行,那就是根据文本的性质或功能加以划分。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生产中,采用的正是这种做法;不过这种做法也会引起另一种问题:即使是同一翻译文本,在不同人的眼中,会出现不同的“命名”现象。这种命名所起的作用,不外乎:(1)反映译者对原本的认识水平、认识角度或意欲达到的目的,即给读者一个导向作用;(2)“醒目”作用: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力,或方便读者作出选择。晚清时期因此出现了名目众多的翻译小说文本标签²⁶。

在晚清时期,最为突出的小说翻译文本类型,可能要算中国文学系统中原本没有的四种:侦探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与科学小说。而这四种类型,在十九世纪末便已经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出现(参见陈平原,1997: 614):(1)1896年,《时务报》第6至9册上发表柯南·道尔的侦探故事《英包探勘盗密约案》;(2)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一册开始连载政治小说《佳人奇遇》;

²⁴ 《电术奇谈》(又名《催眠术》)自1903年10月5日开始在《新小说》第八号连载,至1905年7月第十八号止,题署“日本菊池幽芳原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知新室主人评点”;1905年9月,广智书局出版《电术奇谈》单行本。书末有我佛山人“附记”。

²⁵ 据笔者检索,明确在译本上标明“短篇小说”者,是1904年10月《教育世界》第八十四号刊载的“制造书籍术”,署“译阿文格随笔”;标明“长篇小说”者,是1910年1月11日《小说时报》第三期连载四十二章小说《豆蔻葩》,题“(美)却尔司佳维原著,武进铁樵树珏译述”;自然,如果篇幅上确实长篇而又出版单行本的,不用说也是长篇小说了。

²⁶ 笔者根据自己制作的翻译年表检索的结果,有:哀情小说、笔记小说、裁判小说、痴情小说、道德小说、德育小说、地理小说、顶怪诞慨小说、侠客谈、讽世小说、妇孺小说、改良社会小说、工艺实业小说、怪异小说、闺秀救国小说、国民小说、航海小说、滑稽小说、婚事小说、家庭小说、近事小说、惊奇小说、警世小说、军事小说、科学小说、离奇小说、理想小说、历史小说、立志小说、砺志小说、伦理小说、冒险小说、农学小说、女子探奇小说、奇情小说、人道小说、社会小说、神怪小说、述异小说、探险小说、外交小说、卫生小说、写情小说、心理伦理小说、心理小说、虚无党小说、言情小说、艳情小说、义侠小说、游记小说、渔业小说、寓言小说、札记小说、战时小说、战争小说、哲理小说、侦探小说、侦探艳情小说、政治小说、殖民小说、种族小说、宗教小说,等等。

- (3) 1899年2月，林纾与王寿昌翻译出版法国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4) 1900年，经世文社出版法国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²⁷。

3.5.3 翻译方法

这里的方法，还包括翻译方式。

在晚清时期，从译本发表时署名的方式看，翻译方式主要有三种：(1) 合译，即其中一人（甚或多人）口述，一人（甚或多人）笔录，这种方式虽然与甲午前的合作翻译模式无异，但如前述，主体发生了变化，基本上已经是中国人为主，甚或全部都是中国人，其典型代表便是林纾与其合作者的翻译实践；(2) 独立翻译；(3) 机构翻译：这种情况较为复杂，从逻辑上可以分为几种情形：(a) 个人翻译，但署名为机构；(b) 机构的职员个人或集体翻译，署名机构；(c) 机构购买了个人翻译的文本，署名机构。而由于资料及时间跨度原因，如今考证起来，比较困难。虽然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与论述几乎没有，本文也仅在此点到为止。

翻译方式中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译者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本”问题：一般说来，原本自然应该是作者写作语言的文本。但在晚清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本身也是译本，即译者采取的是“转译”的方式。这存在多种可能的原因，如译者接触到的“原本”资源有限；但主要的原因则可能是译者的语言能力所致。

至于本体意义上的翻译方法，在晚清时期，从性质上言，自然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套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术语，可称之为“直译”与“意译”²⁸；而如果采用Lawrence Venuti的术语，则就是“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²⁹。但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术语系统，都体现了翻译主体对原文文本忠实与否的态度。

²⁷ 作者为凡尔纳；译者的署名各种版本不一，但“就实际情况而论，应当是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记，或标为二人合译”（郭延礼，1998：169）

²⁸ 西方传统译论中也有类似的区分，如literal vs. free/liberal。有关“直译”与“意译”的辨析，可参见王晓元（1999b）。

²⁹ Venuti（1995）在历史语境中，从文化的层面考察了归化与异化，对于拓展翻译研究的视野自有裨益；但这两个术语也存在问题，甚至是逻辑上的问题，如他认为译者的选材也属于“异化”的一种情形，那么，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翻译都是“异化”，这样“归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时也与“异化”不处在同一层面。

同时，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翻译实践。因此，假如我们采用当今为大多数所接受的直译与意译标准，如（许渊冲，1984：5—6）：

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

就根本无法来评判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实践了。

因为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方法，就其主流方法而言，既不是我们今天的“直译”，也不是“意译”。

在晚清的翻译实践中，译者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译述”（陈平原，1997：9），也有论者称之为“意译”（陈平原，1997：619），并为其他论者认同（王宏志，1998：191），甚至有两者并用者（郭延礼，1998：33）。如果从翻译的语言、诗学等方面考虑，也可称之为“归化”。

这种译述方法的主要特点，从其字面上亦可见出：包括“译”与“述”两个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则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1）增改；（2）删节。实际操作中，则可能有其它的形式，如“增删”。而其原因，则有多个方面：（1）语言；（2）诗学；（3）伦理思想观念等。

3.5.4 译本语言

毫无疑问，译本的语言取决于多种因素：（1）历史语境：翻译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它决定了当时社会不同群体使用何种语言形式，口头语，还是书面语；白话，还是文言；（2）翻译主体：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译本的语言最终还是由主体确定并成形；因此不但与翻译主体的教育背景有关，而且与翻译目的相联；（3）译本读者：翻译主体在进行具体的翻译操作之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会预设其译本的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ship），从而确定译本采用的语言形式；此外，实际的译本读者群体与隐含读者群体未必重合或重叠，阅读实践反过来又会对翻译主体后来的翻译语言决策发挥一定的反作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4）经

济因素：这里的经济有两种涵义，一是指翻译主体考虑到金钱的因素，如稿酬是按照译本的篇幅长短来计算的；一是指翻译主体——特别是译者——实际翻译过程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当然，还会有其它的因素在起作用。总而言之，必须综合考察才能对译本语言问题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合理的解释，否则就可能会产生误判，从而误导的后果。

这里不妨以晚清时期的翻译实践为例，予以说明。

这个例子与严复翻译中的语言问题有关³⁰。严复在《天演论》中使用的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严复，1898；1984：136），有论者便认为这是严复的“用心”（王佐良，1989），后来采此说者不在少数，但如果考虑当时的历史语境，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为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使用的书面语都是文言，即文言在当时是主流；何况与严复所翻译的对象——社会学著作——也有关系，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1984：137）中便指出，“倘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

而即便是梁启超，从启蒙的角度，提倡使用俚俗文字，以便普及与推广，因而在“介绍新著《原富》”（1902）对严复翻译的“文体”（即语言）提出了批评（1990：268）：

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这里我们且不引录严复合理的解释，再看梁启超同一年在其“《十五小豪杰》译后语”（1902）中有关译本语言的一段话（1997：64）：

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但因此亦可见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³⁰ 严复翻译的不是小说，虽然胡适也说过严复的译本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个例子能说明这里的问题。

而这个例子就包含了上述的四个因素：（1）晚清时期的主流（书面）语言是文言，即文言是当时的常规（norm）；（2）译者本身受过良好的古文教育，严复甚至属于“桐城派”；（3）隐含读者不同，促使译者可能作出不同的语言选择；（4）但经济因素也不可忽略，梁启超的“自白”便说明了这一点。

3.5.5 副文本

所谓副文本（paratexts）因素，就是指译本正文之外的其它组成部分，如译者署名、著者姓名与国别、原著名称、译本序跋，甚或装帧设计等。

在晚清时期的翻译实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伪译”与“伪作”。所谓“伪译”，是指根本不存在原本但该文本在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却又作为译本而被接受。而“伪作”则相反，是指该文本本来是依照某一原本翻译而成的，但在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却被当作“创作”来接受。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与当时的语境以及文本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关系。

体现在副文本特征上，二者的做法正好相反：“伪译”尽可能提供译本应具有的一切副文本特征，如原作者姓名与国别、原本名称、译者姓名，译本序跋等等，典型例子当推《自由结婚》（1903）文本。该文本不但标明作者及其国别——“犹太遗民万古恨著”，译者姓名——“震旦女士自由花译”，而且有译者“弁言”，并在其中提供原本名称（*Free Marriage*）与作者姓氏（Vancouver）（自由花，1903；1997：109—110）。而“伪作”则完全以“创作”文本的格式出现，自然只有作者署名等特征了。

但在晚清时期，即便是真正的译本，在副文本方面也存在一些时代特征。

译者署名，一般有三种形式：（1）不署名；（2）署笔名；（3）署真名。陈平原（1997：619）认为，第一种形式“表示了一种对小说翻译这一创造性劳动的轻蔑态度”，而第二种形式与第一种不一样，“仍承认译者的存在价值”。但其实未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说第一种情形是“轻蔑态度”，那么是谁在轻蔑呢？署名与否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译者自己的选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译者对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表示“轻蔑”了呢？第二种情形也类似，是译者自己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承认？还是其他人的承认？这里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是译者——当然也包括译者所处的社会——根本不认为小说翻译是“创造性劳动”，

更不认为译者具有我们认为应有的社会地位，这一点，至少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林纾与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两人在署名的时候使用的便是笔名。其主要原因是译者作为晚清的知识分子，从事小说——而且是小说翻译——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文化资本上的收入；而该译本出版后却出乎意料地“畅销”，结果此后林纾等在译本上不但署名，而且署真名。

作者署名与国别，情况相对而言要规范一些，但也有偏离之处。至于原本的名称，大多是不署的。

以上我们对晚清时期的翻译实践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综述。之所以简要，是因为我们更关注翻译主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进行的翻译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影响。

第四章 归化的颠覆：林纾的翻译

吴俊在“林译小说：世纪末的一个悬念”中这样说（1999：101）：

有一个人、有一种文学现象、甚至有一段历史，正在被淡忘。然而，整整一百年之前，就是这个人用他的绝无仅有的方式，书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重复了——的一笔。

这个人与这种现象，“就是林纾和‘林译小说’”。

林纾¹（1852—1924）这个名字，至少象征着两种东西：激进与保守。而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因为林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人们更多地存有对林纾“保守”的“记忆”，反而遗忘了林纾当年的“激进”。保守，是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古文的坚守；激进，是林纾的翻译实践。

如果说，梁启超从启蒙的角度，将（翻译）小说提升到中国文化系统的中心位置；那么，在二十世纪初，真正实践梁启超的理论主张而又取得成就的，就是林纾了²。

与林纾翻译的作品数量相比而言，对林纾的翻译研究³就显得不成比例了⁴。而其原因虽然众多，如所涉及的语言较多；或已有学者的专论影响甚大而妨碍了进一步的研究，如钱钟书（1964）；或译本与原本不易找到⁵而导致无法研究；但以下的说法或许更能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所在⁶（张世涛，1996：16）：

¹ 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幼名群玉（亦名秉辉），后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所使用的笔名则有冷红生、蠡叟、补柳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林纾一名，据邱炜菱（1901；1997：45）说，是在中举后参加礼部试时才开始用的。

² 尽管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提及林纾的只有寥寥数句（2003：86—87）：“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风行於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

³ 林纾的翻译，当指林纾与其“口述者”合作的翻译，如无特别说明或具体的语境可以推断出其他的结论，均指合作的翻译。

⁴ 就笔者所见，以林纾（的翻译）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只有Compton（1971）。

⁵ 商务印书馆在1981年出版的“林译小说丛书”的“出版说明”中称：“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并供参考。”（商务印书馆，1981：2）

⁶ 必须指出的是，张世涛这里所说的原因，当只指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到了八十年代，局面已经大为改观：林纾研究资料、传记等等的出版，即为明证；但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尚未有有份量的研究。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囿于政治倾向的考虑，对林纾这个不仅以翻译著名，也以保皇和反对新文化运动著名的前清举人，文学理论界充满了蔑视，翻译界也不屑一顾。

也就是说，其中存在着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原因。

本章试图在晚清这一宏观语境中，对林纾的翻译实践作一研究。

4.1 林纾的合译⁷

大多数人在谈论林纾与“林译”的时候，虽然也知道林纾不懂外文，但几乎没有意识到林纾合译者的存在，因而论者研究林纾的翻译，给人的总体印象乃是忽视了这位近代文学翻译家⁸最为重要的一面：即林纾的“口译”合作者。林纾与他的合译者在翻译时，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述，他再把口译者的话写成中文，即笔录。没有了合译者，林纾的翻译就根本不可能。张佩瑶（2003：20 注12）指出：

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翻译活动的学者和文学史家，都会指出合译在当时很常见，合作方式通常是由一人口译、另外一人笔录。但是，学者们一般都没有评论口译者对译文能产生什么影响，这大概是由于资料的欠缺。向来研究林纾的专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林氏，至于他的合作人都只是顺带提及的陪衬。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也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韩一字，2004）：

也许还由于林纾文名太盛，而他的合作者却大多不是文学界人士，所以，人们记住的只是林纾和“林译”，对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合作者，则不论当时和日后都不甚重视。然而，每一个口述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造就了作为整体文化现象的林纾和林译，对在其中起主要媒介作用的口译者的忽视，势必导致对历史现象把握的片面性，也影响对林纾在近现代活动的认识。

因此，对林纾与其合译者的合译作一分析，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⁹。

⁷ 与林纾合作翻译者，论者称为口述（者）、口译（者）、助手等等，本文总称之为“合译者”。

⁸ 之所以说是“近代的”文学翻译家，并非如有论者所言，“翻译《茶花女》的林纾却是不懂西洋文字的翻译家，这是翻译史上的一件最为奇异之事”（周敬康，2002：68—69），乃是因为在佛经翻译中，这是一种正常的做法；甚至在林纾之前的近代翻译也基本上属于这一常规（norm）。

⁹ 张佩瑶（2003）与韩一字（2004）分别对魏易与王庆骥两位合译者做了个案研究；但本文无法就林纾所有的合译者做详尽的分析，虽然在此后的分析中，自然包括了林纾及其合译者。

事实上，在晚近有关林纾的翻译研究中，已经有一些论者开始注意到林纾的合译者这一问题了，但对合译者的评价则存在分歧。一种看法是负面的，最早持这一看法的应该是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1924；1984：187—189）：

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的作品中，仅有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不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如果口译者是具有较好的文学常识呢，他所选的书便为较重要的，如果口译者没有什么知识呢，他所选择的书便为第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了。林氏吃了他们的亏不浅，他的一大半的宝贵的劳力是被他们所虚耗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的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

这两个大错误，大约都是由于那一二位的口译者不读文学史，及没有文学的常识所致的。他们仅知道以译“闲书”的态度去译文学作品，于是文学种类的同与不同，不去管他，作者及作品之确有不朽的价值与否，足以介绍与否，他们也不去管他；他们只知道随意取得了一本书，读了一下，觉得“此书情节很好”，于是便拿起来口说了一遍给林先生听，于是林先生便写了下来。他之所以会虚耗了三分之二的功力去译无价值的作品，且会把戏剧译成了小说者，完全是这个原因。

总之，林先生的翻译，殊受口译者的累。如果他得了几个好的合作者，则他的翻译的成绩，恐怕决不止于现在之所得的，错误也必可减少许多。

另一种对合译者就持正面的看法（余协斌，1996：20）：

笔者在此特别指出这一点，是有感于世人每谈及外国文学翻译，必授林纾以殊荣而忽略口述者之功劳，认为有失公正公道。林纾不曾出国门一步，不懂外文一词，没有口述口译者的帮助，是根本没有条件涉足译坛的。因此笔者认为，林纾译书之功劳，其中一半应归于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事实也的确如此，正是由于他与王寿昌合作的成功，才激起了他译书的热情，他一生先后翻译了西方小说180余部，没有一部是他独立完成的。

林纾在不同时间、不同译本的序跋等文字中，对于自己的合译者有过不同的表述，从中也可看出林纾对合译者的态度。

1907年，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1907；1997：293）中说道：

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

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其间疵谬百出。乃蒙海内名公，不鄙秽其径率而收之，此予之大幸也。

并在后文中称合译者为“同志”。从这里可以看出，林纾表达了对合译者的依赖；虽然指出译本存在问题，但似乎还是倾向于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但到了1908年9月，林纾在“《西利亚郡主别传》序”（1908）中，“立场”似乎发生了变化（1997：353）：

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尚祈诸君子匡正是幸！

这里，林纾对时人对其翻译错误问题进行了某种辩解，言词之间已经将责任推到了合译者身上。

到了1914年，林纾在“《荒唐言》跋”（1914）中则变了口气¹⁰（1999：116）：

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者而译，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纾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

1916年，林纾在“《鹰梯小豪杰》叙”（1916）中再次提到了合译者（1997：551）：

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而又不解西文，则觅二三同志取西文口述，余为之笔译。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们由此足可看出合译者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论者对林纾的合译者基本持否定态度者多，正如钱钟书（1964）所说：“在‘讹’字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向对林纾从宽发落，而严厉责备他的助手”（1984：706）；而钱钟书（1964）则可视作对此的一种例外或反动：“假如我前面没有讲错，那末林译的‘讹’绝不能完全怪助手”（1984：707）¹¹。

林纾的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两种：

¹⁰ 钱钟书认为，“助手们可能要求他作这样的声明”（1984：706注2）。

¹¹ 相反，钱钟书（1964；1984：707）指出，“而‘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

第一，原本的选择：林纾本人完全不懂外文，原本的选择几乎完全依赖合译者¹²。就合译者而言，在原本的选择过程中，也存在几方面的决定因素：（1）合译者的外语水平；（2）合译者的（外语与中文）文学或文化修养（甚至包括诗学观念）；（3）合译者的意识形态；（4）合译者所能接触到的原语文本资源；（5）其它偶然因素。一些论者在论及这一点的时候，似乎只专注于负面的作用，将林译中那些他们认为是二三流的作者与作品的责任全部加诸合译者，完全无视那些所谓世界著名名家同样也是合译者选择的结果这一历史事实。因此，在原本的选择问题上，我们需要采取历史的态度，考虑当时的语境。比如，郑振铎一再批评林纾翻译了三分之二以上“二三流”的作品，特别是林纾翻译最多的哈葛德与柯南道尔两人二十七部作品，也都属于“第二等”（郑振铎，1924；1984：187）；但是，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种结论其实都是基于新文学运动所建立起来的关于西方文学建制和文学翻译的种种想法，论者往往一举抹煞了翻译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孔慧怡，2000：106）；而且，“就翻译选材而言就不能说他缺乏品味了，因为Doyle及Haggard都是当时冒险小说的名家。”（孔慧怡，2000：110—111注48）。

第二，具体的口述。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二¹³：（1）合译者的外语水平；（2）合译者的中文水平。合译者的外语水平基本上决定了对原本的理解能否正确，并最终决定译本会否出现错误以及错误的多寡。合译者的中文水平也会对笔录者产生影响，特别是林纾“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林纾，1907；1997：293），而“助手们事后显然也没有校核过林纾的写稿”（钱钟书，

¹² 之所以说“几乎完全”，乃是因为还有几种可能存在：林纾在从事一定的翻译实践之后，可能会向合译者提出选择原本的大致方向，合译者然后向林纾提供可选择的原本，最后两人确定具体的原本；其次，出版机构等因素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出版机构可能决定大的选题方向，如一套丛书，他与魏易合译《迦茵小传》便属于这种情形（详见后）；再次，林纾提出具体的原文文本，寻找合译者，如林纾在“《译林》序”（1901；1997：42）中有如下的叙述：

光緒戊戌，余友鄭叔恭，就巴黎代購得《拿破崙第一全傳》二冊，又法人所譯《俾斯麥全傳》一冊。《拿破崙傳》有圖數帙，……拿破崙第一誓師圖也。吾想其圖如此，其文字必英雋魁杰，當不后於馬遷之紀項羽。而問之余友魏君、高君、王君，均謝非史才，不敢任譯書，最後詢之法人邁達君，亦遜讓未遑。余究其難譯之故，則云：外國史錄，多引用古籍，又必兼綜各國語言文字而後得之。余乃請魏君、王君，撮二傳之大略，編為大事記二冊，存其軼事，以新吾亞之耳目。時余方客杭州，與二君別，此議遂輟。

¹³ 当然也可能包括原本选择中涉及诸如诗学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如林纾在“《兴登堡成败鉴》序”（1922；1999：129）中说：“至于读者，果厌吾文之繁，则咎不在我。吾不审西文，但资译者之口，苟非林季璋之通贍，明于去取，则此书之猥酿不纲，尚不止是也。”

1964; 1984: 708) 这种笔录方式¹⁴。我们现在在没有更多材料的情况下，实在无法还原当时林纾与其合译者真实的翻译语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林纾的笔录——亦即最终的产品——乃是林纾对其合译者口述的一种改写或重写 (rewriting) ¹⁵。

那么，林纾与合译者究竟翻译了多少作品？

林纾与其合译者究竟翻译了多少文本，由于时间与资料等问题，或许永远也无法找出准确的数字，而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看，则可谓众说纷纭：(1) 郑振铎 (1924): 156 种；(2) 寒光 (1935): 171 种；(3) 朱羲胄 (1949): 182 种；(4) 马泰来 (1981): 184 种；(5) 俞久洪 (1983): 163 种（不包括未刊印的十八种）；(6) 钱钟书 (1964; 1984): 170 余种；(7) 林薇 (1990): 189 种；(8) 陈福康 (1992): 180 余种；(9) 马祖毅 (1999): 183 种。

究其原因，则有以下几方面：(1) 统计的对象不一：如“文学作品”，“小说”，几乎排除了非文学类文本，也有用“西书”的；(2) 统计的方法不一：如原著为一部，但林纾及其合译者则翻译为两部或多部；(3) 统计的单位不一：大多数论者均采用“部”，这就意味着已经排除了单篇的“短篇小说”；但也有论者采用“件”来计算的；(4)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论者考虑译文文本是否出版的问题。

即便是现在已经能够确切地知道林纾与其合译者翻译了多少文本，本章也不可能对已确定的全部“林译”译本进行分析，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做个案分析¹⁶。

4.2 个案研究

虽然按照钱钟书 (1964; 1984: 710) 的说法，林纾的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

¹⁴ 1913 年 6 月，林纾与王庆骥同译的《离恨天》(*Paul et Virginie*)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在其“译余剩语” (1913; 1997: 413) 中这样说合译者：“及门王石孙庆骥，留学法国数年，人既聪睿，于法国文理复精深，一字一句，皆出之以伶俐利齿。余倾听而行以中国之文字，颇能阐发哲理。”

¹⁵ 不过，林纾的合译者在译本中的“在场”或“显形”的例子也是有的，如：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 (1964; 1984: 709) 中举出过一个特别的个案——注释——来说明合译者的“在场”：《黑太子南征录》(*The White Company*) 第五章中将“懋尔西”(merci) 注为“系不规则之英语”；而张佩瑶 (2003) 也通过比较译文后，认为“口译者的关键作用远远超出一般人的估计。说林纾受魏易的支配，而且后者对《黑奴》的译文有重大或者决定性的影响，并非言过其实。” (2003: 20 注 12)

¹⁶ 从本文整体看，林纾是一个“个案”；就本章而言，只能选择“个案”来分析，可谓个案中的个案。

段，以 1913 年为分界线¹⁷，但是，由于本文研究时限的原因，这里所要进行的个案分析，也只取其前期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林纾与其合译者所翻译的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的翻译，主要有言情小说、政治小说、战争小说、侦探小说等类。根据译文文本的影响，这里选取均属前期的三个翻译文本加以分析：《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言情小说）；《黑奴吁天录》（1901）（政治小说）；《迦茵小传》（1905）（言情小说）。

4.2.1 个案之一：La Dame aux Camélias

翻译的动机

林纾翻译 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的 *La Dame aux Camélias*（1848）的起因或动机，似乎纯属偶然，但就已有文献看，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1）最早的自然出自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序”¹⁸（1899；1981：1）：

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

从这里看，似乎是林纾主动要求王寿昌口述的。

（2）其次，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中也对此有所说明：

而谦挚友王寿昌精法兰西文；亦与纾欢好。纾丧其妇，牢愁寡欢！寿昌因语之曰：“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

（3）第三，钱钟书（1964；1984：710 注 1）引用了黄浚如下文字：

魏季渚（翰）主马江船政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季渚慨

¹⁷ 这也是一个以政治标准划分的，因为在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林纾开始“谒崇陵”（张俊才，1983：38）。

¹⁸ 林纾（1899）不同版本在标点，甚至连标题上均有所不同，如“序”、“小引”、“引”等等，可参看林纾（1981；1984；1997；1999）；此处为笔者重新标点。

诺，买舟载王子仁同往，强使口授《茶花女》。

钱钟书认为林纾与其合译者是在“逛石鼓山的船上，开始翻译”（1984：710）；这里似乎起主要作用的是魏翰了。而林纾后来在回忆中也说到（1905；1981：2）：

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怪。

这可以说是支持第三种说法的。此外，或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译稿由魏翰出资，请福州城内后街的著名刻手吴玉田镌版”（郭延礼，1998：266），由此看来，魏翰是真正的“赞助人”了。

（4）余协斌（1996：20）则指出：

有人认为林纾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并不是偶然的，言下之意是按事先的译书计划有意选取的。实际上这件事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说，林纾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才使得他开翻译外国文学之先河，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音”的译坛奇才的。

但论者并未具体指出是谁认为“林纾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并不是偶然的”。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们都可以说，林纾翻译此书，似乎并无明确的动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没有明确的动机，并非指林纾与其合译者在翻译前——甚或翻译过程中——没有任何动机；而是想说明，就现有文献看，林纾及其合译者在当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动机。这一点，其实还可以从林纾所作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序”（1899；1981：1）看出一二：首先，小仲马出版小说《茶花女》（1848）的时候，还不到24岁；1870年大仲马去世；1895年小仲马去世，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或许也是真实的，即便认可《茶花女》“尤为小仲马极笔”，那也似乎不能成为二人翻译此书的充分理由¹⁹，因为在当时，原本的文学价值尚未成为翻译选择的主要标准。其次，林纾在此序中只说到小说本身的问题，“小说家”“均出自名手”，并没有像林纾在后来的译本——如《黑奴吁天录》（1901）——的序跋中那样“因文见道”（梁启超语）；其实，在《黑奴吁天录》出版之前，林纾1900年12月为月刊《译林》作“《译

¹⁹ 从这里我们倒是看出，王寿昌作为合译者在促成《茶花女》的翻译方面，可能起了关键的作用。

林》序”，从中可以看出林纾“当时也受到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的影响”（陈福康，1992：133），其中说（林纾，1901；1997：42）：

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顾译书之难，余知之最深。昔巴黎有汪勒谛者，在天主教汹涌之日，立说辟之，其书凡数十卷，多以小说启发民智。

这都从侧面说明林纾开始翻译《茶花女》的时候²⁰，尚无此后那种明确的启蒙或意识形态动机。

删改问题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此前²¹的翻译实践中，删改已经是一个事实甚至常规了，问题是删改了多少与什么的问题。

陈平原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删节有一段说明（1997：633）：

《巴黎茶花女遗事》并非林纾的最佳译作，但译文的处理颇有代表性。除个别误译和增饰外，删节之处也颇多。但删节主要集中在前四节，其中包括另一个妓女的故事、拍卖的场面描写，关于马克之姐的插叙、以及叙事人处有关妓女的议论，这些在林纾看来自然都是多余的闲笔，删去一点也不可惜。五至六节虽偶有删节，也属插叙和议论；至于十七至二十七节则基本照译，其时小说已渐入佳境，译者必也动已情，舍不得割舍。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我们不妨就王振孙（1993）与林纾、王寿昌（1981）两个译本的篇幅做一个大致的统计：（1）王振孙（1993）中，小说《茶花女》部分共224页（1993：3—226），每页26行，每行27字，共计：224页×26行×27字=157 248²²；（2）

²⁰ 至于林纾是在哪一年开始翻译这部书，似乎也有不同说法：（1）林煌天（1995：92）：“1891年，林纾与王寿昌合作译述法国小仲马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2）郭延礼（1998）：“这部小说由王寿昌（晓斋主人）口述，林纾笔记，译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夏。”（参见郭延礼，1998：266注1）（3）林纾在其“《洪罕女郎传》序”（1906）中说到：“前十年译《茶花女遗事》，去年译《迦茵小传》，今年译《洪罕女郎传》”（1997：180），则可推算出时间为1895年。（4）据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年谱》（1949）中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条记：谱主（林纾）与王寿昌合作译《巴黎茶花女遗事》。（5）钱钟书（1964；1984：710注1）引用黄浚的说法，认为翻译之“事在光绪丙申、丁酉间”，而光绪丙申、丁酉是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时间，“目前能找到最早的刊本是己亥（1899年）正月在林琴南家乡福州出版的木刻大巾箱本”（邹振环，1996：121）。

²¹ 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

²² 王振孙（1986）则是一小说译本，256页，版权页上标出的字数为155 000；如果按照这里的统计方法，结果是159 744，均包括标点在内；但与王振孙（1993）在文字上略有出入。这里列出以资对照。

林纾、王寿昌（1981）中，正文为 82 页（1981：3—84），每页 24 行，每行 26 字，共计：82 页×24 行×26 字=51168，而版权页上标明的字数为 51000 字。根据页面统计的字数计算，林纾、王寿昌（1981）为王振孙（1993）的 32.5%。也就是说，林纾、王寿昌（1899）在篇幅上删除的比例相当高²³。

再就陈平原所说的具体删节部分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前四节，王振孙（1993）为 29 页（1993：3—31），共计 29 页×26 行×27 字=20358；林纾、王寿昌（1981）为 8 页（1981：3—10），共计 8×24 行×26 字=4992；后者为前者的 24.5%。由此看来，陈平原（1997）的结论是大致浏览后得出的“印象”。

虽然林纾做了删节，陈平原（1997：632—633）仍然认为，

删节处也不致太损害原作整体感和艺术风貌。于伏脉、接笋、变调、过脉处，轻易不敢更动。此类关键所在，“虽一小物一小事，译者亦无敢弃掷而删节之”。说林译小说“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没错；说林纾译文颇多删节增饰，那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重要的是林纾删改得比同时代好多同道高明，尚不失原作神韵。《巴黎茶花女遗事》并非林纾的最佳译作，但译文的处理颇有代表性。

就小说的翻译而言，删改不外乎两个方面：（1）结构上的；（2）内容上的，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的联系。

改变叙述视角或结构（诗学问题）

原文中的叙述结构可以表述如下：

作者（小仲马）——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叙述者（“我”）
——亚猛——……隐含读者——读者。

文本中主要的叙述者是“我”，而亚猛等主要人物的叙述则是通过“我”来“直接”“转述”的，即所谓的“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下面我们选择小说的第一节开头部分——基本上只具有纯结构的功能——作为分析的对象。

²³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没有考虑文言与白话的差异所引起的字数上的不同。

ST (Dumas fils, 1951: 21)

Mon avis est qu'on ne peut créer des personnages que lorsque l'on a beaucoup étudié les hommes, comme on ne peut parler une langue qu'à la condition de l'avoir sérieusement apprise.

N'ayant pas encore l'âge ou l'on invente, je me contente de raconteur.

J'engage donc le lecteur à être convaincu de la réalité de cette histoire don't tous les personnages, à l'exception de l'héroïne, vivent encore.

D'ailleurs, il y a à Paris des témoins de la plupart des faits que je recueille ici, et qui pourraient les confirmer, si mon témoignage ne suffisait pas. Par une circonstance particulière, seul je pouvais les écrire, car seul j'ai été le confident des derniers détails sans lesquels il eût été impossible de faire un récit intéressant et complet.

Or, voici comment ces détails sont parvenus à ma connaissance. ...

TT1 (王振孙, 1993: 3):

我认为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人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就像要讲一种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既然我还没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

因此，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

此外，我记录在这里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还有其他的见证人；如果光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他们也可以为我出面证实。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只有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唯独我洞悉这件事情的始末，除了我谁也不可能写出一篇完整、动人的故事来。

下面来讲讲我是怎样知道这些详情细节的。

TT2 (林纾、王寿昌, 1899; 1981: 3):

小仲马曰：凡成一书，必详审本人性情，描画始肖，犹之欲成一国之书，必先习其国语也。今余所记书中人之事，为时未久，特先以笔墨渲染，使人人均悉事系纪实。虽书中最关系之人，不幸夭死，而余人咸在，可资以证。此事始在巴黎，观书者试问巴黎之人，匪无不知；然非余亦不能尽举其纤悉之事，盖余有所受而然也。

TT1 与 TT2 所据以翻译的均为法语原本，只是 TT2 在翻译过程中，首先经过林纾的合译者王寿昌“口译”，再由林纾“笔述”下来的。对照后可以看出，在叙述视角上，《巴黎茶花女遗事》发生了变化：原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一变而为第三人称叙述。

这种叙述视角改变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改变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第一人称叙述给人的感觉是，仿佛叙述者是直接向读者讲述一个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距离感，容易给人带来一种“真实感”；而第三人称叙述则相反，读者明显感受到距离感，但这种叙述视角会给人一种“权威感”(authority)。这里

的问题在于，这种改动导致了原本中的叙述结构，在作者小仲马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叙述者：其效果仿佛是译者在给中文译本的读者讲述一个故事。换言之，译者本来处于“缺席”的位置，此时却是已经“在场”了。

对于这种叙述视角的改变，有论者认为，也许是“译者担心中国读者不习惯这种审美形式”（邹振环，1996：124）。但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译者藉此希望译本读者不要将“我”（“余”）与译者产生混淆，从而免除由此混淆带来的有关（尤其是道德方面的）责任。

其实，这里牵涉到叙述视角所属的诗学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学（也包括历史）中，几乎一律使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即便是作者本人充当叙述者，也是以第三人称面目出现。

陈平原（1997：320—321）也指出了叙事视角这一小说形式上的问题：

最初的困惑来自翻译而非创作。把西方小说译成中国说部，如何弥补两种不同小说形式之间的鸿沟？是忠实于原著还是迎合中国人口味？实际进程既非完全忠实，也不是一味迎合，而是互相渗透互相改造。

小仲马在《茶花女》中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因而势必是限知叙述视角，但有利于叙述者在整个叙述中进行干预。事实上，作品中的“我”也是这样做的：叙述者“我”不但承担叙述事件与结构故事的任务，而且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叙述者“我”既可以根据情节需要引出人物构成事件，也可以随时发表议论和感想。但这样一来，故事情节的发展便会受到限制，无法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于是便只有通过“我”与小说男主人公之间的关系，通过后者的回忆来补充。而《巴黎茶花女遗事》，由于译者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译者不得不在翻译过程中删除与第一人称叙述或干预相关的内容，如：下引小说第一节中的插叙便删除了“我认识”等表明是第一人称的引导语。

内容上的删改

小说内容上的删节或改动，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层面，其中包括情节上的删改，或者因为情节上的原因而作出删改。这里我们所选择的例子，便既是包括情节上的删节，也涉及因为情节的缘故而作出的删节。

胡适在其“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中对林纾的一处翻译做了嘲讽：

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原来的句子并不是胡适所列出的，而是“女接所欢，嫖，而其母下之，遂病”；钱钟书（1964；1984：717）也指出了“这个常被引错而传作笑话的句子”。

但未必就如胡适所说的“不必论”。这里为了具体说明林纾（甚或包括口译者王寿昌）翻译过程中的删节情况，特将有关段落列出。

在小说的第一节，叙述者“我”在1847年3月13日去了昂坦街九号（妓女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家），一边看房内的遗物与遗产，一边发表议论；接着便有一段插叙。结果，林译本只有一百来字，而王振孙的译本《茶花女》则有一千多字（统计数字均包括标点在内）²⁴。

ST (Dumas fils, 1951: 24—25)

J'ai connu une ancienne femme galante à qui il ne restait plus de son passé qu'une fille presque aussi belle que, au dire de ses contemporains, avait été sa mère. Cette pauvre enfant à qui sa mère n'avait jamais dit: Tu es ma fille, que pour lui ordonner de nourrir sa vieillesse comme elle-même avait nourri son enfance, cette pauvre créature se nommait Louise, et, obéissant à sa mère, elle se livrait sans volonté, sans passion, sans plaisir, comme elle eût fait un métier si l'on eut songé à lui en apprendre un.

La vue continuelle de la débauche, une débauche précoce, alimentée par l'état continuellement maladif de cette fille, avaient éteint en elle l'intelligence du mal et du bien que Dieu lui avait donnée peut-être, mais qu'il n'était venu à l'idée de personne de développer.

Je me rappellerai toujours cette jeune fille, qui passait sur les boulevards presque tous les jours à la même heure. Sa mère l'accompagnait sans cesse, aussi assidûment qu'une vraie mère eût accompagné sa vraie fille. J'étais bien jeune alors, et prêt à accepter pour moi la facile morale de mon siècle. Je me souviens cependant que la vue de cette surveillance scandaleuse m'inspirait le mépris et le dégoût.

Joignez à cela que jamais visage de vierge n'eut un pareil sentiment d'innocence, une pareille expression de souffrance mélancolique.

On eût dit une figure de la Résignation.

Un jour, le visage de cette fille s'éclaira. Au milieu des débauches dont sa mère tenait le programme, il sembla à la pécheresse que Dieu lui permettait un bonheur. Et

²⁴ 钱钟书（1964；1984：717注2）指出，“这一节从‘Un jour’至‘qu'autre fois’共211字，林纾只用12字来译”；但钱钟书统计的范围，从叙述者的“插叙”的故事而言，则不够完整。或许，正是林纾、王寿昌（1981）与王振孙（1993）在这一点上较大的差距，致使陈平原（1997：633）做出前述的判断。

pourquoi, après tout, Dieu, qui l'avait faite sans force, l'aurait-il laissée sans consolation, sous le poids douloureux de sa vie? Un jour donc, elle s'aperçut, qu'elle était enceinte, et ce qu'il y avait en elle de chaste-encore tressaillit de joie. L'âme a d'étranges refuges. Louise courut annoncer à sa mère cette nouvelle qui la rendait si joyeuse. C'est honteux à dire, cependant nous ne faisons pas ici de l'immoralité à plaisir, nous racontons un fait vrai, que nous ferions peut-être mieux de taire, si nous ne croyions qu'il faut de temps en temps révéler les martyres de ces êtres, que l'on condamne sans les entendre, que l'on méprise sans les juger; c'est honteux, disons-nous, mais la mère répondit à sa fille qu'elles n'avaient déjà pas trop pour deux et qu'elles n'auraient pas assez pour trios; que de pareils enfants sont inutiles et qu'une grossesse est temps perdu.

Le lendemain, une sage-femme, que nous signalons seulement comme l'amie de la mère, vint voir Louise qui resta quelques jours au lit, et s'en releva plus pâle et plus faible qu'autrefois.

Trios mois après, un home se prit de pitié pour elle et entreprit sa guérison morale et physique; mais la dernière secousse avait été trop violente, et Louise mourut des suites de la fausse couche qu'elle avait faite.

La mère vit encore: comment? Dieu le sait.

TT1 (王振孙, 1993: 6—7):

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生活遗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她女儿几乎同她母亲年轻时长得一样美丽。她母亲从来没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只是要她养老，就像她自己曾经把她从小养到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路易丝。她违心地顺从了母亲的旨意，既无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人，就像是有人想要她去学一种职业，她就去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长时期来耳濡目染的都是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而且是从早年就开始了的堕落生活，加上这个女孩子长期来孱弱多病，抑制了她脑子里分辨是非的才智，这种才智天主可能也曾赋予她，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去让它得到施展。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她每天几乎总是在同一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母亲每时每刻都陪着她，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真正的女儿那般形影不离。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道德观念淡薄的社会风尚，但是我还记得，一看到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我从心底里感到轻蔑和厌恶。

没有一张处女的脸上会流露出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感情和这样一种忧郁苦恼的表情。

这张脸就像委屈女郎的头像一样。

一天，这个姑娘的脸突然变得容光焕发。在她母亲替她一手安排的堕落生涯里，天主似乎赐给了这个女罪人一点幸福。毕竟，天主已经赋予了她懦弱的性格，那么在她承受痛苦生活的重压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一点安慰呢？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残存的那么一点纯洁

的思想，使她开心得全身哆嗦。人的灵魂有它不可理解的寄托。路易丝急忙去把那个使她欣喜若狂的发现告诉她母亲。说起来也使人感到羞耻。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一件真人真事。这种事，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经常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公诸于世，那也许还是索性闭口不谈为好。人们谴责这种女人而又不听她们的申诉，人们蔑视她们而又不公正地评价她们，我们说这是可耻的。可是那位母亲答复女儿说，她们两个人生活已经不容易了，三个人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再说，这样的孩子还是没有的好，而且大着肚子不做买卖也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有一位助产婆——我们姑且把她当作那位母亲的一个朋友——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后来下床了，但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比过去更虚弱。

三个月以后，有一个男人出于怜悯，设法医治她身心的创伤，但是那次的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终究还是因为流产的后遗症而死了。

那母亲仍旧活着，生活得怎么样？天知道！

TT2（林纾、王寿昌，1899；1981：4）：

昔有名娼年老，只有一女名鲁意子，其艳丽不减其母。少时其母乃诲之淫，教之谄，鲁意子若习为其艺者，不知其耻也。女接所欢，嫖，而其母下之，遂病。寻有人拯女以去，调摄无效，卒以病死。今其母尚在，天不夭促此母，不宁有意耶！

对于这一删节现象，钱钟书（1964；1984：717）做了这样的解释：

〔林纾〕认识到，“古文”关于语言的戒律要是不放松（姑且不说放弃），小说就翻译不成。为翻译起见，他得借助于文言小说以及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章杂志文体。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还是积习难除，他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摆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新手的林纾之间仿佛有拉锯战或跷板游戏；这种此起彼伏的情况清楚地表现在《巴黎茶花女遗事》里。那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的译笔比其它林译晦涩、生涩、“举止羞涩”；紧跟着的《黑奴吁天录》就比较晓畅明白。古奥的字法、句法在这部译本里随处碰得着。

他还指出“女接所欢，嫖，而其母下之，遂病”这样的句子，“也正是‘古文’里叙事简敛肃括之笔”。

但也有论者并不认同钱钟书上述的解释，而是做了另一种解读（吴南松，2003：72）：

钱钟书先生在分析这一段话时，认为林纾是为了“证明汉语比西语简括”才对原文大加删改的。然而笔者细察林译本，发现这段话的前后，林

纾的译文与原文都相去无几，译者惟独对这段话做了较大改动，这是为何呢？就笔者看来，恐怕还是因为译者担心原文的思想内容不能为译语读者所接受而采取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因为原文讲述的是作者自己认识的一位老妓女如何害了女儿一生，最后还害了她性命的故事，显然不太容易为中国传统的读者所接受。

但是，论者所提供的理由似乎没有说服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妓女”还是“堕胎”，均不属于“不可接受”的范围：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可以说存在着所谓的“妓女”（青楼）文化；钱钟书（1964；1984：717）则考证出《外戚传》与《史记》中均有关于堕胎的记载。

其实，还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林纾所删节的这一段插叙与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关系不大，而在当时及此前的中国，小说相当注重故事主要线索与情节；第二，可能更为重要的则是，由于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中的叙述视角做了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的改动，原文文本中同时作为作品中人物之一的叙述者“我”，所作的“插叙”非常自然——因为这一段插叙本意是为了举例说明叙述者此前的议论；而如果改为第三人称叙述后，依然保留这一完整的插叙，在逻辑上就不太通了。无奈之下，林纾只好删节，将这个插叙的故事改为一般的叙述语言。

但即便是“插叙”，如果跟故事的情节有关，或者跟女主人公马格丽特（即“马克”）有关，林纾与王寿昌在翻译的时候，则没有将“插叙”完全删节，而是基本译出。在小说的第二节，叙述者“我”讲到了马格丽特“几乎三年的时间她就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过日子”（王振孙，1993：12—13）之事，而这件事也是别人告诉“我”的，这里不妨从篇幅上来做一比较：王振孙（1993：13—15）大约共63行（另有2行各只有一个字，忽略不计）， $63 \times 27 \text{ 字} = 1701 \text{ 字}$ ；林纾、王寿昌（1981：5—6）共17行， $17 \times 26 \text{ 字} = 442 \text{ 字}$ ，后者占前者的26%²⁵。

语言问题

早在1897年裘廷梁就已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1898）一文中，他从国之兴亡的角度，指出文言的“弊端”（1994：

²⁵ 如果稍微精确一点计算，则百分比达到28%左右，几乎接近总体的删节比例。

83; 86):

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

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言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但是，正如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所曾指出的（转引自孔范今，1996：89—90）：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话报，在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在芜湖是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斋、彭翼仲等所编，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语说各一篇，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开始的。

因此，“始终以自己的文章自诩并被誉为古文家的林纾以文言翻译《茶花女》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马晓冬，1999：55）。

那么，林纾翻译所使用的语言究竟是不是古文？对这一问题，钱钟书（1964）做了澄清，认为“古文”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术语，自唐以来，尤其是在明、清，有其特殊而狭隘的内涵，并且，“并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同时，在某种条件下，‘古文’也不一定跟白话对立”（1984：712）。

钱钟书首先指出，“古文”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指所谓的“义法”，即“叙述和描写的技巧”——就此而言，白话作品完全可能具备“古文家义法”；但“古文”还有语言的一面。“古文”在语言的使用上有众多清规戒律，不但排除白话，而且勾消了大部分的文言。林纾翻译的文体，在钱钟书看来，不是“古文”，且其本身就违背和破坏了他自己制定的“古文”规律（1984：713）；并认为（1984：714）：

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

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署名

《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第一部作品，他们开始翻译的时候²⁶，文学翻译尚未取得中心地位，译者的地位自然无法得以提升，这也就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林纾、王寿昌二人在 1899 年出版译本时，没有直接署本名，而是署了笔名：冷红生（林纾）、晓斋主人（王寿昌）。而黄骥臣也指出：“此书实出吾闽林琴南手译，其题曰‘冷红生’者，盖不欲人知其姓名，而伪托别号以掩真。”（转引自郭延礼，1998：266）

这反映出，译者作为一种职业在当时并无什么社会地位，即其文化资本是不高的，甚至可以说是受到社会的鄙视的。这一点，从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后，在译本上署真名亦可见出。对此现象，陈平原（1997：619—620）指出：

直到 1903 年《绣像小说》出版，其中不少译作仍不见译者姓名。……随着译作的风行及小说社会地位的提高，翻译小说才逐渐成为一项被社会认可的高雅事业。此后不单译者愿意署名，而且颇有借他人译作扬名者。

读者反应

译本的读者反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第一，读者的实际反应与翻译主体的反应期待（response expectation）一致或基本一致，这就说明翻译主体在设计译本读者群体方面是成功的，翻译的预期目的实现了；第二，读者的实际反应不同于翻译主体的反应期待，这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1）读者的实际反应低于翻译主体的反应期待，或者说与期待方向相反，可称之为逆向反应；（2）读者的实际反应高于翻译主体的反应期待，即出乎翻译主体意料之外，称之为正向反应²⁷。

林纾与王寿昌在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前或当时，究竟有什么样的反

²⁶ 虽然具体的翻译时间尚待考证，但所有的论者均认为在 1891 年至 1898 年这一时段内。

²⁷ 必须指出，这种反应研究与奈达所追求的等效论不同：奈达的等效论是作为翻译标准或原则提出的，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因而属于规定性的（prescriptive）；而本文这里的反应研究，则是对译本生产出来后，在读者群体中产生何种反应的研究，属于描述性的（descriptive），它所关注的焦点是翻译行为完成后，译本所完成的译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应期待，我们今天无从索考，从林纾为译本所写的“引”只能看出，译者只是将原本作为一本文学名著来介绍的；但译本出版后，获得的却是一种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正向反应”。

《茶花女》这样一部当时在法国出版后“轰动一时”（王振孙，1993：418）的文学作品，经过林纾与王寿昌翻译出版后，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严复“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1904），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人士子对该译本所产生的轰动效应的真实写照”（邹振环，1996：123）。

邱炜菱在“《茶花女遗事》”（1901）中从语言与文学的角度，说译者“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情性，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1901；1997：45）

徐维则 1899 年在《东西学书录》中将译本与中国小说典范相比：“林纾译记法国名妓马格尼事，刻挚可埒《红楼梦》。”（转引自邹振环，1996：123）；包天笑在回忆自己翻译小说的开始时，也提及林译问世后，“哄动一时。有人谓外国人亦有用情之专如此的吗？以为外国人都是薄情的，于是乃有人称之为‘外国红楼梦’”（1971：171；转引自邹振环，1996：123）。

英敛之一口气连夜读完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灯下阅《茶花女》事，有摧魂憾魄之情，万念灰靡，不意西籍有如此之细腻。”（转引自邹振环，1996：123）在这里，译本几乎（开始）改变了读者对域外小说不如中国的看法。

《新世界小说社报》第 6、7 期发表题为“读新小说法”的文章，其中说：“《茶花女遗事》出，可为普天下善男子、善女子读；而独不许浪子读，妒妇读，囚首垢面之贩夫读，秤薪量水之富家翁读，胸罗《四书》、《五经》、饱暖《二十四史》之老先生读。”（转引自邹振环，1996：123）从这里可以看出，译本已经对读者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影响。

到了当代，王佐良在谈到《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也说，这部作品“向中国读书界透露了两样新事物：西洋男女的情感生活（包括西洋式的门第观念）和西洋作家的小说技巧”（王佐良，1989：20）其中第一样东西，亦即婚恋等思想观念，对当时的中国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而第二样东西，实际上包括诗学与写作技巧等方面，对此，陈平原（1997：644）指出：

而小仲马的小说则主要是为中国人讲述了一个十分哀艳动人的故事，晚清文人所要再三赞叹的，是“茶花女”而不是《茶花女》。难怪直到 1911 年，还有人感叹“中国能有东方亚猛，复有东方茶花，独无东方小仲马”；众多学步者实际上是在模仿茶花女的故事，而不是《茶花女》的叙事技巧。

而从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并非不愿意学习《茶花女》的技巧，而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将那些技巧“归化”掉了。因此，王佐良所说的“小说技巧”，当不是指“第一人称叙事”，而是其他方面，如日记体等，邱炜菱便注意到译本“末附茶花女临歿扶病日记数页”（1901；1997：45）这一特点，夏志清等也指出，以“东方小仲马”自诩的徐枕亚在《玉梨魂》便模仿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日记体（参见邹振环，1996：124—125）。

张静庐在其《中国小说史大纲》第七章“欧美小说入华史”（张静庐，1920：27；转引自寒光，1935：51）中指出：

人情好奇，见异思迁，中国小说大半叙述才子佳人，千篇一律，不足以餍其好奇之欲望，由是西洋小说便有乘时勃兴之机会。自林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著哀情小说《茶花女遗事》以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破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中国小说界大受其影响，由是国人皆从事于译述。

王无为也在其《中国小说大纲》“序”（1920；转引自寒光，1935：50）中说：

迨清末叶，林纾以瑰环之姿，用文言译《茶花女遗事》一书，是为西方小说化输入吾国之始，亦启长篇小说用文言之端；于是小说界之趋势，为之一变。……同时苏曼殊以非佛非仙之闲人，寄其灵感于小说之中，所为《碎簪记》、《焚剑记》诸篇，皆与《茶花女遗事》相仿佛。

《巴黎茶花女遗事》引发的影响还不止此。1907 年 2 月，中国第一个由留日学生组织的话剧团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了法国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第三幕²⁸。

4.2.2 个案之二：Uncle Tom's Cabin

在这一个案中，我们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1）翻译动机与目的；（2）

²⁸ 戏剧界甚至将 1907 年称为中国话剧诞生年。

翻译中的删节²⁹；以及（3）读者反应。

翻译的动机与目的

如果说林纾在开始翻译《茶花女》的时候，尚未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动机；那么，他在翻译第二部小说，美国作家 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的 *Uncle Tom's Cabin*（1852）的时候，则已经确定了他此后的翻译实践的轨迹。

其实，林纾早在 1900 年 12 月写就的“《译林》序”（1901）就已经显示出他将翻译实践与启蒙话语联系在一起了。林纾在首次（偶然的）翻译取得不同寻常的成功之后，便开始试图将自己的翻译实践与相应的文化资本联系在一起：他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不久，便与学生林长民等人在杭州创办《译林》月刊。虽然该刊后来所刊载的均是政治、经济类译作，几乎没有文学作品；但林纾在序中看到了启蒙（“开民智”）、教育（“学堂”）、译书与小说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1898）译印政治小说的倡议的影响。换言之，林纾试图通过将小说翻译实践与启蒙联系起来，从而为自己的翻译行为取得合法性，进而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³⁰。而这次翻译选择的文本恰恰也是政治小说³¹。

这里，我们不妨从林纾在译本中的序、例言与跋来展开有关的分析。

1901 年，林纾与魏易合作，花了六十六天的时间，在杭州求是书院里，翻译完 *Uncle Tom's Cabin*，当年即在杭州以“武林魏氏（易）刻本”出版《黑奴吁天录》（1901）。译本上有魏易的“序”、林纾的“序”、“例言”和“跋”³²。

²⁹ 这里，笔者将不再作内容上的详尽分析，可参看张佩瑶（2003）。

³⁰ 从这一意义上言，也可以说是林纾的一种策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批评林纾“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其实是没有看出这一点。至于林纾通过翻译获得文化资本，后文中寅半生（1907）对林纾翻译实践的否定，可以说是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³¹ 张佩瑶（2003：16）指出，“此书出版后，西方一直视之为反对奴隶制度并带有宗教性质的小说”。

³² 但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则没有收录魏易的“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1997）也未予收录；张佩瑶（2003：20 注 7）指出，“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序的内容大体一致”的缘故；但这是否也表明出版社有意“突出”林纾？因为，根据魏易的“序”（1901；1960：280），翻译《黑奴吁天录》乃是魏易首先提出的：

然易……又读俄罗斯报，则谓中国本有外人执政之例，至近年美洲驱逐华工，而我支那之人，且欲为奴而不得矣。夫奴隶可耻也，奴隶于异域尤可耻也，至求为奴隶于异域而不可得，而我使臣且出而争之，而争之又不能胜，诚不知我支那之人自居何等，而列邦待我支那之人又居何等也？……然易闻法之汪勒谛，昌明正学，恒假小说以开民智。近得美儒斯士活氏所著《黑奴吁天录》，反复披玩，不啻暮鼓晨钟。以告闽县林先生琴南，先生博学能文，许同任繙译之事。易之书塾，与先生相距咫尺，于是日就先生讨论，易口述，先生笔译，酷暑不少间断，阅月而书竣，遂付剞劂，以示吾支那同族之人。语云：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窃愿读是编者，勿以小说而忽之，则庶乎其知所自处已。

同时，从此可以看出，林纾的“序”中类似或雷同的内容倒有可能取自其合译者魏易。

林纾在短短不足五百字的“《黑奴吁天录》序”（1901；1981：1）中，首先说及美洲黑奴的历史，继而将黑奴的处境与黄人联系起来，特别是华工在美受到的“酷待”，“或加甚于黑人”，但由于国力弱，中国政府不敢为华工争取应有的权利，同时因“又无通人纪载其事”，只有《黑奴吁天录》“可据为前谏”；其次，林纾将其翻译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同上）：

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喻譬；而倾心彼族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之书足以儆醒之者，宁可少哉！

最后一句表明了翻译的动机。再次，林纾也说明了对原本的选择不是像翻译《茶花女》那样是出于文学本身的考虑³³，而是事关民族存亡的国家大事：

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这一点，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林纾，1981：2）中也再次强调，并明确告诫读者，不要视其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

是书系小说一派，然吾华丁此时会，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咄嚙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幸甚！

事实上，林纾始终将《黑奴吁天录》视为政治小说，而并非如有论者所认为的，“就译者与读者的观感而言，仍是将《黑奴吁天录》本身作为同情黑人的作品接受的”（夏晓虹，2000：243）；这一点在林纾为该书所作的“跋”中亦可明显看出。在不到五百字的跋中，除了开头有关作者介绍及原本的真实性的文字外，几乎全是从政治角度来阐述的（1981：206）：

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近年美洲厉禁华工，水步设为木栅，聚数百远来之华人，栅而钥之，一礼拜始释，其一二人或逾越两礼拜仍弗释者，

³³ 林纾在序中似乎也注意到了文学的问题：“‘录’本名《黑奴受逼记》，又名《汤姆家事》，为美女士斯土活著。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1981：1）

此即吾书中所指之奴棚也。向来文明之国，无发私人函件，今彼人于华人之函，无不遍发。有书及“美国”二字，加犯国讳，捕逐驱斥，不遗余力。则谓吾华有国度耶？无国度耶？观哲而治与友书，意谓无国之人，虽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若夫日本，亦同一黄种耳，美人以检疫故，辱及其国之命妇，日人大怒，争之美廷，又自立会与抗。勇哉日人也！若吾华有司，又乌知有自己国民无罪，为人囚辱而殒死耶？上下之情，判若楚越；国威之削，又何待言！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

面对华工在美国的遭遇，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等现实，“跋”中的“有国度”与“无国度”也就显得特别突出，“爱国保种”的动机再次凸现在读者眼前。

翻译中的删节

在“《黑奴吁天录》例言”（林纾，1981：2）中，林纾除了对“序”中有关内容（如书名）作了相应的补充说明³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林纾提出了此前在翻译《茶花女》时尚未明确指出的问题：宗教与删节问题。

删节问题，在前述《茶花女》的个案中，我们给出了一个统计数字，这里不妨也作一大致的统计。原著 *Uncle Tom's Cabin* (1852)，据电脑统计，词数达18万之多，而《黑奴吁天录》（1901；1981），据版权页数据，字数在12万4千，根据版面统计则为：206页×24行×26字=128544字；作为对比，我们选择了黄继忠的译本《汤姆大伯的小屋》（1982），版权页上的字数为43万2千，根据版面统计，则为：（3+596）×26行页×28字=436072字。根据版面统计结果，《黑奴吁天录》（1981）只为《汤姆大伯的小屋》（1982）的29.5%左右；而如果将两种译本与原本进行篇幅上的对照，或许也可以说明删节问题：黄继忠（1982）是Stowe（1852）的2.4倍左右；林纾、魏易（1981）是Stowe（1852）的0.7倍左右。就英译汉而言，一般译本的篇幅（字数）比原本的篇幅（词数）要多；林纾固然因为使用文言，字数上因为简洁的原因会相对要少，但没有这么大的出入。

林纾在“例言”中谈及宗教与删节的有两条（1981：2）：

³⁴ “例言”中说：“是书以‘吁天’名者，非代黑奴吁也。书叙奴之苦役，语必呼‘天’，因用以为名，犹明季六君子《碧血录》之类。”

一 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笃至，语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传述，识者谅之。

一 是书言教门事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本以取便观者，幸勿以割裂为责。

第一条说明原本中存在许多宗教方面的内容，作为翻译，“不能不传述”；但林纾特别指出，译者“非教中人”，可能还有一个原因：1900年前后的“庚子事件”是与宗教有关的。而第二条，虽然面对的同样是宗教内容，但译者删节的理由则是非宗教的，而是从读者角度——即阅读习惯——考虑的，但这里的“烦琐”同时也可能是译者诗学方面的考虑因素。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删节不是林纾所为，而是合译者在口述过程中删节的。这就给研究者提出一个颇为复杂也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林纾与其合译者共同翻译的所有文本中，究竟有多少是合译者在口述中删节的？像魏易在口述*Uncle Tom's Cabin*中所作的删节，林纾是清楚的，那么在其它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又有多少是合译者在口述中自作主张作了删节而又没有告诉林纾的？除非有文献记载（如这里林纾的说明），否则，研究者根本无法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自然也就无法判断是谁决定并作了删节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研究林纾的翻译实践时，不能忽视其合译者的作用³⁵。

Uncle Tom's Cabin 最初是在报刊上连载的，每章均有标题，并且有12章的开头均有题记引文，或者引自《圣经》，或者引自诗歌，甚至还有引自演说家与法官的。作者的这种做法在18、19世纪英语文学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属于一种诗学常规。

直至20世纪初期在小说中依然占居主流地位的中国章回小说，也存在类似的传统：每一章均标出回目，有工整的对仗标题，每章开头配有题记性质的诗文，并采用“话说”、“且说”、“下回分解”等陈套（stereotype）。

而林纾、魏易一律不译原文的章节标题，同时也全部删除每章前的题记引文。在当时中国文学，尤其是传统小说的语境中，林纾、魏易的这种做法，就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这种删节的做法，显然与其内容具有宗教性质无关，因为据张佩瑶（2003）说，“译文保留了原文的大部分宗教内容”，译者在保留内容的选择上，遵循了以下原则（2003：16）：

³⁵ 尽管将林纾与其合译者放在一起研究，也可能存在“无奈”的因素。

1 当小说的主人公汤姆经历信仰危机时，译文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他的情绪起伏。

2 直接提到神灵时，例如 ‘God’、‘the Lord’ 等字眼都予以保留，译为 ‘天主’。不仅如此，连书中人物有关的感叹语，这种可以被看作 ‘烦琐’ 之处而删除的句子，都如实照译。

3 书中人物常引用《圣经》或唱圣诗以抒发感情，特别是用来表达悲伤、痛苦、软弱、不满、或伤心等不愉快的心情，译者把有关引文及内容都译了出来。

4 书中人物的观点所代表的道德情操和宗教立场，作者要是不同意的话，往往会借叙事者或其他角色之口，加以反驳、质疑；译者对这些人物的观点都照译不误。

至少，我们可以说，宗教内容不是删除的主要或唯一考虑因素。

对于译者的删除，或者说删改，张佩瑶（2003）通过分析指出有七类（16—18），其中第二类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直接相关，特引如下（17）：

原著多个章节引用了《圣经》或宗教诗歌作开头；尤其是小说下半部讲述汤姆悲惨境遇时，更连续十章（第 31—40 章）采用这种写作手法；这些引文诗歌，在译本中无影无踪。结果，小说在修辞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宣道、劝诫的修辞风格——在译本中便荡然无存。叙事者在原文最后部分的叙述方式是以一段引文开始，然后讲述一个故事来阐述引文的观点，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来结束“布道”。在译本中，即使叙事者作为布道者的声音没有完全消失，也仅是隐约可闻罢了。

当然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中叙事者的主要作用就是叙述，即便作者通过叙述者道出某些观点，也只是偶一为之，不会像《汤姆》的叙述者那样畅所欲言，频抒己见。《黑奴》译者深谙古典小说叙述模式，可能因此而塑造出一个比较寡言含蓄的叙事者。但是，应该注意，小说内容要是与宣扬教义无关的话，译者却又不受上述叙事习惯的限制。

在这里，论者从修辞风格——主要是内容方面——以及对照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技巧的角度，作了深入的分析。

我们不妨以小说第三十三章为例。

ST (Stowe, 373) ³⁶:

CHAPTER XXXIII Cassy

³⁶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引用的版本版权页上并无出版日期，而从书籍的装订看，当在 20 世纪初期或者以前出版。

“And behold, the tears of such as were oppressed, and they had no comforter; and on the side of their oppressors there was power, but they had no comforter.”-- ECCL. 4:1

It took but a short time to familiarize Tom with all that was to be hoped or feared in his new way of life. He was an expert and efficient workman in whatever he undertook; and was, both from habit and principle, prompt and faithful. Quiet and peaceable in his disposition, he hoped, by unremitting diligence, to avert from himself at least a portion of the evils of his condition. He saw enough of abuse and misery to make him sick and weary; but he determined to toil on, with religious patience, committing himself to Him that judgeth righteously, not without hope that some way of escape might yet be opened to him.

TT1 (黄继忠, 1982: 468):

第三十三章 凯茜

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

——《传道书》第四章第一节

不久，汤姆就熟悉了这个新的生活环境，知道这里有些什么指望，有些什么要提防的事。他干什么活都熟练而能干。同时，由于习惯和信念，干起活来既麻利，又踏实。他生性恬静、温和，总希望以勤奋不懈的努力，来减轻一点目前的恶劣处境。打人、骂人和其他悲惨的事他看得够多了，使他感到厌倦。可是他还是拿定主意兢兢业业，把自己交托给公正无私的上帝，暗自盼望将来总能找到一条生路。

TT2 (林纾、魏易, 1901; 1981: 168):

第三十三章

汤姆处水深火热之中，张惶惨沮者数日，此心渐近平实，无论何役，均以实力行之，遂为诸奴之冠。其心以为主人固悍，然吾尽吾职，则亦可以报主人，或且主人见悯，得有自由之日。

将林纾、魏易（1901；1981）与原文以及黄继忠（1982）加以对照，便不难发现：林纾、魏易删除了章节标题；删除了题记引文；在正文中，不但对有关宗教内容做了删节，如原文中明显的“religious patience”、“Him”等词，在内容上有所改动，而且局部改变了叙述视角：原文是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叙述的，而林纾、魏易的译文则在第二句中发生了叙述视角的转移，前半句“其心以为主人固悍”依然还属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但其后的“然吾尽吾职”则转向自由直接引语了（free direct speech），即采取了汤姆的视角。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除了内容具有宗教的特性外，或许更为突出的乃是林纾、魏易这种删节，具有小说上的形式意义。这一点，对于中国章回小说传统，或许具有一种颠覆的力量。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有这样几种

可能：（1）口译者魏易在口述的时候，直接略过而不口述；（2）口译者魏易口述了，但笔录者林纾觉得没有必要在译文中体现出这一写作技巧；（3）译者或许是出于某种诗学的考虑，或许是根本没有任何考虑，而只是图方便，比如林纾刚开始从事翻译时的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除了小说最后有关“日记”部分（1899；1981：72—84）外，既没有根据原著划分章节，也没有段落的区分。到了《黑奴吁天录》，可谓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进步”：至少是标出了章目。

中西“文法”之比较

此外，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林纾，1981：2）中，还首次提出了此前在翻译《茶花女》时尚未明确指出的问题：中西“文法”的比较问题。他说（1981：2）：

是书开场、伏脉、借筭、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文，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

在这里，我们不妨说林纾第一次从诗学的高度对中西文学作了比较³⁷，并告诫译本读者切勿“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原本虽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文学——或诗学——的角度看，未必算得上是一部名著，那么，林纾的这一做法，或许是通过这种比较提升原本——以及译本——的价值，进而吸引译本读者的一种策略。

读者反应

《黑奴吁天录》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不少人纷纷赋诗作文，悲叹黑奴的苦况，感叹中国人的命运”（邹振环，1996：146），以至于有论者认为这是“一部影响中国历史的译作”（同上，148）。

灵石在《觉民》第八期发表的“读《黑奴吁天录》”（1904），可谓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读者反应（1997：132—133）：

³⁷ 徐志啸（1995，特别是2002）专门讨论林纾的“中西文学比较”，却没有注意到林纾的这一论断。当然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林纾这里的“比较”或许是一种“比附”，甚至是一种“误读”，但如果从提高小说——尤其是域外小说——的地位这一角度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点在我们考虑到林纾作为一个古文家的时候，就更明显了。

我读《吁天录》，以我同胞之未至黑人地位，我为同胞喜。我读《吁天录》，以我同胞国家思想淡薄，故恐终不免黑人地位，我愈为同胞危。我读《吁天录》，证之以檀香山烧埠记，证之以美洲、澳洲禁止华人之新例，证之以东三省，证之以联军入京，证之以旅顺大连威海胶州广湾九龙之旧状，我愈信同胞蒙昧涣散，不能团结之，终为黑人续，我不觉为同胞心碎。

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亦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摹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民。我欲求海上名画师，将四十二章各绘一图，我愿以粗拙之笔，图系一诗，以与《聊斋志异》争声价，庶妇孺贪观，易投俗好。我愿善男子，善女子，分送善书，劝人为善者，广购此书，以代《果报录》、《太上感应篇》、《敬灶全书》、《科场志异》之用，则度己度人，功德无量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对译本“政治小说”的定位，以及由此而对译本的期待，已经实现了。

4.2.3 个案之三：Joan Haste

首译本

哈葛德（Sir 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这个名字，今天的读者或许并不熟悉，但在晚清却算得上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有三个在创刊号刊登西方文豪的肖像。《新小说》选的是托尔斯泰，《小说林》选的是雨果，1906年《月月小说》的创刊号上登载的是哈葛德的头像，将他与托尔斯泰、雨果并列齐名，成为晚清文学启蒙者建设“新小说”的效法对象和文学阅读的“热门”作家，便是一个明证。

哈葛德 1881 年从南非回英国后开始小说创作，一生创作小说 57 部，杂著 10 部。他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冒险、神怪、言情。

林纾在其所翻译的文本中，哈葛德的小说占了二十五种（其中两种未刊），是林纾及其合译者翻译最多的作家。据统计（陈平原，1997：631），在 1896—1916 年，就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家而言，其作品数目（25 种³⁸）也仅次于另一位

³⁸ 据曾锦璋（1966）所作的统计，为 19 种，陈平原将此后的翻译作品数目也计算在内了，即林纾及其合译者到 1924 年林纾去世时止，共翻译了 25 种。

英国作家柯南道尔（32种），其影响可谓深广，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后，才消失³⁹。

因此，研究林纾的翻译，考察哈葛德小说，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这里，我们仅将哈葛德的*Joan Haste*（1895）的翻译作为考察对象，原因是哈葛德小说汉译本中，这部小说的译本影响可谓最大⁴⁰。

*Joan Haste*是哈葛德作品中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小小说。1901年4月3日《励学译编》第一册开始连载《迦茵小传》，至第十二册（1902年2月22日）结束，署“蟠溪子译”，译者蟠溪子即杨紫麟。到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译本才提及合译之事。版权页上的署名是：“翻译者蟠溪子；天笑生参校”⁴¹。

不过，真正使哈葛德在中国近代文坛闻名的还是林纾。1904年，林纾与魏易合作，重译了*Joan Haste*；为了与蟠溪子的译本有所区别，取名《迦茵小传》⁴²，这一“全译本”于1905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此后多次再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6年9月，《迦茵小传》已经发行了三版，1913、1914年几度再版，先后编入《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邹振环，1996：187）。

首先，我们不妨考察一下*Joan Haste*的第一个中译本的情况。关于这本书的翻译经过，蟠溪子在“《迦茵小传》引言”（1903）作了说明。由于该引言不常见，这里全录如下（1903：1—2）⁴³：

译者蟠溪子曰。岁在庚子夏某负筐来海上三载。时以暑假。学堂中自教习学生悉作休夏计。某家海上。辄以晚凉闲步。偶于冷摊得残破西籍数种。索价一先令。购归展读。中有迦茵喜司托来一种。译言迦茵小传者。为欧西小说家言。惜残缺其上帙。而邮书欧美名都。思补其全。卒不可得。时我友天笑声有事海上。楮墨之暇。辄相过从。距庐不百武。有公花园。期晤君则相其园。阳鸟归山。微风涤暑。期天笑生不至。手迦茵小传。就坐林下。冷然诵之。则所谓澄汰其烦。纾淫蒸。而与以萧疏骀荡乎。天笑

³⁹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中将哈葛德划归在“二流以下”作家之列，郑振铎（1924）也将其视为“第二等”的作家；即便如此，1917—1924年间，林纾与陈家麟依然翻译了哈葛德的6种小说。

⁴⁰ 同时，这也是一部重译（或者说复译）小说。

⁴¹ 关于署名问题，不同论者说法似乎不一，如陈大康（2002：83）指出，署名“蟠溪子、天笑生译”；邹振环（1996：186）则认为，小说“经杨紫麟节译、包天笑润饰，取名《迦茵小传》，以蟠溪子的署名，送到文明书局出版”，这一说法容易给读者产生译本没有连载的印象；而郭延礼（1998：282）也认为，“《迦茵小传》原有蟠溪子和天笑生的合译本”。笔者查阅原始文本后，发现以上说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而范伯群（1996：171；175注1）则是准确的。

⁴² 两种译本书名上的细微差异，论者多未加注意，如鲁迅（1931），郭延礼（1998：282）等。

⁴³ 《迦茵小传》书前有一序，但其内容似与翻译本身无涉。而这里的“引言”则与译本的正文放在一处。标点（句读）则照原书。

生来。则促膝并坐。手讲口译。恆至电魄列星。云衣漏月。相将俱归。迨秋来小病。昕夕多闲。乃就原文随译随录。得数十纸。适天笑生归自金陵。道海上。携稿去。嘱稍加删补焉。某既以译笔浅陋。深滋不文憾。又念。今日需译之急。而乃虚牝光阴。消磨精力于小说家言。不几令有识者齿冷乎。亦以资茶话。觐西俗。将附于艳丽思想家之说耳。既述其缘起。复当覓其全帙以成完璧。然迨因之原委。以后度前。亦思过半矣。可勿赘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蟠溪子翻译这部小说的时候，还是一个在上海读书的学生；译者得到这部小说原著也是偶然的，原著残缺，而为了补全，甚至“邮书欧美名都”，终于未果；与天笑生讲读此书，到了秋天，便译出此书；后参与创办《励学译编》的天笑生（范伯群，1996：171）从南京回苏州时途经上海，将译稿带走，译者蟠溪子并且嘱咐天笑生“稍加删补”。后来译文在《励学译编》连载，将近一年之久。从开始的连载，到后来的单行本，我们从蟠溪子的译者引言中知道，这部翻译小说不是全本，缺上半部。

蟠溪子的译本，林纾在杭州的时候，便看过了，并做了很高的评价（林纾，1905；1997：154）：

余客杭州时，即得上海蟠溪子所译《迦茵小传》，译笔丽瞻，雅有辞况。迨来京师，再购而读之，有天笑生一序，悲健作楚声，此《汉书·扬雄传》所谓“抗词幽说，闲意眇旨”者也。

但因为不是全译而不免有“至以为憾”的感慨。这里顺便指出，林纾在杭州时所看蟠溪子的译文，当不是单行本，而是连载的译文，原因是单行本是在1903年出版，而据张俊才（1983：25），林纾于1899年2月从闽县“移家至杭州”，“在杭州居住近三年之久”，并于1901年“由杭州迁家至北京”（张俊才，1983：26）。

林、魏重译

Joan Haste 不是林纾首译哈葛德的作品，1904年林纾分别与魏易、曾宗巩合作，翻译了哈葛德的 *Eric Brighteyes* (1891)（《埃司兰情侠传》，1904）、*Cleopatra* (1889)（《埃及金塔剖尸记》，1905）。林纾在“《迦茵小传》小引”（1905；1997：154；1981：1）中对为什么要重译 *Joan Haste* 做了说明：

甲辰岁译哈葛德所著《埃司兰情侠传》及《金塔剖尸记》二书，则《迦茵全传》赫然在《哈氏丛书》中也。

换言之，商务印书馆与林纾因为准备出版哈葛德系列丛书，*Joan Haste* 自然包括在这一丛书之中。这一点，从商务印书馆在 1904—1909 年间出版了哈葛德 14 部作品的译本，也可以得到证实（参见马泰来，1983：61—63）。

林纾开始并不打算自己重译的，而是首先联系蟠溪子，但“莫审所在”；而其合译者魏易也说（林纾，1905；1981：1）：

小说固小道，而西人通称之文家，为品最贵，如福禄特尔、司各德、洛加德及仲马父子，均用此名世，未尝用外号自隐。蟠溪子通瞻如此，至令人莫详其里居姓氏，殊可惜也。

自然，这本书也可以置之不译，但由于“哈书精美无伦，不忍听其沦没”；于是，林纾只好答应魏易的要求，两人一起合译此书，“遂以七旬之力译成”。*Joan Haste* 的全译本《迦茵小传》1905 年 2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迦茵小传》除前有林纾“小引”外，尚有“钱塘夏曾佑”的“题词”——“积雨卧读林琴南迦茵小传有感”（1905；1981：2）：

万堆书里垂垂老，悔向人前说古今。
薄病最宜残烛下，暮云应作九洲阴。
旁行幸有伽娄笔，发喜难窥大梵心。
会得言情头已白，捻髭想见独沈吟。

而林纾自己也有“买陂塘并序”，其中有言：“而迦茵一传，尤以美人碧血，沁为词华。余虽二十年庵主，几被婆子烧却，而亦不能无感矣”（1905；1981：3）。

钱钟书（1964；1981：46）指出：

近年来，哈葛德在西方文坛的地位渐渐上升，主要是由于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心理学家对《三千年艳尸记》的称道；1960 年英国还出版了一本哈葛德评传。水涨船高，也许林译可以沾点儿光，至少我们在评论林译时，不必礼节性地把‘哈葛德在外国是个微不足道的作家’那句老话重说一遍了。”

我们且不管哈葛德在文学史——如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在 1905 年甚或 1904 年林纾翻译 *Joan Haste* 的时候，大致可以说蟠溪子的译本比较受欢迎：这一点，从林纾、魏易的译本名称也可以推想出来；林、魏二人完全可以另起一个书名，没有必要照搬蟠溪子的书名——两个书名同音。何况，这个书名与林纾此前译本采取意译的命名似乎有所不同，“迦茵”乃是“Joan”的音译。

而论者在讨论这两个译本的时候，大多也说蟠溪子的译本只有半部，林纾、魏易的译本是全本，但几乎都没有对这两个译本做过统计，因而基本上是人云亦云。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个大致统计数据。蟠溪子（1903）的译本正文为 124 页，但其中有一页多是译者的“引言”，实际只有 122 页左右，每页版面字数为 12 行，每行 31 字（不包括标点），共计： $122 \times 12 \times 31 = 45384$ 字；林纾、魏易（1981），据版权页，字数为 15 万 1 千字（包括“小引”与“题词”等），译本正文 247 页，每页版面字数为 24 行，每行 25 字（包括标点），共计： $247 \times 24 \times 25 = 148200$ 字，如果扣除其中的标点数目（经抽样，每页标点数目在 90 个左右）： $247 \times 90 = 22230$ ，则译本的字数为 $148200 - 22230 = 125970$ 。蟠溪子（1903）在篇幅上为林纾、魏易（1981）的 36% 左右，即三分之一强。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章节情况。林纾、魏易（1981）共有四十章⁴⁴，蟠溪子（1903）则不分章节，但从内容看，蟠溪子（1903）是从第二十一章开始的，蟠溪子引言中找不到上半部的说法，虽然尚无证据证明其成立，但译者确实是从下半部开始翻译的。现在再就下半部的翻译（与删节）来做一个统计。这里只需要统计林纾、魏易（1981）的字数： $119 \times 24 \times 25 - 119 \times 90 = 71400 - 10710 = 60690$ 。蟠溪子（1903）的篇幅占林纾、魏易（1981）相应章节篇幅的百分比为 74.8%。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蟠溪子（1903）的删节比林纾、魏易（1981）要多⁴⁵；而两个译本的翻译时间相距并不远⁴⁶。

⁴⁴ 笔者未曾找到英语原本，（2003 年 11 月）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也未借到此书的原本。

⁴⁵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没有考虑进去：两个译本的译者使用语言或文体不同，也会导致字数不同。这里我们不妨给出蟠溪子（1903）的开头与林纾、魏易（1981）第二十一章开头，Joan 给 Henry 写的告别信，以资对比：

1 蟠溪子（1903：2）：

亨利足下。昨辱遣人视妾。感纫不可名状。迦因顽躯无恙。幸勿系念。所难堪者。林南先生之死。我亨利膺此哀痛。当难喻解。今者妾将有远行。告我亨利。必深诧异。然值此青年。义应力食。故未预谋足下。亦未告我姨母。足迹所至。初无定踪。所可自信者。迦因之爱我亨利。曾不稍衰。地老天荒。无渝此志耳。赠书数册。携共听夕。置之行篋。伴我孤影。风前展卷。如与我故人亨利相对也。

读者反应

然而，林纾、魏易（1905）这一“全译本”出版后，却引起了一场译者可能也想不到的“风波”。读者的反应较为复杂，远远超出了译者“言情小说”的定位⁴⁷。

就在林纾、魏易（1905）出版的当年，松岑在看了“足本”后，颇有感慨，在《新小说》第十七号发表文章“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1905），对林纾及其合译者的两个译本提出了批评（1997：172）：

夫新旧社会之蜕化，犹青虫之化蝶也，蝶则美矣，而青虫之蠕则甚丑。今吾国民当蜕化之际，其无以彼青虫之丑，而为社会之标本乎！…少年学生，粗识“自由”、“平等”之名词，横流滔滔，已至今日，乃复为下多少文明之确证：使男子而狎妓，则曰我亚猛着彭也，而父命可以或梗矣（《茶花女遗事》，今人谓之外国《红楼梦》）；女子而怀春，则曰我迦因赫斯德也，而贞操可以立破矣（《迦因》小说，吾友包公毅译。迦因人格，向为吾所深爱，谓此半面妆文字，胜于足本。今读林译，即此下半卷内，知尚有怀孕一节。西人临文不讳，然为中国社会计，正宜从包君节去为是。…）。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小说翻译所发挥的话语功能：冲击了当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而这场风波中的主要人物则是月刊《游戏世界》的主编寅半生（钟骏文）。他在《游戏世界》第十一期发表寅半生“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1907），从多方面通过对比的方式批判了林纾、魏易（1905）的全译本。

寅半生首先就两种译本所体现出来的女主人公 Joan 作了人格上的对比（寅

妾行矣。愿亨利努力加餐。勿以妾为念。

2 林纾、魏易（1981：133—134）：

亨利勋爵足下：前此医者寓君言，来省吾病，语极温婉慈爱，足见深心。唯吾病殊不剧，今且勿药。闻老勋爵奄逝，闻之悲梗万状，此亦君生平祸难之第一遭，悲戚必且更甚，至念至念。吾今日将谋去白拉墨司，以此间孑然无朋友之助，孤飘一女子，何由能立？且贫女年事已及，应自图活于外，然实未尝与阿姨谋之，且无人知我所向，必难见调。至吾一身远出，凭其壮岁体质，料不为风寒所中，而腰橐尚硕，足以为客。君去年归时，所留篋中书卷，君诺赐我，吾即携书同行，用为纪念。吾一日生者，每于风前展卷，必一一忆及病榻趋走之时；且忆展此一篇，就榻读之为君排闷。想后此数年，君必积渐忘我。然我对遗篇，仍复不能遗君。君今勿念，吾行矣！用此留别，愿君清恙早瘳，一生安乐；维此后谅无再见之期，书此以为永诀。侍儿迦茵·赫司德笺上。

⁴⁶ 自然，我们还可以就两个译本相应的内容进行对比与分析，考察两个译本各自删节的（重点）内容是什么。由于篇幅及研究侧重点的原因，这一工作只有留待来日了。

⁴⁷ 自然，我们无从了解译者当时对“言情小说”究竟有何种反应期待。而从后文的分析看，译本引发的读者反应似乎包括了“逆向反应”与“正向反应”两种类型，属于一种混合的反应类型。

半生，1997：249）：

吾向读《迦因小传》，而深叹迦因之为人，清洁娟好，不染污浊，甘牺牲生命，以成人之美，实情界中之天仙也；吾今读《迦因小传》，而后知迦因之为人，淫贱卑鄙，不知廉耻，弃人生义务，而自殉欢乐，实情界中之蝥贼也；此非吾思想之矛盾也，以所见译本之不同故也。盖自有蟠溪子译本，而迦因之身价忽登九天；亦自有林畏庐译本，而迦因之身价忽坠九渊。

在寅半生的眼中，此“迦因”与彼“迦茵”判若两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寅半生继而从小说内容上对二者进行了对比与分析：

何则？情者，欲之媒也；欲者，情之蠹也。知有情而不知有欲者，蟠溪子所译之迦因是也；知有情而实在乎欲者，林畏庐所译之迦因是也。他不具论，试问未嫁之女儿，遽有私孕，其人为足重乎？不足重乎？吾恐中西之俗不同，殆未有不以为耻者。蟠溪子不知几费踌躇，几费斟酌，始将有妊一节，为迦因隐去，而但写其深情高义，念念不忘亨利，而势又不能嫁亨利，因不惜牺牲一身，以玉成亨利，又虑无以断亨利之念，遂勉与石茂（林译本作洛克）订婚，而使亨利得专心以娶意茂（林译本作爱玛）。观其与亨利剖白数语，血泪交迸，字字沉痛，且谓与石茂名为夫妇，誓不与以一分爱情，此其心为何如心！此其语为何如语！是固情界中所独一无二者也。至于迦因与亨利，以前若何互结爱情，皆削而不书，以待读者意会。其自叙云：“残缺其上帙，而邮书欧、美名都，思补其全，卒不可得。”非真残缺焉，盖曲为迦因讳也。故又云：“迦因之原委，由后度前，思过半矣，可勿赘焉。”诚哉其可勿赘焉！不意有林畏庐者，不知与迦因何仇，凡蟠溪子所百计弥补而曲为迦因讳者，必欲历补之以彰其丑。所叙登塔取雏，此乡里小儿女嬉戏之事，而即以为迦因与亨利结清之缘起，甚矣其不正也！至以陌路不相识之人，而与之相互偎抱，虽曰救死则然，亦复成何体统！宜乎来文杰（蟠溪子译本作李文）痛诋之曰：“此女先怙恩格雷芙（即亨利）登塔，已乃张两膊以拯其死，见者无不同声以赍其神勇，而吾则甚恨其人。”（见第九章）夫来文杰何人？迦因之父也。乃不憚尽情痛诋如是。至于卧病其家，非真卧病也，以迦因之有妊卜之，乃日恣淫乐也，观此而迦因之淫贱为何如乎！厥后与爵夫人（蟠溪子译本作林南夫人）客邸倾谈，在蟠溪子译本，则何等慷慨，何等决裂！而林本其意虽同，其语则一味辩驳。且一则曰：“怀中之儿，且蒙无父之辱。”再则曰：“未乳之儿，同付一掷。”念念及于私胎，此岂未嫁女郎对情人之母之口吻乎？而迦因竟无耻若是！试取两书互勘之，迦因之身价，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呜呼！迦因何幸而得蟠溪子为之讳其短而显其长，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神往于迦因也；迦因何不幸而复得林畏庐为之暴其行而贡其丑，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轻薄夫迦因也。世不少明眼人，当不河汉斯言。且不特迦因之身价忽高忽低有如是也，即就亨利而论，从蟠溪子译本观之，俨然一昂藏自立之男子也；而就林本观之，其始也，途遇彼美，冒险登塔，自忘生命；其对母

爵夫人云：“吾恋其美，实欲媚之，故不惮险。”夫亨利何人？盖勋爵之裔也。乃一遇彼美，遽丧其品，至于卧病其家，日恣淫乐，与禽兽何异？且天性之亲，人孰无之？即甚忤逆，未有睹其父临死，而犹哓哓置辩者。乃老勋爵临终，至再至三，殷殷以迎娶爱玛为嘱；而亨利竟溺于情人，不顾父命，肆口强辩，此尚得为人子乎？是皆蟠溪子所删而不叙者也，第浑言之曰：“由后度前，思过半矣，可勿赘焉。”不解林氏何心，而必欲一一赘之！

两种译本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与中国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里主要是指伦理道德——不一致甚或相违背的内容，采取了不同的方法：（1）蟠溪子（1903）删节的目的被称之为“传其品”，因此，“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删而不书”；（2）林纾、魏易（1905）保留的目的却被目为“传其淫”、“传其贱”、“传其无耻”；寅半生甚至藉此对林纾此前的翻译实践作了一个否定的结论：

而林氏自诩译本之富，俨然以小说家自命，而所译诸书，半涉于牛鬼蛇神，于社会毫无裨益；而书中往往有“读吾书者”云云，其口吻抑何矜张乃尔！甚矣其无谓也！

这一风波很快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08年春，王钟声在刚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排演了英国哈葛德原著，杨紫麟、包天笑译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迦茵小传》（参见范伯群、朱栋霖，1993：11）。

但并非所有的读者都像寅半生那样，完全从维护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来解读林纾、魏易（1905）的译本。后来，鲁迅在其“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一文中指出：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 R. Haggard: *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而周作人也在其回忆性文章“《迦茵小传》”（1951；1996：45—46）中对林

纾（及其合译者）的翻译行为作了肯定（1996：45—46）：

我知道英国哈葛德的小说，由于林琴南的译书，大概可以分作两类，其一是神怪蛮荒的，如《埃及金塔剖尸记》与《鬼山狼侠传》，其二是言情的，《迦因小传》之外还有《玉雪留痕》、《橡湖仙影》等，属于早期译品，都还精致。我当时佩服他，特别是关于《迦因小传》，这并不因为我喜欢言情，乃是别有理由的。在这以前曾经出版过一册同名的小说，大约是文明书局印行的吧，译者名字已记不得，也不知道是否说明是哈葛德所著，顶特别的是从中间说起，说是因为上半已逸，怎么也找不到，所以只好如此。我们读了很是喜欢，可是也很纳闷，为什么这只剩了半部呢。及至林译的《迦因小传》出来，才知道汉文虽有两册，原文就只是一本，其所以如此的显然是译者所干的事，即是他只翻译了一半。为什么要把上半部删除了呢？我们拿林译的上卷来看，才明白这是因为说迦因与人私通了，想不到中国译书人倒要替外国小说里的女郎保守贞操，虽是好意，却也未免是太多事了。那时林先生毅然决然的将全部补译出来，这种精神实在很可佩服，至今也还是值得表扬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林纾与魏易的这一“全译本”同时也是一个重译本这一事实，两位译者的翻译行为也就更加突出了。

4.3 归化的颠覆

以上就林纾及其合译者的三个译本进行了个案分析。下面笔者试从整体上对林纾（及其合译者）的翻译这一翻译主体的“个案”，作一较为宏观的论述。

4.3.1 翻译动机与目的

如果说，林纾（及其合译者）在开始翻译《茶花女》的时候，其动机尚具有偶然的性质；那么，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取得了出乎译者意料之外的成功后，林纾及其合译者就已经开始注意到“翻译意识形态”的问题，即将（小说）翻译与启蒙联系起来，可以说其立场已经与当时主流的（小说）翻译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对于自己翻译的动机与目的，林纾在其后的译本序跋中做了多次的表白。

1907年，林纾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7；1997：289—290）中甚至将小说翻译称为自己的“实业”：

畏庐，闽海一老学究也，少贱不齿于人，今已老，无他长，但随吾友魏生易、曾生宗巩、陈生杜蘅、李生世中之后，听其朗诵西文，译为华语，畏庐则走笔书之，亦冀以诚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如圣贤之青年学生，读之以振动爱国之志气，人谓此即畏庐之实业。噫！畏庐焉有业，果能如称我之言，使海内挚爱之青年学生人人归本于实业，则畏庐赤心为国之志，微微得伸，此或可谓实业耳。

林纾愿意“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

1908年，林纾在“《不如归》序”（1908；1997：355）中则将自己比作“叫旦之鸡”：“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搥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

但有时候，作为翻译主体的林纾，对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或潮流未必认同，甚至持反对态度，便在译本的序跋中表达出自己的态度或立场，如林纾在“《英国大侠红鬃落传》序”（1908；1999：95）中说明其翻译的动机：“吾姑译以示吾中国人，俾知好为改革之谈，于事良无益也。”

总而言之，林纾（及其合译者）的意识形态动机与目的，其内涵是多方面的。

4.3.2 意识形态

虽然林纾与当时主流的翻译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林纾及其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没有意识形态了：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

就林纾及其合译者的翻译而言，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有如下几种：

一 中国文化系统中已有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解读与翻译产生制约的作用，所产生的作用就是译者对原本的删节或增改。以译者对《黑奴吁天录》中宗教内容的处理为例，删节的原因就有多种：其一，虽然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1901；1981：2）中说明了翻译的原则：“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笃至，语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传述，识者谅之”，但译者出于“知识管理”或话语控制的目的，对宗教内容做出删节；其二，译者的诗学观念：“是书言教门事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本以取便观者，幸勿以割裂为责。”其三，译者对当时社会现实与政治因素的考虑：1900年的庚子事件。这最

后一点，1906年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可以作为证明。

同样是面对宗教内容，但译者的做法却不太一样。林纾在“《鲁滨孙漂流记》序”（1906⁴⁸；1997：163）中说明了翻译的原则：

至书中多宗教家言，似译者亦稍稍输心于彼教，然实非是。译书非著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能参以己见？彼书有宗教言，吾既译之，又胡能讳避而铲鋟之？故一一如其所言。而吾友曾幼固宗巩亦以为然。

言辞之间尽管依然可以看出带有译者为自己的做法辩护的意图，但毕竟没有删节⁴⁹。

二 译者从域外文本中读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即所谓的“误读”⁵⁰，梁启超说林纾在翻译中往往“因文见道”，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在这一意义上言，林纾的翻译有时可以说是为了“维护”中国已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中国的“伦常”意识形态⁵¹。如林纾在“《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序”（1905；1997：156—157）中说：

则《万里寻亲记》为余所见者，仅瞿、翁两孝子而已。然入于青年诸君之目中，则颇斥其陈腐，以一时议论方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涂辙。……忽得此卷，盖美洲一十一龄童子，孺慕其亲，出百死奔赴亲侧。余初怪骇，以为非欧、美人，以欧、美人人文明，不应念其父子如是之切。既复私叹父子天性，中西初不能异，特欲废黜父子之伦者自立异耳。……若必以仇视父母为自由，吾决泰西之俗万万不如是也。余老而弗慧，日益顽固，然每闻年青人论变法，未尝不低首称善。惟云父子可以无恩，则决然不敢附和，故于此篇译成，发愤一罄其积。

译者自身的“前理解”或“成见”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在这里即是中国的三纲等伦理意识形态，可以说还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林纾的序言作为对读者的一种“引导”，所产生的作用是维持或维护主流意识形态

⁴⁸ “林纾、曾宗巩同译”的《鲁滨孙漂流记》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年（1905）十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换算为纪元时间，为1906年1月；罗新璋（1984）与陈平原、夏晓虹（1997）均未进行时间换算而标为“1905”年。

⁴⁹ 合译者是否也是一个因素？林纾在这里说其合译者“曾幼固宗巩亦以为然”，似乎是说“一一如其所言”是他的决定；但删节与否的决定应该是在翻译前作出的。否则，合译者在口述的过程中“自作主张”作了删节，林纾也不“知情”。

⁵⁰ 当然，误读也可分为“有意的”与“无意的”两种。

⁵¹ “伦常”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态。

三 译者通过译本生产新的意识形态。这里，我们不妨以林纾与其合译者重译 *Joan Haste* 的个案来说明。《迦因小传》的译者潘溪子受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伦理道德）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本的内容作了取舍，只选择了原本的下半部；翻译的结果是迎合或巩固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因此遮蔽了原本中内在的信息，进而导致译本读者对西方文学的误读。林纾与魏易则相反：他们是在明确意识到潘溪子的译本不是“足译本”，并且对它作了相当高的（道德）评价后，决定重译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或之前，已经意识到了潘溪子的译本与原本之间的“差异”了。因此，他们决定重译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虽然林纾及其合译者重译的原因有多种，如出版社计划出版“哈氏丛书”，合译者魏易说西方作家所具有的地位，甚至不排除经济因素，虽然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即微观上，林纾、魏易也会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但重译这一翻译行为在客观上，亦即宏观上，消解或颠覆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至少，重译本当时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

四 读者解读生产新的意识形态。所有的译本，通过读者的解读，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此即译本的接受与影响。

4.3.3 诗学观念

林纾自首次“《黑奴吁天录》例言”（1901；1981：2）中说“是书开场、伏脉、借筭、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之后，多次将域外小说的诗学与其所奉行或认同的“古文家义法”进行对照，或者从域外文本中读出了中国的古文“义法”；甚至如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1964；1984：703）中所说，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或者说，“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同上）。

检视林纾众多的译本序跋，可以发现林纾更多地是在域外小说中“寻找”与中国诗学观念相同或类似之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林纾为 Charles Dickens 的译本《块肉余生述》（1908）与《冰雪因缘》（1909）所写的序言。

林纾在“《块肉余生述》前编序”（1908；1997：348）中说：

此书为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书，分前、后二篇，都二十万言，思力至此，臻绝顶矣。古所谓锁骨观音者，以骨节钩联，皮肤腐化后，揭而举之，则全具铿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则固赫然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灏瀚，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为能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着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奕之著子，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成为国手也。

其中的“方之是书”明确地表明林纾在翻译中是以他所体认的古文义法来衡量与评判域外的小说。

译者自身的诗学观念如果在翻译中占主导地位，译者就可能会在翻译中对原本进行删节，如林纾在“《怪董》跋”（1921；1999：126）中就说，原文“文字庞杂，译者为之更正”。

但还有一种情形，论者至今尚未注意到的，就是译者根据自身的诗学观念解读原本，翻译过程中不但没有出现“以中化西”（即“归化”）的现象，却促使译者采取了“保留”（即“异化”）的翻译方法。林纾在“《冰雪因缘》序”（1909；1997：374）中说：

独迭更司先生，临文如善奕之著子，闲闲一置，殆千旋万绕，一至旧著之地，则此著实先敌人，盖于未胚胎之前，已伏线矣。惟其伏线之微，故虽一小物一小事，译者亦无敢弃掷而删节之，防后来之笔，旋绕到此，无复叫应。冲叔初不著意，久久闻余言始觉，于是余二人口述神会，笔遂绵绵延延，至于幽渺深沉之中，觉步步咸有意境可寻。呜呼！文字至此，真足以赏心而怡神矣。左氏之文，在重复中能不自复；马氏之文，在鸿篇巨制中，往往潜用抽换埋伏之笔而人不觉，迭更司氏亦然。

在这里，林纾的诗学观念对合译者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改善并促进了二人的合作。而在这种“保留”的过程中，域外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的诗学因此被“引进”到中国的文学系统之中。这里还是以《块肉余生述》为例。林纾在“《块肉余生述》续编识语”（1908；1997：349）中说：

此书不难在叙事，难在叙家常之事；不难在叙家常之事，难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韵，令人挹之不尽。且前后关锁，起伏照应，涓滴不漏。言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者喜，至令译者啼笑间作，竟为著者作傀儡之丝矣。

对于“家常”这种俗事，小说（家）能够做到“俗中有雅”、“拙而能韵”，即满足古文“义法”的要求，林纾愿意“作傀儡之丝”

林纾以中国的诗学观念来解读域外小说，这除了说明中国或译者的诗学观念对翻译（者）的制约外，在客观上还会产生另一种作用，即提升了（翻译）小说在中国文学系统乃至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如林纾在“《洪罕女郎传》跋语”（1906；1997：181）中“发现”：“哈氏文章，亦恒有伏线处，用法颇同于《史记》”。

4.3.4 翻译语言

如果只是纯粹讨论林纾在翻译中所使用的语言究竟是古文还是文言，学术意义似乎不大。正如前述，钱钟书（1964）也论述了林纾在翻译中所使用的语言是文言，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古文。何况，翻译无论如何会在语言上给译语带来或多或少新的异质的成分⁵²。因此，笔者试图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语言：翻译中的词汇。

词语或名词在文学文本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最终无疑会与意识形态和诗学相联系。这一点，林纾在其与魏易合译的《拊掌录》中的“‘耶稣圣节前一日之夕景’跋”（1907；1999：63）中认识到了：

畏庐曰：老人英产，力存先英轨范，无取外国之名词，以杂其思想。此语固甚洽余怀也。凡人惟有感念祖国之心，则举事始不忘其故。若漫无决择，见异思迁，此成何等人者，亦降人耳。吾中国百不入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辞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亦亡之矣。嗟夫！

作为译者的林纾出于“爱国”之心，力图保存祖国的文字；但恰恰是在翻译过程中，林纾自己在译文中创造了不少的“新名辞”。

译语文学或译者的诗学在语言上也有要求，如林纾的“雅”、“韵”。因此，

⁵² 因此，从效果上言，翻译永远是“异化”的。

在翻译中，林纾自觉或不自觉会陷于两难境地：完全用古文或文言来翻译域外小说是不可能的；一旦翻译，便会出现语言上的杂糅。林纾在“《〈古文辞类纂〉选本》序”（1918；1999：147）中说：

所苦英俊之士，为报馆文字所误，而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新名词何尝无出处？如“请愿”二字，出《汉书》；“顽固”二字，出《南史》；“进步”二字，出《陆象山文集》，其余有出处者尚多。惟刺目之字，一见之字里行间，便觉不韵。

如果说林纾在《拊掌录》中的跋语中，只是意识到翻译带来的新名词会引起译语社会的思想产生“杂质”；那么，张之洞等人 1903 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学务纲要”提出：“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世风”，“倪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转引自陈福康，1992：92），则从反面说明了翻译中的语言（词汇与语法）给译语和译语社会带来的影响之大⁵³。

因此，林纾及其合译者的翻译，无论林纾如何坚守“义法”，从语言层面看，虽然总体上采用的是“文言”，但在实际效果上，无疑是对当时译语的一种颠覆⁵⁴。

4.3.5 方法与效果：归化抑或异化？

韩南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004）中，将 1870 年代发表在《申报》及其它杂志上的译本与林纾的翻译实践加以比较，得出了林纾与魏易是“保存

⁵³ 要详尽而又历史地考察翻译中的词语问题，需要对当时社会中译语社会的语言规范以及新词作考古分析，这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与能力。

⁵⁴ 林纾后来在“《中华大字典》叙”（1914；1999：173—174）中说：

仆尝谓外国之字典，有括一事为一字者，犹电报中暗码，但摘一字，而包涵无尽之言，其下加以界说，审其界说，用字不烦，而无所不统。中国则一字但有一义，非联合之不能成文，故翻译西文，往往词费。由无一定之名词，故与西文左也。且近日由东文输入者，前清之诏敕，民国之命令，亦往往采用，旧学者读之，又瞠目不能解，索之字典，决不可得，则不能舍其旧而新是谋矣。今中华书局有大字典之宏著，又附以中、小两字典，其要义曰：“备事物之遗亡，求知识之增广。”伟哉言乎！夫曰字典若专为通人而设，则《说文》、《广雅》具在，可以勿须于此；所以能推而广之者，正欲使市井间，亦收其用。故本书合旧有者、新增者、输入者，下至俗字，亦匪所不括，俾稗贩之夫，亦得按部数画，向书而求，为益溥矣。然鄙意终须广集海内博雅君子，由政府设局，制新名词，择其醇雅可与外国之名词通者，加以界说，以惠学者。则后来译律、译史、译工艺、生植诸书，可以彼此不相齟齬，为益不更溥乎！虽然，中国文明方胎，即请以中华书局之字典为萌芽可也。

派，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保存原著的形式”的结论；这一结论，连韩南本人也意识到，“对于以文本省略与插入而见称的林纾来说，或许令人感到惊讶”（2004：143）。

韩南的断语确实“令人感到惊讶”，但同时却也告诉我们：考察翻译实践与翻译史，必须从历史的语境出发。因为，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晚清时期，如果从翻译的具体操作角度看，应该说，林纾及其合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确实保留了原本中的主要内容；但如果与后来——如1909年的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相比较，林纾及其合译者无疑属于“归化派”⁵⁵。而如果从翻译规范的视角看，如在译本中说明作者姓名或国籍、人名地名的翻译等，林纾及其合译者的翻译方法，则又是“异化”。

但问题并不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林纾及其合译者以“归化”的翻译方法，给当时（以及后来）的社会带来了语言、文学（或诗学）与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与变化：（1）给他所赖以翻译的“古文”注入了新的成分，创造了“文言”（翻译）小说的奇迹⁵⁶；（2）改变了时人的文学观念即诗学意识，向中国开启了域外文学的窗口；（3）通过翻译话语，引入并生产出新的意识形态。而尤其令他（甚或其合译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实践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启蒙话语的时候，也同时参与了对他所力图维护的晚清帝国的颠覆⁵⁷。

因此，翻译本身便是一种悖论：无论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方法，都会在译语社会中产生一种“异化”的效果。

⁵⁵ 这也说明，“归化”与否乃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问题。

⁵⁶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中对林纾翻译小说作了评价：“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转引自张俊才等，1983：223）

⁵⁷ Venuti（1997）也注意到了林纾的翻译在这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第五章 伪译：革命话语——《悲惨世界》的翻译

在晚清众多的翻译家中，如果说其代表人物为严复、林纾，想必无人会提出异议，1912年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第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可谓颇为恰当的一个总结。然而，如果说，清末翻译家中，苏曼殊可与严、林并列晚清译林之中，“也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翻译界的先知先觉”（柳无忌，1987：535—536），大家未必都能认同此一说法，但我们可以说，苏曼殊与陈独秀1903年翻译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的小说 *Les Misérables*（1862）的做法及意图等，在晚清却是具有代表性的。

在翻译研究领域，甚或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比较文学领域，有关苏曼殊的翻译研究，或者是对其翻译根本不提，或者主要集中在他的诗歌翻译上，而对其小说翻译则重视不够，即便是有，也是一笔带过（如郭延礼，1998：304—317；李岫、秦林芳，2001：52—57）。造成这一局面，自然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比如说，自1949年以来，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大陆“没有印行过曼殊的任何作品”（林辰，1983：148）；而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由于受到严复“信达雅”这一标准的影响，对苏曼殊的小说翻译，自然就不予重视了。

本章则采取与现有研究相反的做法，试图从不同的视角与方面，考察雨果 *Les Misérables* 第一个中译本的翻译，作一较为详尽的个案研究，希冀以此解决近百年来这一研究课题中存在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包括：（1）《惨世界》的性质：究竟是翻译、创作，抑或二者兼而有之？（2）如果是翻译，那么译者又是谁？（3）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原本是什么？或者说，译者究竟掌握或懂哪些外语？（4）翻译过程中是否存在“删改”与“增加”？如果有，属于何种性质？翻译主体这样做的动机与意图是什么？

5.1 副文本描述

5.1.1 版本：有没有正版¹？

1903年10月8日上海《国民日报》²第63号开始连载《惨社会》，署“法国大文豪器俄著，中国苏子谷译”，至同年12月1日第115号³止，后因该报馆被封而停刊；据笔者查阅该报，正如有论者所特别指出的，《惨社会》当时是与该报另一小说《南渡演义录》依次隔日连载的（陈万雄，1979：10），而非有论者所说的“逐日连载”（邹振环，1996：173）。但是，《惨社会》尚未刊载完毕，只载到第十一回的一半左右（柳亚子，1927）。此即十一回本。

1904年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苏子谷、陈由己同译”；全书也由十一回的未完本，变成了十四回本。对此，陈独秀1926年9月6日在接受柳亚子的采访时，作了如下的回答（柳亚子，1927：282—283）：

《惨世界》是曼殊译的，取材于器俄的《哀史》，而加以穿插，我曾经润饰过一下。曼殊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我的润饰，更是妈虎到一塌糊涂。此书初在《国民日报》登载，没有登完，报馆就被封闭了。当时有甘肃同志陈竞全在办镜今书局，就对我讲：“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我答应了他，于是《惨世界》就在镜今书局出版。并且因为我在原书上曾经润饰过一下，所以陈君又添上了我的名字，作为两人同译了。

需要指出的是，柳亚子在《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的“苏曼殊作品提要”中认为（1927：125），1904年十四回本由上海镜今书局出版，并在同书的“苏曼殊作品索引”中持同样观点（1927：152），但据柳亚子《苏曼殊研究》（1987）中的“苏曼殊作品表”（1987：63），以及“重订苏曼殊作品索引”⁵（1987：66），

¹ 在介绍有关版本情况之前，有必要对有关人名、作品名作一说明：法国作家Victor Hugo（1802—1885）今通译为“维克多·雨果”，简称雨果，在晚清则译为“器俄”，其长篇小说*Les Misérables*则有多个译名，与本研究有关的有：（1）《惨社会》；（2）《惨世界》；（3）《哀史》。苏曼殊（1884—1918），字子谷。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由己。

² 一些论者误为《国民日报》，如陈玉刚（1989：78）、袁荻涌（2003：86）。

³ 一说12月3日第117号，见邹振环（1996：173）。

⁴ 可能由于不易或无法找到《惨世界》（1904）这一版本，就笔者所见，所有的论者均未说明《惨世界》究竟是在1904年的哪一月份出版，尽管这一月份对相关的考证分析相当重要。

⁵ 文末署“一九二六年初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重行写定之”。

出版社乃是“上海东大陆书局出版单行本，改名《惨世界》”⁶；持此看法的还有阿英《晚清小说史》（1996：215）⁷，因袭此说的论者则有陈思和（1997：90）。

由此亦可见，无论如何，余协斌在“雨果在中国：译介、研究及其他——纪念世界文化名人雨果诞辰200周年”（2002：66—67）中的下列说法是不成立的：“1907年，《悲惨世界》的第一个单行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书名为《孤星泪》。”

到了苏曼殊去世三年之后的1921年，苏曼殊的另一位好友胡寄尘又将镜今书局本交给上海泰东书局翻印，再改书名为《悲惨世界》，并删去了器俄和陈由己的名字，改署“苏曼殊大师遗著”，但也有论者说是“苏曼殊大师遗集”（陈万雄，1979：10）；至于内容方面，杨鸿烈在《苏曼殊传》（1928⁸：135）中称：

据钱玄同先生告诉我的话，……最初书名只是《惨世界》，后来经胡怀琛先生加上一个“悲”字，并把独秀先生的名字删去，由泰东书局出版，但译文的本来面目，胡先生曾向钱先生写信声明一字未改。

文公直在《曼殊大师传》（1934：25）中亦采此说：“…但内容则经钱玄同证明，一字未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一字未易”，乃是与十四回本《惨世界》比较而言。

以上简略介绍了雨果*Les Misérables*第一个中文译本最初的三个版本的情况：前后就有三个不同的书名和三个不同的署名。而现在流行或流通的版本，主要依据的则是1921年泰东版，偶尔也有根据十一回本校订的，如马以君（1991），但由于如今无法搜罗齐当年刊载《惨社会》的《国民日报》，且该报也只残存74号（陈万雄，1979：10），马以君（1991）因此只能依据十一回本“校勘前三回”（1991：671），而据陈万雄（1979：10）说，实际上只有“两回多”⁹。

⁶ 据樽本照雄（2002：58；实际上亦据阿英的说法），1904年，东大陆图书译印局亦出版《惨世界》14回本单行本，未提供具体的出版月份。

⁷ 但据阿英（1996：221）“跋”中推算，阿英（1996）一书初版当是在1935年左右，显然晚于柳无忌（1927），甚至，我们可以推测，阿英（1996：215）的说法或许就是根据柳无忌（1927：152）而来的。

⁸ 文末署“一九二三，十一，二十一”。

⁹ 这里也同时指出，本章在以后的分析中，所使用的《惨世界》版本为汪树东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苏曼殊作品精选》（苏曼殊，2003），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与其他版本参照；同时在参照法语原本相关段落的基础上，采用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的《悲惨世界》（雨果，1992）这一“堪称至今最完备的《悲惨世界》中译本”（邹振环，1996：176）作为对照本。

5.1.2 原文：法语，英语，还是日语？

在对译本的最初版本作了以上的基本介绍之后，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译者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本究竟是什么？是雨果的法文原著 *Les Misérables*，英语译本 *Les Misérables*，还是日语译本，抑或其它语种的译本？

按照当时¹⁰的翻译规范，译者常在译本中不注明原文作者或所依据的原作版本情况，当时的读者（更别说后来的研究者）因而无法确切知道译者究竟是从原著直接翻译，还是从其它语种的译本转译过来的。《惨社会》（或《惨世界》）就是如此。

没有文献有根据地直接指明《惨社会》所依据的原本是什么，但从笔者目前查阅的文献看，就苏曼殊（甚或包括陈独秀）究竟“懂”多少种语言的问题，迄今有多种“说法”或“猜测”。

（1）从法文原著翻译：杨鸿烈（1928：135）指出，“曼殊译的小说就是《悲惨世界》，据钱玄同先生告诉我的话，这本书是曼殊和陈独秀先生合译法文雨果（或称器俄）的原著”，看来认为所依据的是雨果的法文原著了，但其可信度较低，因为只是“据钱玄同先生告诉我的话”，并没有其他的根据。而陈独秀在回答柳亚子的问题时，说“《惨世界》是曼殊译的，取材于器俄的《哀史》，……。曼殊此书的译笔，……，对原著很不忠实”（柳亚子，1927：282），似乎也没有特别指出或强调翻译所依照的原本是什么，尽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从法文原著翻译。

柳亚子在“苏曼殊之我观”一文中指出，“苏曼殊不愧是一个天才，梵文英文法文都懂”（1927：78）；“曼殊精通梵文和英文法文”（1927：84），但从其“他的翻译文学，要分三层来讲”¹¹（1927：84）以及“关于法文，他曾拟译小仲马的《茶花女》，但没有译成。译成的只有《惨世界》一书”（1927：88）看，似乎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柳亚子是根据所译的译本来反向“推导”出苏曼殊“精通”法文的。

通过这种反向推导而得出结论的不止一人，如《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1989：76）中说：“苏曼殊是近代文学史上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他精

¹⁰ 1903年，或者说晚清。

¹¹ 柳亚子这里所说的“三层”是指梵文、英文、法文。

通日文、英文、法文和梵文”¹²。

(2) 从日语译本转译：邹振环在“名著名译：《悲惨世界》的中译本”中指出，“雨果的作品大批被译成中文，且大多通过日文转译，这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出现的‘雨果热’有密切的关系。”（1996：172—173）；“苏曼殊与陈独秀都是在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日本翻译家的雨果译作，以强烈的色彩如实地把资本主义创始期的罪恶展示在中国留学生面前。他们敏锐地意识到，雨果这些感伤而又愤激的作品，一定会大受中国读者的喜爱。……苏曼殊……选译的第一部书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1996：173）不难看出，邹振环虽没有明确指出，但却在暗示说苏曼殊是从日文译本转译的。

(3) 从英语译本转译：刘树森在“论中国近代外国小说翻译的叙事语态特征”（1997：57）中说：“《惨世界》即法国小说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最早的中译本，中译者依其英译本译出。”然而，论者并未考证出译者究竟是依据哪一种英译本翻译的，也未说明其论断的依据所在¹³。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一个论者在不同时期作出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判断：柳无忌在“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苏曼殊文集》序”中称（1991：17—18），“曼殊未习德文，但通法文，曾翻译法[国]文豪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推断，柳无忌认为苏曼殊所依据的原本是法文版，而柳无忌（1972；1992：27—28）则指出，“这个中译本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拼凑起来的。第一部分，是雨果原著第一部《芳汀》中第二卷《沉沦》的自由翻译，考虑到苏曼殊当时的语言知识，大概是从英文或日文翻译的。”

苏华（1994：116）说：“陈独秀与苏曼殊的《惨世界》则是根据法文原著译出”；而苏华（1997：63）则指出：“从日文转译法国小说，较有影响的还有苏曼殊翻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

根据苏曼殊（以及陈独秀）的背景¹⁴情况，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从日译本或英译本转译的。那么，苏曼殊的日语与英语水平如何呢？

¹² 陈玉刚（1989）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说明苏曼殊“精通日文、英文、法文和梵文”，可能只是因为苏曼殊的“母亲是日本人”（76），并且“先后翻译出版过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拜伦诗选》以及彭斯、雪莱、歌德、陀露哆等人的作品”（77），有《梵文典》。

¹³ 笔者就此断语有何根据专门向刘树森请教，亦未得到确切的证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考证”并不是刘树森（1997）的目标或任务。

¹⁴ 据“苏曼殊年谱简谱”（苏曼殊，2003），苏曼殊1884年9月在日本横滨出生后，于1889年返回广东，1891年开始一直在村塾就读，直到1896年3月到上海与父母同住，并“从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学习英文”（379），直至1898年春，苏曼殊东渡日本横滨，入“华侨创办的大同学校乙级班习中文”（380）。

据柳亚子（1991：10）的介绍，1908 年秋¹⁵，苏曼殊返回日本与河合氏见面时，陈国权是“日语传译者”；对于苏曼殊的日语程度，柳亚子有一个说明（柳亚子，1991：21 注 22）：

一般以为苏曼殊精通日文，我曾以此点请罗孝明质疑于陈国权，答复如下：“曼殊之日语，若是简单的话，尚可勉强对付，但遇着曲折性之谈话，则颇有辞不达意之处。……曼殊在大同向习中、英文，故对于日文恐怕连平假名及片假名（日本字母）亦不甚了了。”罗孝明亦同意陈国权说法（1966 年 10 月 24 日信）。

1903 年，苏曼殊从日本回来后，先是在苏州吴中公学担任英文教员，后在上海《国民日日报》任英文翻译（马以君，1991：27）。

笔者根据以上两点可以推断，苏曼殊（与陈独秀）合译的《惨世界》当是据英译本翻译的¹⁶。

5.1.3 译者，还是作者？

从目前文献看，大多数论者倾向于认为，《惨世界》（甚至《惨社会》）是译文。那么，谁是这一译本的译者？从前述的版本情况介绍看，存在两种情况。

其一，译者为苏曼殊。这一点从《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刊载时的署名，以及《悲惨世界》出版时的署名，可以证明。

其二，译者为苏曼殊与陈独秀。这一点则可以《惨世界》的署名为依据，尽管这一“同译”的署名出于“出版社”（或陈竞全）之手，并似乎未获苏曼殊的同意：我们现在无法考证其具体经过，“惟一”较为“权威”的证据似乎就是 1926 年 9 月 6 日柳亚子对陈独秀的采访。但距当时已有 20 多年，记忆中的细节是否准确，以及是否真的如裴效维（1986：172）所说：“陈独秀既是当事人，他当然最了解情况，况且他也没有谦虚的必要，因此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¹⁵ 大多文献，包括年谱等，均认为是“1907 年”；“1908 年秋”这一说法乃是据陈国权给罗孝明的信（参见柳亚子，1991：21 注 21）。

¹⁶ 还有一点也可以支持苏曼殊（与陈独秀）是依据英译本翻译的：《惨世界》第九回中，男德住在“非弱士”村的店里，店主人说“有一个叫做《难兴乃尔报》”（苏曼殊，2003：148），这个报纸的中文名称“难兴乃尔”其实是根据英文“National”音译而来；当然，也有可能是根据法语“Nationale”音译的，但笔者觉得更接近英语的发音。此外，尚需指出的是，由于相关内容属于苏、陈“增加”的部分，我们也不妨推断，“难兴乃尔”所依据的不过是《国民日日报》的英文名称 *The China National Gazette* 而已；但这一点与“难兴乃尔”近似 National 的英语发音并不冲突。

从目前的文献看来，能够支持苏曼殊、陈独秀“同译”说的最大证据，在于《惨世界》比《惨社会》多出了三回多。据柳亚子（1927）的看法，《惨社会》在《国民日报》只刊载到第十一回的上半回，报馆便被封关闭，虽然在刊载结束的具体日期上有不同说法：大多数论者认为自1903年10月8日在《国民日报》开始连载，至同年12月1日（如柳亚子、柳无忌，1927），而另一说则认为至12月3日（邹振环，1996：173）。而《惨世界》这一所谓的“足本”则有14回。

前后相差的三回多究竟出自谁之手？

柳亚子在“《惨社会》与《惨世界》”（1927；1987：378—383）一文中，指出二者“发生了许多不同之点”（1987：378—388），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甚紧要的”“几处”，如开场之不同——《惨社会》：“却说一日天色将晚，四望无涯”；《惨世界》：“话说西历一千八百十五年十月初旬，一日天色将晚，四望无涯”；另如由于书名从《惨社会》改为《惨世界》，正文中有关社会的可惨或可惨的社会的叙述时，亦作了相应的文字改动。

（2）“可以发生疑问的”“几处”，主要人物的名字发生了改变——《惨世界》中的“金华贱”与“孟主教”，在《惨社会》中只是“华贱”与“和尚”，而且后者也不是“主教”，此乃二者“最大不同之点”。而尤其可疑者，在回目的标题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如：

《惨社会》：

第五回 贫和尚慷慨留客 苦华贱委婉陈情

第六回 宝姑娘多情待客 富和尚假意怜人

《惨世界》：

第五回 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华贱委婉陈情

第六回 孟主教多财贾祸 宝姑娘实意怜人

柳亚子据此差异¹⁷认为，二者的结局“一定不同”，并根据文本内容的分析，认为“照此看来，现在《惨世界》的结局，实在和它在第五回内的描写，十二

¹⁷ 《惨世界》中很好的孟主教，在《惨社会》中却是“一个很坏”的“贫和尚”。

分矛盾。并且回目也是后来硬改的，显然在译《惨社会》时原来的用意，不预备把贪和尚写作好人的了。”（柳亚子，1987：380—381）

之所以出现与雨果原著中“主教”相反的形象，之所以“翻案”，照柳亚子的“猜想”，是“曼殊和霭俄在思想上根本的不同”（柳亚子，1987：381）；但《惨世界》何以推翻《惨社会》的理想而回到“霭俄原书的老路上去呢？”

柳亚子对此的解释是“中国报馆的习惯”：“长篇小说总是临时陆续做的，决不会预先有完全的稿子存在着”，而“据仲甫所讲，似乎报馆被封以后，曼殊不久即离开上海，那末此书下半部的续成，恐怕未必是曼殊自己的手笔吧”，因此，柳亚子“以为曼殊原稿，只到十一回的上半回为止，而十一回的下半回，以及十二回至十四回，都是仲甫所续成的。如此，则想推翻霭俄原书结局，把孟主教改做贪和尚的是曼殊；而推翻曼殊的翻案，依照霭俄的本意，把贪和尚恢复到孟主教原来地位的是仲甫。”这样一来，“《惨世界》和《惨社会》种种的不同，依此便可以证明统统是出于仲甫之手”（1987：382），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的《惨社会》是曼殊的原著，完全的《惨世界》却是仲甫所续成并修改的了”（1987：383）。

陈万雄（1979）认为“陈独秀对于该译作，关系之密，似远过于此”（11），并根据有关资料，得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陈独秀之于《惨世界》的翻译，不仅是字眼上的修饰，以及出单行本时续完了后三回，而是参与过情节寓意的安排，以至有相当部分乃出自陈氏手笔。”（13）同时，他也指出，“由于无从获知苏、陈二人究竟各译了多少，那些文字出自谁手，但至少，如章士钊说，乃两人‘共译’是接近事实的”（同上）。

章士钊在“与柳无忌论曼殊著作函”（1927）中指出苏曼殊在翻译雨果《悲惨世界》时的汉语水平：“柳君足下：曼殊真近代之异人也。自识字以至卓然成家，不过经二三年。始在沪与钊共笔墨时，学译霭俄小说，殊不成句。且作字点划，八九乖错，程度犹远在八指头陀（此亦异人之一，乃未学诗而能诗者也。）之下。……”（章士钊，1927：16）而从苏曼殊后来创作小说所使用的语言为“文言”来看，章士钊的判断是正确的，并非如游友基（2002：4）所说：“苏曼殊在改写译作《惨世界》时用了当时的白话语言，……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人语言，都用纯粹的白话。在1903年，白话已被苏曼殊加以应用，实在难能可贵，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章士钊曾经发表过题为《双秤记》的小说（1914），这是一篇“身历耳闻”，记叙上海时代，他的亡友何梅士事迹的作品。小说中曾经说及他与陈独秀主编《国民日报》之事，并说某深夜，章士钊轮值校阅稿件，而“独秀就旁移译器俄小说。”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时，不仅与陈独秀、苏曼殊过从最密，而且同居一室。而且，章士钊《双秤记》写于1907年到英国前（据同杂志《双秤记》陈独秀序；参见陈万雄，1979），时间上距1903年只有三四年，误记的可能性较小。再则，《双秤记》在《甲寅》杂志发表时，陈独秀与苏曼殊分别写了序，小说也曾过目；若“独秀就旁移译器俄小说”并非属实，他们两人，尤其是陈独秀，会加以更正。而两人默认，可见陈独秀之从事过《惨社会》的翻译确有其事。还有，这里所说的“移译”与修饰，性质是很不相同的。还有一条更具体的证据。章士钊晚年曾有一段回忆，描述了陈独秀因《惨社会》而惹起一段不小的风波（《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221，中华书局，1961；转引自陈万雄，1979：12）：

朱菱溪，湖南时务学堂头班生，镇算人，为人鲁莽灭裂，要挟同学，使派己充任代表，回上海组织民权社，经营出版事业。迷于狎邪，所事不终。陈独秀在《惨社会》中露骨攻之，菱溪大怒，必阻击独秀然复快。时独秀与吾同居，经调停始无事。

查看《惨世界》，确有这样的文字，见第八回，出自男德之口（苏曼殊，2003：139）：

尚海那个地方，曾有许多出名的爱国志士。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其实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什么书局，什么报馆，口里说的是借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哎，这种口是心非的爱国志士，实在比顽固人的罪恶还要大几万倍。

而这正属于《惨世界》中“增加”的部分。

此外，章士钊还说过，陈独秀“时与香山苏子谷共译器俄小说，注写人类困顿流离诸状，颜曰《惨社会》，所怀政想，盖与此同。”（孤桐，1926；；转引

自陈万雄，1979：12）

以上章士钊分别在1907、1926、1960年三次回忆及陈独秀翻译《惨社会》的事，而且每次说及时，内容又有点不同，“这是确有其事，无可置疑的了”（陈万雄，1979：13）。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是苏曼殊、陈独秀“共译”，何以在《国民日报》上发表时署名只有苏曼殊一人呢？对此问题，陈万雄的解释是（1979：13）：

我们不妨作个假设，在《国民日报》发表时，最初确由苏曼殊执笔。后来因苏氏应付不来，或陈氏要借此舒发言论，例如以上攻击朱菱溪一事，或其他等等理由，使陈氏后来也加入翻译该小说。因署名早就定了曼殊，无改动的必要。即使二人合译，而署一人名字，也非不可理解的。鲁迅早年译著，不少即署他人名字发表，这是大家共知的事实。……这种情形，正如同属晚清革命党人的沈颺民所说，这是‘当时风尚’，……因为在那时的革命党人来说，办报写文章，是为了革命，非图虚名，文章署名与否，谁人署名，不必介意。何况这样做法，也有点奖掖后起之用意呢。

认同陈万雄（1979）观点的有杨天石题为“苏、陈译本《惨世界》与近代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1995）的文章，杨天石认为：“苏、陈二人的《惨世界》并不是严格的翻译，而是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结合体。”（杨天石，1995：27）

钟扬在“从《惨世界》到《黑天国》——论陈独秀的小说创作”一文（1996）中，似乎比陈万雄走得更远，认为，“陈独秀在《惨世界》的译作中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若作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所谓‘苏子谷’可能只是个名义，而实际上是陈独秀在越俎代庖。”（钟扬，1996：57）惜论者未就此作进一步的论述与论证。

与此相反，裴效维在“苏曼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6）中就“苏曼殊研究中的”四个问题展开论述，而其中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惨世界》是否翻译小说的问题”。

裴效维首先否定了《惨世界》乃苏曼殊、陈独秀“合译”的说法，不承认柳亚子关于后三回半为陈独秀“续成”的观点（裴效维，1986：173—174）¹⁸：

¹⁸ 为了避免产生“断章取义”之嫌，同时也为了使读者对论者的论述逻辑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笔者在这里对裴效维做了较为完整的摘引。

我认为，柳亚子先生关于陈独秀对苏曼殊原作做过“修改”的说法，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因为它论据有力，且与陈独秀的说法完全相符。而关于《惨世界》后三回半书为陈独秀所“续成”的说法，则不一定可靠。因为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它还应该有另一种可能性，即苏曼殊的原稿也许比《国民日报》所登十一回半要多，甚至也许本来就已经写到了十四回；况且这后一种可能性与前述陈独秀的说法完全相符，因而这后一种可能性恐怕比柳亚子所说的那种可能性更接近事实。大概连柳亚子本人也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只用“猜想”、“推想”、“我想”、“商榷”之类的措词。而且当他编辑《苏曼殊全集》时，既把《惨世界》全书收了进去，又没有注明此书是苏、陈“合译”的字样，这说明他已经否定了他的上述看法。退一步说，即使有谁能拿出证据证明柳亚子的上述看法，“合译”说也还是不能成立，《惨世界》依然应该算作苏曼殊的作品；因为这正如高兰墅续写过《红楼梦》，金圣叹修改过《水浒传》，而它们仍然分别是曹雪芹和施耐庵的作品一样。

并进一步否定《惨世界》为“翻译”作品（裴效维，1986：174—175）：

“合译”说虽然不能成立，那么把《惨世界》看作苏曼殊的翻译小说是否可以呢？答案也只能是否定的。早在1923年，杨鸿烈就指出，《惨世界》是由“两部无甚连络的小说合并成的：第一部包括第一回至第六回和最末的第十四回，中间插入第七回至第十三回算是另外一部小说”，并“推想”这“另外一部小说”中，“增加改变原文的地方，一定不在少数”。到了1926年，陈独秀又指出，《惨世界》是“取材于俄国《哀史》（按即《悲惨世界》），而加以穿插”，并且“乱添乱造，对原著者很不忠实”。同年，赵景深更认为，《惨世界》“是曼殊的一本古怪的东西，前面一小半大约是根据法国俄国《哀史》改变的，后半似乎是创作了”。我认为他们的看法基本上正确，尤其是赵景深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只是还不够十分准确和具体。实际情况是这样：此书的第一回至第七回的前半回，以及第十三回的后半回和第十四回，是苏曼殊取材于法国雨果《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二卷《沉沦》并加以改编的；而第七回的后半回至第十三回的前半回，则完全出于苏曼殊的创作。这就是说，从回数来看，改编的占八回书，而创作的占六回书；而从篇幅来看，则改编只占三分之一，创作却占三分之二。

但是，必须指出，裴效维（1986）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研究动机似乎不够“纯”：首先他指出，“《惨世界》是苏曼殊从事文学工作最早的成果之一，是他在小说方面的处女作，它本来至少是研究苏曼殊早期思想最有价值的资料”，然而，由于论者“断定此书是苏曼殊的翻译小说，甚至认为是苏曼殊‘与陈独秀合译’的小说”而“不多评论”（裴效维，1986：171）；而他之所以觉得有讨论的必要并不厌其烦地加以讨论（裴效维，1986：177—178），

是因为它对于苏曼殊的评价极为重要。比如过去大家一致认为苏曼殊写作小说的时间始于1912年，认为苏曼殊只写过言情小说，甚至有人据此把苏曼殊归入鸳鸯蝴蝶派，就是在不承认《惨世界》为苏曼殊的创作小说的前提下得出的。如今我们恢复了《惨世界》是苏曼殊的创作小说的本来事实，便不仅证明了苏曼殊开始写小说的时间为1903年，而且证明了苏曼殊写过革命小说，从而使上述传统的看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就与研究者一般应该坚持的客观立场相违背了。(2) 论述过程中不够客观，主观臆断的成分较多，如上引论断：“即苏曼殊的原稿也许比《国民日报》所登十一回半要多，甚至也许本来就已经写到了十四回”；(3) 论述过程中，无视历史事实，如上引“而且当他[按即柳亚子]编辑《苏曼殊全集》时，既把《惨世界》全书收了进去，又没有注明此书是苏、陈‘合译’的字样，这说明他已经否定了他的上述看法。”从这一引文便可以看出，论者根本无视当时在译本或译文上署名混乱这一客观现象。这样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自然令人怀疑了。

同意裴效维(1986)结论的，则有程文超(1999: 110脚注)。

笔者认为，《惨世界》为苏曼殊与陈独秀“合译”(同译)，之所以认为是“翻译”，而不是创作，除了上述有关论据之外，还有一个从未为人所注意的“证据”，那就是《惨世界》这一文本中到处显示出来的“翻译”的“视角”，时刻没有忘记告诉读者：“你看的是翻译小说”。下面所举的例子，均从“增加”的章节中选出：

(1) “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苏曼殊，2003: 136—137；强调为本文所加)

(2) 华贱便开口问道：“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呢？你的名字叫什么？”
那人答道：“我姓明，名字就叫做男德，**巴黎**人士。……”(苏曼殊，2003: 142；强调为本文所加)

(3) 这时，男德才知正是自己心里所惦记的美人，急忙亲亲热热地用手一把搂住那美人的腰，连亲了几个嘴（这是**西俗**，看官别要见疑），……。
(苏曼殊，2003: 155；强调为本文所加)

(4) 那女子又道：“我从前也曾听人讲过，**东方亚洲**有个地方，叫做支那

的。……”（苏曼殊，2003：157—158；强调为本文所加）

笔者虽然认为《惨世界》是苏曼殊与陈独秀的“合译”，即《惨世界》是“翻译”，而不是“创作”，但这里的翻译乃是广义上的翻译，包括“伪译”。这一点，无论是从篇幅上，还是从意图上看，译者的焦点不是译自雨果《悲惨世界》的那一部分，而是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添”的那一部分，即实际上是“创作”（虚构）却以“译本”的名义出现的部分。换言之，笔者认为《惨世界》基本上是 Toury（1995）所称的“伪译”。

5.1.4 苏、陈在《惨世界》中的翻译分工

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对于苏曼殊与陈独秀在《惨世界》这一文本中的具体分工，存在几种完全不同的看法：（1）《惨世界》是苏曼殊创作的小说，如裴效维（1986）；（2）《惨世界》实际上是陈独秀的翻译甚或创作，如钟扬（1996）；（3）游离于这两个极端观点之间的“折中”意见。

即便是“折中”派，在苏、陈二人的具体分工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前所述，柳亚子认为十四回本的后三回是陈独秀续成的；但也有论者认为（陈万雄，1979：13）：

陈独秀之于《惨世界》的翻译，不就是字眼上的修饰，以及出单行本时续完了后三回，而是参与过情节寓意的安排，以至有相当部分乃出自陈氏手笔。

尽管论者坦承“由于无从获知苏、陈二人究竟各译了多少，那些文字出自谁手”，但马以君还是在此基础上，对苏、陈的分工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马以君，1991：671）：

在翻译过程中，他〔苏曼殊〕得到陈仲甫（独秀）的指导和润饰，使毛病有所减少。到了10月底，曼殊离开上海赴长沙参与华兴会的创建工作。离上海时，这篇小说大致载至第七回。在第八回中，陈仲甫将湖南时务学堂头班生朱菱溪“迷于狎邪”的事写了进去，并一直延续至第十一回前半回即报馆被封止。1904年，镜今书局拟出版单行本，陈仲甫又增添了最后三回多……。

从论者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论者认为陈独秀实际上完成了第八回至第十四回的工作¹⁹。

那么事实如何呢？文本细读与分析或许会提供一些证据。

在属于“翻译”部分的第五回中，有两处说到“金华贱”身上带有多少钱，第一处是金华贱敲开主教的门后，首先作了自我介绍，其中说（苏曼殊，2003：126）：

我身上还带了一百零九个银角子和十五个铜角子。

第二处是金华贱与主教说到是否要付饭钱的时候（苏曼殊，2003：128）：

孟主教果然忙答道：“不然，不然，一定要算饭钱的。你共有多少钱呢？你曾说你有一百零九个银角子。”

华贱道：“还有十五个铜角子。”

可以看出，由于这两处都是在同一回内，而且均属于“翻译”性质，前后是一致的，并无矛盾。然而，到了第十三回，在“伪译”结束后，再次回到“翻译”的时候，叙述中出现了如下的内容（苏曼殊，2003：184—185）：

不料随后还有许多危难。当其在监中做工所得工价，除去用度，还应存百零九个银角子和九个铜角子。不料时运不济，尽被强人抢劫去了，一些儿也不曾留下。出监的次日，……。

一日，华贱打算去潘大利地方，……工头只给他十五个铜角子，……。

次日，便起身步行过太尼城，受了许多磨折，方才寻到孟主教家里，住宿一夜。这些情形，前已说过，不必再表。

从这一引文可以看出，金华贱到达孟主教家里时，身上只剩下了“十五个铜角子”，因为此前身上所有的“百零九个银角子和九个铜角子”“尽被强人抢劫去了，一些儿也不曾留下”。这样一来，在以上三处中，前两处与后一处便存在矛盾之处。

¹⁹ 但马以君在这里似乎没有注意到“插入”部分实际上是从第七回中间开始的。

更为值得注意的，紧接上引段落的，是《惨世界》的叙述再次回到了第七回开头。请看二者之间的呼应关系。第七回的开头段落是（苏曼殊，2003：132）：

话说孟主教一家主客，都悄悄睡去，没有了人声。这事随后再表。

而在第十三回上引段落“次日……不必再表。”之后，则是（苏曼殊，2003：185）：

且说这夜华贱住在孟主教家里，到了钟鸣二下，华贱忽然从梦中惊醒，侧耳静听，孟主教全家都已沉沉鼾睡去了。

之所以要注意这种呼应，乃是提请大家注意，在第七回与第十三回之间的“伪译”前后，出现了这种（数字）细节上的矛盾。如果是《惨社会》中存在这种细节矛盾，那我们可以将其原因解释为“中国报馆的习惯”，即“长篇小说总是临时陆续做的，决不会预先有完全的稿子存在着”（柳亚子，1987：382），更可能的，是如柳亚子所言，“恐怕未必是曼殊自己的手笔”（同上）。但与柳亚子“以为曼殊原稿，只到十一回的上半回为止，而十一回的下半回，以及十二回至十四回，都是仲甫所续成的。”（同上）这一观点不同的是，如果仅仅从上述的文本“断裂”来看，完全出自陈独秀之手笔的则可能是从第十三回中“伪译”结束之后到第十四回。但是，在《惨世界》的第十四回结尾，套用中国传统模式作结的诗却又具有浓厚的佛教韵味（苏曼殊，2003：191）：

尧桀原同尽，坦戚有攸关。
我心造三界，别无祸福门。

虽然说，苏曼殊在翻译以及在离开上海的时候，尚未出家信佛。但是，在近代思想家中，不涉佛学的甚少，陈独秀却是少数中的一个。此即说，结尾的诗中亦有苏曼殊的手笔在。目前尚无更为全面、更详细的文献证据，足以说明苏曼殊与陈独秀在《惨世界》的“翻译”过程中的分工²⁰；由此看来，《惨世界》只能是他们二人的“合译”或“合作”了。

²⁰ 但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确两点：第一，陈独秀参与了《惨社会》这一文本的生成过程；第二，根据《惨社会》与《惨世界》在文字上的不同，陈独秀（甚至还有出版社的编辑）参与了对《惨社会》的“修改”。

5.2 翻译分析

从翻译的角度看，《惨世界》这一文本存在一个悖论：整个文本的三分之二的篇幅是“伪译”，“译者”苏曼殊、陈独秀的主体性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而在“伪译”中却又采取“翻译”视角，处处不忘提醒文本的读者他们阅读的是“译本”，此即体现出译者试图掩盖自己的“显形”，尽量做到译者的“隐形”²¹。苏曼殊与陈独秀恰恰是在这“隐形”之中实施了“显形”。

正如前述，《惨世界》实际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真正的）“翻译”部分与“伪译”部分，其中“伪译”则是“插入”在“翻译”之中。这里主要对“翻译”部分进行文本分析。

就《惨世界》的翻译部分而言，译者的作法并没有超出当时的翻译规范，即在翻译过程中同样存在删节、增改等现象。

5.2.1 “翻译”中的删改

关于《惨世界》这一文本中的“删节”与“增添”²²现象，有关论者的论述中出现了诸多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表述，这里一并指出，并加以说明。

柳无忌在其《苏曼殊传》（1972；1992）中说及《惨世界》时指出（1992：27—28）：

这个中译本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拼凑起来的。第一部分，是雨果原著第一部《芳汀》中第二卷《沉沦》的自由翻译，考虑到苏曼殊当时的语言知识，大概是从英文或日文翻译的。第二部分，是篇幅相近的新颖的故事，纯粹是曼殊的创作，和这部法国小说几乎没有类似之处或任何关系。

该书译者还就此作了不必要的译注：“《惨世界》一书，可说是由两部没有什么联系的小说组成的。第一部包括第一回至第六回和最后的第十四回；第二部包括第七回至第十三回。”（柳无忌，1992：28 脚注 1）但事实是，“第二部分”并非“和这部法国小说几乎没有类似之处或任何关系”，而是存在着多重关系：（1）

²¹ 即英文的“visibility”与“invisibility”。

²² 论者一般使用的“增饰”，主要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本的增加与修饰，但“增饰”在这里根本无法反映实际情况。

且不说“伪译”部分与《惨世界》中“翻译”部分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互文”关系²³，至少“伪译”部分也采取了“翻译”的视角；（2）在形式上则是“翻译”与“伪译”二者共同构成《惨世界》这部文本的整体。此外，从本章后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这“两个部分”也并非“篇幅相近”。

杨天石（1995：27）认为：

苏、陈二人的《惨世界》并不是严格的翻译，而是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结合体。其翻译部分采自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卷《沉沦》的第一到第十三节。其第一至第六回，大体忠实于原文，但有改变，有增加，有删节。

而事实上，《惨世界》将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卷《沉沦》中的第七节《失望的内容》、第八节《波涛和亡魂》全部删去不译。

游友基（2001：47）也认为：“苏曼殊与陈独秀合作的半是译作、半是创作的《惨世界》前七回尚能基本遵从雨果《悲惨世界》的思路予以译述，后七回则完全凭空虚构”²⁴。

袁荻涌（2003：86）认为，

这部译著并非严格意义的翻译作品，其特点是兼译兼作。全书前4回和第14回同雨果原著相去不远，译文较完整地叙述了原著第2卷“沉沦”的故事情节，即小偷金华贱（今译冉阿让）到孟主教（米里哀主教）家投宿之事。但从第8回开始，苏曼殊便脱离原著，杜撰情节，编了一段关于明男德奔走革命的故事。

但事实上不是从第八回开始，而是从第七回的后半回开始。

唐月琴（2003：181）指出，“这是一篇翻译与创作兼而有之的作品，书名《惨世界》，其中翻译占六回，创作占八回”，而事实恰巧相反，是翻译占八回，“创作”占六回，尽管每回的篇幅长短不一。

所以有这样的偏差，主要原因在于一些论者根本没有核对中文全译本与“苏曼殊”的译本²⁵。

²³ “伪译”，因而与雨果的原著存在“互文”关系。

²⁴ 其实不然，具体细节见后面的分析。

²⁵ 如《悲惨世界》（雨果，1992）与《惨世界》（1904）；当然，由于论者自身的条件限制，也就无法将有关译本与（法语）原本或其它语种的译本（如英译本）加以对照。

陈万雄对苏、陈在翻译过程中所作的删节，有过这样的归纳：“整体地说，苏曼殊所译是意译，且删削甚多，尤其关于说及法国的历史社会背景，或对环境事物的刻划时，时加大幅删削。”（陈万雄，1979：13）但如果仔细对照《惨世界》与《悲惨世界》（以及相应的法语原本²⁶），就会发现，其实苏、陈二人翻译中删节的远不止此。

对照两种文本后，我们发现《惨世界》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删节：（1）人物²⁷外貌的描绘或内心的刻划，前者的例子，如在第一章第一段中对“冉阿让”（金华贱）的外貌描绘，第一章中冉阿让敲门想在那家住宿一夜时，对那家男主人的外表描绘；后者的例子，如《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二卷第七章“自己组织法庭”“审问自己”等内心活动与“波动”等；（2）历史或文化背景介绍，如在第一章中，对冉阿让“进迪涅城所走的路”的说明，对“柯耳巴十字架”旅舍的背景介绍；（3）景物或环境描写，如对夜色的描绘——当然，也与烘托气氛有关；（4）与故事情节关系不大的叙述或人物对话，如第二章开头几段，第四章中有关段落；（5）与故事情节关系不大的人物心理描写或作者（叙述者）的长篇议论，如第七章、第八章的情形，第十三章；（6）与基督教（或者说宗教）有关的描写，如第十三章最后部分内容²⁸。

可以看出，《惨世界》中存在的种种删节，并非仅仅如陈万雄所说，“也许这是为了迁就当时的读者，使故事情节推演紧凑吧”（陈万雄，1979：13），即不但有诗学观念上的考虑，而且有宗教因素在内。

为了对《悲惨世界》与《惨世界》有一个较为明确与清楚的印象，我们通过对照的方式，比较相关的内容与目录。

雨果的《悲惨世界》（1992），据目录以及版权页上的数据，计有5部48卷376章，123万字。

苏、陈的《惨世界》（1904）所依据的“原文”，只是第一部第二卷“沉沦”。为此，下面分别列出雨果（1992）中“第一部第二卷 沉沦”的章节目录²⁹与苏曼殊（2003）的回目目录：

²⁶ 就本章所讨论的范围而言，笔者比照后的结论是，雨果（1992）在内容层面上是忠实于法语原文的。

²⁷ 即便是主要人物，也不例外。

²⁸ 这里只是对《惨世界》中存在的删节现象所作的一个大致归纳。如果需要举例来说明有关的删节，则就要对照列出《悲惨世界》（甚至法语原本）与《惨世界》中的相关段落，势必占用不少的篇幅。

²⁹ 雨果（1992）“第一部第二卷 沉沦”的目录，经笔者与法语原本对照，在章节数目与内容上二者是一致的，这里因此不再列出法语目录。

《悲惨世界》（1992）第一部“芳汀”第二卷“沉沦”的章节目录：

- 一 步行终日近黄昏
- 二 对智慧提出的谨慎
- 三 绝对服从的英雄气概
- 四 蓬大利埃乳酸厂的详情
- 五 恬静
- 六 冉阿让
- 七 失望的内容
- 八 波涛和亡魂
- 九 新的损失
- 十 那人醒了
- 十一 他干的事
- 十二 主教工作
- 十三 小瑞尔威

《惨世界》（2003）的回目目录：

- 第一回 太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馆店主无情
- 第二回 感穷途华贱伤心 遇贫客渔夫设计
- 第三回 世态炎凉有如此狗 婆心恺惻仅见斯人
- 第四回 鬼蜮官场万般不管 人奴贱种遇事生风
- 第五回 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华贱委婉陈情
- 第六回 孟主教多财贾祸 宝姑娘实意怜人
- 第七回 无赖村逼出无赖汉 面包铺失了面包案
- 第八回 为世不平侠士题壁 恩将仇报恶汉挥刀
- 第九回 忍奇辱红颜薄命 刺民贼侠剑无情
- 第十回 遣英雄老侠赠金 别知己美人挥泪
- 第十一回 败家子夜逢良友 守财奴白手见阎王
- 第十二回 寄情书佳人怀春怨 灭王党顽父露风声
- 第十三回 孔美丽断魂奇烈客 明男德犯驾巴黎城

第十四 回孟主教济贫赠银器 金华贱临命发天良

那么,《惨世界》(苏曼殊,2003)与《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二卷(雨果,1992)在这方面,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笔者对照上述两个文本并参照法语原本后发现,就故事情节的角度而言,《惨世界》的前三回(苏曼殊,2003:114—124),基本上对应于*Les Misérables*的第一部第二卷³⁰第一章(雨果,1992:78—92);第四回(苏曼殊,2003:124—125)对应于第二章(雨果,1992:92—95);第五、六回(苏曼殊,2003:126—131)对应于第三、四、五章(雨果,1992:96—107);到了第七回,情形就比较复杂了。

在第七回的前半回(苏曼殊,2003:132—134)对应于第六章的前三分之一(雨果,1992:107—108),从后半回开始,《惨世界》开始了“增加”部分的内容,但在“增加”部分还“穿插”了《悲惨世界》的有关内容,如苏曼殊(2003:136)有关金华贱因偷面包而被判罪的“新闻”,便对应于雨果(1992:108—109)。

第八回基本上属于“增加”部分,但其中亦“穿插”了与《悲惨世界》有关的内容,那便是金华贱被判有罪后在土伦坐牢的一段(苏曼殊,2003:141)对应于雨果(1992:109—110)。

第九回最长,长达29页(苏曼殊,2003:143—162),但与雨果(1992)在内容上没有一点关系了,虽然还保持着翻译的视角。

第十回(苏曼殊,2003:162—167)、第十一回(苏曼殊,2003:167—174)和第十二回(苏曼殊,2003:174—181),亦与雨果(1992)没有内容上的关系,但依然保持了翻译的视角。

第十三回的情形发生了变化,在前多半回——差不多在五分之三回(苏曼殊,2003:181—184)处,在《惨世界》中总共长达50页左右的“增加”部分结束;该回余下部分则回到与雨果(1992)相关部分:第一段(苏曼殊,2003:184)与《悲惨世界》第六章最后几段(雨果,1992:111—112)对应;其余部分的内容则是依据第九、十章,以及第十一章的开头部分(雨果,1992:123—124;124—127;127—128)大幅删减而成。

³⁰ 以下讨论中,则只说明第几章,省略“第一部第二卷”等修饰语。

第十四回（苏曼殊，2003：186—191）则是依据第十一、十二、十三章（雨果，1992：128—131；131—135；135—144）大事删削而成。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悲惨世界》第七、八章（雨果，1992：113—120；121—123），在《惨世界》中全被删除。

那么，在《惨世界》（2003）这一文本中，译自《悲惨世界》的“翻译”部分与译者“增添”的“创作”部分各自所占的篇幅如何呢？这里我们对各回进行行数的统计，结果如下：

第一回 88 行；第二回 114 行；第三回 64 行；第四回 45 行；第五回 102 行；第六回 59 行；第七回 177 行（76 行开始插入，其中再次“插入”8 行译文）；第八回 145 行（其中插入 9 行译文）；第九回 528 行；第十回 116 行；第十一回 210 行；第十二回 172 行；第十三回 129 行（85 行插入结束）；第十四回 149 行。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惨世界》中属于“翻译”部分的内容共有 $88+114+64+45+102+59+75+8+9+44(129-85)+149=757$ 行，计 $757\times 28=21196$ 字，属于“插入”的“创作”部分的内容共有 $94+136+528+116+210+172+85+2=1343$ 行，计 $1343\times 28=37604$ 字，两者共计为 $757+1343=2100$ 行， $2100\times 28=58800$ 字。如果将各自所占的篇幅转换为百分比，则分别为：译文占 36.05%，“创作”占 63.95%；即“译文”占整个文本的三分之一强，“创作”占整个文本的三分之二左右。

5.2.2 删节引发的误读

无意识的误译与有意识的删节等做法，导致后来的评论者或研究者因此作出与原本不符的分析与判断。这里我们以《惨世界》第五回作为个案，对照《悲惨世界》相应的内容，作一简要的分析。

ST (Hugo, 211—213)

(Il continua.)

--Vous êtes humain, monsieur le curé, vous n'avez pas de mépris. C'est bien bon un bon prêtre. Alors vous n'avez pas besoin que je paye ?

--Non, dit l'évêque, gardez votre argent. Combien avez-vous? Ne m'avez-vous pas dit cent neuf francs ?

--Quinze sous, ajouta l'homme.

--Cent neuf francs quinze sous. Et combien de temps avez-vous mis à gagner cela ?

--Dix-neuf ans.

--Dix-neuf ans !

L'évêque soupira profondément.

L'homme poursuivit : --J'ai encore tout mon argent. Depuis quatre jours je n'ai dépensé que vint-cinq sous que j'ai gagnés en aidant à décharger des voitures à Grasse. Puisque vous êtes abbé, je vais vous dire, nous avions un aumônier au bagne. Et puis un jour j'ai vu un évêque. Monseigneur qu'on appelle. C'était l'évêque de la Majore, à Marseille. C'est le curé qui est sur les curés. Vous savez, pardon, dis mal cela, mais pour moi, c'est si loin ! --Vous comprenez, nous autres !—il a dit la messe au milieu du bagne, sur un autel, il avait une chose poiture, en or, sur la tête. Au grand jour de midi, cela brillait. Nous étions en rang, des trois côtés, avec les canons, mèche allumée, en face de nous. Nous ne voyions pas bien. Il a parlé, mais il était trop au fond, nous n'entendions pas. Voilà ce que c'est qu'un évêque.

Pendant qu'il parlait, l'évêque était allé pousser la porte qui était restée toute grande ouverte.

Madame Magloire rentra. Elle apportait un couvert qu'elle mit sur la table.

--Madame Magloire, dit l'évêque, mettez ce couvert le plus près possible du feu. --Et se tournant vers son hôte : --Le vent de nuit est dur dans les Alpes. Vous devez avoir froid, monsieur ?

Chaque fois qu'il disait ce mot *monsieur* avec sa voix doucement grave et de si bonne compagnie, le visage de l'homme s'illuminant. *Monsieur* à un forcat, c'est un verre d'eau à un naufragé de la Méduse. L'ignominie a soif de considération.

TT1 《惨世界》（苏曼殊，2003：128）：

第五回“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华贱委婉陈情”：

华贱说道：“师傅既然是一个慈善的人，就不用算我的饭钱了。”

哪晓得在这个悲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见钱眼开，哪有真正行善的人呢？

孟主教果然忙答道：“不然，不然，一定要算饭钱的。你共有多少钱呢？你曾说你有一百零九个银角子。”

华贱道：“还有十五个铜角子。”

主教道：“你费了几多天的功夫，才得这些钱呢？”

华贱道：“十九年。”

主教道：“十九年吗？”

华贱道：“不错。现在这些钱还在身边，没有用去。”

孟主教听得华贱说一声现在钱还在身边，急忙把门和窗户闭上。

不多时，凡妈拿了一碟菜进来，放在桌上。主教令她放在火炉旁边。又对华贱道：“亚历山上的风很大，先生一定受寒了。”

你看孟主教口口声声只叫华贱做先生，那种声音，又严厉又慈爱。你想他把“先生”二字称呼罪人，好像行海的时候，把一杯冷水送给要渴死的人，不过是不花本钱的假人情罢了。

TT2《悲惨世界》（雨果，1992：98—100）：

“您是有人道的，本堂神甫先生。您没有瞧不起人的心。一个好神甫真是好。那么您不要我付账吗？”

“不用付账，”主教说，“留着您的钱吧。您有多少？您没有说过一百〇九个法郎吗？”

“还得加上十五个苏。”那人说。

“一百〇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您花了多少时间赚来的？”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人接着说：

“我的钱，全都在。这四天里我只用了二十五个苏，那二十五个苏是我在格拉斯地方帮着卸车上的货物赚来的。您既是神甫，我就得和您说，从前在我们牢里有个布道神甫。一天，我又看见一个主教。大家都称他做‘主教大人’。那是马赛马若尔教堂的主教。他是一些神甫头上的神甫。请您原谅，您知道，我不会说话；对我来说，实在说不好！您知道，象我们这种人！他在监狱里一个祭台上做过弥撒，头上有个尖的金玩意儿。在中午的阳光里，那玩意儿照得多么亮。我们一行行排着，三面围着。在我们的前面，有许多大炮，引火绳子也点着了。我们看不大清楚。他对我们讲话，但是他站得太靠里了，我们听不见。那样就是一个主教。”

他谈着，主教走去关上那扇敞着的门。

马格洛大娘又进来，拿着一套餐具，摆在桌子上。“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他又转过去朝着他的客人：

“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您大约很冷吧？”

每次他用他那种柔和严肃、诚意待客的声音说出“先生”那两个字时，那人总是喜形于色。“先生”对于罪犯，正象一杯水对于墨杜萨的遭难者。蒙羞的人都渴望别人的尊重。

裴效维（1986）在论证“《悲惨世界》的头尾是雨果的《悲惨世界·沉沦》的改编”时，所举根据之一便是“苏曼殊任意改变原作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其中最明显的是对米里哀主教的改写”。论者说（裴效维，1986：175—176）：

在雨果的笔下，米里哀是一个胸怀博大、粪土名利、仁慈慷慨的正面形象；而苏曼殊却把他变成了个心肠冷酷、狡诈虚伪、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贪和尚”，他居然觊觎一个囚犯用十九年监牢生活换来的一点银子。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李丹译《悲惨世界·沉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中有这样一段：

每次他用他那种柔和严肃、诚意待客的声音说出“先生”那两个字时，那人总是喜形于色。“先生”对于罪犯，正象一杯水对于美狄斯的遭难者。蒙羞的人都渴望别人的尊重。

这段话在《惨社会》里却是这样的：

你看和尚无论说什么话，都叫华贱做“先生”，那种声音，又严厉又慈爱。你想他把“先生”二字称呼罪人，好象行海的时候，把一杯冷水送给要渴死的人，不过是不花本钱的假人情罢了。

很显然，雨果原本是赞美米里哀主教的，而苏曼殊却改写为揭露和尚了，意思恰好相反。这一切当然不可能是误译，而只能解释为苏曼殊的有意改写，其目的无非是使他更加中国化，以便与他自己的创作部分协调一致，共同构成一部针对晚清社会的作品。

作者雨果“原本是赞美米里哀主教的，而苏曼殊却改写为揭露和尚了，意思恰好相反”，裴效维认为“这一切当然不可能是误译”，但对照原文与《惨世界》，就会发现这种意思上的“相反”恰恰与“误译”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就上引段落而言，笔者可以说完全是由“误译”直接引起的。请看法语原文以及苏、陈的译文：

ST (Hugo, 211—212):

(Il continua.)

--Vous êtes humain, monsieur le curé, vous n'avez pas de mépris. C'est bien bon un bon prêtre. Alors vous n'avez pas besoin que je paye ?

--Non, dit l'évêque, gardez votre argent. Combien avez-vous? Ne m'avez-vous pas dit cent neuf francs ?

TT1 《惨世界》(2003: 128):

华贱说道：“师傅既然是一个慈善的人，就不用算我的饭钱了。”

哪晓得在这个悲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见钱眼开，哪有真正行善的人呢？

孟主教果然忙答道：“不然，不然，一定要算饭钱的。你共有多少钱呢？你曾说你有一百零九个银角子。”

很显然，这里存在“误译”：“不然”，原文用了“No”（如果采用的是英译本作

为翻译的原本³¹)或“Non”(法语原本)等表明“不用付帐”的意思,但译者没有理解,结果将其“翻译”成“不然”,自然就改变了原文的意思——译者添加的“议论”从其“误译”看,在性质上与“翻译”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加强了译文所表达的意义而已,但这翻译却是“误译”;甚至还有一种可能,译者以叙述者身份添加的价值判断——“哪晓得在这个悲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见钱眼开,哪有真正行善的人呢?”——乃是在对原文“Non”做出误读(及误译)之后“添加”的;这一点从译者使用了“果然”与“忙”等词也可以看出。换言之,译者添加这一段叙述语,其意在于使译文前后显得更加连贯,即严复在其“《天演论》译例言”(1898)中所说的“前后引衬”(1984: 136);有论者(陈万雄, 1979: 13)说译者“在译文中,随时会顺着文意,插入几句讽谕时政,嘲弄社会人心的话”。

同样地,早在1927年,柳亚子便在“《惨社会》与《惨世界》”中对此作了分析,并一直为众多研究者所征引,几乎已成定论。首先我们不妨看一下柳亚子的分析。

柳亚子在“《惨社会》与《惨世界》”(1927; 1987: 378—383)中,在指出二者“发生了许多不同之点”(1987: 378—378)之后认为,二者的结局“一定不同”,并根据对文本内容的分析,“照此看来,现在《惨世界》的结局,实在和它在第五回内的描写,十二分矛盾。并且回目也是后来硬改的,显然在译《惨社会》时原来的用意,不预备把贪和尚写作好人的了。”(柳亚子, 1987: 380—381)

之所以出现与雨果原著中“主教”相反的形象,之所以“翻案”,照柳亚子的“猜想”,是“曼殊和霭俄在思想上根本的不同”(柳亚子, 1987: 381);但《惨世界》何以推翻《惨社会》的理想而回到“霭俄原书的老路上去呢?”

在笔者看来,柳亚子对译本的分析及结论是一种误读³²。而这种误读实际上

³¹ 不妨参考Isabel F. Hapgood的英译本中相应的文字:

[He continued:]
 “You are humane, Monsieur le Cure; you have not scorned me. A good priest is a very good thing. Then you do not require me to pay?”
 “No,” said the Bishop; “keep your money. How much have you? Did you not tell me one hundred and nine francs?”

³² 苏曼殊、陈独秀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借用雨果的文本来达到自己宣传革命与暗杀等目的;由于翻译主体与雨果的拯救社会的方案或理想——即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在翻译中“添加”并删改,但这并不意味着“和尚”的结局就不同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和尚的结局,他们考虑的乃是革命宣传。换言之,柳亚子

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删节有密切的关系。

对照上引 TT1 与 TT2, 可以看出:《惨世界》删除了《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在与主教对话中对“马赛马若尔教堂的主教”的描绘, 结果将本来相隔“距离”较长的对话作了“浓缩”。《悲惨世界》中的下列对话(雨果, 1992: 99):

“我的钱, 全都在。这四天里我只用了二十五个苏, 那二十五个苏是我在格拉斯地方帮着卸车上的货物赚来的。您既是神甫, 我就得和您说, 从前在我们牢里有个布道神甫。一天, 我又看见一个主教。大家都称他做‘主教大人’。那是马赛马若尔教堂的主教。他是一些神甫头上的神甫。请您原谅, 您知道, 我不会说话; 对我来说, 实在说不好! 您知道, 象我们这种人! 他在监狱里一个祭台上做过弥撒, 头上有个尖的金玩意儿。在中午的阳光里, 那玩意儿照得多么亮。我们一行行排着, 三面围着。在我们的前面, 有许多大炮, 引火绳子也点着了。我们看不大清楚。他对我们讲话, 但是他站得太靠里了, 我们听不见。那样就是一个主教。”

他谈着, 主教走去关上那扇敞着的门。

到了《惨世界》, 则就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苏曼殊, 2003: 128):

华贱道: “不错。现在这些钱还在身边, 没有用去。”

孟主教听得华贱说一声现在钱还在身边, 急忙把门和窗户闭上。

接下来的一段, 在《悲惨世界》中是这样的(雨果, 1992: 99):

马格洛大娘又进来, 拿着一套餐具, 摆在桌子上。“马格洛大娘,” 主教说, “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他又转过去朝着他的客人:

“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 您大约很冷吧?”

在《惨世界》中, 则变成了(苏曼殊, 2003: 128):

不多时, 凡妈拿了一碟菜进来, 放在桌上。主教令她放在火炉旁边。又对华贱道: “亚历山上的风很大, 先生一定受寒了。”

由于《惨世界》的“浓缩”, 以及译者的“改动”——将“他谈着, 主教走去关上那扇敞着的门。”改为“孟主教听得华贱说一声现在钱还在身边, 急忙把

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依然只是将《惨世界》视为“翻译”, 而不是将《惨世界》的主体部分视为“伪译”, 因而没有看出“插入”伪译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是他们翻译背后的主要动机与目的所在。

门和窗户闭上。”，将《悲惨世界》中原本存在的纯粹是“并列”的“叙述语言”，变为了具有潜在价值判断的前后构成“因果”关系的“陈述语句”。与此同时，《惨世界》的这一改动，将“关上窗户”与后面主教所说的“很冷”之间原本存在的果因关系消除了。

柳亚子恰恰是依据这一“浓缩”与“改动”得出了以下的结论：“这是说和尚在觊觎华贱身边的钱，恐怕他在夜间逃走，所以要把门窗关闭了。”（柳亚子，1986：380）

我们觉得译者在这里的删节也是有意识的，但就对“马赛马若尔教堂的主教”的描绘的删节而言，也可能出自对所谓情节与节奏的考虑，因为这一段描绘实际上是对那个主教的负面评价³³。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发挥作用的可能还有其它方面的因素。

柳鸣九在“《悲惨世界》前言”（1992：4）中指出，雨果

把人道主义的感化力量视为改造人性与社会的手段，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与后来的冉阿让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说中一个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形象，冉阿让后来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们身上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人道主义爱心，而且他们这种爱，还能感化凶残的匪帮，甚至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在悲惨世界里创建了滨海蒙特勒伊这样一块穷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于是，人道主义的仁爱在小说里就成为了一种千灵万验、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

这种通过人道主义感化社会的主张，恰恰与译者的革命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立场发生了冲突，结果自然是删节了。

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苏、陈的删节是故意的，内容紧接我们上面讨论的内容：

TT1（雨果，1992：100）：

“神甫先生，”那人说，“您真好。您并不瞧不起我。您让我住在您的家里，您为我点起蜡烛。我并没有瞒您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没有瞒您我是一个倒霉蛋。”

主教坐在他身旁，轻轻按着他的手。

“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但是要问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

³³ 因此，如果译者有意要贬低甚至批判主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机会，而不应该作出删节。

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除非是需要住处的人，谁也不是在自己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个人睁圆了眼，有些莫名其妙。

“真的吗？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主教回答说，“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真怪，神甫先生，”那人叫着说，“我进来时肚子是真饿，但是您这么好，我已经不知道饿了，我已经不饿了。”

TT2（苏曼殊，2003：129）：

华贱洋洋得意地道：“现在蒙师父待我这样好法，师父这一片仁心，我真是感谢不尽。既然是这样，我也不必瞒着我的来历和我的苦处，待我细细地说把师父听吧。”

主教用手拉着华贱的手，和颜悦色地道：“你也无庸将你的来历告诉于我。此处不是我的家，是上帝的地方。无论什么客来，也不问他的姓名和他的脾气。而且你已经受苦，又饿又渴，我必欢迎你，你切莫要使客气吧。”

华贱道：“我现在很饿，又渴。当我进门的时候，见了师父这样仁慈，也就令我忘记了。”

在这里，能够体现主教“人道主义”精神的对话被删节了。

此外，“创作”部分中的主人公男德，甚至可以说就是“译者”苏曼殊与陈独秀的理想“代言人”，对宗教（上帝）的看法（苏曼殊，2003：156—158）³⁴也影响到删节问题。

5.2.3 诗学干预

诗学是指有关文学的观念以及写作技巧等方面。《惨世界》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疑也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并在译本中体现出来。这里仅以小说第一回开头为例加以说明（苏曼殊，2003：114）：

话说西历一千八百十五年十月初旬，一日天色将晚，四望无涯。一人随那寒风落叶，一片凄惨的声音，走进法国太尼城里。这时候将交冬令，天气寒冷。此人年纪约摸四十六七岁，身量不高不矮，脸上虽是瘦弱，却很有些凶气；头戴一顶皮帽子，把脸遮了一半，这下半面受了些风吹日晒，

³⁴ 详后。

好像黄铜一般。进得城来，神色疲倦，大汗满脸，一见就知道他一定是远游的客人了。但是他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暂且不表。

开头使用的“话说”与段尾使用的“暂且不表”，表明译者受到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影响，使用传统小说中常见的“套语”；甚至可以说，译者受中国诗学的影响。此外，译文中的“西历”反映出译者的“中国”或者说“东方”视角。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作为译文，使用“西历”，译者显然已经超越了原文文本的限制，因为原文作者“雨果”本身是“西方”人，在写作小说《悲惨世界》的时候，自然不必也没有点明时间的属性（如“夏历”或“西历”）；第二，在译文中“插入”“西历”二字，译者在无形之中“介入”译文文本的叙述，换言之，由此产生的效果是译文读者仿佛是在“聆听”译者的叙述——这一点，通过“话说”这种中国传统的话本式套语而显得尤为突出。

《悲惨世界》中的第一章《步行终日近黄昏》，在叙述冉阿让的时候，雨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叙述者——采用的是“限知视角”，即是从迪涅城里的居民等人的视角来叙述的，而没有一种全知的叙述视角，因而在叙述的开始，人们并不知道那个“体格粗壮，正在盛年，可能有四十六或四十八岁”的“中等身材的人”就是冉阿让，文本中也一直是使用“他”、“那人”来指称“冉阿让”，而“柯耳巴十字架”旅舍的主人雅甘·拉巴尔从市政厅的回信中才知道“他”叫“冉阿让”；但其他人并不知道，因而，文本中的叙述便一直保持限知视角——“他”、“那人”——来指称“冉阿让”。在《惨世界》的第一回中，开始也一直采取限知视角来叙述，使用“此人”、“他”来指称“金华贱”；但在“苦巴馆”店主从衙门的回信中得知“此人”就是“金华贱”后，叙述中便一直使用“华贱”这一全知视角了。

这种叙述视角上的差异在读者身上所引起的效果是不同的：雨果（或者说叙述者）在《悲惨世界》（雨果，1992）采用限知视角，首先会给读者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神秘感”或“悬念感”，迫使或吸引读者产生一种继续阅读下去的欲望，急于想知道“他”是谁；到了《惨世界》，由于在第一回即将结束的时候，这种限知视角被全知视角所取代，原有的神秘感与悬念自然也就不再存在。此其一。其二，《悲惨世界》的限知视角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那就是通过使用“他”或“那人”而不直接指称“冉阿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读者对“冉阿让”

产生的“负面印象”；而《惨世界》则相反，会强化这种印象。这一点，从《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二卷的第六章以“冉阿让”作为其标题，以及在该章的叙述中才开始使用“冉阿让”这一全知视角，就可以看出雨果的用意：雨果在第六章前采用限知视角来叙述“冉阿让”这一小说主人公的“故事”，除了给读者带来“悬念感”外，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避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冉阿让”形成“负面”的印象，从而削弱主人公后面的“正面”形象。

5.2.4 翻译中的“添加”

1 以叙述者的身份所作的添加，如第五回中：

哪晓得在这个悲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见钱眼开，哪有真正行善的人呢？（苏曼殊，2003：128）

这是叙述者对世上人们金钱观的一个评价，而这一“添加”的评价乃是“插入”冉阿让在主教家中与主教对话的语境中。在同一语境中，类似添加的评语还有：

〔你想他把“先生”二字称呼罪人，好像行海的时候，把一杯冷水送给要渴死的人，〕不过是不花本钱的假人情罢了。（苏曼殊，2003：128）

在第六回中，“金华贱”在主教家与大家坐在一起，“坐齐了席后，孟主教就按例念了祷告。念罢，即使用饭。”这时，“插入”了叙述者对金华贱如下的评论（苏曼殊，2003：130）：

此时华贱心中乐不可言，那种神气，可惜没有照一个像下来，把大家看看。

还是在第六回，吃完饭后，主教说要领金华贱去卧室，“华贱就起身跟着前去。走过主教卧房的时候，凡妈正在要将银器放在孟主教床头下碗柜里面”，添加了以下内容（苏曼殊，2003：131）：

放急了，碰得豁浪一声响亮。主教只顾引了华贱，还没有听见。

从后面的内容看，叙述者似乎是为后面金华贱深夜偷银器的情节作铺垫。

2 套用中国传统小说模式，在每回的结尾使用套语，如“要知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在全书结束时，套用诗歌作结的模式，第十四回结尾³⁵（苏曼殊，2003：191）：

尧桀原同尽，坦戚有攸关。
我心造三界，别无祸福门。

5.2.5 “误译”了什么？

此处的“误译”是指由于译者的理解等因素而造成的。这里举几例³⁶：

1

ST (Hugo, 179)

Il ne se retourna pas une seule fois. S'il s'était retourné, il aurait vu l'aubergiste de la Croix-de-Colbas sur le seuil de sa porte, entouré de tous les voyageurs de son auberge et de tous les passants de la rue, parlant vivement et le désignant du doigt ; et, aux regards de défiance et d'effroi du groupe, il aurait deviné qu'avant peu son arrivée serait l'événement de toute la ville.

TT1 《惨世界》第二回（苏曼殊，2003：117）

这时他若是还回走旧路，那苦巴馆里管事的和那班客人，必定闹到街上，千人百众，指的指，说的说，人多嘴杂，大家都要评评他的来历，世上人的嘴是轻薄的，那时倒不好看。

TT2 《悲惨世界》一（雨果，1992：83）

他的头一次也没有回转过。假使他回转头来，那就会看见那柯耳巴十字架的旅舍主人正立在他门口，旅舍里的旅客和路上的行人都围着他，在

³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悲惨世界》本来是宣扬基督教以及人道主义的，此处作结的诗歌却饱含中国“佛教”的宗教味道。

³⁶ 必须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言，如果要说明或证明译者在翻译中存在“误译”，自然应该依照“忠实”的标准，对照“译本”与“原本”；但也可以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包括译语相同与不同、译本生产的时间等情形）进行比较，寻找译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并由此分析产生“差异”的诸种原因。就本个案而言，由于《惨世界》所依据的“原本”尚不清楚（即便是能够证明所依据的是英译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英译本），《悲惨世界》（1992）的译者则基本上没有《惨世界》的“译者”那种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动机，因而将《悲惨世界》（1992）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原本”（即假定是“忠实的”译本）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即便是《悲惨世界》（1992）存在不忠实的可能性，即便由于雨果的原著中的意识形态与译语社会文化相冲突，但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来，译者或翻译主体的常规做法也只是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相关内容进行“删节”，而不会“增添”，因而也不会出现对照译本（此处即1992年版《悲惨世界》）“超出”原本的情形；而且也符合描述研究所采取的以译语社会为取向的（target-oriented）方法。尽管如此，这里依然提供法语原本的相关段落，以供参照。

那里指手画脚，说长论短；并且从那一堆人的惊疑的目光里，他还可以猜想到他的出现不久就要搞得满城风雨。

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惨世界》的译者完全译错了³⁷：从叙述视角的角度看，《惨世界》的译文属于所谓的间接心理描写，即以叙述语的形式再现了主人公“他”的内心活动；《悲惨世界》则是叙述者从全知视角的角度对事件（或事实）的描写与对可能的心理活动所作的“窥视”（原文与译文的最后部分）。

2

ST (Hugo, 187—188)

Le visage du paysan prit une expression de défiance, ... et tout à coup il s'écria avec une sorte de frémissement:

--Est-ce que vous seriez l'homme? ...

Il jeta un nouveau coup d'oeil sur l'étranger, fit trois pas en arrière, posa la lampe sur la table et décrocha son fusil du mur.

Cependant aux paroles du paysan: *est-ce que vous seriez l'homme?* ... la femme s'était levée, avait pris ses deux enfants dans ses bras, et s'était réfugiée précipitamment derrière son mari, regardant l'étranger avec épouvante, la gorge nue, les yeux effarés, en murmurant tout bas: *taso-maraude*.

TT1 《惨世界》第二回（苏曼殊，2003：121）

那男子听到这里，忽然大声问道：“你是一个人吗？”急忙转过身来，将灯放在桌上，把那墙上挂的快枪取到手里。

那妇人只听得“你是一个人吗”一句话，猛然吃了一惊，便扑地立起身来，拉了他两个孩子，急忙躲在那男子的后面，便开口道：“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TT2 《悲惨世界》一（雨果，1992：87—88）

那农民的脸上立刻起了戒惧的神情，……，并且忽然用一种颤栗的声音喊着说：

“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

……

那妇人听见那农民说“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以后，……，她低声说道：

“佐马洛德。”[作者原注：佐马洛德（*tso-maraude*），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方言，即野猫。]

原文中的意思是说“您”就是人们在议论的“那个人”，《惨世界》误译导致译

³⁷ 而且有删节。

文文本前后的逻辑关系不清楚，如《惨世界》的读者便无法理解为什么“那妇人”在听见“你是一个人吗”这句话后所作出的反应。

3

ST (Hugo, 312)

(Il tira deux pièces de cinq francs de sa sacoche et les remit au prêtre.)

--Monsieur le curé, voici pour vos pauvres. Monsieur le curé, c'est un petit d'environ dix ans qui a une marmotte, je crois, et une vieille. Il allait. Un de ces savoyards, vous savez ?

--Je ne l'ai point vu.

TT1 《惨世界》第十四回（苏曼殊，2003：190）

华贱道：“我看你很觉困苦，今给你两块半元的银钱。”又道：“那童子的年纪约莫有十多岁，手里拿着风琴。我想他必定从这条路经过。”

牧师道：“我实在未见。”

TT2 《悲惨世界》十三（雨果，1992：139）

“神甫先生，这是给您的穷人的。神甫先生，他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他有一只田鼠笼子，我想，还有一把摇琴。他是向那个方向走去的。他是一个通烟囱的孩子，您知道吗？”

“我确实没有看见。”

可以看出，译者在这里没有看清（或看懂）原文“pour vos pauvres”（相当于英文的“for your poor people”），将其理解为“你（们）穷人”了，从而导致误译。其实，如果译者从情理或逻辑上稍作考虑，就不会出现这种误译，因为牧师或神甫，即便是“穷”，本人也不会接受他人的“钱财”，但可以代表教堂接受捐献，以此帮助那些穷人。但是，这里的误译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加以解释：译者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种“误译”，乃是因为译者是从中国文化中类似身份者（如和尚或道士）可以“化缘”，可以接受他人（施主）的“钱财”；结果便将误译所表达的内容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不察。

5.2.6 人物与地方命名的用意

关于《惨世界》中的人物命名问题，程文超（1999：111）就“金华贱”这一名字指出，“苏曼殊的《惨世界》将主人公冉阿让的名字译为‘金华贱’——这名字自然与音译、意译的关系都不大”；论者没有就此再作进一步的申说。但

可以看出，论者似乎有所暗示。

这里，我们试就《惨世界》中的人物与地方命名的问题作一探讨，考察译者命名的用意。

人名：

1 Jean Valjean: 这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惨世界》译作“金华贱”，《悲惨世界》译作“冉阿让”³⁸。笔者认为，《惨世界》的译法更像“音译”³⁹，虽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将人物的姓名颠倒了，译者似乎以为是姓“Jean”（金）了；其二，中文的名字本身含有原文名字没有的含意，故此有程文超（1999：111）的“春秋笔法”式的说法。

2 The Bishop of Digne: 孟主教；（迪涅的）主教。值得注意的是，《惨社会》第五回的标题中只有“贪和尚”，第六回的标题中有“富和尚”，到了《惨世界》则一概成了“孟主教”，这里是否也存在“春秋笔法”的问题？与“虚构”部分中的“孔美丽”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是否可以作“孔”“孟”的解读⁴⁰？

3 Petit-Gervais: 极可哀；小瑞尔威。前者完全是另起名字了，但具有强烈的意指倾向。这种做法在“虚构”部分更加突出。

4 范桶：与“饭桶”谐音。

5 明白男德：谐音“明白难得”。

6 吴齿小人：谐音“无耻小人”。

7 明顽：谐音“冥顽”。

8 满周苟：谐音“满洲狗”。

9 非弱士

10 孔美丽

11 克德

12 潘大利

³⁸ 下面依照这一先后顺序列出人名或地名，不再列出两种译本的名称；属于《惨世界》中虚构部分的人名与地名，《悲惨世界》中则没有相应的译名。

³⁹ 虽然笔者无法确切地知道《悲惨世界》日译本中人名的发音，但可以肯定地说，“金华贱”的吴语发音（甚至包括普通话的发音）接近法语（和英语）“Jean Valjean”的发音。这或许可以启发我们解决《惨社会》或《惨世界》所依据的原本问题。

⁴⁰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将“原文”（法语或英语）中主教前的“Monsieur”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做了翻译，并且对其中的“Mon”进行了“音译”。笔者还要指出的是，在《惨世界》的第五回，译者将原文的“Monsieur”正确地译为“先生”（苏曼殊，2003：128；见前引），这就说明译者是在清楚“Monsieur”含义的前提下，有意这样翻译的；或许这是因为译者将其作为整个专名（Monsieur le Cure）的一部分了。

13 凡妈

地名：

1 Digne: 太尼城；迪涅城。属于音译。

2 苦巴馆：“苦巴”馆。

3 色利栈：“色”“利”栈。

4 无赖村：“无赖”村；且近似谐音“无奈”。

5 尚海：与“上海”谐音。

5.3 “伪译”分析：革命话语

5.3.1 “伪译”的文本分析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既然（《惨世界》的）译者其主要意图不是在于他们译自雨果的小说内容，而是在于他们的“伪译”部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译者在“伪译”中究竟试图要表达什么呢？其意图与动机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通过文本分析，方可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

在对“伪译”文本进行细读之后，发现“伪译”主要表达了如下的思想观点：

1 反对孔教，或者说非圣。第七回中，男德在念有关金华贱因偷面包而定罪的报纸新闻后，有下面一段描写（苏曼殊，2003：136—137）：

那范桶听罢，便道：“呵，金华贱乃是我的老友。……。他怎么现下居然做了贼呢？真真是想不到的。那支那国的孔夫子也曾说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两句话真说得不错。”

……

这时，范桶只好在一旁劝道：“休要发气。……。难道孔夫子的话，你都不服吗？”

男德即忙答道：“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

将尊孔的斥为“饭桶”，通过男德之口，将孔教斥为“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

“狗屁”，而将其“奉作金科玉律”的则是“支那贱种”。译者通过“伪译”的方式，对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了“批判”（或者说“谩骂”），却因为是“翻译”而基本无需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问题是，在《惨世界》的“伪译”的开始，说“这范财主只生一子，名叫阿桶。那范桶自幼养得娇惯，到念多岁，还是目不识丁。”（苏曼殊，2003：134），连报纸也看不懂（2003：135），这里却出口成章地引用“外国”（支那）哲学家（孔子）的名言，伪译的“作者”虽然采取了“翻译”的视角来“伪装”或掩盖自己的身份，这里却“露出马脚”，原因就是“作者”只顾批判“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忘记了人物身份与语言、知识的关系了。换言之，“作者”根本无意去注意这些诗学上的“细节”问题；其主要意图乃是通过“范桶”之口，引出所要批判的“靶子”。

2 财产公有的观念。伪译通过男德之口，批判旧的观念，表达一种新的财产观念（苏曼殊，2003：137—138）：

“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

“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蠹贼呢？”

3 对中国政局与维新人士的批评。第八回中，男德从来信中得知有尚海志士要来的消息后，寻思道（苏曼殊，2003：139）：

尚海那个地方，曾有许多出名的爱国志士。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其实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什么书局，什么报馆，口里说的是借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哎，这种口是心非的爱国志士，实在比顽固人的罪恶还要大几万倍。这等贱种，我也不屑去见他。

这里，隐含作者⁴¹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男德之口批判了两类所谓的“爱国志士”，而在第九回中，则是通过叙述者，批判了“志士”面对困境时的态度，与男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苏曼殊，2003：144）：

⁴¹ 最终也就是作者或“伪译者”，尽管在理论上文本中隐含作者不等同于文本外的实际作者。

这时，男德身上一钱没有。你看男德为着世界上不平的事，去舍身救人，倒弄得这样下场，怎不令人灰心短气？哪晓得那男德是一个天生的刚强男子。不像尚海那班自称什么志士的，平日说的是不怕艰难，不愁贫困，一遇了小小的挫折，就突自灰心短气起来；再到了荷包空的时候，更免不得怨张怪李，无事生端，做出些无理的事情，也顾不得大家耻笑，这就到了“小人穷斯滥矣”的地步。那男德虽然这样失败，这样困穷，没有一点儿悔恨的意思，还是一团心安理得、上不愧天、下不愧人的气象。

叙述者在这里直接诉诸于读者（“你看”），对作品主人公及其行为进行评论；叙述者通过这种干预或评论，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如果考虑到这是“伪译”，那么叙述者对主人公男德与“尚海”“志士”的这种价值判断最终就是“伪译者”或“作者”的价值立场。

第十一回中，范桶和男德从所住的客栈出来，男德提议去“书坊里去看看，有什么新出的书籍，买些儿回来看看消闲”（苏曼殊，2003：173—174）：

说着，放步前行。不多一会，到了好几家书局，看了一些儿的书，却都是从英国书译出来的，没有一部是法国人自己做的；译的文笔，还有些不甚通顺。男德寻思道：“我法国人被历代的昏君欺压已久，不许平民习此治国救民的实学，所以百姓的智慧就难以长进。目下虽是革了命，正当思想进步的时光，但是受病已久，才智不广，不能自出心裁，只知道羡慕英国人的制度学问，这却也难怪。我二人暂且回去吧。”

这里，“伪译者”依然是通过叙述干预与小说人物的言语对有关时政进行评论与批判。但或许是“伪译者”过于专注于自己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只顾“宣传”与“鼓吹”，结果在这里留下了“败笔”：从上引可以看出，“好几家书局”卖的书“都是从英国书译出来的，没有一部是法国人自己做的”，这就是说这些书都是“法文译本”了；可“伪译者”却忘记了范桶和男德“此时”还在“尚海”这一事实。换言之，“伪译者”没有考虑或“无暇”考虑“连贯”（coherence）等诗学问题了。

4 批判宗教。还是在第九回中，男德与孔美丽再次在败落寺院见面，说了各自的遭遇，孔美丽在听了男德的劝解后（苏曼殊，2003：156—158），

就拿着雪白的手帕儿，抹干了香泪，低声说道：“照你这样说起来，倒

是没有什么伤心的事体。俗界悲欢，莫非妄念？还是定了心，快在此拜谢上帝的恩吧。”

男德忙道：“你还是这样愚蠢。我生平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

那女子忽然呆看着男德，不懂什么缘故他说出这样奇怪的话来。

男德又道：“我们去到神龛面前，好将这道理细细讲给你听吧。”

那女子就拉着男德的手，走了十多步，来到神龛面前，双双坐下。

男德便开口说道：“这世上的人，天天说什么‘上帝’。你以为真有什么上帝吗？不过因为上古野蛮时代，人人无知无识，无论什么恶事都要去做，所以有些明白的人，说些善恶的果报，来治理他们，免得肆行无忌，哪里真个上帝的道理呢？我从前幼年的时候，有一礼拜日，跟我的父亲做礼拜，只听得那主教说道：‘凡人倘若时常尊重上帝，有钱的时时拿些钱来，放在寺院铁箱子里面，将来他父母死后的灵魂，就会上升天堂。’对他这种荒唐的话，那时我就有些不信。”

从这里可以看出，伪译通过人物之口对宗教——不但是西方的上帝，而且是中国佛教——的“本质”作了批判，对宗教的“危害”作了分析。与此同时，也对——那些在男德以及孔美丽看来属于“陋习”的中国与西方的风俗习惯，加以嘲笑。

5 主张暗杀。在“伪译”部分，塑造了一个“姓明，名白，字男德”的主人公：他是一个“赤心侠骨”之人，认为“凡人做事都要按着天理做去，却不问他是老子不是老子”（苏曼殊，2003：140）。男德将华贱从监狱中救出来后，随身带的钱却被华贱偷去，差点死于非命。男德沉思后发出感慨（苏曼殊，2003：144）：

“这桩事，也没有什么奇怪，在这种惨世界上，哪一个人不和金华贱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另造一种公道的世界，是难救这场大劫了。”说罢，便把那把快刀拔将起来，说道：“我一生仁义道德，都仗着你才能够去做，怎好不小心收藏起来？”说着，就把刀又收在袋里。

男德不但听见了“官府”二字就“火上心来”（苏曼殊，2003：146），而且将“朝廷堂堂的一位命官”（苏曼殊，2003：147）村官满周苟杀了（苏曼殊，2003：160）。男德暗杀的主张，在他对克德的一番话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体现（苏曼殊，2003：180）：

杀父冤仇，原不可不报。但自我看起来，你既然能舍一命为父报仇，

不如索性大起义兵，将这班满朝文武，拣那黑心肝的，杀个干净。那不但报了私仇，而且替这全国的人消了许多不平的怨恨。

后来，克德告诉男德（苏曼殊，2003：183）：

这几日，我们党里面哄传，大总统拿破仑想做专制君主的形迹，一天流露似一天，压制民权的手段，一天暴烈似一天，俨然又是路易第十四世和第十六世的样子来了。

男德“闻说，不觉怒发冲冠，露出英雄本色”，携带“炸弹”行刺“大总统”，未遂后，“用枪自毙”。

5.3.2 语言与诗学

在清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文言还是白话，从宏观上言，取决于当时的语言主流、译本的隐含读者或翻译动机与目的等因素；从微观上言，则取决于译者自身的诗学观念以及译者的语言水平等因素。虽然现在无法从诸如译者的序跋或其它文献了解《惨社会》或《惨世界》的译者其隐含读者或翻译动机与目的是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清末时期翻译的主流语言是文言，中国小说系统中的主流则是白话章回体。《惨社会》或《惨世界》的译者选择的是白话章回体⁴²。

苏曼殊 1903 年 9 月初从日本回到中国的时候，只是一个快满 19 岁⁴³的青年，当时与苏曼殊共过事的人对其汉语程度的了解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在柳亚子的“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柳亚子，1927：279—286）中，陈独秀说到苏曼殊的汉语水平（柳亚子，1927：284）：“他从小没有好好儿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不甚高明。”章士钊也在“与柳无忌论曼殊著作函”（1927：16）中指出苏曼殊在翻译雨果《悲惨世界》时的汉语水平：“曼殊真近代之异人也。自识字以至卓然成家，不过经二三年。始在沪与钊共笔墨时，学译嚣俄小说，殊不成句。且作字点划，八九乖错，程度犹远在八指头陀之下。”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如果说选择白话作为译本的语言是苏曼殊的

⁴² 虽然目前尚无统计数据说明当时文学系统中白话创作与翻译的真实情况，但有论者因此说苏曼殊是“中国白话文的先驱之一”（毛策，1995：31），则未必。

⁴³ 苏曼殊生于 1884 年 9 月 28 日。

主体性表现，那么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对他而言，白话毕竟比文言要容易得多。何况，即便是苏曼殊要学习中国的白话章回体小说，也要快得多；因此，就苏曼殊而言，他本人在当时未必就像林纾那样具有明确的诗学观念与立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苏曼殊在《国民日报》发表“女杰郭耳纒”⁴⁴，使用的却是文言；1903年10月24日在《国民日报》上发表的“呜呼广东人”，虽为白话，但其正式程度比《惨世界》要高。尽管不能排除他人为苏曼殊修改稿件的可能性⁴⁵，但这同时也说明还有一种情形，即选择“白话”作为译本的语言有可能是陈独秀的主张。

虽然《惨社会》开始连载的时间是在1903年10月，但今天大家看到的是1904年出版的单行本《惨世界》或其翻版。且不说陈独秀是否参与了《惨社会》（1903）的“翻译”，但正如柳亚子在“《惨社会》与《惨世界》”（1927）中所指出的，陈独秀参与《惨世界》的“修改”却是明显的。正是在1904年3月，陈独秀等人发起创办提倡并实践白话的《安徽俗话报》⁴⁶。是年3月31日，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1904；转引自叶再生，2002：699—700）中说到《安徽俗话报》⁴⁷的宗旨：

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睡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

陈独秀⁴⁸在这里已经明确地将白话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因此，至少可以

⁴⁴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汪树东选编的《苏曼殊作品精选》（苏曼殊，2003）中，对“女杰郭耳纒”的发表时间却有不同的说法：在该文后注明的时间为“1903年7月12日、8月12日”（202），而在“苏曼殊年谱简谱”中却是1903年“10月7日，……始载《女杰郭耳纒》，至12日载完。”（381）如果苏曼殊回到中国的时间1903年9月初是准确的，那么发表的时间更有可能是1903年10月7日、12日。经笔者核查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国民日报》（一册），该文实际的发表时间为1903年10月7日、8日、12日，作者署名“子谷”。

⁴⁵ 苏曼殊后来创作的小说《断鸿零雁记》（1912）、“绛纱记”（1915）、“焚剑记”（1915）、“碎簪记”（1916）、“非梦记”（1917）均为文言，且不是章回小说。

⁴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论者都说《惨世界》于1904年由镜今书局出版，但均未指出出版的具体月份，连专门考订出版日期等细节的陈大康（2002）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笔者在这里无法指出《惨世界》与《安徽俗话报》出版的时间先后。

⁴⁷ 《安徽俗话报》为半月刊，筹建于安庆，编辑、发行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印刷于上海大陆印刷局，32开本，每期40页，朔望发行。该刊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发起，与桐城学堂学长房秩五、吴守一及芜湖科学图书社的汪孟邹等合作组成。参与编撰者，除上述人外，还有章谷士、曹复生等。实际执掌主编工作的是陈独秀（参见叶再生，2002：698）。

⁴⁸ 在此之前，中国近代创办的白话报主要有《民报》（1876）、《无锡白话报》（1898）、《杭州白话报》（1901）、

推断：苏曼殊汉语上的“无奈”与陈独秀政治意识形态动机相结合的结果便是白话成为《惨世界》的语言。

此外，还有一个“微观”的文体学意义上的个案可以支持笔者的上述推断。

笔者初步浏览与统计后发现，在《苏曼殊作品精选》（苏曼殊，2003）中，除了《惨世界》外，在包括苏曼殊自己创作的小说在内的其它文本中，没有使用属于口语⁴⁹的“事体”一词，而在《惨世界》（2003）不足六万字的篇幅（114—191）中，却使用了18次：

1 店主人……随口问道：“你来做什么事体的呢？”（苏曼殊，2003：115）

2 此人也不理会这些事体，只管又问道：“饭做好了没有？”（苏曼殊，2003：115）

3 店主人说道：“哪里是为着这些事体！”（苏曼殊，2003：116）

4 孟主教……笑呵呵地问道：“是什么事体？是什么事体？我们难道要遭什么大祸不成吗？”（苏曼殊，2003：125）

5 欲知来者何人，为着什么事体，且听下回分解。（苏曼殊，2003：125）

6 男德道：“没有什么要紧，不过有一桩事体，我心里觉得很不平。请你看这条新闻吧。”（苏曼殊，2003：135）

7 男德道：“果然有了这桩事体，就是我的责任了，岂有袖手旁观的道理？”（苏曼殊，2003：146）

8 男德道：“你倒不要问这些长短，请你把这些事体快快地说给我听吧”（苏曼殊，2003：146）

9 那妇人……开口问道：“你为着什么事体，从什么地方到这里呢？”（苏曼殊，2003：147）

10 老者道：“……看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事体。”（苏曼殊，2003：165）

11 男德也接着道：“……无论什么事体，都要听先生的教训才是。”（苏曼殊，2003：166）

12 “我〔范桶〕伯父忙答道：‘只为那时村官骗了他许多银钱，哪里还肯火上加油？因此就将这件事体搁起。难道到了今天就要推赖不成？你不必多说

《苏州白话报》（1895、1901、1902 三种）、《中国白话报》（1903）等（参见叶再生，2002：687—698）。
⁴⁹ 而且是吴方言，或周边地区方言。

了，倘若不快将银子还我，就将这条老命拼着你这富户。’”（苏曼殊，2003：169）

13 男德道：“是什么事体呢？”（苏曼殊，2003：177）

14 明顽又道：“……后天的事体，我都一一知道了。”（苏曼殊，2003：178）

15 男德道：“到底你知道的是什么事体呢？”（苏曼殊，2003：178）

16 这时男德还囚在家中，听见这些伤心惨目的事体，你道是何等难受！（苏曼殊，2003：179）

17 男德道：“贤弟不必伤心，但有些儿不平的事体，请告诉我，我自有个主张。”（苏曼殊，2003：179）

1904年3月，陈独秀在上引的“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两次使用了“事体”一词。值得注意的是，在《惨世界》中，“事体”一词不但出现在“翻译”部分（114—134；184—191）⁵⁰，而且同样出现在“伪译”部分（134—184）。包天笑曾说苏曼殊到吴中公学去的时候，“初来乍到，对吴依软语一窍不通，只能与同仁们作笔谈”（参见毛策，1995：21）“事体”正是“吴依软语”中的词汇。如果这一个案成立，那么，陈独秀在《惨世界》的文本生产中的作用就远非他自己所说的“润饰”可以概括。

5.3.3 为什么选择“伪译”？

Toury 在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中对“伪译”作了如下的界定（1995：40）：

文本的生产者由于本身是文化中人，通常很清楚译本与翻译活动在他们的文化中的地位，……有时，他们甚至可能决定积极地利用自己的文本，将自己的文本——甚至创作出文本——作为译本发表。这些文本在其他语言中没有对应的原语文本，因而也就没有事实上的“转换操作”与翻译关系，称之为伪译本（pseudotranslations）或虚译本（fictitious translations）。

在清末，（小说）翻译已经成为一种运动或思潮，苏曼殊、陈独秀作为“文化中

⁵⁰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丛书”（吴相湘主编）中有《国民日报》（一册）（1965）一书，收录了“清光绪二十九年六、八等两月份”的《国民日报》，其中有前六次隔日连载的《惨社会》，不足三回。这里列出的1、2两个引例中的“事体”，在《惨社会》的第一回中也已出现（见1965：340；360）。

人”⁵¹，自然不会对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翻译感到陌生，因而可以说具备了进行“伪译”的基本条件。

Toury (1995: 41—42) 在论及“伪译的一些作用”的时候，主要从语言与文学的角度出发，没有考虑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动机与目的：

从文化进化的视角看，伪译文本的生产与传播其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是，这是将新奇事物 (novelties) 引进到文化中的方便方式。事实上，这常常是作家这样做而又不致引起过分敌意的仅有方式，这在那些不愿偏离得到认可的模式与成规的文化中尤其如此。从文化组织而言，由于被视为文本生成的一种二级方式，文化上被承认为翻译的文本中发生的偏离，人们通常有着更多的宽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创新者将自己的文本伪装成译本，而且不仅只是在美文中存在这种情况。……

有时候，创新并非跟整个文化有关，而只是跟作家此前的活动相关，作家想改变写作风格，却又不想自己的做法与之前的声名发生联系。……同时，决定将文本作为译本，更不用说怀着这一目的创作文本，这总是隐含着一种顺从的行为，即顺从于被认为具有威望、重要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与语言。因此，这是试图将该文化具有的优越性传给文本，进而操纵受众对文本的接受。这是在译语文化中隐藏在假名背后的一种方式，而所增值的则是可能得益于一般译本或更有可能的是某种翻译传统具有的地位。

将文本伪装成译本的另一种解释则是，作者担心对自己或作品的审查措施。很明显，无论是这种动机，还是只是想赚更多的钱这种幼稚的说法，跟前面更为全面的解释都不矛盾。毕竟，最有可能受到反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对文化约束的偏离；而对译本的审查相比之下通常要宽松得多。造成这一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假定译本的来源不在本土这一事实使得译本的威胁较小；另一原因是无法真的去追查“不在场”的作者，而作者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在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翻译已经不是一种二级 (secondary) 文本生产方式；译本《惨社会》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译者（此处即苏曼殊）此前也没有什么文学（甚或文化）上的声望与资本。因此，最有可能的就是审查制度的原因了。

这就需要我们考察当时译者以及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了。

俄国是 1900 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之一，按照条约，1903 年俄国军队的第二次撤军期限已到，但俄国不但不撤军，反而提出所谓撤兵的七点先决

⁵¹ 苏、陈二人均有留学日本的经验，且此时均任职于《国民日报》。

条件，把蒙古与东北三省划归俄势力范围。这种行径激起中国人的愤怒，中国因此掀起了拒俄运动。留日学生还发起组织了“拒俄义勇队”，青年会全体成员参加并成为骨干，其中便有苏曼殊。1903年5月，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行动方式“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冯自由，1981；转引自程文超，1999：117）。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潮领域中，前后延续了40年之久（朱义禄、张劲，1998：219），传播的初期在1901—1907年间（参见朱义禄、张劲，1998：219；李怡，2001：21），1903年则为其高潮，重点是介绍与宣传俄国虚无党人的思想与行动（朱义禄、张劲，1998：219）。

1901年，梁启超在其“难乎为民上者”一文中写道：“无政府党者，不问为专制国，为自由国，而惟以杀其首长为务”（梁启超，1901；转引自李怡，2001：20），而梁启超注目的也只是其暗杀活动和“破坏主义”，并非对其学理产生了认同，这一点，梁启超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中有明确的表示：“虚无党的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转引自李怡，2001：21）维新运动失败后，从梁启超这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到很多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都倾心于暗杀、破坏等激烈手段。此时，最早接触和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暴烈之矢一致指向清政府或君主制度。（李怡，2001：21）

1902年，梁启超在他主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了罗普编写的《东欧女豪杰》，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俄国虚无党人。

1902年，马君武在其所译的介绍无政府主义历史的《俄罗斯大风潮》一书序言中说：“人间之最可恐者，莫如野蛮时代之所谓贤君英主也。”

较早而且较为系统地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是马君武。马氏在1902年，署名“独立之个人”，翻译了第一部无政府著作——英国人克喀伯著的《俄罗斯大风潮》（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译者在“《俄罗斯大风潮》序言”（1902）中，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新主义”而极力推崇（1984：2）：

法兰西之国民者，世界上思想最高之国民也。圣西门之徒倡社会主义（即公产主义）于世，其势日盛。至十九世纪，而英人达尔文、斯宾塞之徒发明天演进化之理。由是两种学说发生一种新主义，是新主义曰“无政府主义”。

此后，《大陆杂志》、《浙江潮》等报刊也陆续登载一些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苏报》1903年6月19日发表佚名文章“虚无党”（1903）：“吾心动，吾血愤，吾胆壮，吾气豪，吾敢大声疾呼以迎此潮流而祝曰：杀尽专制者，非此潮流荡薄之声乎。”（佚名，1984：4）；并在文章最后指出：“呜呼，吾欲无言，吾但取其一方针，其所以对待政府者，以属望巴枯宁其人。”（同上，5）。此后便发生了有名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苏报》被停刊。

1903年，自然生（即张继）翻译《无政府主义》一书，其作序者声言“羡慕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神速，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赞扬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盗夺杀害之权利”（转引自李怡，2001：22）张继在1904年1月2日《中国自治报》第2期发表文章“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提到绝对自由，并将其解释为“人宜自治而不肯被治于人”，“人贵为主，他人来主我者何为？”（转引自李怡，2001：22）张继乃是苏曼殊在《国民日日报》的同事。

苏曼殊不但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自己也于1903年10月在《国民日日报》发表“女杰郭耳缙”（1903），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

十一回本的《惨社会》（1903）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语境中翻译并连载的。

1903年10月17日，苏曼殊在《国民日日报》附送的《黑暗世界》上发表“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苏曼殊，2003：309—310）：

一

蹈还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苏曼殊，2003：309）

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苏曼殊，2003：310）

表达了苏曼殊反抗清朝的决心。

《惨世界》的合译者陈独秀不但也是拒俄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在安徽成立“安徽爱国会”。

《国民日日报》的编辑组成更加值得注意：主编章士钊乃原《苏报》主笔，

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张继、何梅士、陈由己（陈独秀）、陈去病、金天翻⁵²、谢晓石、柳亚子、刘师培等人（参见叶再生，2002：670—671），其中不少当时或其后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介绍过无政府主义或虚无党思想，如张继、金天翻。

1903年8月27日《国民日日报》第21号刊登的“书讯”中，有如下两则⁵³：

1 “无政府主义”：

吾编译是书想必能受吾同胞之欢迎籍此手段以削除奴隶野蛮世界则幸甚不日出书定价三角 自然生白；

2 “虚无党与中国革命之关系”：

是书公因氏所编详记虚无党手段及致用方法末言中国革命之结果壮快淋漓读之有不中霄起舞者决非爱国男儿现已脱稿不日出书 编者白。

其中第一则书讯《无政府主义》的译者便是张继（自然生）⁵⁴。

如果考虑到《国民日日报》是在《苏报》被查封后直接创办的报纸这一渊源关系，我们简直可以说苏曼殊与陈独秀简直是处在宣传无政府主义与虚无

⁵² 据邹振环（1996：184—185）：

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最为详细的意译本，当推金一〔金天翻〕译的《自由血》。《自由血》1904年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刊印，镜今书局发行，全书分八章。第一章虚无主义之起源；第二章虚无主义之导师；第三章俄国政府之内容及其压制政策；第四章革命运动之历史，分为三部分，一文学革命时代，二游说煽动时代，三暗杀恐怖时代；第五章虚无党之诸机构；第六章西欧虚无党亡命客之运动；第七章虚无党之女杰；第八章国事犯之禁锢及流放；结论。该书绪言讲：“……自由！自由之声遍于国中；倒专制，杀贵族之名词轰于四境。……国民争以其无量数之脑血、泪血、颈血染红革命之旗帜，虽不能以大蹂大膊，千里一赤，而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八骏万乘，杀之有如屠狗，短簪抉目，一瞑不视，追捕亡命，蹈死如饴。……东方有专制国焉，中国是也；西方有专制国焉，经十八世纪之反动，寿命不长，劫灰已烬。今存者，惟俄罗斯而已，夫专制政体寿命之长短与国民学问思想之程度作反比例。”绪言满怀激情地赞美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虚无党何也？自由之神也，革命之急先锋也，专制政体之敌也。……吾译虚无党，吾愿吾国民知其所奋也。”

⁵³ 这是笔者根据上海图书馆近代室《国民日日报》的缩微胶卷（索书号为3988，胶卷上的编号为2/N-0481）原文照录的，因篇幅不长，不予标点，也不再在本文的“参考文献”中列出，特此说明。

⁵⁴ 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州人，他曾于1899年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00年与他人组织青年会，后又与人组织兴亚会，主张革命。1903年春回国，在《苏报》、《国民日日报》上鼓吹革命，先后发表了《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说君》等文章。1904年加入华兴会。张继思想比较激进，是中国早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人物。《无政府主义》一书系根据日文资料编译，分上下两编，上编题为《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宣传无政府党的主张和手段；下编题为《各国无政府党》，介绍各国无政府党的历史和情况。该书虽属译作，但译者是根据当时的日文资料归纳意译的，实际上是借译述之笔而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书前有“燕客”（即译者）写的序言。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革命为图存之良药，革命为进化之利器”，“望其革命风云之速起，于此沈沈殆死之大陆，演一种雄烈壮快之活剧也。”此书出版不久，编者在1904年1月出版的《中国白话报》2期上发表了一则告白，略谓：“夫欲建设，必先大破坏，无政府党可谓达于破坏之极点矣。今之中国正值破坏时代之初，而吾编译是书，想必受吾同胞之欢迎，藉其手段以铲除此野蛮奴隶世界，则幸甚矣。”（参见并转引自蒋俊、李兴芝，1991：26—27）

党思想的中心。

无政府主义具有如下一些主要的特征或思想，（1）对权威的极端否定（周宏，2003：66）；（2）对密谋性活动的特别青睐。无政府主义推崇“用行动宣传”的信条。但是，这里的“行动”并不是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实践活动，而是密谋性的暗杀、恐怖活动（周宏，2003：67）；（3）废除国家、取消私有制，将社会的一切生产的和生活的资料归“为社会公有”的主张（张胜祖、韩未名，2001：64）。

这些特征或思想，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可以说在《惨世界》中，或通过其中人物的言语，或通过他们的行动，几乎均有所体现。

因此，无论是从篇幅上，还是从思想内容上，我们认为，《惨世界》的重心或用意乃是在于译者所“增添”的“创作”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惨世界》是一部“伪译”。而苏曼殊与陈独秀之所以不直接用创作小说发表自己的观点或主张，或者说宣传他们本身或他们认同的思想，则是出于审查制度的原因；正如叶再生（2002：671）所指出的，《国民日报》“鼓吹革命排清之锋芒不减于《苏报》，但吸收了《苏报》案的经验，论说注重策略”。

Toury（1995：45—46）指出：

在文化地位上，伪译明显地与真正翻译密切相关。因此，文本伪装成译本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文化中存在翻译的观念，而主要是因为这种观念及其实现形式〔即译本〕在文化中具有某些**功能**，而且这些功能为文化中的成员所承认与认可。……伪译者通常的做法是，在自己的文本中，将译语文化中已经与翻译相联系的特征（features）与某一具体原语与类型文本的翻译结合起来。通过强化与真正译本的象似性，使文本更加容易被当作译本。正是由于这种做法，有时才可能从虚译本重构出某种语言中虚假原文文本的点滴，就好像那许多原文文本无从知道的真译本一样。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伪译”部分，不时通过采取“翻译”视角以及保持与翻译部分的互文关系，提醒读者这是译本，或给人以译本的印象：在报纸上连载，采取“伪译”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5.3.4 主体性与意识形态：作者的人道主义与译者的无政府主义

如果说真正或真实的翻译是译有所本，那么“伪译”可以说是“无中生有”。

就本章所探讨的个案而言，则介于二者之间，既有原本可依的“翻译”，又有翻译主体的“创造”，即伪译；而从内容看，则以“伪译”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惨世界》这一文本中“翻译”与“伪译”相混杂，其特殊之处在于翻译主体将“伪译”“插入”一个“翻译”之中，并在“伪译”中采取翻译视角；换言之，在译本发表或出版的时候，翻译主体并不希望读者知道那是“伪译”，而是希望读者觉得自己阅读的是“译本”，这种做法与清末译者那种“明目张胆”地告诉读者哪些地方是他们自己的“得意之笔”完全不同。今天看来，翻译主体的主体性程度非常高，但在当时，翻译主体所要隐藏的恰恰就是其主体性。

那么，苏曼殊与陈独秀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显然，这与译者的语言、诗学等主张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是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主张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译者的意识形态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译者的主张就是要推翻当时的统治阶级，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却又无法明确地以译者自己的主张的形式公开或发表，即不存在这种一种言论自由的环境。

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作品中，塑造了冉阿让这一主人公，围绕这一形象，雨果虽然“描述了当时法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高韵青，1998：81），但他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道德理想，却是人道主义：“雨果却并不主张用流血和暴力来彻底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并不主张对社会采取‘报复的行动’”；“他把仁慈、博爱看作拯救人类于一切苦难之中的永恒的力量”（同上）。

高韵青在“从《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形象看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1998：82）中指出：

在雨果看来，一个不幸者挺身去和整个社会搏斗，只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只有仁慈博爱才能够提高个人道德、疗救社会疾患；而在永恒的爱的光辉照耀下，一切受难者均将得救。作者笔下的米里哀神父，实际上是爱的精神的化身，他显示了上帝的爱的巨力威力，把冉阿让这个“异常险狠”的苦役犯感化成为一个皈依宗教、一心向善的人。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冉阿让被感化而在心灵上“脱离苦难”的过程，歌颂了那在他生活中和心灵上撒下了无限温暖的“爱”的光辉，歌颂了宗教精神对于人类的巨大感召力量，从而宣扬了道德感化的思想。

显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表达的，除了在“注写人类困顿流离诸状”上有着共同之处外，他所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或者说意识形态立场与主张，与苏曼殊、陈独秀的立场与主张是完全不同的。

而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苏曼殊、陈独秀在《惨世界》中的翻译行为，可以说是一种“鼓吹”，而且鼓吹的是“起义”与“暗杀”等无政府主义主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在“翻译”部分对原文进行删节，并增添内容，改变米里哀神父在译本读者中的形象。

从以上对《惨世界》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译者”的重点并不在于介绍与引进雨果及其《悲惨世界》，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雨果？为什么要选择雨果的《悲惨世界》？

苏、陈之所以选择雨果及其《悲惨世界》，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可能“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出现的‘雨果热’有密切的关系。”（邹振环，1996：172—173）；“苏曼殊与陈独秀都是在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日本翻译家的雨果译作，以强烈的色彩如实地把资本主义创始期的罪恶展示在中国留学生面前。他们敏锐地意识到，雨果这些感伤而又愤激的作品，一定会大受中国读者的喜爱。”（邹振环，1996：173）

章士钊认为，陈独秀“时与香山苏子谷共译俄小说，注写人类困顿流离诸状，颜曰《惨社会》，所怀政想，盖与此同。”（孤桐，1926；转引自陈万雄，1979：12），此即说，“选择雨果作品作为改写对象，说明苏曼殊和雨果在思想上有一定相通之处，使他能从雨果著作中，看到自己身处其中的苦难中国的影子”（毛策，1995：26）

但是，对《惨世界》中“翻译”部分的分析可知，译者的意识形态主张与作者或原本是不一致的，是相抵触的，甚至如柳亚子所说的，“苏曼殊和俄俄在思想上”存在“根本的不同”。

因此，唯一可以解释雨果及其《悲惨世界》被苏、陈选择的，是雨果作为一个域外作家的声誉或文化地位。译者通过将“伪译”插入雨果的译本之中的方式，可以避免被审查或免除由此带来的责任。对此，Toury（1995：42）作过这样的解释：

将文本伪装成译本（……）的另一种解释则是，作者担心对自己或作

品的审查措施。很明显，无论是这种动机，还是只是想赚一些钱或更多的钱这种幼稚的说法，跟前面更为全面的解释都不矛盾。毕竟，最有可能受到反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对文化约束的偏离；而对译本的审查相比之下通常要宽松得多。造成这一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假定译本的来源不在本土这一事实使得译本的威胁看来较小；另一原因是无法真的去追查“不在场”的作者，而作者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Toury 考虑的主要还是文学（系统）。《惨世界》则并非出于文学的原因，而是基于伪译者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立场。无论如何，苏、陈采取“伪译”的方式肯定与担心来自当局的审查有关则是无疑的。下面一则由有关当局发出的电告可以说明这一点（转引自毛策，1995：23—24）：

上海逆党著书报刊，煽惑人心，大逆不法，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按名拿办。乃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依然妄肆蜚语，昌言无忌，实属执迷不悟，可恨已极。仰各属府、州、厅、县，将《国民日日报》荒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准买看。如有寄售《国民报》者提究。

电告并咨请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转致邮政局“毋得代寄《国民日日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同上）

至于苏曼殊与陈独秀选择雨果《悲惨世界》的原因，固然如杨天石（1995：30）所言：“打动苏曼殊和陈独秀的正是雨果对下层人民及其悲惨命运的同情”⁵⁵；但从本章的分析看，这种选择更多地体现为译者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与手段。

从文本上言，《惨世界》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不但有依据原本⁵⁶的翻译，但是一个不完全的翻译，译者却以完全与完整的译本出现；虽然在结构上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译本，译者却在译本中间“插入”表达自己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的“伪译”——因而，《惨世界》既不是本体意义上的译本，却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伪译”，而是“翻译”与“伪译”兼而有之。结果是，在历史上，既有将其视为“翻译”文本者，也有将其视为“创作”文本者，却没有论者将其视为“翻译+伪译”的混合文本。只有从“混合”性上，方可以看出（伪）译者的

⁵⁵ 章士钊后来也回忆说：陈独秀“时与香山苏子谷共译俄小说，注写人类困顿流离诸况，颜曰《惨社会》，所怀政想，盖与此同。”（转引自杨天石，1995：30）

⁵⁶ 尽管未必是依据雨果的法语原著 *Les Misérables*，有可能是其它语言的译本（如英译本）。

主体性，即译者的动机与意图所在。要做到这一点，则就要求研究者从文本出发，却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文本本身，从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译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动机等方面进行多视角的考察与分析。

第六章 异化的萌芽：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

如果说，在晚清的文学翻译实践中，翻译方法乃是以“意译为主的时代风尚”（陈平原，1997：619）；那么，清末“周氏兄弟”¹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就显得尤为突出了，是晚清翻译实践中常规的一种变异。本章试图围绕周氏兄弟1909年编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1909）这一个案，探讨异化翻译。

对于鲁迅翻译的研究或讨论，早在鲁迅在世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的就是1920年代后期与1930年代初期的那场甚至带有政治斗争性质的争论，其中梁实秋、赵景深、瞿秋白等名字甚至因此成为一种象征或代表了。

而在1949年以后，翻译研究领域，特别是大陆的翻译研究领域，则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一些论者，找出一些比较好的经典例子，说明鲁迅的译文是多么好懂或不难懂（如李季，1952；袁锦翔，1990），有的甚至是加以拔高²。

对鲁迅的研究，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³。然而，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鲁迅全集》出版过好几种，而差不多鲁迅的每一句话都给反复咀嚼研究，偏是研究鲁迅翻译的文章却这么少。”（王宏志，1999：219）尽管最近几年来，研究鲁迅⁴与周作人的翻译的论文有所增加，特别是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如王宏志，1999）；但是鲁迅的译著几乎与著作各半，周作人的翻译也相当多⁵，对其翻译的研究与其译著的份量显然不成比例：就笔者所知，以鲁迅的翻译作为博士研究对象的，至今只有两篇（Lundberg，1989；刘少勤，2003）；以周作人的翻译作为博士研究对象的，则只有一篇（王友贵，2001）。

¹ 周树人与周作人，在清末，特别是在民初（乃至新文化运动初期），主要是以“周氏兄弟”名世的；但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在他们早年的作品中，署名有时是互相借用的，即：有的作品为鲁迅所作，却以周作人的名义发表；也有的作品虽为周作人所写，发表时却署了鲁迅或周树人的名字；有的作品则属于他们兄弟两人合写，发表时却随便地署上了一个人的名字。”（张菊香，2002：37）。后文中也会根据语境的需要，采用鲁迅与周作人等名字来表述。

² 如王友贵在《翻译家周作人》（2001）中称，《域外小说集》“开始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派的‘改造民族的灵魂’的基本音调，……此书的设计一开始就意在使其成为一盏指路明灯，一个引进域外新文学新思想的坐标”（30）；“在译介对象上，它首先将文学翻译家的目光引向东欧南欧北欧，开创了20世纪翻译文学的新格局，而且也是推动落后的俄国文学翻译介绍、使之呈现后来居上的情势的一个起点。这一重大转折不惟改变了20世纪翻译文学的格局，改写了中国翻译文学史，而且改变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走向”（46）。

³ 事实上，对鲁迅的研究已有专门的名称“鲁迅学”，如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2001）。

⁴ 虽然鲁迅这一笔名是周树人在1918年才开始使用的（鲁迅，1981：第十六卷，11），但由于习惯的原因，大多论者并未考虑时间因素，即便是研究此前时段的，也采用“鲁迅”这一名字；本文在无特别理由的情况下，也从此习惯。

⁵ 据王友贵（2001：199注2），“周作人一生翻译的总量大抵为491万字”，而这“其实并非周作人翻译的实际总量”，总之文学翻译“构成周氏文学世界之‘半壁江山’”（5）。

6.1 周氏兄弟初期的翻译

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论者大多将清末至五四运动前划分为第一阶段，如陈玉刚（1989：165）便认为，“鲁迅一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便是“从1903年到1918年”；王友贵（2001：12）指出，虽然“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分期，很难划分精当。……大致也可分为3个时期，即早期：1904-1921年”。我们这里只讨论周氏兄弟第一阶段中的晚清时期。

1903年对于鲁迅的翻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年份。在这一年，来日本将近一年的鲁迅先后翻译并发表了四种译文：最早的翻译是发表在1903年6月《浙江潮》第5期上的“斯巴达之魂”（鲁迅，1903a）与“哀尘”（鲁迅，1903b）；10月出版《月界旅行》（1903c）；12月发表《地底旅行》首二回（1903d）（鲁迅，1981：卷16，5—6）。

如果从翻译方法的角度看，鲁迅此时的翻译与晚清当时的翻译规范相比，实在没有什么差别可言，甚至我们可以说尚未达到当时的翻译规范水平：譬如，虽然鲁迅在“斯巴达之魂”的前言中自称“译者”（1903a；1981：卷7，9），可是不但鲁迅本人当时没有说明原文的出处，后来也记不起原文是什么了（1935；1981：卷7，4）：

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

而且“直到目前，中外的鲁迅研究专家也同样没法找到这篇‘翻译’的‘老家’——它的原著”（王宏志，1999：186）⁶；至于“哀尘”，即便是“译者附记”，其内容大多也是从日文译本的译者“序文”翻译过来的（工藤贵正，1995：39）。

再来看法国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的作品翻译。

《月界旅行》乃是鲁迅据日本井上勤的译本重译凡尔纳的科学小说*De la terre à la lune*（1865），从翻译方法（包括语言的选择）上而言，也可以称得上是梁启超式的“豪杰译”⁷了（鲁迅，1903c；1981：卷10，152）：

⁶ 因此有论者认为“《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蒋荷贞，1992；转引自王宏志，1999：186）。

⁷ 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月界旅行》辨言”与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译后语”（1902；1997：64）

《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

从翻译选材的视角看，固然如鲁迅在“辨言”中所说：

盖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实《镜花缘》及《三国演义》之赐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但更为实际与直接的考虑，可能还是周作人的说法较为准确，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和《地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周作人，1956：456），并且可以说，无论是在翻译观与翻译实践上，都是在跟梁启超的翻译之风。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在先后翻译并发表了《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后，并不知道这两部作品的作者均是同一个人——法国科学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而是将作者的名字作了不同的翻译：（1）《月界旅行》的作者是“培伦”：“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鲁迅 1903c；1981：卷 10，151）；（2）《地底旅行》的作者则成了“英国”的“威男”⁸。这一点，即便是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乃是鲁迅“出于对日译底本的尊重，依据日译用语”（工藤贵正，1995：43）的结果；但从上所述，不难看出，鲁迅初期的翻译无论是从方法、选材，还是翻译语言上，依然是当时的意译风气。

这一点，即便是从鲁迅的“《月界旅行》辨言”（1903；1981：卷 10，152）也可以得到直观的印象：

存在着某种互文的关系：“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

⁸ 这里的“威男”，笔者认为为Verne的音译。

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书名原属《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意，今亦简略之曰《月界旅行》。

换言之，其方法可能比当时的主流方法还要极端，用鲁迅“致杨霁云”中的话来说，“但我的译本，似未完，而且几乎是改作”；以致于鲁迅后来还为此感到懊悔：“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鲁迅，1934；1981：卷12，409）。

周作人的翻译情形与鲁迅类似，1904—1906年之间有多篇译本发表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06年，小说林社出版的《孤儿记》，书不分卷，不分回，署“会稽平云撰”，“周作人以平云署名将雨果《悲惨世界》译成《哀史》，又称《孤儿记》”（邹振环，1996：176），可以说是伪作。而平云在其“《孤儿记》凡例”（1906；1997：177）中又说：

一、是记为感于器俄《哀史》而作，借设孤儿以甚言之。

.....

一、是记中第十及十一两章，多采取器俄氏 Claude Geaux 大意。此文系器氏小品之一，志此以示不敢掠美，且谢唐突。

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至少是“著”“译”混杂。

总而言之，周氏兄弟在1906年以及此前的翻译，无论是选材还是翻译方法，均未超越当时的常规。

6.2 周氏兄弟翻译方法上的转向

我们认为，周氏兄弟翻译上的转向发生在1906—1907年之间，而不是学术界公认的1909年¹⁰。

⁹ （1）1904年，周作人开始从英文翻译《侠女奴》，译文发表在同年《女子世界》第8至12期，署“萍云女士述文”（陈大康，2002：124）；小说林社1905年出版单行本，署“萍云译，初我润”（陈大康，2002：140）。（2）1905年5月，小说林社出版周作人的译本《玉虫缘》，署“（美）安仑坡著，碧罗译，初我润”（陈大康，2002：140）。（3）1906年，《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合刊（第二年第四、五期）发表鲁迅翻译的“短篇小说”《造人术》，署“（美）安仑坡著，碧罗译，初我润”（陈大康，2002：140），据张菊香（2002：41），“《造人术》译后附言却为周作人所写，也发表于《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附言署名萍云”；1906年，《女子世界》第十三、十四、十五期均有周作人的译本发表：第十三期刊载“短篇小说”《好花枝》；“会稽萍云女士假造”的“短篇小说”《女猎人》；第十四、十五期连载（英）陶尔（Dayle）的《荒矶》（陈大康，2002：149）。

¹⁰ 这只不过是一个出版年份，尽管在没有其它时间证据的情况下，也被视为某一事件的发生时间。

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来到东京与许寿裳等筹商提倡文艺运动；1907年夏，鲁迅与许寿裳等筹办《新生》文艺杂志（鲁迅，1981：卷16，6—7）。鲁迅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筹办文艺刊物，应该说主要与当时翻译已成潮流有很大的关系，原因是：第一，到此时为止，鲁迅（以及周作人）尚未写出真正的原创文艺作品¹¹，因此筹划中的刊物主要不是发表创作作品的；第二，据樽本照雄（2000：163；171）的统计，1901—1907年间，“翻译多于创作”，并且在晚清时期，1907年翻译达到“顶峰”。

虽然我们尚无确凿的证据说明鲁迅等人当时筹办文艺刊物的具体细节以及有关的准备工作，但从现有的资料可以推断，鲁迅“指导”或督促周作人¹²翻译了不少“文艺”作品，并准备在筹划中的刊物上发表¹³。

1907年春，周作人翻译《红星佚史》（1907）（*The World's Desire*¹⁴），同年11月¹⁵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颜廷亮，1996：213）；其中十六节诗，则是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用离骚体笔述（张菊香，2002：41）¹⁶。

周作人在其所作的“《红星佚史》序”（1907；1997：251—252）中指出：

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

¹¹ 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1981：卷4，511）中说：“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

¹² 周作人是在1906年夏秋之间（陈福康，1992：170），与回国完婚的鲁迅一起赴日本留学的。

¹³ 鲁迅等人筹办的刊物最后流产。周作人在1908年有多篇（部）译本发表：6月10日，《民报》第二十一号刊载《一文钱》，题“（俄）斯蒂勃克著，三叶译”；10月2日，商务印书馆出版《匈奴奇士录》，标“言情小说”，署“（匈牙利）育诃摩耳著，周逮译”；12月5日，《河南》第八期载《庄中》，标“短篇小说”，题“（俄）安敦·契诃夫著，独应译”；《寂寞》，题“（俄）安介·爱梭·坡著，独应译”（参见陈大康，2002）。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许广平在1938年6月5日初版、1948年12月15日三版的《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中的一个“按”中，引用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8：188）：

豫才在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退了学，……再到东京的目的……简单得一句话就是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办杂志不成功，第二步的计划是来译书。……总算印出了两册《域外小说集》。

由此看来，“办杂志”与“译书”是先后不同的两件事了，但笔者认为，周作人的这一说法可能由于距当时有一段距离而存在不确之处，如周作人说鲁迅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但事实上是鲁迅与许寿裳等人一起筹办刊物；在时间上，鲁迅1932年1月16日给增田涉的信中，便说：“《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鲁迅，1932a；1981：473）。而周作人的“关于鲁迅之二”等回忆性文字均是鲁迅1936年逝世之后写作的。

¹⁴ 有论者认为《红星佚史》译自Henryk Sienkiewicz的*The Lighthouse Keeper of Aspinwell*（王宏志，1999：210注1），不知依据何在；据《鲁迅全集》第16卷（附集）的“鲁迅著译年表”（1981：7），《世界的欲望》为英国哈葛德与安德鲁·兰合著。

¹⁵ 但据《鲁迅全集》第16卷（附集）的“鲁迅著作年表”（1981：7），译本则是在12月份出版的。

¹⁶ 有论者因此认为鲁迅与周作人“合作从事翻译，是在日本开始的，时在1907年”（陈福康，1992：170），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看法（王宏志，1999：210注1）。

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弛其神智，否者或群逼糲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周作人（以及鲁迅）在翻译观与翻译选材等方面，与当时或此前的翻译规范已经开始有了不同：对当时或此前主要从意识形态话语（主要是从翻译的社会教化功能）的视角为翻译寻找合法性的根据这一做法提出了委婉的批评¹⁷；而从“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来看，则可以断定这是在影射林纾的翻译了¹⁸。上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氏兄弟此时已经（开始）注意域外文本中的文学性以及文学文本（“说部”）的功能。

最为突出的是在 1909 年：周氏兄弟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分别于这一年的 3 月与 7 月在日本东京出版。

6.3 《域外小说集》

周氏兄弟编译¹⁹出版的《域外小说集》（1909）分两册，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出版，共收录短篇小说十六篇，其中三篇为鲁迅翻译，其余均为周作人翻译²⁰。

6.3.1 《域外小说集》的作者分布与选材

考察《域外小说集》（1909）的作者分布与选材状况，考察的对象理当是 1909 年的初版《域外小说集》。遗憾的是，笔者虽多方搜罗，依然未能查阅到——更别说买到——这个版本。只好退而求其次，依据 1921 年增订版《域外小说集》

¹⁷ 周作人的“《红星佚史》序”（1907）是在 1907 年的二月写就的，而摩西发表在《小说林》1907 年第一期的“《小说林》发刊词”（1907）中指出当时存在的“一蔽”，即“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1997：253）：“……今也反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1997：254），并提出了有关小说实质的看法：“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同上）。

¹⁸ 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1920；2003：87）就说林纾“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

¹⁹ 《域外小说集》1909 年初版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1921 年重印本则署“周作人编译”，且增加不少篇目。

²⁰ 大多数论者在讨论《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基本上不提周作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全是鲁迅翻译的，如郭延礼（1998：445）便指出：“鲁迅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域外小说集》”；但如果仅仅从翻译的数量上言，可以说周作人应该是这个集子的主译者。论者之所以这么做，可能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1921)。问题是,这两个版本除了在文字上有所不同外²¹,在篇幅上相差很大。因此,有必要先来看一下《域外小说集》(1909)的分册目录,弄清楚初版的《域外小说集》两册究竟有哪些篇目²²。以下的篇目根据陈大康(2002: 236; 244)制定,作者英文名及生卒年份则据与1921年版《域外小说集》篇目相同的1938年版正文后的“著者事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括号内提供作者今天的通用译名。

《域外小说集》(1909)分册目录

《域外小说集》(1909)第一册,书首有《序言》及《略例》,收录7篇:
 波兰: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1篇:“乐人扬珂”;
 俄国:契诃夫(Anton Tshekhov 1861-1906)2篇:“戚施”,“塞外”;
 俄国: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 1855-1888)1篇:“邂逅”;
 俄国:安特来夫(Leonid Andrejev 1871-1919)2篇:“谩”,“默”;
 英国:淮尔特(Oscar Wilde 1854-1905)[王尔德]1篇:“安乐王子”;

《域外小说集》(1909)第二册收录9篇:

芬兰:哀禾(Juhani Aho 1861-)1篇:《先驱》;
 美国:亚伦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爱伦·坡]1篇:“默”;
 法国:摩波商(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莫泊桑]1篇:“月夜”;
 波思尼亚:穆拉淑微支(Milena Mrazovic)2篇:“不辰”,“摩诃末翁”;
 波兰: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2篇:“天使”,“灯台守”;
 俄国:斯谛普虐克(Slepniak 1852-1897)1篇:“一文钱”;
 俄国: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 1855-1888)1篇:“四日”。

根据上表,可以得出一个《域外小说集》(1909)中作者所属国家与收录文本数目分布的状况,即:俄国:7;波兰:3;芬兰:2;法国:1;英国:1;美国:1;波思尼亚:1。

由此可以看出,收录文本与作者最多的国家是俄国,几乎占了半数。这一

²¹ 1921年版《域外小说集》对1909年版《域外小说集》中的部分偏僻古字作了改动(鲁迅,1921)。

²² 笔者为此访求多家古旧书店,查阅多家大图书馆,均未能如愿;这里列出的目录,严格说来,也属于二手资料。

作者分布统计结果无法支持一些在学界流传与流行的说法，如认为《域外小说集》“重点介绍了北欧和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郭延礼，1998：447），因为俄罗斯民族在当时绝对不是“弱小”的民族。而即便是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1909）中“重点介绍了北欧”的作家与作品，其原因也是如“《域外小说集》略例”中所言：“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鲁迅，1909；1981：卷10，157）。

在体裁上，译者选择的是“短篇小说”；在原文作者的选择方面，注意到了此前基本上未曾受到注意的一些国家，如芬兰、波兰。周氏兄弟当时这么做的原因肯定不是单方面的，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地推断出所有的原因，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解释：之所以选择“短篇小说”，固然有引介域外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用意，但也不能排除当初翻译这些文本主要是为筹划中的刊物这一原因；至于对原文作者方面的选择，诚然如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1981：第四卷，511）中所言，“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但恐怕我们不能排除周氏兄弟以及论者没有指出的另一个因素：选择较为“偏僻”或“生僻”的作者与作品，发生“撞车”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了²³。用鲁迅后来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1929）中的话说，乃是因为“便捷，易成，取巧”，“贪图用力少，介绍多”（1981：卷4，131）。甚至，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譬如鲁迅在1921年版的“序”（1921；1981：卷10，161）中便说过：

但要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6.3.2 翻译的动机与目的²⁴

周氏兄弟翻译并出版《域外小说集》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呢？大多数论者

²³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还有一个原因：一般而言，在同一种语言里，译本的语言难度要低于原创文本的语言，因而，通过译本翻译第三国的文本（鲁迅后来称之为“重译”，即今天的“转译”），在语言难度上，对译者而言相对要低一些。

²⁴ 动机与目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据《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本），前者是“推动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念头”（302），后者是“想要达到的地点或境地；想要得到的结果”（904）；但二者似乎又存着一定的区别。

基本上援引了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1921; 1981: 卷 10, 161)中的说法,如郭延礼(1998: 446)便认为,一是为了“改造社会”;二是为了借鉴外国文学的艺术技巧;并明确指出“这两点”在 1909 年与 1921 年的两个序言中都有“说明”(郭延礼, 1998: 446)。但论者似乎没有看出,这两个序言之间存在着矛盾或某种程度上的不一致之处,至少在重心上是不同的。

较为可靠的办法,依然是从文本解读开始。先看“《域外小说集》序言”(1909; 1981: 卷 10, 155),全文引述如下: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序言”的第一句便隐含了译者的翻译动机,即与“近世名人译本”相抗衡;这里的“近世名人”是指当时处于翻译场中主流位置的林纾。对此,鲁迅 1932 年一月十六日²⁵在致增田涉的信中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鲁迅, 1981: 卷 13, 473):

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

但这其实只是译者翻译动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触发点。

与其说周氏兄弟针对的是林纾本人,不如说针对的是当时的主流(文学)翻译界。虽然译者当时不过是二十多岁的“无名”青年²⁶,但是,正如前述,鲁迅等人此前曾经筹办一个文艺刊物——而且打算主要是发表译文的刊物。由此来看“序言”中的“《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

²⁵ 王宏志(1999: 194; 214)说是“1月6日”。

²⁶ 1909年5月1日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与日本人》第508期“文艺杂事”上有报道,全文如下(藤井省三, 1980: 91; 转引自王宏志, 1999: 212注14):

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革命的虚无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等措辞，就不难体会到译者不满的乃是当时那种并非“词致朴讷”，但“收录”却不“审慎”，因而“失文情”的译本。这一点，在“序言”的最后一句中得到了证实：“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这可能也是周作人所说的，这篇短短的序言，“气象多么的阔大，而且也看得出自负的意思来”（周作人，1971：231；转引自王宏志，1999：201）。

周氏兄弟的另一个动机，则是“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域外短篇小说在中国的翻译，此前便已经有了，最早标有“短篇小说”这一标签的则是1904年10月《教育世界》第八十四号刊载的“制造书籍术”（陈大康，2002：126）。因此，如果从“引进”“短篇小说”这一体裁（genre）的角度看，《域外小说集》（1909）并不具有开创的意义，也未必如冯至所说的，“它是采取进步而严肃的态度介绍欧洲文学最早的第一只燕”（转引自郭延礼，1998：446）。这本小说集的独特之处，正如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中所指出的（1909；鲁迅，1981：卷10，157）：“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此外，如果说此前的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试图使作者向（译文）读者靠拢，那么，周氏兄弟在这里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向，试图让当时的中国读者向作者靠拢，走向比较真实的域外作者与作品，如鲁迅便在有关安特来夫（今译“安德烈夫”）的“杂识”中说，“安特来夫……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在有关迦尔洵的“杂识”中指出，“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鲁迅，1909；1981：卷10，159）。因而，如果从文学的艺术或诗学的角度看，周氏兄弟又确实做到了将“异域文术新宗”带到了“华土”。

这种艺术上的“异质”性在鲁迅执笔的“《域外小说集》序”（1921；1981：卷10，163）也得到了印证：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1921；1981：卷10，161）中一开始便说：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鲁迅的这一解释，后来的论者一再加以引用，以此说明鲁迅²⁷——而不是周作人，也没有提及周作人——“译介外国文学”是为了“改造社会”（郭延礼，1998：446）。我们如果从1909年的“序言”看，虽然其中也提到：

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沓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

但联系到前引周作人“《红星佚史》序”（1907），当可看出，“改造社会”即便是周氏兄弟的翻译目的之一，也不应该是其主要目的。这一点，还可以在鲁迅作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1908；1981：卷1，71）中得到说明：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英人道覃（E. Dowden）有言曰，美术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勉，有时丧我而惆怅，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已经在强调“纯文学”的功能了，即文学——自然包括翻译文学——“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1921年版的“序”

²⁷ 非常有趣的是，这篇“序”在1921年版《域外小说集》上的署名是“周作人”，但据周作人后来的说法，实际上却是“鲁迅”执笔的：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对此有所说明：“过了十一个年头，上海群益书社愿意重印，加了一篇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写的。”

在内容——或者说强调的重心²⁸——上之所以发生了某种变化，自然也可以理解：十多年之后，中国的形势，甚至是局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动；而1909年尚年轻无名的译者，到了写序的1920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即便不是领袖人物，至少也是主要人物了。

6.3.3 新的翻译范式

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过程中，可谓开创了新的翻译范式，这一点，在对《域外小说集》的（翻译）研究中，尚无论者注意到。这一范式主要体现在“《域外小说集》略例”（1909；1981：157）中：

一 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

一 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逡徙具足耳。地名无他奥谊。人名则德，法，意，英，美诸国，大氏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谊，次氏。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匈牙利独先氏后名，大同华土；第近时效法他国，间亦逆施。

一 ！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门之儿僮——年十四五耳——亦至”者，犹云名门之儿僮亦至；而儿僮之年，乃十四五也。

一 文中典故，间以括弧注其下。此他不关鸿旨者，则与著者小传及未译原文等，并录卷末杂识中。读时幸检视之。

这里提到的几个方面——人名地名、标点符号、作者介绍，乃至与翻译没有直接关系的装订，如果与晚清当时的翻译规范加以对照，二者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同时，译者的这种做法也具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学术特征²⁹了。

当然，《域外小说集》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新范式，则是周氏兄弟所采用的“直译”方法了。

²⁸ 如果说鲁迅这里所说的是当时的事实，那也主要是受到以梁启超“新民说”为代表的启蒙主张的影响；也并非如相当一部分论者所认为的，是鲁迅等人的“首创”。

²⁹ 需要指出的是，周作人1907年2月译出的《红星佚史》，1907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时，译者“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被出版社完全删除。

6.3.4 直译：异化的萌芽

如前所述，晚清时期的主流翻译规范是意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文文本的生成干预较多。但是，在晚清后期，特别是 1907 年及此后，“出现了一些比较认真的译作，基本上采用直译，……但‘直译’始终没占主导地位，理论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陈平原，1997：624）相反，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直译”在“清末民初是个名声很坏的术语”（陈平原，1997：624—625）：“它往往跟‘率尔操觚’、‘诘屈聱牙’，跟‘味同嚼蜡’、‘无从索解’，跟‘如释家经咒’、‘读者几莫名其妙’联系在一起。”

周氏兄弟虽然在“序言”中没有明确提出“直译”之说，但序言中又确实提到了“直译”的一些特征：“词致朴讷”、“弗失文情”；同时，周氏兄弟在上引“《域外小说集》略例”中说到人名与地名的翻译时，指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逡徙具足耳。”而在《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前，鲁迅在为周作人译的《劲草》所作的序中，也提到翻译应该“使益近于信达，”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而译者求诚之志，亦或稍遂矣。”（转引自陈福康，1992：174）从这里不难看出，尽管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没有对其翻译方法（即“直译”）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很明显，这一方法的主要内涵在于“忠实”于原文；在某种意义上言，相当于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中提出的“信”。

严复虽然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但从其在《天演论》中的翻译实践与“译例言”看，他本人——以及其后晚清的绝大多数译者——并未实践这一后来影响中国翻译界近百年的翻译原则。周氏兄弟便不同，不但将忠实于原文作为翻译的原则加以遵守，而且具体落实在翻译的方法上了，即后来有名³⁰的“直译”。

6.3.5 何谓“直译”？

那么，究竟何谓“直译”？周氏兄弟并没有对此直接加以界定。我们不妨考察 1909 年前后，周氏兄弟对他们的翻译方法——“直译”——有过哪些表述

³⁰ 茅盾在“直译·顺译·歪译”（1934；1984：351）中指出：“‘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

31。

就笔者所见的文献而言，周氏兄弟在1909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对“直译”作出较为详细的理论阐述，只是在一些译本的序、跋或附记中说明自己的翻译方法。

1913年，鲁迅在“《艺术玩赏之教育》译者附记”（1913；1981：卷10，416）中，说自己用的方法是“循字逐译”，认为这样才“庶不甚损原意”。同年，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社给周作人译《炭画》³²的退稿信中说：“虽未见原本，以意度之，确系对译，能不失真相，因西人面目俱在也。但行文生涩，读之如读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转引自陈福康，1992：175）；陈福康（1992：175）因此认为，周氏兄弟当时并未使用“直译”这一术语，最初使用的，“可能是‘对译’一词”。同时，这封退稿信再次点明了“直译”的一些特点：保留了原文的“真相”，译文“行文生涩”。

到了1917年，周作人在“《古诗今译》题记”（1917；转引自陈福康，1992：175-176）中指出：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谤阿克列多思学了中国文自己来做。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第二年，周作人在“文学的改良与孔教”（1918；转引自陈福康，1992：176）中对“直译”作了“最好的说明”³³（郭延礼，1998：464）：

至于“融化”之说，大约是将它改作中国事情的意思，但改作以后便不是译本；如非改作，则风气习惯，如何“重新铸过”？我以为此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³¹ 周氏兄弟的“直译”观，其内涵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在鲁迅后来与梁实秋、瞿秋白等人的有关争论或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由于研究对象时间上的限制，这里不拟展开讨论。必须指出的是，论者这种将后来的观点来解释前期的实践与观点的做法，特别是在前后观点的内涵上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也不妥当。

³² 王宏志（1999：209）作《炭书》。

³³ 这是周作人1918年11月8日答复张寿朋的信。

周作人强调，“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是“最为正当”的方法；如果出现“成绩不良”，那是他“毫无才力”的结果，与方法本身无涉。这种方法，鲁迅后来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1921；1981：卷10，169）中也说，“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

周氏兄弟最早使用“直译”一词³⁴，是在1920年：周作人在“《点滴》序”（1920；1986：302）中指出这部白话文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有“两件特别的地方”，第一件便是“直译的文体”。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1925；1981：卷10，245）也指出：“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真正开始对“直译”进行阐述与总结³⁵，是周作人在1925年6月为译文集所写的“《陀螺》序”（1925；1984：398）：

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达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 *Lying on his back* 一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词了。据我的意见，“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至于有些天才的人不但能够信达雅，而且还能用了什么译把文章写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好的，不过是别一问题，现在可以不多说了。

在这里，周作人不但界定了直译，而且举例说明直译、胡译、死译之间的区别，有论者认为这是“十分精辟”（陈福康，1992：177）的。

不过，最为全面而又辩证的论说，当是鲁迅在“‘题未定’草”（1935；1984：301）中的一段话：

³⁴ 需要指出的是，就笔者所阅读的文献而言，“直译”一词并非周氏兄弟首先使用。傅斯年在1919年1月16日所作的“译书感言”（1919；1984：366）中便已认为“用直译的笔法”是“译书的方法”中“公共的原则”之一。从此文还可看出，傅斯年在此前便已经使用“直译”一说了（1984：367）。

³⁵ 茅盾在1922年8月发表“‘直译’与‘死译’”（1922；1984：343）中指出：“近来颇有人诟病‘直译’；他们不是说‘看不懂’，就是说‘看起来很吃力’。”由此看来，周作人的“《陀螺》序”（1925）——甚至周氏兄弟在此前后的一些表述——有可能也是对那些“诟病”直译者的回应。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懂，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这里的思考，已是在与梁实秋等人展开论争之后；严格说来，周作人（1925）与鲁迅（1935）中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换言之，周氏兄弟在晚清末年的“直译”，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原文的“忠实”上，正如当时与周氏兄弟住在一起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回忆所言：“我曾将德文译本对照读过，觉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转引自陈福康，1992：175）。

从以上对周氏兄弟的“直译”考古式的考察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周氏兄弟为什么要采用“直译”的方法³⁶了：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过程中，坚持求“真”意识，力求以“原意”、“真相”或“面目”与“丰姿”呈现在读者面前，

³⁶ 王宏志（1999：226）指出，“鲁迅最清楚地解释了他选择‘直译’的原因，是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及《关于翻译的通信》两篇文章”，但笔者认为，鲁迅的解释或者说鲁迅的观点与1909年以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观点有了较大的差异，如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1932b；1981：卷4，382）中指出：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

针对中国“文或话”存在的问题，鲁迅提出（同上）：

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鲁迅这种希冀通过“直译”来改造中国语言并因而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最终改变甚至颠覆当时的意识形态）的翻译动机或目的，在1909年至（发表白话小说的）1918年之间，是不存在的。笔者因此也就对此不予讨论。

将真正的“异域文术新宗”介绍到“华土”来，使译本的读者了解域外的“性解思惟”，这一点，茅盾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1954；1984：502）中指出来了：

近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可以说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但是，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对近代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的介绍的，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他在一九〇七年写了《摩罗诗力说》，扼要地论述了东方古代和西欧近代文学的主潮；而在他所计划、翻译和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九〇九年）中，俄国的契诃夫，波兰的显克微支，法国的莫泊桑，丹麦的安徒生，第一次以真朴的面目，与我国读者见面。

当然，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1909）的翻译中采用“直译”，也是针对以林纾为代表的“误译”风气，挑战当时译界的主流翻译规范。

6.3.6 翻译的语言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异化”，主要是体现在翻译方法上³⁷，即对原文文本（以及作者）的“信”或“诚”这一层面³⁸。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因为周氏兄弟的翻译语言。

不但在晚清末年，而且在民初³⁹，主流的书面语言依然是文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文本所采用的语言，也是如此。换言之，翻译的规范语言是文言。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也不例外。

稍微有点令人感到例外的是周氏兄弟所运用的语言，与同一时期的文本相比，更加具有“复古”的特点，有论者指出（王友贵，2001：37）：

周作人的13篇文字皆古奥端正，鲁迅译的3篇用字还要古僻一些，倘若将他先前译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同《域外集》比较，《域外集》的文字观明显后退，因此二人的语言观在这一时期出现保守后退的回流。

³⁷ 如果按照Lawrence Venuti（1995）的说法，对原文文本的选择亦属于“异化”的范围，但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就失去了区分“归化”与“异化”的意义了。

³⁸ 而即便是在这一层面，周氏兄弟的“信”或“诚”也基本上是停留在文本的层面，并非如有论者所说的是“翻译伦理”（刘少勤，2003：85），尽管在翻译过程中做到对原文文本的“信”或“诚”，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诚信”。

³⁹ 这里的“民初”甚至可以算到新文化运动，周作人的“第一篇白话”是1918年2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上的白话译文“古诗今译”，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发表在1918年。

周氏兄弟的这一复古倾向，其实与他们所处的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他们正师从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接受“小学”的训练。对此，周作人作了如下的说明（周作人，1920：302；转引自王宏志，1999：209）：

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1906年住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

鲁迅自己也说过，因为受到《民报》的影响，“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文章很“生涩”（鲁迅，1926；1981：卷1，3；转引自王宏志，1999：209），结果《域外小说集》1921年重印（增订）版的时候，“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鲁迅，1921；1981：162）。

但是，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也并非没有语言上的“异化”。如果说当时的文言是规范，他们使用复古的文言且不算异化的话，那么，他们对所译的文本不加区别地一律采用文言，并且是具有复古倾向的文言，由此出现的“异化”却未必是译者当时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譬如，周作人译英国王尔德的童话“安乐王子”，采用“直译”的“文言”，就没有考虑到文本的类型或体裁问题⁴⁰。这一点，周作人自己在1918年就意识到了：“凡外国人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多是不幸。其中第一不幸的，要算丹麦诗人安得森”，因为安得森（即安徒生）的童话原本“最合儿童心理”的活泼语言，“变了大家的古文”（参看杨联芬，2003：144）。事隔多年以后的1929年，鲁迅在“《小彼得》译本序”（1929；1981：卷4，151；1984：262）中也指出这一点：

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

虽然1909年的时候，译者翻译的隐含读者未必就是“童话”的理想读者，或许更多地是鲁迅所说的“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同上）读者。但无论如何，译文的语言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异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⁴⁰ 另如周作人译丹麦安徒生（周译“安兑尔然”）的“皇帝之新衣”亦属这种情形。

由此看来，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1909）中追求的，就不仅仅是周作人所说的“信与达”了，而且有严复的“雅”在内。在这一意义上言，周氏兄弟可谓是在翻译实践中力图实现严复的“信达雅”了⁴¹。

6.3.7 翻译的效果

陈平原（1997：637）对《域外小说集》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

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出版以前，周氏兄弟的译作从选材到文字都不脱时尚，没有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在周氏兄弟、在晚清小说翻译界，都是件大事，是一块里程碑，标志着新一代译才与新一代小说家的出现——尽管真正成大气候还得等到五四以后。

在笔者看来，《域外小说集》（1909）的出版，对于周氏兄弟而言，确实“是件大事，是一块里程碑”，因为这一事件基本上决定了周氏兄弟此后的翻译方法；但对“晚清小说翻译界”来说，是否也是“一块里程碑”？这就需要考察译本在“晚清”这一语境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鲁迅自己曾在“《域外小说集》序”（1921）中对当初《域外小说集》的发行情况作了说明：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没有人买了。

.....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

除了这卖出的40余套外，周氏兄弟自然会送一些给友人。王宏志（1999：197）指出：

放回晚清的时代背景里，《域外小说集》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说是一点痕迹也没有，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事实上，从现在可以见到的材料中，并未见当时的文献里有人提及《域外小说集》，即使是在人们的回忆录里，也没有什么人说过怎样地受到《域外小说集》的感动或影响。

⁴¹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1984：136）提出“信达雅”这一后来被奉为翻译的“标准”，但严复自己并未做到这一点。

难怪乎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1921；1981：162）中说，“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一些论者对《域外小说集》作出了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的评价，如“它的实体与精神，都为中国文化史雕刻了不可磨灭的印痕”（胡从经，1982：16；转引自王宏志，1999：197），“是我国新时期文学翻译运动史上的第一只春燕。它为我国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翻译运动指明了方向，并给当时和继起的文学翻译家以重大的影响”（臧仲伦，1991：97；转引自王宏志，1999：197）；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过高的评价，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⁴²，应该说跟论者没有将《域外小说集》置于“晚清”这一具体而又宏观的语境中考察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也是论者根据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后来所具有的影响来“反推”的结果⁴³。

6.4 《域外小说集》（1909）的失败：多视角的解释尝试

同一个现象，不同的论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解释，同一论者在不同的时间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视角来分析。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自然也不例外。

这里，首先考察论者对《域外小说集》（1909）失败的原因分析，然后提出笔者的解释。

最早⁴⁴提出较为全面解释的要算阿英了，时在1935年⁴⁵。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第十四章最后一节（1996：217—20）说到“在当时最感到寂寞，而后来成为五四直译运动前车的另一派译家，那就是周树人（鲁迅）兄弟”。阿英首先引用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对周氏兄弟译本失败的解释（阿英，1996：217-218）：

⁴² 如王宏志（1999：197）便认为：“今天人们对《域外小说集》的重视，是一个后来随着鲁迅的形象的膨胀而给认为地建造出来的神话。”

⁴³ 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1909）中的角色也因其抗战期间的问题而被“抹去”了。

⁴⁴ 除了译者（鲁迅）1920年写的“《域外小说集》序”（1921），胡适（1922）可能是对《域外小说集》（1909）失败的最早解释者。

⁴⁵ 据阿英1955年8月写的“跋”（1996：221），“《晚清小说史》是我二十年前的旧作，曾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究不偿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

阿英认为，胡适上述的原因，“不是根本性的”，否则，“为什么林纾不失败而周氏兄弟失败呢？”为此，阿英提出了如下的解释：其一，“主要的理由”之一是，“过去中国人的习惯，虽也需要短篇，确是要原原本本，有始有终的故事。这样直译的短篇，自然就不为一般读者所欢迎了”（阿英，1996：218）。其二，阿英指出：

周氏兄弟翻译，虽用的是古文，但依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这对当时中国读者，也是不习惯的。既没有林纾意译“一气到底”的文章，又有些“诘屈聱牙”，其不得到欢迎，是必然的。

阿英通过译文对比后指出（阿英，1996：220）：

晚清翻译小说，林纾影响虽是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兄弟的。问题是，周氏兄弟理想不能适合于当时多数读者的要求，不能为他们所理解，加以发行种种关系，遂不能为读者所注意。

王宏志（1999：202-203）分析了“《域外小说集》不受欢迎的真正原因”：

（1）“周氏兄弟当时的名气”：当时他们还是年轻的“无名之辈”；（2）“他们所选作的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也同样是籍籍无名，更不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和兴趣”；（3）“最重要的还是周氏兄弟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所运用的译笔”。

作为一个文学史家，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中指出，“‘直译’在晚清没有市场，小说翻译界基本上是‘意译’一边倒”（1997：625），他从“译意”的表现方式与晚清译者何以不愿采用直译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陈平原认为，晚清小说翻译家的“意译”，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1997：625）：一、改用中国人名、地名，便于阅读记忆；二、改变小说体例、割裂回数，甚至重拟回目，以适应章回小说读者口味；三、删去“无关紧要”的闲文和“不

合国情”的情节，前者表现了译者的艺术趣味，后者则受制于译者的政治理想；四、译者大加增补，译出好多原作中没有的情节和议论来。

对于“意译”的方法在晚清风行一时，译者不愿采用直译的方法，陈平原主要从“当年整个的文化氛围和作家-读者的文学理想”两方面加以考察（1997：627-629）。第一，晚清那一代译者的外语水平限制了他们直译；第二，晚清一度盛行的“口授-笔录”这种合译方法，助长了意译的声势；第三，“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实际上与译者和读者大众对域外小说的理解和评价大有关系”：

“意译”方法的背后隐含着译者“不尊重原作的表现技巧”，“对域外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第四，“小说家与翻译家两种角色没有真正分离，小说翻译家的角色意识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结果是“专业翻译家一般比较严谨，大体采用直译或近乎直译；作家而兼翻译家者，则颇多技痒难忍，喜欢删节或添饰”，这也是晚清“重意译轻直译的一个原因”。

毫无疑问，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之所以在晚清“失败”，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今人已经无法完全确定究竟是哪一个或哪一些因素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只能说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笔者这里试图提出一种多元因素决定论。这些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 正如前述，文言在晚清是（翻译的）主流语言，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1909）中所使用的语言为古奥的文言，因而并没有超出当时的翻译规范所规定的语言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译者使用的是文言，但由于采用了“直译”的方法，结果导致译本的语言“句子生硬，‘诘屈聱牙’”（鲁迅，1921；1981：卷10，162）；从这个意义上言，周氏兄弟的翻译语言是“异化”的——“异”于当时的翻译语言规范⁴⁶，即严复与林纾那种通顺的文言。

此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新青年》从1918年开始使用白话文⁴⁷；其二，周氏兄弟二人在1918年都已开始使用白话进行翻译或创作；其三，《域外小说集》在1921年再版的时候，除了“改去了”“几个偏僻的字”外，译文依然是文言。这就说明，“语言”并非如某些论者（郭延礼，1998：452）所说的，是《域外小说集》（1909）“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⁴⁶ 这一规范与当时的创作语言规范是一致的，如严复（1898；1984：136）就说过：“《易》曰：‘修辞立其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⁴⁷ 此时，以林纾为代表的一些译者依然在使用文言进行翻译。

体裁 短篇小说⁴⁸这一体裁或文类，在中国的文学系统中也存在，但与域外的“短篇小说”无论是在叙述技巧还是情节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收录的短篇小说，恰恰是那种“异”于中国短篇小说的文本⁴⁹；造成这种结果，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一，是译者在选择原文文本的时候，“有意”选择那些不同于中国的文本；其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因为采取了“求真”的“直译”，没有像当时主流的译者那样，对域外短篇小说进行“归化”处理，即按照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学规范的要求对所译文本进行删改。一言以蔽之，存在着体裁诗学两方面的原因。

译者 / 作者地位 译者的文化资本，这一点从译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印就可以看出。到了1921年——而《新青年》在1918年便开始使用白话文了——依然出版文言文译本，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语言并非如有论者所认为的，是“失败”的主要原因（郭延礼，1998：452）。

毫无疑问，译者如果具有足够的文化资本或影响力，所翻译的文本在译语语境中获读者接受的程度（或者说销售）自然会受影响。周氏兄弟1909年及此后一段时间内，尚未积累足够的文化资本，当时在中国尚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无法像林纾或严复的译作那样畅销。但到了1920年，周氏兄弟的文化资本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⁵⁰，同样的译本所受到的“待遇”自然不同了（鲁迅，1921；1981：卷10，162）：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

此外，原文作者在译语语境中是否已经具有影响力或知名度，在译本的接受过程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域外小说集》（1909）中的绝大多数作者，当时在中国尚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读者期待与隐含读者 鲁迅在“论翻译——答J.K.论翻译”（1932b；1981：

⁴⁸ 《域外小说集》（1909）实际收录的体裁包括短篇小说、寓言、童话等文本类型。

⁴⁹ 有论者指出，《域外小说集》中所选的“这些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大都属于主观表现、抒情化叙事，它们常常以诗化的意境与语言，表达个体生命的体验。因此，这些作品在形态上大都‘不像’小说，而更接近诗。”（杨联芬，2003：139）

⁵⁰ 鲁迅1918年就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颇具影响的小说“狂人日记”；周作人1918年也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译诗，其后更是发表“人的文学”这一新文学的宣言书。

卷4, 381—382)⁵¹中论及译本的不同读者问题, 至今注意到的似乎还不多见, 而从中窥视到鲁迅在翻译上所采取的精英立场者则尚未有:

但我想, 我们的译书, 还不能这样简单, 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 粗粗的分起来: 甲, 有很受了教育的; 乙, 有略能识字的; 丙, 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 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 启发他们是图画, 演讲, 戏剧, 电影的任务, 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 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 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 还不能用翻译, 至少是改作, 最好还是创作, 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 讨好了, 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 无论什么, 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

很明显, 鲁迅既然自己也承认自己的翻译属于“硬译”, 那就表明他译本的“隐含读者”是属于“甲类”的, 即“很受了教育的”一类。

而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文言——来看, 应该是属于受过良好(传统)教育而又愿意阅读域外小说的“精英”阶层。然而, 这些“精英”分子的小说观(或者说“诗学”)显然尚未达到译者的“隐含读者”的层次, 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 还是在形式上, 均存在阅读“障碍”。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1921; 1981: 163)中指出: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 所描写的事物, 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 ……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 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 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 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 这一节, 大约也不必虑的。

这里鲁迅从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视角——也可以说是从译介的内容的角度——说明了晚清时期读者尚无法接受这种“直译”带来的完全“陌生化”效果。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1921; 1981: 163)中还说: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 见过的人, 往往摇头说, “以为他才开头, 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 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 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 不必虑了。

⁵¹ 据《鲁迅全集》(1981: 卷4, 386注1), 鲁迅给瞿秋白的回信是在《文学月报》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 但大多数论者似乎把鲁迅的回信看成是1931年发表的(如王宏志, 1999: 238), 这可能是受了罗新璋(1984: 265注1)的影响; 事实上, 鲁迅这封写于1931年12月28日的回信也不可能在1931年发表。

鲁迅说这话的时候——1920年，自然不必担心了，因为此时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短篇小说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自己就在1918年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但在1909年以及其后的几年中，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读者还无法接受这种与中国固有的短篇小说迥异的域外短篇小说。

诗学观念 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译者的诗学观念与大多数译语读者认同的诗学观念；后者也可以说是当时译语文化中的（主流）诗学观念。如果将周氏兄弟与同时期（即晚清）、同性质的（即文学，或小说）的其他译者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周氏兄弟的诗学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选择原文文本时更为强调其文学性；同时代的其他译者认同的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学。这些译者各自的诗学观念在具体的内容上可能也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是“中国的”，或者说是“本土的”。而周氏兄弟当时的诗学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中读者——自然也包括其他主流译者——的主流诗学之间的不同，在于周氏兄弟注重的是原文中异质性的诗学，或者说是“域外的”。译语读者的文学诗学⁵²因与译者不同，自然难以认同译者选择与翻译的文本。

翻译方法 如果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翻译史这样一个宏观语境中来考察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1909）中所使用的翻译方法，那么，周氏兄弟的“直译”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在翻译史这一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存在着“直译”与“意译”之间的“斗争”。但在《域外小说集》（1909）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在晚清末年这一中国语境中，由于周氏兄弟文学诗学不同的缘故，他们所采用的“直译”却显得特别突出，成为当时的一种“另类”与“异数”。

以上笔者就周氏兄弟编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做了一个分析，主要试图解释这个译本为什么在当时没有产生译者所期待的效应。当然，还有一些可以考虑的因素，如译者的意识形态与赞助人，但由于在《域外小说集》（1909）这一个案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与当时其他译者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相同的；赞助人主要也是译者自身，因此这里没有作进一步分析。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其它的视角来解释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1909）的遭遇问题。这里，笔者试图从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论的视角，解释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1909）在出版后的遭遇。

⁵² 主要体现在读者的阅读取向与习惯等方面。

Even-Zohar (1978; 1990) 把翻译文学视为一个系统——一个处在译语文化这样一个宏大系统中的系统, 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这一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成为中心时, 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形 (埃文-佐哈尔, 2000: 118): (1) 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形, 即: 文学的发展尚属“幼嫩”, 有待确立; (2) 一种文学 (在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 处于“边缘”位置, 或处于“弱势”, 或两者皆然; (3) 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

Even-Zohar的这一观点, 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与“市场”, 相当一部分论者试图运用此说来解释或说明中国某一时期的翻译实践与现象。但可能因为论者或者对这一理论不够熟悉, 或者对所要分析的对象把握不到位, 甚或二者兼而有之, 结果出现了理论上的“误读”或“误用”现象⁵³。具体到《域外小说集》(1909) 这一个案, 有论者便尝试运用Even-Zohar的上述论断 (王友贵, 2001: 2-3): “假此理论来观照周作人的文学翻译, 《域外小说集》问世的前后正处于左哈 [Even-Zohar] 所说的第三种情形”, 即“文学正处于‘危机’或转折点, 甚至是处于一个文学真空”。

我们知道, 《域外小说集》(1909) “问世的前后”确实是晚清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高峰阶段 (见樽本照雄, 2000), 即翻译文学处于晚清文学系统的“中心”⁵⁴, 但是否就是Even-Zohar所说的“第三种情形”呢? 这就反映出论者在翻译史与理论两方面的问题⁵⁵: 其一, 晚清的(文学)翻译得以形成“潮流”, 并非源自当时的文学多元系统, 而是出于当时的政治系统, 特别是意识形态系统的需要; 其二, 当时的文学系统并未“处于‘危机’或转折点, 甚至是处于一个文学真空”的状态; 其三, “翻译文学”的出现虽然主要与政治相关, 但经过一定的积累后,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身又形成了一个“系统”——“翻译文学”系统; 其四, “翻译文学”系统对已有的文学多元系统形成了某种冲击, 但在晚清时期, 文学系统并未发生或出现危机, 更未出现过“真空”: 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其五, 论者没有注意到Even-Zohar上述论断关注的焦点是在“文学多元系统”, 基本上没有考虑其它(多元)系统⁵⁶。

⁵³ 详见邵璐“国内翻译界在多元系统论研究上的误区”(2004)。

⁵⁴ 如林纾在“《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1906; 1997: 183)中指出:“方今译小说者如云而起, 而自为小说者特鲜。”

⁵⁵ 张南峰在《中西译学批评》(2004: 28-29)中“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解释严复、林纾、鲁迅翻译”, 可能是用多元系统论对晚清(文学)翻译唯一作出正确解释的。

⁵⁶ 在多元系统论的框架内, 只有张南峰的“为研究翻译而设计的多元系统论精细版”(2001)才可以较为

但这并不一定就是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存在问题，笔者以为，问题更多地出在论者身上⁵⁷。比如，我们依然可以运用Even-Zohar的一些观点来解释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1909）中的翻译行为。

Even-Zohar（埃文-佐哈尔，2000：122）指出，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

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单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相反地，译者即使要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也在所不惜。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即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当然，从译语文学的角度来看，译文从采纳的翻译规范初时可能显得太标新立异。如果新的文学时尚在文学斗争中失败了，依照它的观念和口味而产生的翻译作品就永远不能流行；但假使新的时尚胜利了，翻译文学的文学形式库将更加丰富、灵活。

周氏兄弟当时确实没有对所选择的原文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文学形式”上的“归化”处理，相反，却打破了中国的文学传统规范——即诗学规范——，甚至还包括标点等形式因素。结果，周氏兄弟采用了体现“充分性”的“直译”方法，但因为过于“标新立异”而最终“失败”。

为什么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1909）会“失败”，Even-Zohar（埃文-佐哈尔，2000：122）也指出来了：

只有在本国系统经历大转变的时期，译者才会突破本国文学的既定形式库，尝试采用不同的文本制作方法。我们不要忘记，在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不容许有革新的余地时，即使是译语文学里缺乏的形式，也不能移植过来。不过，在系统逐渐开放的过程中，某些文学之间的距离会愈来愈近，最终会导致充分性这个规定与译语实际上表现的对等高度吻合。

换言之，由于中国文学系统并未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即处于“稳定状态”，译者却采用“异化”的方法，中国文学系统自然会“不容许”。而到了五四时期，却能够再版，便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大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对译本的接受也就变得容易了。

完整地解释，惜乎“多元系统论精细版”尚未引起大陆研究界的充分注意。

⁵⁷ 当然，就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而言，笔者认为Even-Zohar这里的“理论”无法从整体上加以解释（参见本文结语部分）；中国大陆一些论者这方面的尝试因而不免流于牵强。

结 语

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1920；2003：8）开篇中指出：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在清末，这一“思潮”的主流便是小说翻译¹。对于晚清翻译的总体特征，梁启超也作了一个描述（1920；2003：86）：

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清末的文学翻译，尽管如梁启超所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但毕竟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同时也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从（文学）翻译的角度看，亦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与特征。

本文以作者在第一章中所提出的翻译社会学模式作为研究的问题框架与出发点，历时地考察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至甲午战争期间的宏观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的特点，以此作为研究甲午战争至清末这一阶段文学翻译的背景与切入点；具体从社会文化语境、翻译主体、文本、读者等方面入手，在个案分析中考察翻译主体行为与翻译行为；力图从翻译、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视角，完成Pym（1998）所提出的翻译史的三个任务²：考古，历史批评，解释。

¹ 当然，清末翻译的另一特点是社会科学的翻译，从影响的角度看，可以严复为代表。

²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在具体的论述中，各有其侧重，没有必要做到“等量齐观”，在本研究中也做不到。

下面我们首先试从动机与目的、文本类型、意识形态、译本读者与翻译语言、翻译策略与方法、话语功能与译后行为以及主体性等方面，对清末的小说翻译作一总结；然后，就中国大陆一些论者对晚清文学翻译在解释与论述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就本文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思考。

动机与目的

根据本文的考察，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中，首次明确揭示小说——包括翻译小说——具有承载意识形态的话语功能的，是在 1873 年，蠡勺居士在“《听夕闲谈》小序”（1873）中，指出小说与“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之书，国史古鉴之纪载”等“经典”不同之处³，在于小说的“谑趣”与“感人”，提醒人们不要将小说视为“小道”，将小说纳入了“文以载道”之中的“文”的系统；译者翻译该书的目的则在于“广中士之见闻”。虽然作者为“西国名士”，译者也希望读者“尚勿等诸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翻译界，注重的文本类型是科学技术⁴，而不在“小说”，译者的这一翻译意识形态话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再次注意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是傅兰雅 1895 年刊登的“求著时新小说启”（1895），广告指出：“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1896 年，广学会出版林乐知编辑翻译的《文学兴国策》可以说是对傅兰雅的一个回应与认同⁵。

³ 如果有关文字本文前面已经引用并注明具体页码，这里不再注明，下同。

⁴ 对此，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1920；2003：85）中作了颇为准确的描述：

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鸦片战役”以后，渐忧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隆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

⁵ 1896 年 4 月，（上海）广学会出版（林乐知口译，蔡尔康笔述的）《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八卷（熊月之，1994：625），该书附有日本森有礼（1847—1889）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与光绪进士任廷旭合译的《文学兴国策》（甘慧杰，2002：1）。森有礼在出使美国期间，向美国政界、学界发函咨询教育强国之道，全文如下：

敬启者：自膺简命，驻贵国京都护理公使，除办理美、日交涉事务外，尚奉特旨，访察一切凡有

从 1873 年到 1896 年间，虽偶有文学——主要是小说——翻译，但尚未形成一种文学翻译的潮流，并未产生相当之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学翻译尚未处于当时的翻译系统的中心位置，同时也与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学系统中没有位置这一事实有密切的关系。

甲午战后，思想启蒙话语开始进入翻译日程的中心，其表征为社会科学文本类型的翻译⁶；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日渐引起注意。1897 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认识到小说在“教育”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重要作用，并注意到了小说在启蒙中的优势：通俗易懂。

就启蒙语言与启蒙方式做了较为系统而又精当分析的，则推严复与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小说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载体的优势地位再次凸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严、夏二人利用甚或“创造”域外资源作为其理论支撑，提倡通过翻译小说等途径来实现“使民开化”的目的；尤为重要者，他们还指出了小说的意识形态实践功能：即小说这一“人心之营构”以话语的方式，向读者直接或间接地传达意

益于敝国文学诸事，并讲求一切凡有关于敝国振兴诸端。度阁下必有卓见良策，请烦一一指教，以作东方开化之助，实为幸甚。窃以敝国所访求之大略，凡增人智慧、辅人德行、利人身家，种种有益于国政民俗者，悉请开诚相示。若与文学相关，而为今所专重者，厥有五端：一曰富国策，二曰商务，三曰农务与制造，四曰尽伦常、修德行、贍身家，五曰律例与国政。阁下必能洞悉其渊源，而有以详细示之也。倘蒙俯允，赐以复函，或示一端，或示全璧，悉从尊便。敬当视为至宝，什袭藏之。他日将原书译为日文，刊印成书，上呈有司，下示人民，俾敝国国君臣士庶均有裨益，皆出阁下之所赐矣。伏惟鉴察，不宣。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华盛顿京城日本使署发。

森有礼收到 13 份“复函”及从“美京文学部”“摘录”的“美国兴学成法”编为一册，加上上引的“日本驻美国京城护理公使森有礼公函”，共 15 篇。林乐知在“序”（1896；2002：3）中道出了他（以及合译者）编译《文学兴国策》的动机与目的：

《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知天下之势，不值其穷则不变，不变则无以通且久。《中庸》曰：“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是知世之人心，不启其明则不动，不动则无以变而化也。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知治国之法，不知所变则不进，不进则无以至于道也。夫强弱者势也，明昧者心也，变通者法也。世无亘古不能变之法，人无愚昧不能明之心，国即无积弱不能强之势。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强之国势，此《文学兴国策》之所为译也。

同时，林乐知指出：

日本崇尚新学，其兴也淳焉。中国拘守旧学，其滞也久矣。诚使当世主持学校之人，均奉是编以为圭臬，当愈晓然于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可兴矣。试观日本之文学与年俱进，国家之富强亦与之俱进。考诸史策，证诸见闻，日本今日蒸蒸日上之情形，不独异国人见之无不惊以为奇，即日本当国之大臣亦见之而以为念不到此矣，尚何人敢谓文学无益于国哉？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文学”尚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即指（人文）教育与启蒙。但林乐知采用《文学兴国策》这一书名，无疑对真正的“文学”发展有促进作用。

⁶ 译者可以严复为代表。

识形态内涵，最终体现为读者或社会的行为，即表现为“人身之所作”，创造出新的历史：严、夏认识到了小说翻译的译外行为的重要性。从实际所产生的影响言，康、梁与严、夏等人此时已经为小说与小说翻译高潮的到来，建立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基础。

真正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开创小说翻译局面的，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1898年，梁启超在亡命日本的途中，开始阅读与翻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发表译文的同时，刊出“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首次提出作为文类的“政治小说”，同时引入并建立了政治小说翻译话语与小说翻译意识形态话语；继而提出了“新民”这一意识形态启蒙的主张，面对“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童孺”等普罗大众。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1997：50）的开头，便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这一小说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主张，而“新民”的内容则几乎囊括了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在文学系统，甚至文化系统中，小说由此从边缘走向中心。

但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小说根本无法承担“新民”这一意识形态重任，唯有求诸于域外小说的翻译；选择域外小说文本的原则是“外国名儒所撰述”而又“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提倡小说（翻译）的目的，正如“《新小说》第一号”（1902；1997：56）中所言：“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其宗旨亦如“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小说报社，1902；1997：59）所提出的：“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

至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等人的话语逻辑：小说可以承载与传播意识形态，理应属于“文以载道”中的“文”系统；中国传统小说“不出海淫海盗两端”⁷，即其所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不符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以只有通过创作新的小说⁸与翻译域外小说，来达到“新民”的目的，此即说传统小说所载之“道”非新民之“道”。小说翻译意识形态话语就此进入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小说界革命”因而并非出自文学系统自身的需要，“新小说”的目的乃是为了“新民”。

⁷ 梁启超后来在其《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对此有所“反省”，指出：“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催故锋而张新军”（2003：16）。

⁸ 梁启超的“新小说”中的“新”作动词解。

虽然从整体上言，通过小说翻译实现“意识形态启蒙”，已成为清末小说翻译实践的“翻译意识形态”，或者说是译者等主体翻译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但在具体的翻译语境中，不同个体的翻译动机与目的则自然会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或者说有着各自的翻译动机与目的，具体体现为翻译主体的意识形态话语、诗学观念、译者的文化资本（如地位）与经济等因素⁹。

因而，在具体的翻译个案中，则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分析各个因素，最终确定翻译行为的动机与目的。

就清末翻译而言，梁启超等人提倡翻译的目的是意识形态启蒙，而在他们看来，实现这一目的最佳手段是小说；但由于中国传统小说无法承载这一功能，因而只能选择域外小说这一文类（genre）。

文本类型

就翻译而言，有两种类型需要选择：原本的类型与译本的类型。

在清末文学翻译中，虽然已经选择了小说这一文类，但具体选择哪些类型的小说，当时则尚未有一个所谓的“选目”。从原则上言，只要能够达到严复在“原强”（1895）中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目的，都可成为翻译的对象。换言之，小说类型的选择必须符合“新民”这一意识形态启蒙的原则¹⁰。

梁启超首先翻译、发表¹¹政治小说《佳人奇遇》（1898），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1997：37—38）中指出“政治小说”这一小说类型的特点与功能：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后来，《新小说》也就此作了一个简单的定义：“政治小说者，著者欲以图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新小说报社，1902；1997：61）。这样，域外文学声

⁹ Lefevere（1992）将地位与经济等成分放在赞助人（patronage）这一因素中加以考虑，因而是从对译者的“制约”的角度展开的，笔者则试图从译者等翻译主体的“主动”或“主观能动性”（主体性）的视角切入。

¹⁰ 至少，译者或赞助人能够从所选择的小说中寻找出支持选择的合法性依据，或者说能够达到起码的翻译意识形态要求。

¹¹ 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一册开始连载《佳人奇遇》，至第三十五册毕，作者署“（日）东海散士前农商部侍郎柴四郎”。光绪二十七年（1901）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题《佳人之奇遇》，译者署梁启超。

誉并不是特别高¹²的政治小说，经过翻译后，因为其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而被经典化。

此后，各种类型的小说便不断进入翻译日程。并且，人们根据不同小说类型的特点，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功能，如“新小说报社”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1902；1997：59—62）中便指出：

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

政治小说 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

哲理科学小说 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

军事小说 专以养成国民尚武精神为主，其取材皆出于译本。

冒险小说 如《鲁敏逊漂流记》之流，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

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其奇情怪想，往往出人意表。……本报更博采西国最新奇之本而译之。

从此，译者（作者）或出版机构开始根据小说文本的性质或特点贴上各种不同的“标签”¹³。甚至有人以此作为参照，比较中外小说类型，如“定一”在“小说丛话”（1905；1997：99）中说：

中国小说之不发达，犹有一因，即喜录陈言，故看一二部，其他可类推，以至终无进步，可概可概！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

且不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是否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但确实如论者所说，中国传统小说中没有这三种小说类型，它们成为小说翻译的重点选择对象，也就毫不足怪¹⁴。

在实际的小说翻译与刊载中，译者或出版机构会根据小说文本的性质做出具体的归类，贴上不同的“标签”，从某种意义上言，“引导”读者乃至社会注

¹² 但其作者却是有相当身份的“魁儒硕学、仁人志士”与“外国名儒”（梁启超，1898；1997：37，38）。

¹³ 据笔者考察，此前主要是《清议报》对小说贴“标签”，如“政治小说”；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第十四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后，其它报刊登载小说时也开始仿效这一做法，如1902年12月9日《大陆报》第一号开始连载《鲁敏逊漂流记》，标“冒险小说”。风行此一做法，则是在1903年及以后的事。

¹⁴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首次刊载翻译侦探小说，是在1896—1897年《时务报》（参见陈大康，2002：68—69）。

意其侧重点，甚或“卖点”¹⁵。

如果从篇幅或体裁上言，清末的翻译小说中，最初的短篇小说译本主要集中在侦探小说这一类型，长篇小说则包括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军事小说等类型（参见陈平原，1997：743）；随着小说翻译的深入，时人对小说观念的认识也在加深，如紫英在“《新庵谐译》”（1907；1997：273）中说：

泰西事物物，各有本名，分门别类，不苟假借。即以小说而论，各种体裁，各有别名，不得仅以形容词别之也。譬如“短篇小说”，吾国第于“小说”之上，增“短篇”二字以形容之，而西人则各类皆有专名。如 Romance, Novelette, Story, Tale, Fable 等皆是也。

确定了小说的类型，进入翻译程序后，译者还需要做出一个抉择：译本的类型。

当梁启超等人注意到小说“通俗易懂”的特性，这实际上预设了一个立场¹⁶：中国小说的类型问题。中国小说的类型划分，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种类。管达如在“说小说”（1912；1997：398—402）中从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分类，其中前两类¹⁷是：（1）从“文学”上分，有文言体、白话体与韵文体；（2）从“体制”上分，有笔记体与章回体。梁启超等人在痛斥中国小说不出“诲淫诲盗”两端但又强调其具有易于深入人心的特点，他们实际上所指的是中国的“白话章回体小说”。

文本类型¹⁸对翻译过程，特别是对确定翻译的策略与方法，具有一定的影响¹⁹。就本文研究的小说翻译而言，我们不但需要考察原文文本的类型，如长篇、短篇，而且需要考虑译语文化语境中的文本类型，这实际上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文本分类，细分起来非常复杂。这里我们仅举一种情形加以说明：假设原文文本在篇幅上为长篇小说，那么，翻译成中文后，可能出现几种类型：

¹⁵ 因此有时可能会出现同一种小说被贴上好几种标签的情形。

¹⁶ 梁启超所指的因而只能是白话小说。

¹⁷ 第三类是“性质上之分类”，实际上是一些“标签”，如“神怪”、“社会”、“科学”、“侦探”、“冒险”与“军事”等小说，详见本文第三章。

¹⁸ 既可以是原文，也可以是译文的文本类型。

¹⁹ Newmark（1981；1988）；Reiss & Hans J. Vermeer（1984）；Nord（1991）等，根据语言的功能与文本的功能，确定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如Newmark依照原文类型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Reiss & Hans J. Vermeer提出的目的决定论，Nord依据译文类型提出的“工具性翻译”与“文献性翻译”。

译本或者是长篇，或者是中篇，或者是短篇。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为译者还面临其它的选择：笔记体，还是章回体？是文言体、白话体，还是韵文体？这样一来，从理论与逻辑上言，同一部长篇小说原本，译成中文后就可能出现 18 种小说亚类型（sub-type）。

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会真的出现这么多的小说亚类型。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分类中，一般的情形是笔记体小说所采用的语言是文言，而且基本上是短篇小说；章回体小说所采用的语言是白话，而且是长篇小说。如果论者没有注意到中国小说传统的这一诗学规范，就有可能做出“误判”。譬如，根据这一中国小说传统诗学规范，林纾的小说翻译就是一个“变异”，属于“异化”的范围：他的译本是长篇文言小说²⁰。从这一意义上言，马晓冬（1999：55）认为“始终以自己的文章自诩并被誉为古文家的林纾以文言翻译《茶花女》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就未必了：可以说，林纾并未遵守中国小说传统中的诗学规范。林纾违反中国的诗学规范，固然与其所受的教育有关，更与其（“桐城派”）诗学观念紧密相联²¹。与林纾相反，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如果从小说类型的诗学规范的视角看，属于“文言短篇”小说类型，因而是“归化”的翻译。

清末小说翻译中，实际出现的译本类型有：（1）长篇文言小说，如林纾的译本；（2）长篇白话小说，如苏曼殊、陈独秀译的《惨世界》（1904）；（3）短篇文言小说，如周氏兄弟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4）短篇白话小说，如吴棫译的“灯台卒”（1906）；（5）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文白夹杂的文本，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长篇小说译本，如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1902）、鲁迅译的《月界旅行》（1903）。

意识形态

在翻译这一语境中，存在多种意识形态类型。从宏观上言，可以分为原语意识形态与译语意识形态两大类。原语意识形态又可分为原语社会的各种意识

²⁰ 值得注意的是，林纾的“长篇文言”这一小说亚类型，并不是梁启超等人所认定的那种具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小说”（即“白话章回体小说”）。

²¹ 尽管林纾本人并不承认自己属于真正的“桐城派”。

形态与原文文本的意识形态²²。译语意识形态则包括：（1）译语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可归为主流意识形态与边缘意识形态；（2）翻译主体的意识形态，需要注意的是主体的意识形态在译语社会意识形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彼此的关系：主体认同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边缘意识形态？或者说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的立场是“维护”还是“颠覆”？（3）译本的意识形态，需要考虑的是译本的意识形态与原语社会、原本的意识形态以及译语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说，翻译处于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网络之中。

原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原本（甚或作者）的意识形态，它们的主要作用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1）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在文本选择过程中的宏观作用：以日本为例²³，中国自甲午战败，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重视日本这一原语国家，就小说翻译而言，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以及西方小说的日译本（如科学小说），日益受到译者与论者的重视。据樽本照雄的“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2000：163—165），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中国翻译了日本原作103种，从日译本转译的欧美小说77种²⁴。（2）原本（或作者）的意识形态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的“微观”作用²⁵：这涉及原本（或作者）的意识形态在具体文本的选择与翻译中的作用；这也可以从翻译主体（以及译语社会文化）的视角来分析。

因此，译语意识形态是研究中的重点。从分析的操作层面上言，可以翻译主体作为切入点，考察翻译主体（的意识形态）与原语意识形态及译语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一）如果翻译主体的意识形态与译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或基本一致，至少没有冲突，原本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对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构成冲击或危险，翻译行为就会得以顺利进行。此时，译本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译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所起的是“维护”作用。我们需要考察的就是译本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在译语语境中产生了何种具体的作用。

（二）如果原本的意识形态与翻译主体或译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会采取何种策略与措施。一般而言，翻译主

²² 当然，还有作者的意识形态，具体的文本只是作者意识形态的体现，即意识形态话语而已。

²³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从日本翻译或转译，还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留学日本的人数多；日语与中文的相近；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刊，如梁启超就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

²⁴ 但樽本照雄（2000：165—166）提供的具体数字却没有77种，而只有74种：英国42种，法国25种，俄国5种，德国1种，波兰1种。

²⁵ 毫无疑问，这一切会受到翻译意识形态的宏观“指导”。

体可能采取的基本措施类型²⁶有：（1）删节；（2）淡化；（3）保留；（4）增改。至于具体采用哪一种或几种做法，则需视当时的语境而定，同时也要看当时译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容忍度。

下面试结合有关个案加以分析。

删改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亡命日本的途中开始阅读与翻译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同年 12 月 23 日译本开始在《清议报》第一册连载。从翻译意识形态这一宏观角度看，柴四郎的《佳人奇遇》是符合身为政治改革家的译者梁启超的翻译动机的，即可以达到“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的目的。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一政治小说内容涉及中国，当作者与译者对中国的政治立场不一致，即具体的意识形态立场或话语方面存在分歧的时候，译者采取怎样的措施？有论者说（王宏志，2000：185）：

尽管梁启超当时刚值百日维新失败，受到通缉，流亡日本，且曾跟革命党人有过接触，可能受过一些影响，但他基本上还是属于保皇党，对清政府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柴四郎的态度却很不一样，他实在无爱于清廷，在小说的第一回末、第二回开始介绍范卿出场的时候，原著便有一段超过 2500 字的文字，从明末满人入侵中国开始说起，直至鸦片战争以后，猛烈攻击满清之残暴，用词很是严苛……梁启超最初翻译这段文字，分节发表于《清议报》第四期时，里面的反清思想完全保留下来，批评清政府的字眼，甚至比原著还厉害，但后来却因为康有为的压力而把这段文字删去。

可以看出，译者最初翻译并发表的时候，采取了“保留”了原本中政治敏感“内容”，但后来在出版单行本的时候，却删除了有关内容，译者这样做的原因，除了来自“康有为的压力”外，还有一个被人忽视的因素：当初在《清议报》刊登的时候，是在日本横滨；而单行本《佳人之奇遇》（1901）则是在中国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如果说上述删节的主要原因是原本中的内容不符合译语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来自赞助人（康有为）与出版机构的压力；那么，在该小说的第十回至十六回，梁启超则作了“更大的改动，这主要是因为《佳人奇遇》原著的主调改变了，由原来的争取合理国权而改变为宣扬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梁启超“出于政治的考虑”，作了不少的删改；结果，“有时候，这些删改显然是

²⁶ 在翻译实践中，则可能是几种类型的组合。

过大”，甚至“跟原著的精神不协调”（同上，186）。

保留 林纾在“《剑底鸳鸯》序”（1907；1997：291—292）中所说明的情形，对于翻译主体而言，可谓是“一种两难的境地”，不妨看林纾是如何面对与解决这一难题的：

吾华开化早，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往往出于荏弱。……

余翻司各德书凡三种：一为《劫后英雄略》，则爱梵阿之以勇得妻也，身被重创，仍带甲长跽花侯膝下，恭受花圈，此礼为中国四千年之所无；一为《十字军英雄记》，则卧豹将军娶英王翁主，亦九死一生，仅而得之；若此书则尤离奇，意薇岑既受休鼓拉西之聘矣，更毁婚约，以赐其侄达敏，此又中国四千年之所无者。余译此书，亦几几得罪于名教矣，然犹有辩者。达敏、意薇岑始已相爱，休鼓不审其爱而强聘之，长征巴勒士丁三年不反。二人同堡，彼此息息以礼自防，初无苟且之行。迨休鼓兵败西归，自审年老，不欲累及少艾，始毁约赐达敏。然犹百般诡试，达敏屹不为动，于是休鼓拉西释疑，知二者果以礼自防者也，遂予之。此在吾儒，必力攻以为不可。然中外异俗，不以乱始，尚可以礼终。不必踵其事，但存其文可也。晋文公之纳辰嬴，其事尤谬于此。彼怀公独非重耳之姪乎？纳嬴而杀怀，其身犹列五霸，论者胡不斥《左氏传》为乱伦之书！实则后世践文公之迹者何人？此亦吾所谓存其文不至踵其事耳。《通鉴》所以名“资治”者，美恶杂陈，俾人君用为鉴戒：“鉴”者师其德，“戒”者祛其丑。至了凡、凤洲诸人，删节纲目，则但留其善而悉去其恶，转失鉴戒之意也。以上所言，均非余译此之本意；余之译此，冀天下尚武也。……故究武而暴，则当范之以文；好文而衰，则又振之以武。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以去其倦敝之习，追蹶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

林纾在这里的两难在于：通过译本可实现其翻译的意识形态目标——“冀天下尚武”，但如果“忠实”地翻译，小说的某些内容——甚至是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则会与当时译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面对这一情形，译者可能采取的方式有多种：最为“消极”也是最安全的做法自然是不翻译含有“敏感”内容的原本，即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删节有关的“敏感”内容；用增添的方式替换敏感的内容；最“危险”的做法则是完全保留原文文本的内容，但通过某种“干预”的方式为自己的翻译行为的合法性提供依据。林纾在《剑底鸳鸯》中就采取了最后一种做法：引证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身上发生过类似的事，但中国文化中的经典文本《左氏传》却并没有认为是“乱伦”；译者因此认为，对译本而言，“不必踵其事，但存其文可也”。当然，林纾这里之所

以甘冒“得罪于名教”的危险，并为自己的翻译行为加以“辩护”，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如翻译的经济考虑。

增改 苏曼殊、陈独秀为了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的，借助于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1904）这一手段，在译本中不但删改原本中与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不符的内容，而且“增添”能够表达自己意识形态主张的章节，结果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最终成为“伪译”²⁷。

保留+增改 “知新室主人”在“《毒蛇圈》译者识语”（1903；1997：111）中比较了中西小说写作技巧或诗学上的差别²⁸：

译者曰：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手下处也。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为法国巨子鲍福所著。其起笔处即就父母〔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西欧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

译者同时也点明了“爰照译之”的目的在于“介绍于吾国小说界”；虽然我们也可以作另一种解读：译者不愿“费事”去改动原文中的这种“常态”结构²⁹。

评论家“趺座主人”在“《毒蛇圈》评语”（1904；1997：112），说明了翻译上的技巧处理手法，其中第三回评语为：

²⁷ 详见本文第五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袁进在“试论近代翻译小说对言情小说的影响”（2000：208）中认为：

当时〔晚清〕译法国小说的人首先看中的是雨果，而不是福楼拜，尽管后者在法国小说界的名气并不亚于雨果。因为雨果的《悲惨世界》更切近中国当时的价值观念，而《包法利夫人》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就有一些距离。

雨果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最早的当是1903年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即《惨社会》/《惨世界》），但这部译作（“伪译”）从思想上言，与雨果的创作意图或原本的主题，大相径庭，论者的分析之所以出现失误，乃是因为他没有分析与研究过苏、陈的译本，更不用说与原本或较为忠实的译本进行对比了。

²⁸ 诗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本文有时为了强调，特单独列出。

²⁹ 譬如说，《鲁滨孙飘流记》的译者在“《鲁滨孙飘流记》译者识语”（1902；1997：66）明确指出，面对与中国传统小说“体例”完全不同的“日记体”这一诗学特征，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即保留，但译者这样做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不但有介绍与引进新的写作手法（即诗学）的考虑，而且有读者阅读兴趣与译者经济因素在内：

原书全为鲁滨孙自叙之语，盖日记体例也，与中国小说体例全然不同。若改为中国小说体例，则费事而且无味。中国事物物皆当革新，小说何独不然！故仍原书日记体例译之。

以下无叙事处，所有问答仅别以界线，不赘明某某道。虽是西文如此，亦省笔之一法也。

中间处处用科译[译]语，亦非赘笔也。以全文均似闲文，无甚出入，恐阅者生厌，故不得不插入科译[译]，以醒眼目。此为小说家不二法门。西文原本，不如是也。

虽然“不赘明某某道”这种作法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也不乏其例，但评论者可能认为这不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常规”，因而特别加以说明，其意也可说是为了译文读者。至于译者为了“醒眼目”，为了读者不致“生厌”，而在译文“中间处处用科”，评论家不但不认为是“赘笔”，而且觉得是“小说家不二法门”，即符合中国小说的诗学规范；因此，尽管“西文原本不如是”，依然是“合法”的。译者的做法，可能还跟中国传统带有说书倾向的白话小说中，作者喜欢在文本中“插入”自己的议论或评论有关³⁰。

如果说趺座主人在第三回中的评语还只是从诗学观念上为译者的“显形”行为做出“辩护”性质的说明，或者还为读者提供一些“阅读指南”，那么他在第九回中的“评语”（1904；1997：112）就完全不同了：

后半回妙儿思念瑞福一段文字，为原著所无。窃以为上文写瑞福处处牵念女儿，如此之殷且挚，此处若不略写妙儿之思念父亲，则以“慈”、“孝”两字相衡，未免似有缺点。且近时专主破坏秩序，讲家庭革命者，日见其众。此等伦常之蠹贼，不可以不有以纠正之。特商于译者，插入此段。虽然，原著虽缺此点，而在妙儿当夜，吾知其断不缺此思想也。故虽杜撰，亦非蛇足。

这里最为明显与突出的，自然是作为“评论家”的趺座主人对翻译过程的“干预”——甚至“干涉”——行为。可以看出，导致这一干预行为的原因，不仅仅是评论家自身所坚持的“慈”、“孝”等意识形态所带来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干预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即“近时专主破坏秩序，讲家庭革命者，日见其众。此等伦常之蠹贼，不可以不有以纠正之。”这样，译者与评论家“共谋”的结果是，通过这种干预，译本表达了与原文文本不同且属于评论

³⁰ 比如，《毒蛇圈》第三回状少年文雅，译者便插入与中国有关的如下内容（转引自陈平原，1997：321）：

可惜他生长在法兰西，那法兰西没有见过甚么美男子，所以瑞福没得好比他。要是中国人，见了，作起小说来，一定又要说甚么面如冠玉，唇若涂朱，貌似潘安，才如宋玉的了。

家的意识形态立场。换言之，翻译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意图，实施了对原文文本的重写或操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一直纠缠在一起：翻译主体出于对已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与立场，选择原本，这一选择过程既包括已有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制约，又意味着翻译主体自身所预设的新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所认同的（甚至被强加的）意识形态即将“登场”；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与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更是“难分难舍”，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增添或删改的意识形态内容，对于原本而言是“新生的”，但在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则未必是新的，甚至很可能是“主流的”或“残留的”；译本完成后，译本作为一种话语，成为译语社会中宏大话语的一个组成元素，或者说成为一个系统，与其它系统展开“斗争”，一种新的“互动”关系由此产生。

译本读者与翻译语言

与作者在创作文本时一样，译者在翻译之前或过程中，也会有意或无意地预设读者类型，针对特定的读者类型进行翻译，即翻译的目标读者。与此同时，译本一旦生产出来，文本本身则会有其“隐含读者”，即文本的最佳解读读者，或者说理想读者。此外，文本还有现实读者，即阅读文本的实际读者。因此，同一文本就可能存在三种类型的读者；最为理想的情形是三种类型的读者产生重合，即都是同一类型的读者，最“坏”的情形则是三种类型的读者群体互不相干，一般的情形是介于这二者之间，存在部分的交叉。

在清末小说翻译的语境中，译本的三种读者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这种复杂的读者群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语言等文本特征表现出来的。

首先，无论是小说（翻译）的理论倡导者，还是小说翻译的实践者，都主张并实践着意识形态启蒙，而之所以选择“小说”这一文类，主要就是因为小说能够满足面对大众；换言之，从理论上言，小说翻译的目标读者是大众，即梁启超所说的“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童孺”。而别士〔夏穗卿〕在“小说原理”（1903；1997：77—78）中区分了中国小说的派别：

综而观之，中国人之思想嗜好，本为二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与粗人。故中国之小说，亦分为二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体裁各异，而原理则同。今值学界展宽，士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

别士在这里也将小说的目标读者限定在“妇女与粗人”的范围。因此之故，梁启超主张“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时代需要的是“觉世之文”而非“传世之文”；体现在语言上，则如“饮冰”[梁启超]在“小说丛话”（1903；1997：82）中所说：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展开，靡不循此轨道。……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

为了达到“思想之普及”的启蒙目的，饮冰这里将语言的通俗化范围扩展到“凡百文章”。

然而，平子在“小说丛话”（1903；1997：83）中表达了与别士（1903）不同的意见：

夏穗卿著《小说原理》，谓今日学界展宽，士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著小说之目的，惟在开导妇女与粗人而已。此其论甚正，然亦未尽然。……且小说之效力，必不仅及于妇女与粗人，若英之莎士比亚，法之福禄特尔，以及俄罗斯虚无党诸前辈，其小说所收之结果，仍以上流社会为多。西人谓文学、美术两者，能导国民之品格、之理想，使日迁于高尚。穗卿所谓看画、看小说最乐，正含此理，此当指一般社会而言者也。夫欲导国民于高尚，则其小说不可以不高尚。必限于士夫以外之社会，则求高尚之小说亦难矣。

换言之，平子认为小说的目标应该是“雅俗共赏”。

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却存在一道不易跨越的鸿沟：饮冰也认识到在实践中实现语言通俗化的困难所在³¹：“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

³¹ 梁启超可谓集语言通俗化的理论提倡者与实践者于一身，尚且有如此感慨，更别说那些只是从理论上提倡白话的人了：他们在提倡语言通俗化主张的文章中毫无例外地使用了文言；这或许是出于对文章读者对象的考虑？

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同上）或许因为这一缘故，楚卿（狄葆贤）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3；1997：80）中从理论上采取了“妥协”的立场：

故言文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为今之计，能造出最适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焉。

这样，在小说翻译的理论主张（即翻译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错位：在清末的小说翻译中，虽不乏白话译本，目前也尚无统计数据，但大多数译者采用的还是文言，至少是“文、白”夹杂。换言之，小说译本的“文言”这一语言特征决定了其隐含读者并非“大众”，而是具有文言阅读能力的“精英阶层”。

至于现实读者的构成，觉我在“余之小说观”（1908；1997：336）中有一个大致的估计，并分析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二者在清末的“遭遇”（1997：335—336）：

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果民国国程度之日高乎？吾知其言之不确也。……若以臆说断之，似白话小说，当超过文言小说之流行。其语言则晓畅，无艰涩之联字；其意义则明白，无幽奥之隐语，宜乎不胫而走矣。而社会之现象，转出于意料外者，何哉？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所以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

可以看出，读者与语言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语言固然与译者及文本类型等相关，语言也可以决定读者类型；读者则通过市场（“销行”与“流行”）而对译者选择翻译语言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

因此，管达如在“说小说”（1912；1997：412）中提请作者与译者深思：

则作小说，当多用白话体是也。吾国今日小说，当以改良社会为宗旨，而改良社会，则其首要在启迪愚蒙，若高等人，则彼固别有可求智识之方，而无俟于小说矣。今之撰译小说者，似为上等人说法者多，为下等人说法者少，愿小说家一思之。

选择文言作为译本语言，除了小说读者的制约因素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译者自身所受的教育、诗学观念以及文言自身的特点。首先，清末的译者，不用说是从小读古书作古文，运用起文言来自然要比白话容易得多。其次，白话在文学系统中没有地位，文言作为语言规范的社会地位，文言的文化资本比白话要高；译者的诗学观念——如“雅驯、含蓄、合语法、有韵味”（陈平原，1997：761）——依然以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为主。第三，文言与白话相比，白话显得“冗繁”（鲁迅语），因此“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梁启超语）此外，正如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1984：136）中所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即文言可以表达白话无法传达的“思想”。

总之，在译者的诗学观念、文言的“优势”以及读者市场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文言成为清末小说翻译的语言（与诗学）规范。从这一意义上言，清末的小说翻译并未真正实现对“大众”的“意识形态启蒙”这一目标，相反，倒是对清末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启蒙”。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清末，随着小说翻译的积累，小说翻译的语言在总体上则是从“雅”走向“俗”³²。

翻译策略与方法

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有时甚至到了无法区分的地步³³。如果说翻译策略主要和翻译的动机与目的相关，策略决定方法；那么，翻译方法同时还与译者对原本或原作者的态度——如尊重——有关。

这一点，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Methoden des Übersetzens*”（1813）中就已经指出，“真正的译者”“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他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将读者移近作者，二是尽量不打扰读者而将作者移近读者”（施莱尔玛赫，2000：25）。Even-Zohar与Toury提出的“充分性”与“可接受性”，前者以原本为中心，后者以译本读者为中心，可以说与Schleiermacher的观点相似。他们的不同之处³⁴

³² 尽管也有个别的例外，如周氏兄弟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

³³ Lawrence Venuti（1995）的“归化”与“异化”便如此。

³⁴ 当然，从研究（者）的角度看，他们的分别在于规范性vs.描述性。

在于，Schleiermacher认为“两个途径彼此迥然不同，译者必须步步为营，尽最大的努力紧紧的沿着其中的一条途径前进，否则，如果将两者混而为一，即会出现无法预见的后果”（施莱尔玛赫，2000：25）；Toury（1980）则认为翻译总是位于译语文化中的彻底可接受性与原本的彻底充分性这两极之间：没有对译语文化而言是完全“可接受的”译本，也没有对原本而言是完全“充分的”译本（参见Gentzler, 2001：126）。

在清末的（文学）翻译中，虽然从理论或者说原则上言，译者可能都意识到翻译“应该”³⁵做到严复所说的“信、达、雅”，如严复本人就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中坦承自己翻译《天演论》的“达旨”“实非正法”（1984：136）；但真正遵守这一“正法”——尤其是其中的“信”——的译者却不多。

就清末的小说翻译实践而言，“主流”的翻译方法则是侧重“可接受性”的“归化”翻译，即以“译述”为主。这一点，“海天独啸子”在“《空中飞艇》弁言”（1903；1997：108）中，对“译述的方法”可谓作了充分的表述：“凡删者删之，益者益之，竄易者竄易之，务使合于我国民之思想习惯”。

清末的译者选择“译述”的归化翻译方法，是由翻译的动机与目的、文本类型、意识形态、读者市场以及译者的语言与诗学观念等多元因素决定的：既然翻译的动机与目的是进行“意识形态启蒙”，其出发点势必是面向译语读者，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尽力降低原文可能带来的“陌生化”效果，使读者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减少阅读障碍；既然选择（翻译）小说这一文本类型作为启蒙的手段，并因此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翻译）小说的诗学规范就必须符合中国传统文学“最上乘”的诗学规范；既然要“普及”，要有小说市场的“消费者”，就必须考虑实际市场中读者的购买力与分布；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翻译主体——译本的生产者——根据自身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与语言规范，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做出最后的决定。

话语功能与译后行为

正如在第一章所提出的，每一个翻译行为可说是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即译内行为、译外行为与译后行为。如果将译内行为理解为文本内的语言层面上

³⁵ 可以称之为理想的“翻译诗学”。

的操作活动，将译外行为视为文本在翻译语境中的话语层面的运作；那么，译后行为则是译本这一翻译产品进入“市场”后读者的“消费”行为。

对译后行为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1）分析译本在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了哪些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2）分析翻译主体的翻译动机与目的，验证译本是否实现了当初的翻译意图，达到了相应的目的；（3）在前两个层面的基础上，还可以比较与对照译本实际发挥的作用与翻译的预设功能，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异，由此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不难看出，第二个层面的操作是以第一个层面的操作为基础的，因而，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展开分析与研究，均需要进行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的对象文本可以包括：译本；与译本同类型的文本，即译本生产后生产的原创文本与译本；可能受译本影响的研究文本、评论文本与描述性文本³⁶；有关的社会思潮、运动与译语语言等宏观文本。通过对这些可能有关的文本进行话语分析³⁷，确定译本在译语社会文化中实际产生的“影响”³⁸，在某种意义上言，这种历时分析实际上是一种话语考古学。

由于清末的小说译本与原创文本大部分现已不易找到，这里自然只能根据时人受到翻译影响的文本加以概略的分析。这种影响，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意识形态；文学；语言。

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1907；1997：253）中，形象地描述了清末（翻译）小说的风行和翻译小说所带来的影响：

今之时代，文明交通之时代也，抑亦小说交通之时代乎！国民自治，方在豫备期间；教育改良，未臻普及地位；科学如罗骨董，真贗杂陈；实业若掖醉人，仆立无定；独此所谓小说者，其兴也勃焉。海内文豪，既各变其索縑乞米之方针，运其高髻多脂之方略：或墨驱尻马，贡殊域之瑰闻；或笔代燃犀，影拓都之现状。集葩藻春，并亢乐晓，稿墨犹滋，囊金竞贸。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特起者，小说也；四方輶致，掷作金石声，五都标悬，烁若云霞色者，小说也；竹罄南山，金高北斗，聚珍摄影，钞腕欲脱，操奇计赢，舞袖益长者，小说也；虱发学僮，蛾眉居士，上自建牙张翼之尊严，下迄雕面粥客之琐贱，视沫一卷，而不忍遽置者，小说也；小说之风行于社会者如是。狭斜抛心缔约，辄神游于亚猛、亨利之间；屠沽察睫竞才，常锐身以福尔、马丁为任；摹仿文明形式，花圈雪服，贺自由之结

³⁶ 就小说翻译而言，描述性文本可以指作者的回忆录或相关自述性文字，但这种文字可能存在“失实”的成分，因此也需要进行考证或互文分析。

³⁷ 自然，对所有相关文本进行全面分析，并不可能。

³⁸ 因此，这一层面可以说是翻译的文化研究中最关键但也最难的层面。

婚；崇拜虚无党员，炸弹快枪，惊暗杀之手段：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又如是。则虽谓吾国今日之文明，为小说之文明可也；则虽谓吾国异日政界、学界、教育界、实业界之文明，即今日小说界之文明，亦无不可也。

摩西此时已认识到（小说）翻译的功用：（翻译）“小说”在塑造国家的文明，翻译小说塑造了新的意识形态；在清末甚至形成了一股“思潮”或“运动”，如“自由之结婚”、“暗杀之手段”。

翻译小说给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冲击并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使时人重新（正确地）认识域外小说，如林纾、王寿昌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其二，引入新的写作技巧（包括叙述技巧等），如前述译本《毒蛇圈》；其三，促使读者有意识地比较中外小说之异同，如“知新主人”在“小说丛话”（1905；1997：101—102）中说：

吾友徐子敬吾，尝遍读近时新著新译各小说，每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盖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而外国小说，则往往一个闷葫芦，曲曲折折，直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吾友吕庐子，阅中外小说甚夥，亦谓外国小说，虽极冗长者，往往一个海底翻身，不至终篇，不能知其究竟；中国从无此等章法，虽有疑团，数回之后，亦必叙明其故，而使数回以后，另起波澜云云。

其四，形成新的文学语言。陈平原（1997：787）指出“别具一种姿态”的“译本文体”对中国传统小说文体所带来的影响：

梁启超的白话小说并非纯粹出于白话，除习见的穿插诗词歌赋外，还因“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夹入不少文言段落。林纾的古文也不是真正的古文，其中掺杂不少隽语、土语、佛家语、佻巧语。清末民初的白话小说、方言小说、古文小说和骈文小说，各自之间文体相互渗透自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这种渗透并没有改变各自文体的基本特征。真正对上述四种文体造成冲击的、并或多或少改变了其某些基本构成的，是方兴未艾的译本文体。

这里试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吴趼人在其所著短篇小说《预备立宪》前有如下的“《预备立宪》弁言”（1905；1997：193）：

恒见译本小说，以吾国文字，务吻合西国文字，其词句之触于眼目者，觉别具一种姿态，而翻译之痕迹，即于此等处见之。此译事之所以难也。虽然，此等词句，亦有颇令人可喜者。偶戏为此篇，欲令读者疑我为译本也。呵呵！

翻译语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从当初的“归化”语言到“异化”语言的转变或过渡；虽然作者自称这种作法带有游“戏”的成分，但其“刻意”模仿域外模式却是事实。其五，塑造了新的读者群的阅读趣味。

小说翻译，无论译者如何“归化”，在翻译过程中，译本的语言总会发生“异化”，总会在译本中留下“域外”的语言“痕迹”³⁹，经过一段时间译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适应，从而对译语的语言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自评“新文体”：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翻译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可能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如标点、词汇、语法。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翻译对译语的影响、对文学的影响，最终也会对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也就因此产生。

必须指出的是，清末小说翻译在产生了如上所述的诸种“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

正如本文所指出的，清末文学翻译的肇端，并非出自中国文学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政治改革与意识形态启蒙的目标所采取的一种手段与途径，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域外小说的解读往往从翻译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忽略甚至无视文本的文学性，自是在所难免，也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当时所翻译的原本毕竟是小说，译本也是以小说的身份而不是政治教科书的面貌出现的。梁启超等人当初进行“新民”的手段也是首先改良小说，进行“小说界革命”。只是绝大多数理论提倡者与实践者都已卷入了梁启超等人

³⁹ 可参看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的“新文学工具论”的狂飙之中，无暇他顾而已。但是，随着翻译实践的积累，翻译文学开始形成自己的系统，成为中国文学这一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译本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地位与身份问题，以及新小说（包括译本）的文学性，也就日益凸显出来。

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王国维，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1997：38）中说：

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褻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追，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汗德《伦理学》之格言曰：‘当视人人为一目的，不可视为手段。’岂特人之对人当如是而已乎，对学术亦何独不然。然则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可解者也。

王国维这一同样来自域外理论资源的“纯文学”观，距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不过三年的时间。但这三年却是小说翻译盛行的三年，这一点从吴沃尧在“《月月小说》序”（1906；1997：187）中的感慨可以见出：

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曰：随声附和故。

吴沃尧认为“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的原因在于“随声附和”，而这种“随声附和”并非“正当”（同上）：

美之独立，法之革命，非一二人倡于前，无数人附和于后，以成此伟大之事业耶？曰：是又不然。认定其宗旨而附和之，以求公众之利益者，何可以无此附和？凭藉其宗旨以附和，诡谋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其群者，又何可以有此附和？今夫汗万牛充万栋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其能体关系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谓必无；然而怪诞支离之著作，诘曲聱牙之译本，吾盖数见不鲜矣！凡如是者，他人读之不知谓之何，以吾观之，殊未足以动吾之感情也。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然而彼且嚣嚣然自鸣曰：“吾将改良社会也，吾将佐群治之进化也。”随声附和而自忘其真，抑何可笑也。

有此感受的不止吴沃尧一人。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1907；1997：

253—254)中也指出新小说的“一蔽”:

虽然,有一蔽焉: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今也反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吠声四应,学步载途。以音乐舞蹈,抒感甄挑卓之隐衷;以磁光声电,饰牛鬼蛇神之假面。虽稗贩短章,苇茆恶札,靡不上之佳谥,……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课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无一不赐于小说者。其然,岂其然乎?……请一考小说之实质。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

在这里,摩西提出了小说的“美”的特性,指出“一小说也,而号于人曰:吾不不屑屑为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254)或许是因为有感于“新工具论”的大潮,作者自己也意识到:“此其所见,不与时贤大异哉!”(255)

然而,此时如果从纯文学的“美”或文学性入手,社会文化环境尚不够成熟——翻译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依然是“启蒙”,读者群体的接受能力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周氏兄弟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作为追求“文学性”的一种努力与尝试,无论如何,当时毕竟失败了。

事过十多年后,当年“新小说”的提倡者与鼓吹者梁启超却不得不再次“告小说家”(1915; 1997: 511):

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十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于险谲钩距作奸犯科,而摹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箭墙钻穴,而自比于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公。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齷齪,其行谊习于邪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循此横流,更阅数年,中国殆不陆沉不止也。

梁启超这里说的是创作的小说,但必须承认,清末的创作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当时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言,无论是小说翻译还是小说创作,似乎都偏离了梁启超等人当初预设的方向。

当然,这里不是要否定清末的小说翻译:这不是历史的态度与立场;更不能用五四甚或今天的(文学)标准来评判历史。

陈平原（1997：632）指出：

我们在指出清末民初翻译家在选择译作中体现出来的审美眼光时，虽不无遗憾之感，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抹杀他们译介外国小说的功绩。或许，正是这种艺术趣味比较接近中国传统小说的译作，才真正吊起了中国读者的胃口，引起一代读者对域外小说的兴趣，为五四作家对真正的世界名著的翻译培养了读者队伍。

或者说，清末的小说翻译其成功之处正在于译者采取了“归化”这样一种“和平过渡”的方式，从而成为其后新文化运动之奠基；为翻译文学（系统）进入中国文学系统中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翻译中的主体性⁴⁰

在以原文文本为取向（source-text-oriented）的翻译实践与理论中，译者的理想与目标是译文忠实于原文，达致所谓的“透明”（transparency）。译者在这“透明”中也就消失于无形之中，即“隐形”（invisibility）⁴¹。

在清末小说翻译这一潮流中，其最为基本而又突出的特征就是主体性，具体表征则是翻译主体的“在场”（presence）或“显形”（visibility）。

这种“显形”在翻译行为中，从翻译动机与目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到对意识形态的操纵，可谓无处不在。但这种“显形”最终体现在文本的层面上，表现为翻译过程中，语言、诗学与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上的增与删；既表现在译本的序跋等副文本中翻译主体的“自我表白”及对译本读者的“导向”之中，更表现在评论家等“专业人士”将“评语”一类的“价值判断”或对时政的评论⁴²直接“插入”译本的正文之中这样最具“暴力”性质的干预之中；“伪译与伪作”可谓“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清末小说翻译，表面看来是一种

⁴⁰ “主体性”（subjectivity）自从Lawrence Venuti编辑的文集*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1992）以来，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中国大陆的翻译研究界甚至引起了有关主体性的争论。本文无意在这里就“主体性”展开理论思辩。具体内容可参看《中国翻译》2003—2004 以及其它有关学刊上所刊载的有关文章。

⁴¹ Lawrence Venuti在其书名中就使用了“隐形”一词：*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5）。

⁴² 如林纾在“《不如归》序”（1908；1997：355）中说：

方今朝议，争云立海军矣。然未育人才，但议船炮。以不习水战之人，予以精炮坚舰，又何为者！所愿当事诸公，先培育人才，更积资为购船制炮之用，未为晚也。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摭其胸臆。非敢妄肆嗾吠，尚祈鉴我血诚。

“归化”，其实却是最大程度上的“异化”：手段（即策略与方法）是“归化”的，效果却是“异化”的⁴³。

这里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我佛山人”的“《电术奇谈》附记”（1905；1997：163—164）具有代表性：

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

原书人名地名，皆系以和文谐西音，经译者一律改过，凡人名皆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俾读者可省脑力，以免艰于记忆之苦。好在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也。

书中间有议论谐谑等，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衍义者借此以助阅者之兴味，勿讥为蛇足也。

译者⁴⁴首先将“文言”小说改为“俗语”即白话小说，而且将原译的六回“剖为二十四回”；虽然是“冀免翻译痕迹”，即在某种意义上言，是为了“通顺”，本来是为了“隐形”，却在此“隐形”过程中，完成了“显形”的行为。

至于对“原书人名地名”的处理，则完全采取“归化”的方法，目的是为了减少译文读者的阅读困难，译者为自己的“归化”处理，甚至搬出了“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这一传统小说诗学观点作为其合法性依据。

尤为突出的是第三点，“书中间有议论谐谑等”内容，完全是“衍义者”的创造，其意图也是为了增加阅读的“兴味”，借此吸引读者。

“译者”对自己的这种“增删”行为，毫不讳言，在“附记”中清楚地予以表露，显然是对自己的“显形”做法颇为自得，根本无意于隐藏自己的主体性，译者之“显形”自然也就变成“明目张胆”了。

对晚清文学翻译的多元系统论阐释

对清末的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或翻译文学，中国大陆有一些论者尝试从

⁴³ 从最初对域外文学的不屑一顾到清末翻译小说超过原创小说，甚至以创作冒充翻译（伪译），这便是“异化”效果的明证；更何况，这种“异化”主要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

⁴⁴ 需要指出的是，《电术奇谈》（又名《催眠术》）自1903年10月开始在《新小说》第八号上连载，至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第十八号止，标“写情小说”，题“日本菊池幽芳原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知新室主人评点”；“我佛山人”虽为“衍义者”，但不少论者则将其直接视为“译者”，如陈玉刚（1989：23）即说《电术奇谈》为“吴趼人译”。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论视角加以解释。

对于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的地位问题，不同的论者，几乎依据同一理论——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论，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论者——甚至同一论者在同一时间（详下）——做出不同的判断，究竟所根据的是什么：是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现实客观的把握，还是按照事先的理论框架逆推出来的结果？⁴⁵

检视中国大陆的一些论者尝试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解释中国近代的文学翻译的文献，发现他们所引用的理论文献范围基本上不出 Even-Zohar 的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1978；1990；埃文-佐哈尔，2000）与 “多元系统论”（埃文-佐哈尔，2002）。

下面就一些论者⁴⁶的分析加以分析。

王东风在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2000）中将中国 “第三次翻译高潮” 分为两个阶段，其中 “第一阶段是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严复和林纾”，论者首先分析了 “第一阶段” 的社会文化语境（5）：

其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王朝社会。长期以来，中国的帝王和臣民们，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无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文化中心，故称 “中国”。正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央大国、文化霸主的意识在当时 的君臣民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对西方列强的崛起，他们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事实。当时的译者们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上的文化优越感和现实中的挫折感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和人文作品的。在这样一个社会心理条件下，虽然中国当时的文化地位在客观上是处于劣势，但封建士大夫们在心理上并不承认这个差距。

论者继而指出：“因此，当时的翻译文学实际上只能在多元系统内处于次要地位，难登大雅之堂。”（同上）我们不明白论者何以得出这一结论，但必须指出的是，说 “当时的翻译文学” “难登大雅之堂”，与事实不符：当时⁴⁷的翻译文学——至

⁴⁵ 这一点，我们无从得知，但却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⁴⁶ 这里选择的两位论者在中国大陆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而也就颇具代表性。

⁴⁷ 论者这里将 “第一阶段” 限定在 1840 至 1919 年，且视严复与林纾为这一阶段的 “代表人物”，并无不当之处，但如果考察的是其标题中的 “翻译文学”，这就成了问题：正如本文前述，晚清的翻译文学或文学翻译，主要是在甲午战后，况且严复翻译的也不是文学文本；并且，据樽本照雄（2000：171）的统计，在 1901—1907 年间，翻译小说超过创作小说。因此，论者的断语至少不适用于 1901—1919 年这一时段；

少是翻译小说——已经被视为“文学之最上乘”。

继而，论者在分析了严复翻译*Evolution and Ethics*的第一段这一例子⁴⁸后，认为，“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这种归化式的翻译策略正是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时的典型特征。”（同上）论者还论及到了林纾（5—6）：

无独有偶，与严复同属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林纾也采用了同样归化的翻译策略。他在翻译小仲马的*La Dame aux Camélias*（《茶花女》）时，也将第一人称换成了作者名“小仲马”。不难看出，两位译者在处理同一语言现象时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是出于同样的社会语用目的。而这一目的又是由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学多元系统所占据的地位以及译者对中国文化地位的主观认定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虽然当时中国的文化地位客观上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但中国人在心里〔理〕上还不愿面对和承认这个现实。

需要注意的是，论者在这里不但涉及到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占据的地位，而且包括了“中国文化地位”：论者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跨文化语境的问题了，即不但考虑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这一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而且考虑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至少是与原语文化系统进行了比较。这样一来，论者似乎就没有注意到Even-Zohar的理论主要面对的是译语文化系统这一立足点。此外，论者也有一点是我们不明白的：既然论者认定这一时期属于“第三次翻译高潮”——而且是以文学翻译为主的时期，为何会出现“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的现象⁴⁹？从论者的论述逻辑看，原因就是这一时期的译者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而论者根据Even-Zohar等人的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译者采取“充分性”的翻译策略，即“异化”，位于边缘位置时，则采取“可接受性”的翻译策略，即“归化”；既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归化”，翻译文学的地位自然就是“边缘”了。换言之，论者的结论乃是根据理论逆推出来的，即寻找符合理论的那些“事实”。

谢天振（2003：64—65）也“参照”Even-Zohar有关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的“三种情形”，“去观照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似乎的确可以发现不少契合之处”（2003：64）：

而这一时段恰好是近代翻译小说的高潮阶段。

⁴⁸ 虽然胡适说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本身具有文学的价值，但毕竟不是文学文本。

⁴⁹ 王宏志（1999：38）指出：“晚清文学翻译大盛，是Even-Zohar所说翻译处于主要位置的时候。”

譬如中国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就与上述第一种情况极相仿佛：当时，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

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论者认为“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是处在“中心”位置的；但在同一文中，论者却又认为“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处在“边缘”的位置（2003：65）：

埃文-佐哈尔则是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这一角度出发解释上述现象，并且进而引申出关于翻译文学的位置对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策略等的影响问题。在埃氏看来，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在上述两例中，罗马译者已经“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清末民初的中国译者则“实际上蕴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域外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因此，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占据的显然仅是边缘位置，于是译者对所译作品或是随意删改、或是“削足适履”，把原作生硬地套入译入语文学中的现成模式，如把西洋小说“翻译”成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模样，等等，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翻译的“充分性”。

论者在同一文中，运用同一个人的理论，分析同一个对象，前后得出的结论却自相矛盾。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两种：论者所依据的理论存在问题，或者是论者对所讨论的对象把握不足，甚或二者兼而有之。

笔者认为，如果仅仅依据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是无法对清末的文学翻译做出较为完满的解释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一理论“集中研究的却是语言 / 文学多元系统”，因而“不足以全面解释翻译多元系统的现象与文化中其他多元系统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张南峰，2004：137）。上述论者考察与分析晚清文学翻译，进行分析与做出推断的时候，恰恰是局限于语言 / 文学多元系统，其解释不够充分也就在所难免。

张南峰（2001）鉴于 Even-Zohar 等人的多元系统理论所存在的问题（详见 2001：172—174），针对翻译研究提出一个“多元系统论的精细版”，并在《中

西译学批评》中运用多元系统论，对严复、林纾的翻译作了如下的解释（2004：28—29）：

清朝末年，中国的文化多元系统因外国侵略而开始出现危机或者真空，于是需要借助翻译来填补，但在危机初现之时，古文的语言文学系统在中国语言文学多元系统中的支配地位依然稳固，在严复、林纾以及他们的读者的心目中依然至高无上，因此他们必然要遵守目标文化的语言、文学规范，制造出「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甚高而「充分性」(adequacy) 颇低（即是颇不忠实）的译文来。假如他们用了白话文来直译的话，起码在当时来说，一定不可能有那样大的社会效果。

笔者下面采用多元系统论的视角，就本文的研究作一概述：

如果套用系统⁵⁰的概念，国家这一系统可以分为国家机器系统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那么，根据本文的语境分析，可以看出，直接引发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并非来自与翻译系统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而是国家机器系统中的军队系统：1840 年代鸦片战争⁵¹军事上的失利，导致晚清朝廷政治系统⁵²“不稳定”。

晚清朝廷为了“国家”或“民族”(nation-state)的安全，或者更为直接地说，为了自身的统治稳定，作为对军事失利的一个直接应对措施，设立了外语翻译人才培养学校与翻译机构，开展洋务运动，试图以此达到非常具体的“师夷长技”并进而“制夷”，最终实现“自强”的目的。在这一意识形态主导下，翻译主体及其赞助者为使其翻译行为在民族-国家系统中具有合法性，采取或者说巧妙地借用了“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等话语策略。翻译选材主要是广义的科技文本类型；翻译所产生的影响因而主要是在科学技术层面，虽然也会在意识形态上带来间接的影响。随着翻译的积累，以及翻译主体构成及其认识上的变化，原文文本的类型也发生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变，形成二者共存的局面。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完全粉碎了洋务派“御外”与“自强”的希望。人

⁵⁰ 从本质上言，一旦采用系统的概念，就是承认“多元系统”的存在。虽然这与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有共同之处，即其“问题框架”(problematic)均为系统论，但不同的是，Even-Zohar无论是早期注重文学多元系统，还是1990年代后期关注的文化多元系统，都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范围。从这意义上言，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似乎不能从整体上解释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同样地，张南峰（2001）虽然起源于Even-Zohar的理论，但严格说来，已经不是Even-Zohar的理论。

⁵¹ 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

⁵² 主要体现为统治地位的不稳定。

们开始将“改革”的目光直接转向政治系统，探讨政治改革。“维新”的主张将翻译更多地引向社会科学，出现了主要面向社会上层精英的政治启蒙话语。

戊戌维新变法的流产，迫使维新派领袖探求失败的根源，梁启超等人最终转向“意识形态”启蒙，并且是对大众的启蒙，“新民”话语由此提出。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派⁵³从“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的诗学与意识形态观念出发，认为要想将他们的“道”——政治主张，或意识形态话语——“通俗易懂”地“灌输”给大众，只有利用“小说”这一“雅俗共赏”的途径。

从以上粗略的勾画中可以看出，启蒙派之诉求于“小说”系统或者说“文学”系统，乃是将其作为一种达到政治或意识形态主张的途径或手段，主要不是从文学系统的自身需要出发⁵⁴。

在启蒙派看来，“文学”系统内部的中国“小说”基本上不出“诲淫”与“诲盗”两端，因而无法实现他们的“载道”功能；解决的办法只有两种：创作新的小说；翻译域外小说。但创作小说毕竟不容易⁵⁵，最为便捷的途径便是翻译小说。翻译文学或翻译小说在取得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地位后，正式进入中国的“文化”系统。

翻译文学进入中国文化系统后，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却颇耐人寻味，这一点也没有人注意或论及到。笔者认为，在清末，翻译文学的位置不是一个，至少有两个，而且是具有悖论性质的两个：经过梁启超等人的鼓吹与推动，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取得了“中心”位置；在文学——甚至是小说——系统中，翻译文学则基本上处于“边缘”位置⁵⁶。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解释清末的文学翻译高潮：首先，由于处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中心”地位，译者以此作为其翻译行为的合法性根据，在译本的序跋中，无论译本内容是否与翻译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总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及⁵⁷；其次，面对中国自身已有的强势文学，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则处于“边缘”的位置，译者因而基本上是依照中国传统的诗学来解读域外的小说文本，即便是试图提高翻译小说的文学

⁵³ 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称之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⁵⁴ 因此，中国大陆的一些论者在尝试运用Even-Zohar的“文学多元系统”观点来解释清末的文学翻译，不免有附会与牵强之嫌。

⁵⁵ 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并没有写完，而且他自己在“绪言”中也承认：“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1997：55）。

⁵⁶ 在文学系统内，采用Even-Zohar的观点，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译者考虑的主要是“可接受性”（归化）而不是“充分性”（异化）。

⁵⁷ 换言之，译者可以说是打着意识形态启蒙的“旗号”在进行翻译。

地位，也是在中国诗学传统中寻找与之相同或相似的地方⁵⁸。因为启蒙的目的⁵⁹与中国诗学这两方面的原因，译者自然是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了，在翻译过程中也是自由地处置原文文本，其极端的形式便是“伪译”这一“无中生有”的翻译。

虽然清末文学翻译的需要并不来自文学系统本身，但随着文学翻译的积累，翻译文学系统逐步开始形成，并对文学系统中的中国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诗学观念、表现手法与语言等方面。在清末，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基本上处于边缘位置⁶⁰，因而文学翻译总体上只能是以“可接受性”为主导，“充分性”较强的文学翻译不能为当时的读者所接受。

从上面勾划的粗略发展进程与概括可以看出，考察清末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即便是其中的文学翻译，尤其是本文研究的小说翻译，也必须将其纳入“民族-国家”这一总系统之中，即从宏观上考察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否则，就无法把握这一时期的真实面貌，无论采用什么理论与视角，都无法正确地给出一个客观而又合理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由于无法对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学翻译现象进行考察与分析，因而笔者并不奢望由此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⁶¹。

拓展本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虽然本文确立研究的出发点是清末的文学翻译，作为一种翻译类型的断代史研究，时段并不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译本的收集与整理方面，却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远远超出了笔者当初的预料之外。由此困难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全面、真实地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现象；在不完备的资料基础上做出的总体结论就无法确保其可靠性。这些客观的困难也就决定本研究的

⁵⁸ 当时译者这种用中国传统的诗学观念来解读域外小说的做法，既可以说是译者自身的诗学观念或当时主流诗学观念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也可以说是译者的一种类似于佛经翻译中的“格义”式的策略，意在使读者更愿意接受译者通过译本所传达的内容。

⁵⁹ 但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总是有具体的启蒙思想内容作为选材的指导。

⁶⁰ 翻译文学的边缘位置只有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发生了改变；因此清末的文学翻译对于新文化运动而言，是一个准备与酝酿的阶段。

⁶¹ 如郑振铎 1923 年 7 月 2 日在《文学旬刊》第 78 期发表“翻译与创作”（1923），说：“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这与 50 多年后 Even-Zohar 的观点颇类似，但笔者认为这种或类似的“规律”应该“论从史出”，应该建立在历史上的翻译现象进行统计的基础之上，而且规律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

局限所在，此其一。其二，是本文虽然研究的是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但并没有涉及戏剧、诗歌等文类，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集中在小说翻译领域。

本文的局限，也就昭示了本研究领域未来的可能方向。（1）资料收集 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完整地收集有关文本，包括译本、译者的序跋等副文本，对译本的评论，受译本影响的文本等；（2）社会文化背景考察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文化背景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如这一时期具体的（国际）政治环境，各种具体意识形态的内涵等，从而将研究对象置于更为广阔的语境之中，以期更为客观与真实地描述翻译行为；（3）译本的影响研究 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考察译本对文学创作——或作者——的影响，包括语言、诗学等方面；同时，考察译本对当时或其后阶段的思潮或运动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换言之，考察译本作为翻译话语在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运作。

总而言之，本文研究的对象尚有不少值得开拓的空间，值得笔者和其他研究者在未来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在笔者，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rnstone, Willis. 1993.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ssnett, Susan and André Lefevere, eds.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 Berman, Antoine. 1984. *L' 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Paris: Gallimard.
- Berman, Antoine. 1992.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Trans. S. Heyvaer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heung, Martha (张佩瑶). 1998. "The Discourse of Occidentalism? Wei-yi and Lin Shu's Treatment of Religious Material in Their Translation of *Uncle Tom's Cabin*". In David Pollard ed. 1998: 127—149.
- Compton, Robert William. 1971.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s of Lin Shu, 1852-1924*.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Dumas Fils, Alexandre. 1951. *La Dame aux Camélias*. Paris.
- Even-Zohar, Itamar. 1978.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Itamar Even-Zohar *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Tel Aviv: Porter Institute, 1978) 21-26.
- Even-Zohar, Itamar. 1990.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
- Even-Zohar, Itamar. 1997. "Factors and Dependencies in Culture: A Revised Outline for Polysystem Culture Research."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4.3: 15-34.

- Gentzler, Edwin.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 Gentzler, Edwin. 2001. 2nd rev. editio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Hugo, Victor. *Les Misérables*. Paris: Bruxelles.
- Kelly, L. G. 1979.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Oxford: Blackwell.
- Lefevere, André. 1977. *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er to Rosenzweig*. Assen/Amsterdam: Van Gorsum.
-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 Liu, Lydia (刘禾).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ndberg, Lennart. 1989. *Lu Xun as a Translator: Lu Xu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03-1936*. Stockholm: Orientaliska Studier, Stockholm University.
- Niranjana, Tejaswini. 1992.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llard, David, ed. 1998.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 Pym, Anthony. 1998.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 Stowe, Harriet Beecher. *Uncle Tom's Cabin, A Tale of Life Among the Lowly*.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Publishers.
- Toury, Gideon. 1995a. "The Notion of 'Assumed Translation' - An Invitation to a New Discussion". H. Bloemen, E. Hertog & W. Segers, eds. *Letterlijkheid, Woordelijkheid / Literality, Verbality*. Antwerpen/Harmelen: Fantom, 1995.

135-147.

Toury, Gideon. 1995b.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Tymoczko, Maria. 1999.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Venuti, Lawrence, ed. 1992.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Venuti, Lawrence.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London: Routledge.

Venuti, Lawrence. 1997. "Lin Shu: Translating for the Emperor". *TRANS* No. 2: 143-150.

Wong, Laurence (黄国彬). 1998. "Lin Shu's Story-retelling in 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a Dame aux camélias*". *Babel* 3: 208-233.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1984.《保卫马克思》(*For Max*)。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阿英, 1996.《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阿英, 2000. "初期的翻译杂志"。载阿英《阿英说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84—192。

埃文-佐哈尔 (Even-Zohar), 2000.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庄柔玉译。载陈德鸿、张南峰 (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117—123。

包天笑, 1971.《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

别士 (夏曾佑), 1903. "小说原理"。原载《绣像小说》第三期。另载陈平原、夏晓虹 (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73—78。

- 陈大康, 2002。《中近代小说编年》。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陈福康, 1992。《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陈福康, 2000。第二版修订版。《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陈鹏翔(编著), 1975。《翻译史·翻译论》。台湾: 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陈平原, 1997, 《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中、下册)。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 陈平原, 1997。“前言”。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3—15。
- 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思和, 1997。“雨果及其作品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4: 88—98。
- 陈万雄, 1979。“谈雨果《悲惨世界》最早的中译本”。《抖擞》总第 31 期: 10—14。
- 陈永国, 2002。“话语”。《外国文学》3: 28—33。
- 陈玉刚(主编), 1989。《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陈子展, 2000。《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程文超, 1999。《百年追寻》。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楚卿(狄葆贤), 1903。“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原载《新小说》第一卷第七号。
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78—81。
- 丁立群, 2003。“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一种文化阐释”。《哲学动态》3: 37—41。

- 丁伟志、陈崧，1995。《中西体用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定一，1905。“小说丛话”。原载《新小说》第十五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97—100。
- 独立之个人 [马君武]，1902。“《俄罗斯大风潮》序言”。[英] 克喀伯著《俄罗斯大风潮》，独立之个人译。上海：广智书局。另载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2。
- 段怀清，1994。“关于‘林译’美国文学作品的几个问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54—56。
- 范伯群，1996。“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的文学翻译对小说创作之促进”。《江海学刊》6：171—175。
- 范伯群、朱栋霖，1993。《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冯桂芬，1861。“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另载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9—72。
- 冯自由，1981。《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
- 傅斯年，1919。“译书感言”。原载《新潮》1919年3月1日第一卷第三号。另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66—368。
- 甘慧杰，2002。“点校说明”。载载森有礼（编）《文学兴国策》（林乐知、任廷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3。
- 高凤谦，1897。“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时务报》1897年5月12日第26期。另载徐中玉（主编），1995：732—734。
- 高旭东，2000。通向世界文学的桥梁——读《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文学评论》1：145—147。
- 高韵青，1998。“从《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形象看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外

交学院学报》3: 81—84。

工藤贵正 [日], 1995。“鲁迅早期三部译作的翻译意图”。赵静译, 陈福康校。
《鲁迅研究月刊》1: 38—43。

龚书铎 (主编), 1997。《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北京: 中华书局。

管达如, 1912。“说小说”。原载《小说月报》第三卷第五、第七至十一号。另载
陈平原、夏晓虹 (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97—412。

郭延礼, 1997。“中国近代翻译述略——兼论文学翻译迟到的原因”。《岱宗学刊》
2: 66—72。

郭延礼, 1998。《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海天独啸子, 1903。“《空中飞艇》弁言”。原载 (日) 押川春浪著、海天独啸子
译, 1903 年 9 月明权社出版的《空中飞艇》。另载陈平原、夏晓虹 (编)《二
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06—108。

寒光, 1935。《林琴南》。上海: 中华书局。

韩迪厚, 1969。《近代翻译史话》。香港: 香港辰卫图书公司。

韩南 (Patrick Hanan), 2004。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韩一字, 2004。林纾与王庆骥——被遗忘的法文合作者及其对林纾的意义。《中
华读书报》2004 年 3 月 31 日。

韩永芝, 2001。“从文化排斥与文化认同看清末外国小说翻译”。《解放军外国语
学院学报》5: 66—69。

郝岚, 2003。“被道德僭越的爱情——林译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迦
茵小传》的接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64—69。

郝岚, 2004。“林纾对哈葛德冒险与神怪小说的解读”。《东方论坛》1: 72—77。

贺麟, 1925。“严复的翻译”。原载《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21 号(1925 年 11 月) 页 75—87; 另载罗新璋(1984: 146—160)。

胡适, 1922。“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

偈 [吴沃尧, 吴趼人], 1906。“《预备立宪》弁言”。原载《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二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93。

趼廛主人 [吴沃尧, 吴趼人], 1904。“《毒蛇圈》评语”(第三回、第九回)。原载《新小说》第九号、第十二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12。

蒋俊、李兴芝, 1991。《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蒋英豪, 1997。“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文史哲》1: 71—78。

觉我, 1908。“余之小说观”。原载《小说林》第九期、十期。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32—338。

康德, 1990。“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译。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22—31。

孔范今, 1996。“‘新文学’史断代上限前延的依据和意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必要阐释”。《东岳论丛》6: 89—96。

孔慧怡(Eva Hung), 2000。“还以背景, 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载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 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88—117。

况敏, 1998。“举头红日近 极目楚天舒——罗选民教授和他的话语翻译研究”。《中国翻译》3: 25—28。

黎难秋, 1993。《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蠡勺居士, 1873。“《听夕闲谈》小序”。《瀛寰琐记》第 3 期。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570—571。

- 李鸿章, 1961。《奏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季, 1952。“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翻译通报》1952年1月号。另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303—314。
- 李岫、秦林芳(主编), 2001。《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下)。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李亚舒、李难秋, 2000。《中国科学翻译史》。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李怡, 2001。《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泽厚, 1979。《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李泽厚, 200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李宗刚, 1994。“论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 17—32。
- 利玛窦、金尼阁, 1983。1997年4月北京第三次印刷。《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何兆武校。北京: 中华书局。
- 梁启超, 1892。“学要十五则”。《读书分月课程》。另载梁启超, 1999: 3—5。
- 梁启超, 1896。“《西学书目表》序例”。另载梁启超, 1999: 82—84。
- 梁启超, 1896。“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另载梁启超, 1999: 66—67。
- 梁启超, 1896。“论幼学”。另载梁启超, 1999: 34—42。
- 梁启超, 1897。“《蒙学报》、《演义报》合叙”。《变法通议》。另载梁启超, 1999: 131。
- 梁启超, 1897。“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另载梁启超, 1999: 128—129。
- 梁启超, 1897。“论译书”。另载梁启超, 1999: 44—50。

梁启超, 1897。“论幼学”。《变法通议》。另载梁启超, 1999: 34—42。

梁启超, 1898。“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37—38。

梁启超, 1901。“难乎为民上者”。《清议报》1901 您 10 月 11 日(第 98 册)。

梁启超, 1901。“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丛报》第 1 号。
另载梁启超, 1999: 655—657。

梁启超, 1902。“《十五小豪杰》译后语”。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64。

梁启超, 1902。“《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一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54—55。

梁启超, 1902。“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50—54。

梁启超, 1902。“介绍新著《原富》”。另载牛仰山、孙鸿霓(编), 1990: 266—268。

梁启超, 1902。“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58—63。

梁启超, 1915。“告小说家”。原载《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一期。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510—512。

梁启超, 1989。《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北京: 中华书局。

梁启超, 1999。《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梁启超, 2003(1920)。《清代学术概论 儒家哲学》。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林昌彝, 1988。《射鹰楼诗话》卷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林煌天, 1995。“略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福建外语》1—2: 92—

林乐知，1896。“《文学兴国策》序”。载森有礼（编）《文学兴国策》。林乐知、任廷旭译。上海：广学会。

林乐知，2002。“《文学兴国策》序”。载森有礼（编）《文学兴国策》（林乐知、任廷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3—6。

林纾，1899。“《巴黎茶花女遗事》序”。《巴黎茶花女遗事》。福州畏庐藏版。另载《巴黎茶花女遗事》（1981）（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罗新璋（编），1984：161；陈平原、夏晓虹（编），1997：40；吴俊（编），1999：3。

林纾，1905。“《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序”。原载（美）增米自记、（英）亚丁编辑，林纾、曾宗巩合译，190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56—157。

林纾，1905。“买坡塘并序”。另载《迦茵小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3。

林纾，1906。“《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红礁画桨录》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3-184。

林纾，1906。“《洪罕女郎传》跋语”。上海：商务印书馆。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1997：181—182。

林纾，1906。“《洪罕女郎传》跋语”。原载商务印书馆版《洪罕女郎传》。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1—182。

林纾，1906。“《洪罕女郎传》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1997：179—180。

林纾，1907。“‘耶稣圣节前一日之夕景’跋”。原载1907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华盛顿欧文著，林纾、魏易合译”的《拊掌录》。另载吴俊（标校）《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63。

林纾，1907。“《爱国二童子传》达旨”（节录）。原载（法）沛那著，林纾、李世

中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爱国二童子传》。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88—291。

林纾，1907。“《剑底鸳鸯》序”。原载（英）司各德著，林纾、魏易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剑底鸳鸯》。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91—292。

林纾，1907。“《孝女耐儿传》序”。《孝女耐儿传》。林纾、魏易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1997：293—294。

林纾，1908。“《不如归》序”。原载（日）德福健次郎著，盐谷荣英译，林纾、魏易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不如归》。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54—355。

林纾，1908。“《块肉余生述》前编序”。原载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却尔司迭更司著，林纾、魏易译的《块肉余生述》前编。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48—349。

林纾，1908。“《块肉余生述》续编识语”。原载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却尔司迭更司著，林纾、魏易译的《块肉余生述》后编。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49。

林纾，1908。“《英国大侠红鬃烈传》序”。原载男爵夫人阿克西原著，林纾、魏易同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侠红鬃烈传》。另载吴俊（标校）《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95。

林纾，1909。“《冰雪因缘》序”。原载（英）却尔司迭更司著，林纾、魏易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冰雪因缘》。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73—374。

林纾，1909。“《彗星夺婿录》序”。原载（英）却洛得倭康、诺埃克尔司著，魏易口译，林纾笔述，商务印书馆出版《彗星夺婿录》。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73。

- 林纾，1914。“《荒唐言》跋”。另载吴俊（标点）《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16。
- 林纾，1914。“《中华大字典》叙”。原载《中华大字典》。另载吴俊（标校）《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73—174。
- 林纾，1916。“《鹰梯小豪杰》叙”。上海：商务印书馆。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1997：551—552。
- 林纾，1918。“《<古文辞类纂>选本》序”。原载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选编的《<古文辞类纂>选本》第一卷。另载吴俊（标校）《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46—148。
- 林纾，1921。“《怪董》跋”。原载192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伯鲁夫因支原著，林纾、陈家麟译《怪董》。另载吴俊（标校）《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26。
- 林纾，1922。“《兴登堡成败鉴》序”。原载1922年9月另载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林驹同译，（法）蒲哈德《德大将兴登堡欧战成败鉴》。另载吴俊（标校）《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29。
- 林纾、王寿昌（冷红生、晓斋主人），1899/1981。《巴黎茶花女遗事》。北京：商务印书馆。
- 林纾、王寿昌译，1899/1981。《巴黎茶花女遗事》。北京：商务印书馆。
- 林纾、魏易（合译），1906。《海外轩渠录》（二卷）。上海：商务印书馆。
- 林学锦、詹扬文，1994。“试论雨果小说中神父形象的人道主义内涵”。《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39—46。
- 灵石，1904。“读《黑奴吁天录》”。《觉民》第八期。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1997：131—133。
- 刘禾（Lydia H. Liu），1999。《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刘禾（Lydia H. Liu），2002。《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

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

刘少勤，2003。《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刘树森，1997。“论中国近代外国小说翻译的叙事语态特征”。《外国语》5：55—65。

刘献彪，1998。“对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几点看法”。《中国比较文学》4：149—153。

刘勇强，2003。“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文学遗产》3：109—124。

柳鸣九，1992。“《悲惨世界》前言”。载雨果《悲惨世界》（李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上册，1—6。

柳无忌，1987。“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载柳亚子，1987：517—536。

柳无忌，1992（1972 英文版）。《苏曼殊传》。王晶珪译。北京：三联书店。

柳亚子，1927。“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载柳亚子、柳无忌，1927：279—286。

柳亚子，1987。《苏曼殊研究》。柳无忌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柳亚子，1991。“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苏曼殊文集》序”。载马以君（编注）《苏曼殊文集》（上、下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3—25。

柳亚子、柳无忌（编），1927。《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上海：北新书局。

鲁滨孙飘流记译者，1902。“《鲁滨孙飘流记》译者识语”。原载《大陆报》第一卷第一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6。

鲁迅（译），1903a。“斯巴达之魂”。《浙江潮》1903年6月第五期。另载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七卷：9—16。

鲁迅（译），1903b。“哀尘”。《浙江潮》1903年6月第五期。

鲁迅（译），1903c。《月界旅行》。东京：东京进化社，1903年10月。

鲁迅（译），1903d。《地底旅行》第一、二回。《浙江潮》第十期。

鲁迅，1903。“《月界旅行》辩言”。原载《月界旅行》（东京：东京进化社，1903年10月）。另载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10卷，151-152。

鲁迅，1908。“摩罗诗力说”。原载《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另载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1卷：63—100。

鲁迅，1909。“《域外小说集》略例”。原载1909年版《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另载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10卷：157。

鲁迅，1909。“《域外小说集》序言”。原载1909年版《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另载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10卷：155。

鲁迅，1913。“《艺术玩赏之教育》译者附记”。原载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8月第一卷第七期。另载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10卷：416。

鲁迅，1921。“《域外小说集》序”。原载1921年版《域外小说集》。另载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10卷：161—163。

鲁迅，1925。“《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10卷：240—246。

鲁迅，1926。“《坟》题记”。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1卷：3-5。

鲁迅，1929。“《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原载一九二九年四月朝花社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一）》。另载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4卷：131—132。

鲁迅，1929。“《小彼得》译本序”。原载1929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小彼得》中译本（许霞译）。另载鲁迅（1981）《鲁迅全集》第4卷：151—153。

鲁迅, 1931。“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新闻》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三日, 第二十期和二十一期。

鲁迅, 1932a。1932 年 1 月 16 日给增田涉信。鲁迅 (1981)《鲁迅全集》第 13 卷: 471—474。

鲁迅, 1932b。“论翻译——答 J. K. 论翻译”。原载《文学月报》一九三二年六月第一卷第一号。另载鲁迅 (1981)《鲁迅全集》第 4 卷: 379-386。

鲁迅, 1933。“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原载 1933 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创作的经验》。鲁迅 (1981)《鲁迅全集》第 4 卷: 511—514。

鲁迅, 1934。“致杨霁云”。载鲁迅 (1981)《鲁迅全集》第 12 卷: 409—410。

鲁迅, 1935。“‘题未定’草”。《文学》月刊 1935 年 7 月第五卷第一号。罗新璋 (编)《翻译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398—399。

鲁迅, 1935。“《集外集》序言”。鲁迅 (1981)《鲁迅全集》第 7 卷, 3—5。

鲁迅, 1981。《鲁迅全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 1938。《鲁迅全集》第 11 卷。1948 年 12 月 15 日三版。上海: 鲁迅全集出版社。

罗新璋 (编), 1984。《翻译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罗选民, 1990。“话语层翻译标准初探”。《中国翻译》2: 2—8。

罗选民, 2002。“话语的认知模式与翻译的文本建构”。《外语与外语教学》7: 11—14。

马晓冬, 1999。“《茶花女》汉译本的历时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3: 55—60。

马以君, 1991。“前言”。载马以君 (编注) (编注)《苏曼殊文集》(上、下册)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1) 26—52。

马祖毅, 1999。《中国翻译史》(上)。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毛策, 1995。《苏曼殊传论》。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茅盾, 1922。“‘直译’与‘死译’”。《小说月报》1922年8月第13卷第8期。
另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343—344。
- 茅盾, 1934。“直译·顺译·歪译”。《文学》1934年3月第2卷第3期。另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351—354。
- 茅盾, 1954。“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1954年8月19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译文》1954年10月号。另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501—517。又载《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1—16。
- 孟登迎, 2002。《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术丛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摩西[黄摩西], 1907。“《小说林》发刊词”。原载《小说林》1907年第一期。
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53—255。
- 穆雷, 1996。“创建话语翻译学——罗选民教授翻译研究述评”。《语言与翻译》1: 77—80。
- 蟠溪子, 1903。“《迦因小传》引言”。《迦因小传》。翻译者蟠溪子, 参校者天笑生。上海: 文明书局。
- 裴效维, 1986。“苏曼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文学研究组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集》(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170—219。
- 彭明、程献(主编), 1999。《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披发生, 1909。“《红泪影》序”。原载岭南息影庐主[陈梅卿]译述英国巴达克礼著, 广智书局出版《红泪影》。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79—380。
- 平子, 1903。“小说丛话”。原载《新小说》第七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3。

普列汉诺夫[俄],1980。《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王荫庭译。北京:三联书店。

钱基博,1933。“林纾的古文”。原载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 页 137—153。另载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175—188。

钱永祥,2002。《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北京:三联书店。

钱钟书,1964。“林纾的翻译”。原载196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另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96—725。

乔森纳·卡勒(Jonathan Culler),1998。李平译。《文学理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邱炜菱,1901。“《茶花女遗事》”。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1997: 45。

裘廷梁,1898。“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原载《无锡白话报》1898年8月27日第19、20期。另载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4) 82—86。

森有礼(编),1896。《文学兴国策》。林乐知、任廷旭译。上海:广学会。

森有礼(编),2002。《文学兴国策》。《文学兴国策》。林乐知、任廷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1981。“出版说明”。载《巴黎茶花女遗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

上海国民日报馆(编),1965。《国民日报》(一册)(清光绪廿九年六、八等两月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邵璐,2004。“国内翻译界在多元系统论研究上的误区”。《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5: 40—45。

余协斌, 1996。“法国小说翻译在中国”。《中国翻译》1: 19-22+44。

余协斌, 2002。“雨果在中国: 译介、研究及其他——纪念世界文化名人雨果诞辰 200 周年”。《中国翻译》1: 66—69。

施莱尔玛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2000。“论翻译的方法”。伍志雄译。载陈德鸿、张南峰 (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21—27。

施蛰存, 1999。“翻译文学的输入——《翻译文学集·导言》”。载本社编《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286—313。

石介, 1984。《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北京: 中华书局。

世 [黄小配], 1908。“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原载《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四期 (1908 年 3 月 12 日)。另载陈平原、夏晓虹 (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20—323。

斯托夫人, 1982。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松岑, 1905。“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新小说》第十七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 (编), 1997: 170—172。

苏华, 1994。“陈独秀与法国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6: 115—120。

苏华, 1997。“二十世纪初叶日本文学在中法文学交流中的桥梁作用”。《文艺理论与批评》1: 59—64+77。

苏曼殊, 1903。“女杰郭耳縵”。《国民日报》1903 年 10 月 7 日、8 日、12 日。另载苏曼殊, 2003: 199—202。

苏曼殊, 1935。《曼殊大师全集》。文公直编。香港: 文渊书店。

苏曼殊, 2003。《惨世界》。《苏曼殊作品精选》。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孙艺风, 2003。“跨文化语境下的意识形态——兼论翻译的功能与作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6: 108—113。

- 孙致礼, 1996。《1949—1966: 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南京: 译林出版社。
- 谭好哲, 1997。《文艺与意识形态》。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谭载喜, 1991。《西方翻译简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汤庭芬, 2000。《无政府主义思潮史话》。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唐月琴, 2003。“论苏曼殊的小说创作”。《湖南社会科学》3: 181—182。
- 天僂生, 1907。“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原载《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一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85—288。
- 铁, 1908。“铁瓮烬余”。原载《小说林》第十二期。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56。
-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 2001。《福柯的面孔》。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王宏志, 2001。“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中国比较文学》2: 98—107。王建开, 2003。《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 1919-1949》。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王克非(编著), 1997。《翻译文化史论》。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东风, 2000。“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4: 2—8。
- 王尔敏, 200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国维, 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38。
- 王国维, 1995。“论新学语之输入”。载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上海: 上海书店, 1995) 720—723。
- 王宏志(Lawrence Wong), 1995。“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研究月刊》3: 47—59。另载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168—197。又载王宏志《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183

王宏志, 1999.《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王建开, 2003.《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 1919-1949》。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克非(编著), 1997.《翻译文化史论》。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克非, 1994. “论翻译文化史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4: 57-61。

王克非, 1996.《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 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列耀, 1999.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期: 51—56。

王小璜, 1998.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茶花女》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 42—45。

王晓丹, 2000.《翻译史话》。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晓元, 1999a.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中国翻译》2: 10—14。

王晓元, 1999b. “直译意译辨析——翻译方法论之一”。载姜治文、文军(主编)《当代英语百论》(第一卷)(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9) 154—158。

王晓元, 2000. “文学翻译中的删改”。《翻译季刊》16&17: 24—39。

王友贵, 2001.《翻译家周作人》。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王振孙(译), 1986. 1992年7月北京第7次印刷。《茶花女》。[法]小仲马著。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王振孙(译), 1993.《茶花女: 小说—话剧—歌剧》。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佐良, 1987。“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次专题翻译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翻译》5: 2-4。另载王佐良《翻译: 思考与试笔》(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2-6。

王佐良, 1989, “严复的用心”。载王佐良《翻译: 思考与试笔》(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37—42。

王佐良, 1989。《翻译: 思考与试笔》。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魏惟仪(编), 1992。《林纾魏易合译小说全集重刊后记》。

魏易, 1901。“《黑奴吁天录》序”。原载 1901 年武林魏氏刊行木刻四卷本《黑奴吁天录》书首。另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279—280。

魏源, 1999。《海国图志》(节选)。载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21—46。

文公直, 1934。《曼殊大师传》。载苏曼殊, 1935: 1—44。

我佛山人[吴趼人], 1905。“《电术奇谈》附记”。《电术奇谈》。上海: 广智书局。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163—164。

我佛山人[吴趼人], 1905。“《电术奇谈》附记”。原载《新小说》第十八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63—164。

吴趼人, 1906。“《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一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186—188。

吴俊(标校), 1999。《林琴南书话》。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吴俊, 1999。“林译小说: 世纪末的一个悬念”。《作家》9: 101—106。

吴立昌(主编), 2004。《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吴南松, 2003。“功能翻译理论及其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以对晚清小

说翻译的批评为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69—73。

吴棹（译），1906。“灯台卒”。原载《绣像小说》第六十八至六十九期，题“星科伊梯撰[波兰显克微支（1846-1916）]，（日）抱一庵主人译，钱塘吴棹重演”。

吴沃尧[吴趼人]，1906。“《月月小说》序”。原载《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一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6—188。

武润婷，2003。“晚清的文学启蒙精神”。《文艺研究》4：43—44。

夏晓虹，2000。“斯托夫人与批茶女士——晚清翻译文学误读之一例”。载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34—246。

谢飘云，2002。“林纾与严复散文、译述之比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8-46+51。

谢天振，1998。“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中国比较文学》2：1—19。

谢天振，1999。《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谢天振，2003。“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外国语》4：59—66。

谢昭新，2003。《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新小说报社，1902。“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原载《新民丛报》第十四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8—63。

熊月之，1994。《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徐志啸，1995。“中国比较文学的发轫期”。《山西师大学报》1：53—59。

徐志啸，2002。“试论林纾的中西文学比较”。《学术月刊》8：59—63。

徐中玉（主编），1995。《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上海书店。

许钧，1999。对翻译的历史思考——读《从西塞罗到本雅明》。《上海科技翻译》3：1—4。

薛玉凤，2002。“汤姆叔叔”形象质疑。《山东外语教学》6：18—20。

严复，1895。“原强”。原载1895年3月4—9日《直报》。另载牛仰山（编）《天演之声——严复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2—48。

严复，1898。“《天演论》译例言”。原载卢氏慎始基斋《天演论》初版本刻本。另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36—138。

杨洪承，2003。“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53—58。

杨鸿烈，1928。《苏曼殊传》。载杨鸿烈《中国文学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928）95—151。

杨联芬，2003。《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天石，1995。“苏、陈译本《惨世界》与近代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6：26—33。

耀公，1908。“小说与风俗之关系”。原载《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五期。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23—326。

叶再生，2002。《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4卷）。北京：华文出版社。

佚名，1903。“虚无党”。《苏报》1903年6月19日。另载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3—5。

译书公会，1897。《译书公会章程》。另见章太炎（1981：37注12）。

饮冰[梁启超]，1903。“小说丛话”。原载《新小说》第七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 1997) 82。

游友基, 2002。“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苏曼殊小说论”。《福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3: 1—4。

俞吾金, 1993。《意识形态论》。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雨果, 1992。《悲惨世界》。李丹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袁荻涌, 1994。“译述·意译·直译——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形态演变”。《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 4: 91—96。

袁荻涌, 2003。“雨果作品在近现代中国的译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85—89。

袁锦翔, 1990。《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袁锦翔, 1996。“胡适与文学翻译理论”。《中国翻译》4: 50—52+58。

袁进, 1999。“试论中国近代对文学范围认识的突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 14—23。

袁进, 2000。“试论近代翻译小说对言情小说的影响”。载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06—224。

臧仲伦, 1991。《中国翻译史话》。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曾宪辉, 1993。《林纾》。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张健(译), 1979。第二版。2005年5月第5次印刷。《格列佛游记》。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菊香, 2002。“鲁迅周作人早期作品署名互用问题考订”。《鲁迅研究月刊》6: 37—43。

张宽, 1995。“Discourse(话语)”。《读书》4: 132—134。

- 张梦阳, 2001。《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张南峰, 2001。“从边缘走向中心(?) :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外国语》4: 61—69。
- 张南峰, 2001。“为研究翻译而设计的多元系统论精细版”。《中外文学》3: 170—186。
- 张南峰, 2004。《中西译学批评》。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张佩瑶, 2003。“从话语的角度, 重读魏易与林纾合译的《黑奴吁天录》”。《中国翻译》2: 15—20。
- 张佩瑶, 2003。“西方主义的话语? ——《黑奴吁天录》个案研究”。《中外文学》32, 3: 141—166。
- 张申府, 1937。“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实报·星期偶感》1937年5月。另载《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68—170。
- 张胜祖、韩未名, 2001。“刘师复无政府主义思想探析”。《益阳师专学报》2: 62—65。
- 张世涛, 1996。“《迦茵小传》和林纾的古文翻译”。《中山大学学报论丛》3: 16—20。
- 张祖武, 1998。“酿成一场战争的小说——评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37—39。
- 章士钊, 1927。“与柳无忌论曼殊著作函”。载柳亚子、柳无忌(编), 1927: 附录, 16—17。
- 赵光育, 1999。《中国翻译小说史论》。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赵稀方, 2003。《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郑大华, 2002。“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中州学刊》5: 118—123。
- 郑振铎, 1924。“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另载薛绥之、张

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49—164；另见钱钟书等《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1—17。

知新室主人〔周桂笙〕，1903。“《毒蛇圈》译者识语”。原载《新小说》第八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1。

知新主人，1905。“小说丛话”。原载《新小说》第二十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1—103。

钟扬，1996。“从《惨世界》到《黑天国》——论陈独秀的小说创作”。《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4：57—63。

周宏，2003。“无政府主义：无根的社会学说”。《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64—68。

周建人，1959。“关于‘直译’”。原载《外语教学与翻译》1959年第9期。另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51-653。

周敬康，2002。“林纾与他的‘林译小说’”。《文史杂谈》6：68—70。

周氏兄弟（纂译），1909。《域外小说集》（一、二册）。东京：神田印刷所。

周树人，1903。“《月界旅行》辨言”。《月界旅行》。东京：进化社。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1997：67—68。

周作人（编译），1921。《域外小说集》。上海：群益书社。

周作人（译），1920。《点滴》。北平：北京大学出版部。

周作人，1907。“《红星佚史》序”。载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301。

周作人，1920。“《点滴》序”。载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301-303。

周作人，1924。“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另载周作人，1998：721

-723。

周作人, 1925。“陀螺序”。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398—399。

周作人, 1932。“桐城派对新文学的影响”。另载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189—190。

周作人, 1951。“《迦因小传》”。《亦报》1951年03月11日。另载黄乔生(选编), 1996: 45—46。

周作人, 1956。“鲁迅与清末文坛”。另载周作人(1997)《关于鲁迅》(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253—254。

周作人, 1971。《知堂回想录》。香港: 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周作人, 1998。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周作人[会稽平云], 1906。“《孤儿记》凡例”。原载小说林社1906年版《孤儿记》。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177。

朱羲胄, 1949。《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台北: 世界书局。

朱义禄、张劲, 1998。《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紫英, 1907。“《新庵谐译》”。原载《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五号。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73—274。

自由花, 1903。“《自由结婚》弁言”。《自由结婚》。自由出版社。另载陈平原、夏晓虹(编), 1997: 109—110。

邹振环, 1996。《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邹振环, 1998。《江苏翻译出版史略》。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邹振环，2000。《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邹振环，2000。《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樽本照雄（编），1988。《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清末小说研究会。

樽本照雄（编），2002（1997）。《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

樽本照雄，2000。“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经日本传到中国的翻译小说”。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1—171。